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郑振铎书话

 **BOOK**
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

《鲁迅书话》

古时序跋之文均为小道，后人未有以此为业者。故章太炎云：“序记之属，古人所轻。”近来书话盛行，成一时之俏，风尚起矣。余历数众家，而鲜有提及鲁迅者。今辑《鲁迅书话》一册，引世人一阅，欲证之于学界。晚清以降，书话家者流，鲁迅乃第一人。先生曾游学东瀛，得西学之魂，后涉猎金石，校辑野史，倡导木刻，又译介域外文明，以白话文而名显天下。先生读书之多、之广，为现代一绝，而书话更巍巍大气：不掉书袋，不迂腐自娱，亦无绅士“雅”态。先生之文，上究远古，旁及异邦，近逮人生，一言一语，苍然深邃，情致极焉。其所云有康德、尼采之气，其所爱在弱小之民；读古书而知旧世之弊，论世道则不畏朝野短长。其文贵于浑厚冷峭，于书卷气杂以斗士风采。夫鲁迅书话，智者之言、精英之言、人间真言也！无趋古之调而多人道之声，非西崽气而有东西合璧之神。拒闲适于门外，引悲慨于书林。“心事浩茫”，“寄意寒星”，立人兴邦之语泽被世人。夫子之语，洋洋兮多生命哲思，浩浩乎为旷世奇文。读鲁迅之书，而不阅其书话者，便不解其知识结构，亦难悟其精神真义也。

（孙郁）

《周作人书话》

周作人嗜书。购书、藏书、抄书、订书、谈书、评书、著书，其与书如形与影。

周氏少时接受旧学训练，颇涉野史笔记，自述由杂学入门。后步长兄树人（鲁迅）后尘，求学南京，留学日本，得异域文术熏陶，参较中西，遂淹博贯通。此可谓由杂而一。“五四”时代，本思想启蒙之旨，于神话学、民俗学、生物学、性心理学等东西洋著述，多所译介，于中国思想革命及新学科之创立，功不可没。此可谓由一而杂。此后转而广览中国古代笔记，提要勾玄，披沙拣金，用功甚勤。推崇平实态度，讲伦理准乎自然，论道义力避空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同情而宽容，不责备于古人，唯佳言之务得，思有惠于后学。常述先贤通达之论，公诸同好，其为书话，蔚成大观。此乃由杂复归于一。

周氏于书，见多识广。学问无穷，人生有涯，杂而一，一而杂，又复归于一。后之学者，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欲得读书之秘法。周氏尝撰读书诗一首，以饮酒拟之，多饮常饮，一呷便识好丑：世有好事人，扣门乞传授。舌存不可借，对客徒搔首。非不愿借，乃无可借者。此事无捷径，唯苦读之，良久，自知其味。

（黄乔生）

《郑振铎书话》

先父郑振铎一生“爱书如命”。他以一介寒儒，常常倾其囊中所有来买书，而他的买书又绝不仅仅是“癖”，这和他的研究工作及关心祖国的文化是息息相关的。人们从他撰写的书话中，可以时时感受到他的灵魂与书的撞击，倾听到一位爱国者的心声。

他写“读书随笔”，字虽不多，却融汇了作者对每一部书的精辟见解。“关于古版小说”是先父多年从事古小说研究的收获，介绍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古籍版本。“劫中得书记”，是先父在“孤岛”时期，为使祖国大批珍贵文献古籍免遭流失异域的厄运，而竭尽全力进行抢救的真实记录，是他以独特的方式报效祖国的生动写照。“西谛题跋”记录了先父对每本书的认识，寥寥数语却意趣无穷。“漫步书林”是他建国后从政之余写的一组书话。书林里繁花似锦，景色无边；作者如一位导游，与您边走边谈关于“书”的种种，使您在轻轻松松中增长不少知识。

先父身为作家、学者、藏书家，一生离不开书，与书终生相伴，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

像作者一样地去爱书、读书吧！这是本书作者的最大心愿。

（郑尔康）

《阿英书话》

先父阿英生平爱书、藏书、编书、写书，和书打了一辈子交道，连做梦也忘不了书。

在多年革命生涯中，他的藏书历经坎坷。日寇侵占“孤岛”，他将几万册藏书匆匆托人代管，结果损失了大部。到新四军后，他在艰苦的敌后游击环境中，继续搜集各种书籍、报刊，为了妥善保存，费去了大量心血。解放战争爆发后，在敌机疯狂轰炸、扫射下，他冒着生命危险，涉越冰河，把一些珍贵书报，运送到安全地带，为祖国挽救了重要的文献。

他读书的范围广而杂，文学、社会科学、生物学、心理学、哲学……多所涉猎。他学识渊博，造诣高深，话剧、京剧、电影、评论、散文、杂文、小说、诗歌、文学史、美术史，各个领域都留下了成果。

30年代，他就开始写“书话”，尤重晚清文学研究；开新文学史料建设的先河。

打开本书，呈现在你眼前的是一片新的天地：罕见的书籍版本，珍贵的佚文、轶事。从中到外，从古到今。五彩纷呈，醒人耳目。祖国的大量文化遗产，经过他的挖掘、整理，重又焕发出夺目的光辉。你读着一篇篇的书话，仿佛随着作者遨游于广阔无垠的知识海洋……

（钱瓔 钱小惠）

《巴金书话》

有人向书找“颜如玉”，有人向书要“黄金屋”，往往总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真正好读书的人不求“美女”与“金钱”，却乐在书中。因为他们在里边找到了乐趣，获得了知识，认识到世界，领悟出人生。

巴金自小就爱读书，连梦里也在读书。他敞开胸膛，尽量吸收，见书就读，取己所好，日积月累，脑中存有个无形的“仓库”，那是谁也无法抢走的。书，在他寂寞时给以安慰，病痛中减轻他的苦楚，浩劫中予他以希望、鼓舞……。

本书讲的正是他的读书、爱书、买书、赠书、写书、译书、编书，谈说自己的创作，介绍他人的作品，都是他的心里话。全书共分六辑，或从整体上谈书，或评说自己的作品，或为他人的作品置论……还有巴金为书刊撰写的广告！其中有些是《巴金全集》中漏收的，它们连作家自己也已遗忘了。本书目次编定之后，曾送请巴金审阅，首肯。

这位体弱多病的九十多岁的老人，至今仍不忘读书。他说：“读了好作品，我会感到心灵充实，充满对生活的热爱。”

（纪申）

《唐弢书话》

文界之有“书话”一体，唐弢功莫大焉。唐公以作家、学问家为魂魄，以藏书家为筋节，治书话三十余年，成《书话》与《晦庵书话》，恃其书味本色及文章风采，风行海内外。本编选其书话精华，广搜逸文，贯通其六十年间著述，辅以“唐弢读书，我读唐弢”新视角，以编辑体例揭示其“书话六境界”。六境界中自有大智慧，若能“品书会心”，何妨借书话作清妙小品？至于“考镜源流”、“书坛掌故”，复使清妙归于厚实。“序跋甘苦”，苦在包罗某方面之小史，甘在化小史为抵掌闲谈。“装帧学问”及“书城纵横”，写尽访书艰辛、得书喜悦、赏书乐趣。高明读者诸君于“唐弢书话六境界”深处，领略某种潇洒雅致的“人生境界”，亦有流连忘返之感乎？

余尝师从晦庵先生治鲁迅及现代文学凡二年，最喜其《偶成》诗中“平生不羨黄金屋，灯下窗前长自足”之情致。兹重拾其书话境界以证之：书话者，岂止话书乎？亦话“灯下窗前”如此读书人之性情也。知性情所在，即知书话妙谛之所在矣。

（杨义）

《孙犁书话》

文学艺术上的风格，是一种特定的高层次的思想艺术境界。它既从创作者的生活、个性、才情中来，也从其渊博的学识中来，是二者相激相发、相辅相成、无间融汇的结果。

孙犁“对书有一种强烈的，长期积累的，职业性的爱好”。他的一生，是爱书、读书的一生。文史哲经，农林畜牧，金石考古，书法美术，轶闻杂说，等等，凡与社会人生相关的一切，他无不广泛涉猎，取精用宏。在他，阅读历史和阅读现实，是一个双向互补的过程，以此，他在两个方面都读出了自己的见解。作为作家，他的全部阅读和书话写作，又都归趋于文学艺术规律的把握。其书话之作，有飘逸幽远的书卷气，而无单调乏味的学究味，更无卖弄学识之嫌。

《孙犁书话》凡七辑：（一）《幻华室藏书记》；（二）《耕堂读书记》；（三）《耕堂读书随笔》；（四）《耕堂序跋》；（五）《书衣文录》；（六）《芸斋琐谈》；（七）《耕堂书信》。读一读《孙犁书话》，你不只可以真切地领略到历史文化的灿烂辉煌，再次欣赏到这位作家纯朴真诚、清静淡雅的整个创作风貌，更能体悟到：他何以在创作上能够独树一帜的奥秘……

（金梅）

《黄裳书话》

黄裳以书话名。当世之人，若先生于书话体中得大自在者，盖鲜矣！身为报人，志在学苑，故兼学者、作家、记者文脉于一体，厚重而古朴，自然而大方，书卷气与艺术味杂然相糅，悠悠然有古雅清淳之风。先生钟情版本目录之学，探赜明清典籍，尤见功力，于古于今，无隔膜之感。所谈“善本”、“孤本”，多真知灼见，纵横古今，散淡飘逸，多为书林中妙语；而言及现代诸文人轶事，则洗练冲淡，如痴如醉。其所言多书话家肺腑之语，以人生为书，以书为人生，揭天下鲜知之旧闻，或乐古，或讽今，常有久历沧桑、冷眼看世之态。黄裳承“五四”遗风，辨伪、析真，锲而不舍，于混沌之中觅出新径，看似随意，而真义在焉。先生通晓小品之精髓，又杂以白话之韵致，得其要义而成新体。有感则通，思绪所及，援笔书之。其文古而今，今而古；其意浅而深，深而浅。黄裳书话，读之如清风朗月，林中甘泉，良多趣味，能不令我辈珍爱乎？

（孙郁）

序 言

姜德明

现在，书话这种形式已经非常习见了。

特别是在读书界，所有爱书者几乎没有不喜欢读书话的。

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诗话、词话、曲话古已有之，名著多有，唯有书话似乎是近六十年始为人们所用，并逐渐流传，终于为公众所认可。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书话的理解仍各有不同，在理论和实践上，既无统一的定义，写法上也各行其是。书话的形式也许还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的发展和探索，才能更臻完美，认识统一。

现在，人们对书话范围的界定还比较宽泛，多数人把凡是关于谈书的散文、随笔，包括书的序跋，甚至较短的书评，一律目为书话。或者说，书话本来就内容宽广，可以无所不谈，不必强求统一。

但，有些认识已经逐渐为更多的人所接受也是事实。如，书话源于古代的藏书题跋和读书笔记，并由此生发、衍变而成。书话不宜长篇大论，宜以短札、小品出之。书话以谈版本知识为主，可作必要的考证和校勘，亦可涉及书内书外的掌故，或抒发作者一时的感情。书话不是书评，即不是对一本书作理论性的全面介绍、分析和批评。书话不能代替书评。

我常说，书话只要能够引领读者爱慕知识，并唤起他们爱书、访书、藏书的兴趣就好，不必过苛地要求它承担更多的繁重任务。

40年代初，我开始对新文学书刊发生兴趣。在课堂里无法满足的知识，只好到旧书摊前去探秘，开头是盲无所从，碰到什么是什么。一本曾孟朴的《鲁男子·恋》，曾经让我痴迷多时，误以为是新文学最伟大的小说。到了40年代中后期，突然发现唐弢先生写的关于新文学的书话，一下子顿开茅塞，好像找到一位引我入门的老师。我羡慕他的藏书丰美，那些充满魅力的版本一直诱惑着我。我采取的是笨办法，循着他书话中提到的书一一去搜访。读唐弢的书话，打开了我的眼界，如读一部简明的新文学史。

50年代中期，我由《人民日报》读者来信部调往文艺部，在袁鹰同志手下编副刊。他是一位放手用干部的好领导。我在工作中偶有所想，一般都能得到他的支持。当时，袁水拍同志已请西谛先生为我们副刊开辟了《书林漫步》专栏，那当然是书话。这个专栏得到了知识界的好评，可惜所谈的都是古籍，距离一般读者的兴趣稍远。为此，西谛先生后来有意避开冷僻的版本，分别写了买书、分书、整书、访书等接近生活的题目。本来他还可以继续写下去，却因“反右派”、“大跃进”，以及他出访域外不幸遇难，这组文章遂成绝响。西谛先生为我们副刊刊载书话奠定了基础，功不可没。

60年代初，唐弢先生举家北迁。当他刚刚安好新居，我就贸然闯入，请他为我们写书话。他答应了，却流露出某种顾虑，问我：“现在还有读者对这类文章感兴趣吗？党报上介绍旧书版本会不会有人反对？”我打消他的顾虑，并同他一起商定，可以先从革命书刊和左翼文艺运动的书刊谈起，再一步步地涉及进步文艺，如文学研究会的诸大家和巴金等。所以，晦庵的书话一开张，便谈李大钊、鲁迅，以及国民党的禁书和革命者的伪装书。至于含有书斋趣味的藏书票、藏书印、线装书籍装帧等，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

是在 1962 年，作者在出版《书话》单行本时临时补入的。如此谨慎，今天的读者也许会大惑不解。

在这以后，我又联系阿英先生写了近代文学丛谈，请陈原先生写中外读书小品，赵家璧先生写编辑忆旧，钱君匋先生写书籍装帧琐谈，李健吾先生写艺术短筒，路工先生写访书见闻录，还有丁景唐、瞿光熙、胡从经等先生写的有关新文学的书话。以上有的虽然没有用书话的招牌，实际都没有离开书。我以为报纸副刊是发表书话的理想园地，不仅可以提高报纸的文化品位，也是普及文学史和培养读者艺术修养的极好方式。书话兴盛一时，到 1964 年强调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大批判”的时候就匆匆收场了。

“文革”前夕，我已沉默，静候批判。因为报社已经抛开文艺部，背后整理铅印了十来种文艺部工作错误的专题材料，其中的两份，即关于唐弢的书话，以及读书随笔的。罪名之大、上纲之高已令人胆战心惊。到了“文革”开始，却又被“造反派”们当作“假批判、真包庇”，认为书话之类正是为 30 年代的反革命文艺黑线摇旗呐喊，是有计划的一个阴谋活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书话的兴衰，莫不与时代的政治起伏有关，这时候我才想起当年唐弢先生的顾虑并不是多余的。

至今为止，人们都承认唐弢先生的书话影响最大，这不是偶然的。他在篇幅有限的方寸之地，能给人以知识和文采，表达出一个爱书人的品格，这不是任何一位作者都能达到的境界。1979 年 10 月，他在编完《晦庵书话》时说：“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这样，我以为书话虽然含有资料的作用，光有资料却不等于书话。”他的经验已成为人们研究书话特点的重要依据。说他在书话写作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也不过分。

近代藏书家傅增湘的《藏园群书题记》、周叔弢先生的《自庄严堪藏书题识》、邓之诚先生的《桑园读书记》、马叙伦先生的《读书小记》、《读书续记》等，尽管偶然会间及掌故，重点仍在资料和校勘，有的已近于目录学的范畴，更不要讲抒情了。唐弢先生却强调文学因素，并把它理论化了，使枯燥的藏书题跋走出专门家的书斋，化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这是后人不应该忘记的。当然，我们也不能机械地理解为书话必得抒情，一定谈掌故。这要因书而定，不能勉强。以知识为主没有错，写得生动活泼一点也是必要的。邓之诚先生是以文史学家的眼光写书话的。1955 年他在编完自己的《桑园读书记》后说，他的读书记以“提要”和“劄记”合成。“提要”是“撮其内容，使未读是书者稍明途径，且知某事见某书，为切实可用也”。“劄记”则“间附己见”，意在表述个人的观点。这也是经验所得，一家之言，是书话的另一种写法。近年，孙犁同志写的《书衣文录》，更一反传统藏书题跋的写法，甚至把与书本身全无关系的一时感触写在书衣上。但，没有人不承认那是书话，而且是思想深刻、别具一格的书话。

有人说最先用“书话”为题写作的不是唐弢先生，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怎么重要。我也没有作过考证，只是在翻旧书刊的过程中，见到 1937 年 10 月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前后，阿英先生写过一组《鲁迅书话》；同年 4 月，他还在《青年界》第 11 卷第 4 号上发表了一组《红楼梦书话》。但，也不能就此断定最早用“书话”的是阿英。作家曹聚仁早在 1931 年 8 月 15 日出版的《涛声》半月刊创刊号上，便以《书话二节》为题了。同月 22 日出版的《涛声》

第2期，他又发表了《书话·2》。如果有耐心去翻阅一下，1933年和1934年的《申报·自由谈》，那里还有另外几个作者，也在以“书话”名义写读书小品。书话在30年代曾经一度繁荣，丝毫也没有影响唐弢先生在书话创作方面总其大成的功绩和历史贡献。前人的实践我们都应当尊重。文学史上从来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地会跳出一个伟大的天才来。

为了适应当前读书界的需要，也为了向读者提供一部系列的权威读物，北京出版社邀我来主编“现代书话丛书”。我认为这是出版家注重基础工程的举措，有利于长远的文化建设。经过筹划，现在推出了八位作家，都是撰写书话的大家，有过历史的贡献。

在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过程中，我与各卷选编者及出版家进行了反复的磋商。时间并不充裕，这也可以说是一次紧张、团结的合作。我们想尽力做得完美一点，怕亦有不周之处。如有不当，希望读者不吝赐教。

1996年4月于北京

郑振铎书话

第一辑 读书随笔

步韵诗

中国诗里，有一个束缚真情最甚的桎梏，便是步韵，在作步韵诗者的意见，不过以步和前人或同时人的韵，而能工切，益可显出他们的雕斫的才能。而不知五七言的格律，已足限制真情的流露；如并选韵的自由而更剥夺之，则恐即诗才极盛的人，也决不能畅其所欲言了。纳兰容若有一段话说得极好：

今世之大为诗害者，莫过于作步韵诗。唐人中晚稍有之，宋乃大盛。故元人作《韵府群玉》。今世非步韵无诗，岂非怪事。诗既不敌前人，而又自缚手臂以临敌，失计极矣！愚曾与友人言此。渠曰：“今人只是做韵，谁曾做诗！”此言利害，不可不畏。若人不戒绝此病，必无好诗。（《淶水亭杂识》卷四）

（《小说月报》十四卷一号，一九二三年一月）

纳兰容若

纳兰容若是明珠的儿子，很有些诗才。他刻过一部很重要的《通志堂经解》，又著有《侧帽词》、《饮水词》，近阅他的《渌水亭杂识》，觉得其中有几段论诗的话，极有见地。

自五代兵革，中原文献凋落，诗道失传，而小词大盛。宋人专意于词，实为精绝。诗其尘饭涂羹，故远不及唐人。

人情好新，今日忽尚宋诗。举业欲干禄，人操其柄，不得不随人转步。诗取自适，何以随人。

诗之学古，如孩提不能无乳姆也。必自立而后成诗，犹之能自立而后成人也。明之学老杜学盛唐者，皆一生在乳姆胸前过日。

曲起而词废，词起而诗废，唐体起而古诗废。作诗欲以言情耳。生乎今之世，近体足以言情矣。好古之士，本无其情，而强效其体以作古乐府，殊觉无谓。

这种见解，都是前代的人所不敢说的。

（《小说月报》十四卷一号，一九二三年一月）

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一诗，为中国最长的叙事诗。欧洲各国，前如希腊，后如英、德，其最初之文学皆为史诗。中国则史诗极不发达。《诗经》里的诗，以抒情诗及颂歌为最多。后来作者，只白居易最善于叙事诗，他所作的却都不很长。所以《孔雀东南飞》虽不及二千言，而已被称为古今第一长诗。

这首诗的字句，各本颇不同，文词也有费解的地方。最可怀疑的便是，前言“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后言：“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在二三年中小姑决不会由扶床而走的孩子，骤长至与新妇同长。即以二三为相乘之数，言新妇在焦仲卿家已六年，而六年的时间，也不能使小姑由扶床而走，而长至如新妇之长。《乐府诗集》载此诗，将“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二句删除。宋本的《玉台新咏》也不曾载此二句（据丁福保《全汉魏六朝诗》附注）。但考《古诗纪》及通行本《玉台新咏》则皆有此二句。丁福保以为“此二句乃后人添入”，实为臆断之言，不足信。细读原诗，“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四句，语气融成一片，决非后人添入，且后人也无故将前后矛盾之句添入之理。如删去“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二句，则“新妇初来时，小姑如我长”二句，便变为毫无意义了。宋人最好臆改古书。《乐府诗集》及宋刻《玉台新咏》见此处不可解，便删去二句，以求其无病。而不知斧痕显然，反失原诗低徊悲惋之意。丁氏不从《玉台新咏》，而信宋人，更强造后人添入之言，殊可笑！我以为古书偶有错，并不要紧，决不会因此便失其真价。我们遇到这种地方，只应该明明白白的把他举出，不宜巧辞强解，代古人掩护。这种无理的武断的掩护，中国人最喜为之。对于古书，是有害无益的。

（《小说月报》十四卷一号，一九二三年一月）

碧鸡漫志

古代的诗，都是可以歌唱的。《诗经》便是一部颂神、婚丧、宴会的乐歌集。大概他们的诗，都是先有情而后有言，然后才配以音律。所以情感不至受音律的拘束而难于充分表现。自汉以后，乐府渐兴，乃至先有音律，而后有文辞。音律不能表现情感，而情绪反受音律的支配。中国抒情诗不大十分发达，大概这也是一个原因。宋王灼的《碧鸡漫志》，对于这一层，有几段话说得极好：

或问歌曲所起，曰：天地始分而人生焉。人莫不有心，此歌曲所以起也。《舜典》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诗序》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乐记》曰：“诗言其志，歌咏其声，舞动其容。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故有心则有诗，有诗则有歌，有歌则有声律，有声律则有乐歌。永言即诗也，非于诗外求歌也。今先定音节，乃制词从之，倒置甚矣！而士大夫又分诗与乐府作两科。古诗或名曰乐府，谓诗之可歌也。故乐府中有歌，有谣，有吟，有引，有行，有曲。今人于古乐府，特指为诗之流，而以词就音，始名乐府，非古也……

古人初不定声律，因所感发为歌，而声律从之。唐虞禅代以来是也，馀波至西汉未始绝。西汉时，今之所谓古乐府者渐兴，晋、魏为盛。隋氏取汉以来乐器、歌章、古调并入清乐，馀波至李唐始绝。唐中叶虽有古乐府，而播在声律则鲜矣。士大夫作者，不过以诗一体自名耳。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

他的见解，真是很高！现在的歌曲，也都是先有歌然后制谱，正是“因所感发为歌，而声律从之”的。

（《小说月报》十四卷一号，一九二三年一月）

李后主词

好的诗词，情感必真挚，词采必美丽。如春水经流于两岸桃花、轻舸唱晚之境地中。读者未有不为其美景所沈醉的。李后主词，在许多词人中，可算是一个已到了这个境地的。亡国后所作，尤凄惋动人。如“离恨却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凤笙休向月明吹，肠断更无疑”、“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及“独自莫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句，谁不读之凄然呢？苏东坡议后主《破阵子》“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诸语，以为“后主既为樊若水所卖，举国与人，故当恸哭于九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不应“挥泪宫娥，听教坊离曲”。不知此正后主至情流露处。他心里不愿哭庙谢民，便不哭庙谢民。此种举动，实胜于虚伪的做作万万。好的作品，都是心里想什么，便写什么的。

（《小说月报》十四卷一号，一九二三年一月）

唐诗

王若虚说：“崔护诗云‘去年今日此门中’，又云‘人面只今何处去’。沈存中曰：‘唐人工诗，大率如此。虽两今字不恤也。’刘禹锡诗云‘雪里高山头白早’，又云‘于公必有高门庆’。自注云：‘高山本高，于门使之高，二义殊。’三山老人曰：‘唐人忌重叠用字。’如此二说，何其相反欤？予谓此皆不足论也。”（《滹南遗老集》卷三十八）

像这种不足论的解说，“诗话”里不知道有多少。他们常常因此发生了许多无聊的辩论。若虚以“皆不足论”四字评之，真是痛快之至。

（《小说月报》十四卷二号，一九二三年二月）

郑 厚

郑厚是郑樵的哥哥，年长于樵四岁。他的著作已散佚。只有《说郛》里节录的一部《艺苑卮言》到现在还流传在人间。偶读《溇南遗老集》，见所引郑厚的话，都是很有见地的。现在且钞关于文艺的一段，以见他的文学批评的一斑。有机会还很想把他的遗著辑成一本。但此愿恐非一时所能达耳。

魏晋以来，作诗倡和，以文寓意。近世倡和，皆次其韵，不复有真诗矣。诗之有韵，如风中之竹，石间之泉，柳上之莺，墙下之蛩。风行铎鸣，自成音响，岂容拟议！夫笑而呵呵，叹而唧唧，皆天籁也。岂有择呵呵声而笑，择唧唧声而叹者哉！（《溇南集》卷三十九引）

（《小说月报》十四卷二号，一九二三年二月）

王若虚的文学评论

我们研究中国的“文学评论”(Literary Criticism),对于王若虚应该加以二十分的注意。他对于诗与文,都有独特的见解;对于古代文艺的不合理处,与批评者的曲说附会处,都能大胆的举出,痛快的攻击。自刘彦和、刘知几、郑渔仲、朱晦庵后,我还没有找到一个能够与他并肩而立的批评家。而他的实事求是、勇于求真的精神,除郑渔仲外,更无人能及。现在且举他批评黄山谷诗的几段话,以见其批评精神的一斑:

山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此所以力追东坡而不及欤?.....

山谷诗云:“语言少味无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夫阿堵者,谓阿底耳。顾恺之云:“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殷浩见佛经云:“理应阿堵上。”谢安指桓温卫士云“明公何须壁间阿堵辈”是也。今去“物”字,犹“此君”去“君”字,乃歇后之语,安知其为钱乎?

山谷诗云:“新妇矶边眉黛愁,女儿浦口眼波秋。”自谓以山色水光,替却玉肌花貌,真得渔父家风。东坡谓其太澜浪,可谓善谑。盖渔父身上,自不宜及此事也。(《滹南遗老集》卷三十九)

(《小说月报》十四卷二号,一九二三年二月)

几部词集

五七言的古律诗，在唐以后，便衰落了下去，现在虽还有人崇拜所谓“宋”诗，然而为“宋”代文学的骄傲的，乃非“诗”而为“词”，正如为元、明二代的骄傲的，乃非“诗”、“词”而为“杂剧”、“传奇”一样。

“词”是从“乐府”蜕变出来的，在五七的古律诗外别启一新的文体。当“诗”的一体，已成为陈言腐调，不复有真率活泼之气时，“词”的作家，便如经过濛濛春雨后的春笋一般，纷纷的拔地而出；在倦极欲眠的文坛里，射进一道新鲜的曙光。我们只要把五代、宋时的“诗”与“词”拿来比较一下，便可知二者精神的相差了。

所以我们欲了解五代及宋的文学的真精神，便非对于他们的词集，加以十二分的注意不可。

现在就我所知道的，把较为重要的几部词集写在下面。

(一)《词律》清万树撰。原刻本，石印本。这部书很重要，对于历来的错误，校正不少。

(二)《词综》清朱彝尊编，王昶补。原刻本，光绪间金匱浦氏重刻本。

(三)《词苑英华》汲古阁刊本。这部书汇刊《花庵词选》、《中兴绝妙词选》、《草堂诗馀》、《花间集》、《尊前集》、《词林万选》及《诗馀图谱》，极为重要。惜不易得。

(四)《六十家词》汲古阁刊本，石印本。

(五)《名家词集》《粟香室丛书》本。

(六)《词学丛书》原刊本。这部书汇刊《乐府杂词》、《阳春白雪》等六种。

(七)《四印斋词丛》光绪间王鹏运刊本。

(八)《历代诗馀》乾隆间原刊本。

(九)《古今名家词刻》原刊本。

(十)《彊村丛书》现代宋祖谋刊本。此书搜罗最为宏富，校刊亦精，计有总集四种，唐诗别集一家，宋词别集一百十二家，金词别集五家，元词别集五十家。

(《小说月报》十四卷三号，一九二三年三月)

李清照

我们很不容易在中国的诗词里，找到真情流露的文字。他们为游戏而作，为应酬而作，多半是无病而呻的作品。其真为诚实的诗人，真有迫欲吐出的情绪而写之于纸上者，千百人中，不过三四人而已。李清照便是这最少数的真诗人中的一个。她的《漱玉词》和《金石录后序》，都足以使人读之而凄凉悲抑不能自己的。我所见的《漱玉词》有二本，一为汲古阁本，一为四印斋本。四印斋本较汲古阁本为完备。其中好句极多，如“记取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更添，一段新愁”（《凤凰台上忆吹箫》）、“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一剪梅》）、“暖雨晴风初破冻。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酒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粉花钿重”（《蝶恋花》）等语，都是极好的。《茗溪渔隐丛话》曾引她批评前代词人的话，几无当她意的人。虽秦七（少游）黄九（鲁直），也受她的讥弹。其实她的词，确较秦、黄诸人为高。秦、黄等仅以词工为主，而她的词则都是从心底流出的。

（《小说月报》十四卷三号，一九二三年三月）

警世通言

冯犹龙所编辑的《喻世》、《警世》、《醒世》的“三言”，是平话系短篇小说的大宝库，其中至少有十之三四是旧本。《醒世》传本颇多；《喻世》以《古今小说》为蓝本，而选了二十一篇，又加以从《警世》、《醒世》选出的二篇，故亦无甚重要。惟《警世》则四十篇中，不经见之作甚多。此书的出现，对于研究中国小说者实有很重要的关系。第一，当然是因为她供给了好几十篇的重要的短篇小说。《今古奇观》所选者，不过四分之一而已，其中四分之三皆为不经见之作。研究宋、元、明短篇小说的人，加上了这三十篇的作品，其关系的重大，我们很可以想见。第二，《京本通俗小说》的发觉，怀疑的人不少。但在《警世通言》中，选《京本通俗小说》者竟有七种之多；《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即《京本》之《拗相公》，《陈可常端阳仙化》即《京本》之《菩萨蛮》，《崔待诏生死冤家》即《京本》之《碾玉观音》，《范鳧儿双镜重圆》即《京本》的《冯玉梅团圆》，《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即《京本》的《西山一窟鬼》，《小夫人金钱赠年少》即《京本》的《志诚张主管》。繆刻《京本》时，所言《定山三怪》一卷，破碎不完，故未录入者，竟亦在其中，改名为《崔衙内白鹞招妖》，编《警世》者，并于题旁特别注明：

“宋人小说，题作《碾玉观音》”

“宋人小说，旧名《西山一窟鬼》”

“古本作《定山三怪》，又云《新罗白鹞》”

有了这个有力的旁证，我们很可以不必再致疑于《京本》的伪作了。而《定山三怪》一卷竟在这里发见的事实，更足以使我们高兴。又有《计押番金鳧产祸》一卷，原注“旧名《金鳧记》”。玩其文句的结构，以及其描状的活泼生动，当亦系宋人平话之一种。

宋人平话是文学史的珍宝之一，可惜我们不能得到十种以上。繆刻的七种是很重要的，而在《警世》中也竟有了七种以外的二种，这真是一种并不寻常的发见。

日本内阁文库中有一种平话小说集，名《清平山堂》，凡选入平话十五种，其中当亦有宋人之作，可惜不曾见到原书，无从下断语。最近，听说《永乐大典》中的“平话”一部分，又有在北平发见的消息。惟不知所发见者是否六十卷的全部，或仅为其中的一部分。然无论如何，这个发见的重要是无可否认的。我们相信其中的古平话——宋、元人的词话、诗话——一定是很多的。这个发见也许较《警世》的刊布更为惊人耳目。

《警世》将由商务刊行，所根据的一本，其来源亦自日本，惟非内阁文库藏本（疑系尾州本），其中卷数，颇多脱讹，又无总目，无插图，疑系重刊本，或书贾借旧版补刻重印者。

（《小说月报》二十卷一号，一九二九年一月）

关汉卿绯衣梦的发见

关汉卿的杂剧六十二种，传于今者，仅《元曲选》中的《玉镜台》、《谢天香》、《金线池》、《窦娥冤》、《鲁斋郎》、《救风尘》、《蝴蝶梦》、《望江亭》八种，又，《元人杂剧三十种》中的《双赴梦》、《拜月亭》、《单刀会》、《调风月》四种，凡十二种而已。此外，我们知道在陈与郊编的《古名家杂剧》中尚有《钱大尹智勘绯衣梦》一种。然《古名家杂剧》存亡不可知，此剧的存亡遂亦在不可知之列。近来涵芬楼购得明顾曲斋所刊的十六种曲，《绯衣梦》竟亦在其中。这个无意中的发见，使我高兴了好几天。这个消息，想也是研究元曲的人所皆乐闻的吧。顾曲斋不知系何氏的“斋名”，顾曲斋所刊元曲，究竟有多少种也不能知道。现在知道的顾曲斋所刊曲，仅有涵芬楼藏的十六种，日本盐谷温君藏的二种，共十八种而已。涵芬楼的一部，插图皆已被人撕去，盐谷君的一部，则尚有插图，至为精美。当是万历时或其后的刊本。顾曲斋所刊元曲，与《元曲选》所刊的，其面目却甚有不同之点。上月我到南京江南图书馆去时，曾借出八千卷楼旧藏的《元明杂剧二十七种》，与《元曲选》校对，其面目亦大不相同。然丁氏的《元明杂剧》与顾曲斋所刊的元曲，其内容却并无差异。如就二书所同收的罗贯中《龙虎风云会》一剧而言，我校对了全剧之后，相差者不过数字而已，且这数字也还是刻雕上的偶错。此可见《元曲选》与同时明人所刊的元曲，其不同的程度是如何的大。臧晋叔氏自己在序上说，他所得的是内府藏本，故与坊本不同。然这话却未必十分可信。臧氏所谓“内府藏本”也许竟是如金圣叹氏的《古本水浒传》、毛宗岗氏的《古本三国志》同是“乌何有”之物，也未可知。我们就臧氏的削改汤氏“四梦”的事实观之，可知臧氏的削改元曲并不是不会有的事。叶堂氏在他的《纳书楹》上便已猛攻着臧氏，说他是一个“孟浪汉”，不知埋没多少好的元曲了。

《元曲选》以外的许多明人刊、或元人刊的杂剧集的出现，乃是最可乐观的事；即使并没有佚著的发见，也已足够订正《元曲选》的本子了。十数年前的元曲学者以《元曲选》为惟一研究资料的迷梦，今日殆已打得粉碎了。元、明刊的元曲集子更有多少种呢？这是我们所不能知道的。但我们却颇希望像《元人杂剧》、《顾曲斋所刊曲》之类，能够再发见几种。这也许并不是一种不可能的奢望。同时并希望已发见的几种元曲，能够逐一的印行。这有裨于元曲研究者却非浅鲜呢。

有人疑心《顾曲斋所刊曲》，即为陈氏的《古名家杂剧》。我没有见过陈氏的书，不敢下断语。然我的意思，却以为并不是一书；因为在我们所知的十八种顾曲斋刊的元曲中，很有几种与陈氏所刊的《古名家杂剧》不同的。

明人刊行元曲的，当必甚多。他们虽没有臧氏那末大的魄力，一时刻了百种之多，然而他们却都是较臧氏更为小心的刻书者，不敢以意擅改古作的。所以他们刊的元曲，多半是最近于元曲的真相的。

（《小说月报》二十卷一号，一九二九年一月）

投笔记

偶在涵芬楼的善本书室里，发见了一种不大经见的传奇，颇为之喜跃。这一种传奇便是丘璇的《投笔记》。璇所作的有《香囊》（一作《罗囊》）、《举鼎》、《五伦》、《投笔》诸记。其《香囊记》是否即为《六十种曲》中的《香囊记》（相传是邵给谏所作的），我们已不可知。《举鼎》、《五伦》其存亡已在不可知之数。《投笔记》的发见，对于研究丘璇的人确是一个大消息。即在“传奇史”的初期上，也确是一个足以令人注意的消息。更有趣的是，这本《投笔记》乃是二南里人罗懋登所注释校刊的。罗懋登是《三宝太监下西洋记》的作者，也曾注释过《拜月亭》。有了这部《投笔记》的发见，我们也可想象，他所注释的决不仅止《拜月》、《投笔》这两种了。将来也许有机会可以见到更多的出于他的手注的东西吧。

《投笔记》分为四卷，三十九出。叙的是班超投笔从戎的事。其中也免不了英雄矢志，义士赠金，奸人诬陷，封赠团圆的“传奇套子”。好像明人的传奇，除了这样的写法以外，便不易得到读者、演者的同情似的。其布局的“烂调”，有似于“才子书”的《平山冷燕》、《玉娇梨》诸小说。即汤临川也不能外此，更不必说别的作家了。琼山的《投笔记》也是一部沉没于这个圈套中的作品，且也不能算是一部“超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作品，不过是许多平平的明人传奇中的一部而已。

他在《投笔记》的第一出“引戏”的末所唱的“家门”中，已把全书的提要说得很明白：

[沁园春]后汉班超，学通文武。早岁孤穷，为甘旨无给，佣书朱户。包羞忍耻，顿挫英雄。投笔归来，得逢相士指点，携书拜九重。承诏命，独持汉节，远使到西戎。奸谋忌劾班超功，老母遭冤病狱中。幸有贤妻割股，大家上疏。妻来京邸，骨肉相逢。柔服外夷，三十六国。定远元功，万里封归故里。一家欢会，旌表励精忠。

更有四句话是：

邓二娘力行孝道，徐克振义重交游。

曹大家为嫂上表，班仲升投笔封侯。

他的目的，只是说出：“推世道，有更变，有乘除。风云万里，大鹏展翅只须臾。……试看《投笔记》，方显伟男儿。”那也不过是很平凡的对于穷通显达的通俗的见解罢了。

（《小说月报》二十卷四号，一九二九年四月）

马致远杂剧

前几天赵景深先生在《自由谈》上论及马致远杂剧；文中有两点错误，值得一说。

第一点，赵先生举出马氏小令四首，以为系马氏《孟浩然踏雪寻梅》等四剧的胚胎。这是不大可信的论断。谁知道马氏那几首小令是作在杂剧之前的呢，还是作在其后的？小令里发挥旷达的厌世观，是一般元曲家共同具有的思想；怎么能强指马氏先有此种小令所具有的胚胎，然后才发展而成为杂剧呢？果是此说，则元人小令中，咏陈搏、咏孟浩然等等者也不在少数，难道又是马氏杂剧的胚胎？元、明人小令，歌咏崔、张故事者最多（《雍熙乐府》有《小桃红》百首，咏西厢事；成化间所刊《赛驻云飞小曲》，亦有咏西厢事者多篇）。难道他们也都是王实甫《西厢记》的胚胎么？我以为研究一个作家的作品，除明白的知道其作品产生的确实年月者外，便很难决定某篇是某作的胚胎，或某作是由某文某诗发展而成的；更不能因为小令简短，便硬指他们必为杂剧的胚胎。我们只能说，马氏这些小令在思想上和他的杂剧是同样的——当然出于同一位作家之手下的东西，思想自不会相差得很远的。

第二点，赵先生无条件的相信了王国维《曲录》的记载，以为《孟浩然踏雪寻梅》一剧是马致远所作。其实马氏压根儿便不曾写过此剧。我们在《录鬼簿》、《太和正音谱》诸最古的记载上，都找不到马氏剧目里有所谓《踏雪寻梅》的一剧。强派此剧为马氏作者，始于明人息机子的《古今杂剧选》。王国维根据了息机子之说，便也将此剧加入马氏剧作之列。说来可笑，息机子所录的《踏雪寻梅》剧原来便是周宪王（朱有燉）所作的那一本。宪王此剧，作于宣德七年，有自序，说明其作此剧的意旨甚详，当然不会是抄袭或改作马氏的。（《息机子杂剧选》，北平图书馆藏；周宪王《踏雪寻梅》，见商务版《奢摩他室曲丛》）为什么息机子硬把这张冠改戴在那李头上，我们不能知道；难道他也熟读马氏小令，觉得有些小令乃是此剧的胚胎么？明人如此伪造作者姓名的事，是司空见惯的，于散曲及剧曲尤甚。（《吴歙萃雅》等坊本，最荒唐，作者姓名错误极多。）我们必须仔细剖析，一不小心便会上他们的大当。王国维《曲录》的许多错误，便往往都因此而得之。就今日所已有的正确的知识，去纠正王氏及诸明人的错误，而别编一部中国戏曲总目（大东版《曲海总目提要》错误尤多），当不会是什么无聊的工作罢。

（《申报自由谈》，一九三三年九月九日）

第二辑 关于古版小说

水浒传的续书

《水浒传》的续书颇多，而以陈忱的《水浒后传》与俞万春的《荡寇志》为最重要。

陈忱为明末遗民，浙江乌程人（俞樾：《茶香室续钞》十三），自号古宋遗民。忱之作此书其用意与龚圣与之作《三十六人赞》正同。圣与生在宋末，目睹蒙古民族之侵入中原，忱则生在明末，也身历满洲人的统治。他们不甘为异族的奴隶，因而希望有英雄豪侠起来，光复祖国——即使这些英雄，是杀人放火的暴徒，也是可爱的，可赞许的。水浒英雄因此便为他们所属目。圣与只作了一篇赞，而忱则写了《水浒后传》四十回。这四十回的《水浒后传》是直接于百回本的后面的。第一回第六至七页（原刊本上）作者借阮小七口中说道：“无奈宋公明日夜望着招安。后来天子三降诏书，宿太尉保奏，大家就收拾朝京。即差我们征伏大辽，剿除方腊，赤心为国，血战数年。”在后文也处处的提起征方腊及征辽的事，却从不曾提起过一句“田虎、王庆”的话。陈忱未必没有见到过余氏全本《水浒》，也许连杨定见的百二十回《水浒全书》也见到过。然而为了避免异族统治者的疑忌之故，雁宕山樵的序，却假托作于万历戊申，作者姓氏，却题着古宋遗民，原刊本每页之下，也都题着“元人遗本”四字。卷首《论略》也说：“不知何许人。以时考之，当去施、罗未远，或与之同时，不相为下，亦未可知。”既然处处都要表示不是作于清初而是明代万历以前的书，当然不得不割舍了征田、王的故事了。由此益可证明：征田、王的二段故事，为万历时候的“新增”，乃是人人都知的事实了。卷首的《论略》说：“《后传》为泄愤之书。愤宋江之忠义，而见鸩于奸党，故复聚余人，而救驾立功，开基创业。愤六贼之误国，而加之以流贬诛戮。愤诸贵幸之全身远害，而特表章草野孤臣，重围冒险。愤宦宦之嚼民饱壑，而故使其倾倒宦囊，倍偿民利。愤释道之淫奢狂诞，而有万庆寺之烧，还道村之斩也。”全书概略，已尽见于此。其中最寓深意的是“开基创业”一件事。中原既然为少数民族所占据，不甘为奴的英雄之士，便只好航海远去，独立一邦。这是作者的寓意，也就是作者所希望而未能实现的。宋江诸人死后，梁山泊未死的英雄尚有三十二人，然皆散在四方，“如珠之脱线，如叶之辞条，再不能收拾到一处。”不料权奸尚在，怨毒尚深，这三十二人，几乎个个被逼，重演“逼上梁山”的几幕既悲且壮的戏文。阮小七等既被逼而重占山头为盗，李俊等也受害而乘槎远去，占了暹罗国为王。而呼延灼、关胜诸人，则力为宋人抵御金兵。然时势已非，诸位英雄虽尽其心力，也只能撑住半壁江山而已。最后，高宗正式封李俊为暹罗王。兄弟聚会，君臣赋诗。结果是大圆满。这样的结束，仿佛很可大快人意，弥补了前书“神聚蓼儿洼”的不可弥补的悲剧。然而作者的意志却不在此。他一开头便使阮小七在梁山泊感旧思故，意境已极凄清。其后“浔阳江闷和酒楼诗”（十六回），“小相逢古殿话新愁”（二十六回），“武行者叙旧六和塔”（二十八回）诸节，也无不有“临风泪零”，“车过腹痛”之感。作者之意，实不在弥补缺憾，而在怀念英雄。全书充满了凄凉之况，如深秋夕照，空山独立，凉风吹过松顶，簌簌有声。我们读了这部续书，只有更慨然的怒权奸之误国，伤英雄之凋落而已。作者如果不是一位伤心人，怎么能创造出这样的一个伤

心之情境呢？雁宕山樵的序说：“必其垂老奇穷，颠连痼疾，孤茆绝后，而短褐不完，藜藿不继，屡憎于人，思沉湘蹈海而死。必非纡青拖紫，策坚乘肥，左娥右绿，阿堵堆塞，饱厌酒肉之徒，能措一辞也。”这便是作者自己的自况吧。下文且引一段来看：

……那阮小七山前山后，各处走过一遍，甚觉伤心。叫伴当搬上祭物，摆在忠义堂空地上，点了香烛，满满的斟六七十大碗酒，朝上乱拜几拜，叫道：“晁天王、宋公明二位哥哥，众兄弟英魂不昧。我阮小七一片诚心，备些酒肉，重到山寨里，望空浇奠。众位都要似生前一般开怀畅饮。虽是被奸臣所算，害了性命，却也天下闻名，道是我等替天行道，忠心为国的好汉子。我阮小七他日死后，自然魂灵随着哥哥同在一处。”说罢，两泪交流。又磕了几个头，烧化纸帛，叫伴当把猪羊切碎，荡起酒来，大家来吃。伴当道：“不曾带得刀来，怎处？”阮小七道：“不妨，我腰边有解手刀，割来吃罢。”掀起衣襟，伸手去摸，笑道：“阿呀，也失带了。也罢，你就把手撕开。”伴当撕肉荡酒，团团坐定，大块肉，大碗酒，吃了一回。阮小七酒已半酣，揎拳裸臂的，说与伴当们道：“你们不晓得，这是忠义堂，前面扯起一扇杏黄旗，旗上写着‘替天行道’四个大字。兀的不见石柱倒在地上哩！大堂中间，供养晁天王灵位。左边第一把交椅，是寨主宋公明坐。因建一坛罗天大醮，报答神天，七昼夜圆满，上苍显异，坠下石碣，却篆着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员地煞星的姓名。因天文定了位次，不敢搀越，依次而坐。我却是天败星，坐第三十一把交椅。若商议甚么军情大事，擂起鼓来，众好汉都聚堂上，听传号令，好不整肃。那两边还有许多耳房旱寨水寨仓库监房，自从受了招安，尽行拆毁。如今变做满地荒草，几堆乱石了，你道可伤不可伤！”说一回，吃一回，不觉大醉。

雁宕山樵说：“肝肠如雪，意气如云，秉志忠贞，不甘阿附，傲慢寓谦和，隐讽兼规正，名长成串，触处为奇，又非漫然如许伯哭世，刘四骂人而已。”又说：“……中原陆沉，海外流放，是得《离骚》之哀。”作者的心事尽于此矣。

俞万春的《荡寇志》，其立意与情境都与《水浒后传》不同。《水浒后传》作于亡国之后，故怀念英雄。《荡寇志》作于太平天国即将起义之时，故痛恶“替天行道”的英雄。《水浒后传》充满了怀旧之感，故意境凄清，如秋月之孤高。《荡寇志》一心要斩杀起义的英雄，故字里行间都是怖厉的杀气，如入古斗兽之场，刑人之所，白骨委地，碧血染尘。俞氏作此之意，正与金人瑞相同，所以他的《荡寇志》便直接于金氏七十回本的《水浒》之后。金氏所口诛笔伐者尚止宋江一人，一百单八条好汉之死，也只托之于卢俊义的一梦。俞氏则不然。他创造了许多雷部的人物，专来剿除梁山泊英雄。他将那一百单八条好汉，个个都绑上了断头台，个个都不得好死。这与《水浒传》的全书是完全不相拍合的。那末可爱、可敬的李逵、林冲、鲁智深、武松等等也都不脱盗名，同归于尽。《水浒传》的作者创造这几位英雄的初意，岂料到他们竟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水浒故事传布民间好几百年，又岂料到这个故事竟会有了这样的一个结局？一部英雄传奇而演变到这样的面目，真可以说是完全失去了英雄传奇的本相与特色了。作者实在太残忍了，太煞风景了，太辜负了《水浒传》的一部绝好的英雄传奇了。我们读到不愉快的书也有，却从没有读到像《荡寇志》那末不愉快，那末凄厉可怖的。

《荡寇志》又名《结水浒》，自第七十一回（因系紧接金本的第七十回）起至第一百四十四回止，也共有七十回，又多了一回“结子”，正与金本的楔

子相对。俞氏，山阴人，字仲华，别号忽来道人。在他儿子龙光的识语上，叙述他的生平颇详。道光辛卯壬辰间，俞氏随父从戎粤东“征讨”瑶民之变有“功”，获议叙。已而归越，以歧黄术邀游于西湖间。壬寅时，英人侵略海疆，他又献策军门，备陈战守器械。“晚归玄门，兼修净业。”道光己酉（二十九年，即公元一八四九年）卒。著有《骑射论》、《火器考》、《戚南塘纪效新书释》、《医学辨证》、《净土事相》及《荡寇志》等书。《荡寇志》始作于道光之丙戌（公元一八二六年），迄丁未（公元一八四七年）而稿成，凡经二十年，然尚“未遑修饰”。其后，他的儿子龙光乃手校数月而刊行之。

《荡寇志》的意境虽凄怖，然行文健隼，也颇有些动人心肺之处。头几回写陈丽卿的神情，很活泼可喜；像那样的一位女子，粗豪而又妩媚，直率而又婉丽，既不是弱不禁风的才女，又不是鲁鲁莽莽的卖解的艺妓。她活是一位早失慈母，不离父亲寸步，全由他训练出来的不懂人情世故的好女子。但到了后来，丽卿便过于不像一位女子了。她的父亲陈希真的人物，更是一位世间所少有的超人，文武兼全，智勇兼备，又懂得些道法。写得太好了，反而将他写成一位“超人”或“非人”了，一点个性也看不出来。云天彪、祝永清等，也都写得不甚好。全书中最好的一段，最足动人的一段，是希真逃难，遇云威道故的一件事。闻名已久，知己相逢，班荆道故，互倾心怀，其情境的挚热很可使人感泣。

……云威道：“我却不曾会过。我有一个至交，是东里司捕盗巡检张鸣珂。他对我时常说起，那陈希真智勇都了得。那年轮困城一战，官兵只得八千，败西夏兵五万，都是他一人的奇谋，可惜都被上司冒了去。至今惋惜他，又钦佩他。”希真道：“那张鸣珂莫不就是郓城县知县盖天锡的旧东人？”云威道：“便是。你且说那陈希真到底怎的了？有东京来的，说他辞了提辖，去做道士，可真么？”希真道：“是真的。”云威吁口气道：“英雄不遇，至于如此。”希真道：“他如今连道士也做不成了。”云威惊问道：“此话怎说？”希真道：“小侄动身的前几日，此人为一件事上，恶了高太尉，逃亡不知去向。现在各处追捕紧急，若吃拿住，决没性命！”云威听罢，拍着桌儿，只叫得苦。口里说道：“怎么这般颠倒！如此英雄，屈他在下僚，已是大错，怎的竟把他逼走了？却怎生还想望天下太平！他万一被追捕不过，心肠变了，竟去投那梁山泊，却怎好？贤侄，你可晓得他往那方去的？”希真道：“这却不知。这人恐未必上梁山。”云威道：“他不上梁山，不过一身之祸；他上了梁山，天下之祸。我料他也未必便上梁山，但不知何处去了。贤侄，贤侄，便似你也只得如此微职，岂不可悲。”那云威一片叹息之声，从丹田里直滚上来，眼角上津津的有水包着。希真见他这般肝胆相许，也止不住那心里的感激。看那云威背后一个小厮，便道：“小侄有句话要禀叔父，叫尊纪回避了。”云威便叫那小厮出去。希真把格子门掩上，走去云威面前，扑的双膝跪下。云威大惊，忙亦跪下来搀道：“贤侄有话，但说不妨。这却何故？”希真流泪道：“小侄不敢欺瞒，叔父不要愁苦，只小侄便是落难逃亡的陈希真。”云威大惊。“梁山泊已曾兜揽过，要小侄去入伙，小侄那里肯去。如今四海飘荡，无家可奔，却不知叔父如此错爱，使小侄悲酸钻入五脏。此生父母之外，只有叔父。”说罢，磕头不止，泪如泉涌。云威一只手拦不住他，尽他磕完了，又把希真的脸细看了看，叫道：“我的哥！你何不早报？忧得我苦！”二人从地上起来，抖抖衣服，仍复坐了。云威道：“怪道你说什么王助，叫我无处落想。你且把高俅怎生逼你，说给我听。”希真道：“高俅逼迫，尚未露形迹，是侄儿见机先走。”就把那衙内怎的调戏女儿丽卿，再三盘算；怎的虚应着他，到后来怎的不得脱身，不得已坏了他两个承局，怎的叫

丽卿男装，投奔山东沂州府；怎的恐有追赶，特从江南大宽转得到贵地。云威又惊又喜道：“不料阁下与老夫做了侄儿。你不必到沂州去，就住在敝庄，只说我的亲戚，无人敢来盘问。老夫养得你父女二人，待奸邪败了，朝廷少不得有番申理，那时再归故里。那庄家就这里开发了他。”希真道：“这却不敢。虽蒙厚恩，如父母一般。只是沂州舍亲处已是得信，在那里盼望，不如让小侄且去罢。”正说着，听得格子门外笑语之声，丽卿、云龙兄弟两个，手绾着手推门进来。二人见两位老的，都双眼揉红，眼泪未干，正惊疑要问。云威开言道：“龙儿不要厮缩着。他不是你哥哥，他是东京女英雄陈丽卿，乔扮男装。”丽卿大惊失色。云龙也吃了一惊，连忙放手，退了几步，看了看说道：“怪得我有五六分疑他是女子。”希真道：“我儿不要吃惊，我已向祖公公将真情尽告。切不可教外面庄家得知。”云威道：“你二人便姊弟称呼。”云龙就向丽卿唱个喏，丽卿答了个万福，二人不觉笑起来。云龙又细问缘由，云威一一说了。又对希真道：“贤侄既是这般说，令亲盼望，老夫亦不敢多留。只是显得老夫薄情。今日却去不得，与贤侄此一别，未知何日再会。卿姑有人家否？”希真道：“不曾。”云威道：“可惜龙孙正月里已定了一头亲事，不然扳附令爱，岂不是好。如今贤侄且将令爱送到令亲处安置了，自己再到这里来住几日，何如？”希真道：“山高水长，有此一日，小侄如无出身，定来追随几杖。只恨小女无缘，不能扳龙附凤。”希真方知丽卿果然不是此地姻缘。云威道：“贤侄休怪老夫说，似你这样人物，不争就此罢休。你此去须韬光养晦，再看天时。大丈夫纵然不能得志，切不可怨怅朝廷，官家须不曾亏待了人。贤侄，但愿天可怜见，着你日后出头，为国家出身大汗。老夫风烛残年，倘不能亲见，九泉下也兀自欢喜。”（第七十六回）

此外，又有天华翁的《水浒后传》。这一部书与《三国还魂记》相类，叙宋江再生为杨么，卢俊义再生为王魔。像这类的“再生缘”，在民间传说中是极多的。惟此书我未见，不能评判，但以“再生”为骨架，其意境已落于凡尘，便再高明也决不会超出于《荡寇志》及《水浒后传》以上的。

又继于《荡寇志》之后的“续水浒”亦间有之。日本则常有以时事影射《水浒》的著作出版，但不是零片无可取，便是有意的强今以就古，都是无关紧要，不足轻重的，故这里一概不提了。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郑振铎文集》第五卷）

全相平话三国志¹

三国历史之成为通俗的故事，恐怕是很早很早的事，也许还远在《五代史平话》的构成之前。唐李商隐《骄儿诗》有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则当唐时已以三国人物作为笑谑之资。在唐末时，通俗小说，当已很流行于世。说书的风气，早已由印度传入。一面“变文”体的伍子胥故事等成了世人所好，一面类似说书体的《唐太宗入冥记》等当然也博得群众的欢迎。那末佳妙的天然讲材，三国的历史，当然有很快的便成为说书人的专业或至少是所说的讲题之一的可能。苏轼在他的《志林》上说道：“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志林》卷六）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上也以为“说三分”有了专家。可见在北宋时代，三国故事，已成为极流行的一种讲史了。但北宋的三国志话本之类的作品我们却已不能见得到了。我们所能见到的第一个三国志话本乃是元至治间新安虞氏所刊的五种“全相平话”之中的一种，《全相平话三国志》。金华蒋大器（庸愚子）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序上说：“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蒋氏所见的“评话”，或者是一种极古的本子，或者即为新安虞氏所刊的《全相平话三国志》。虞氏刊的《三国志平话》，老实说，也真足以当“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的批评。我们猜想，蒋氏之言，十有七八是指着这个元刊本《三国志平话》而发的。

但“虞氏新刊”的《三国志平话》果是他自己的“新作”呢，还是因袭、改订或廓大了的旧作？三国故事的流传既是有了那末悠久的历史，“三国志的话本”又颇有很早产生的可能。且我们既有了宋人传下的《五代史平话》，难保同时不有一种宋本的《三国志平话》。所以虞氏所刊的《三国志平话》很有以一种旧作为蓝本的可能。我们并不说她是翻刻，一则因虞氏既自说是“新刊”，当然不会是完全抄袭旧文；再则，虞氏刊的三国，与宋人传本的《五代史平话》，其气韵与结构之间，实迥乎不同，辞语的写作也完全歧异。在取材一方面，更足以见出他们不是一条道路上的伙伴。《五代史平话》似出于通人之手，采用俚俗之说，极为小心，且不大敢十分大胆的超出于历史的真实的范围之外。虞氏刊的《三国志平话》则完全不同。她的取材是十分任意的。历史只有三分，采之传说和作者自己的想象的创作倒有七分。所谓“满纸荒唐言”者是也。且白字连篇，文法也不全不备，人名也音似而实非，种种都足以见出她是由民间的说话人的手笔之下写成了的。

想象中的宋人相传的三国志话本既不可得见，则最早的《三国志平话》的传本，便要算是这部“虞氏新刊”的了。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郑振铎文集》第五卷）

¹ 本文系从《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中摘录，此标题是编者所加。

谈金瓶梅词话（摘录）

《金瓶梅》所表现的社会

《金瓶梅》是一部不名誉的小说；历来读者们都公认她为“秽书”的代表。没有人肯公然的说，他在读《金瓶梅》。有一位在北平的著名学者，尝对人说，他有一部《金瓶梅》，但始终不曾翻过；为的是客人们来往太多，不敢放在书房里。相传刻《金瓶梅》者，每罹家破人亡，天火烧店的惨祸。沈德符的《顾曲杂言》里有一段关于《金瓶梅》的话：

袁中郎《觴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余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怪。今惟麻城刘延伯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钞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摧吴关，亦劝余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余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出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以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箠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

在此书刚流行时，已有人翼翼小心的不欲“以刀锥博泥犁”。而张竹坡评刻时，也必冠以苦孝说，以示这部书是孝子的有所为而作的东西。他道：

作者之心其有余痛乎！则《金瓶梅》当名之奇酸志、苦孝说，呜呼，孝子，孝子，有苦如是！

他要持此以掩护刻此“秽书”的罪过。其实《金瓶梅》岂仅仅为一部“秽书”！如果除净了一切的秽褻的章节，她仍不失为一部第一流的小说，其伟大似更过于《水浒》，《西游》、《三国》更不足和她相提并论。在《金瓶梅》里所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的社会。这社会到了现在，似还不曾成为过去。要在文学里看出中国社会的潜伏的黑暗面来，《金瓶梅》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资料。

近来有些人，都要在《三国》、《水浒》里找出些中国社会的实况来。但《三国志演义》离开现在实在太辽远了；那些英雄们实在是传说中的英雄们，有如荷马的 Achilles, Odysseus, 圣经里的圣乔治，英国传说里的 Round Table 上的英雄们似的带着充分的神秘性，充分的超人的气分。如果要寻找刘、关、张式的结义的事实，小说里真是俯拾皆是，却恰恰以《三国志演义》所写的为最弩下。《说唐传》里的瓦岗寨故事；《说岳精忠传》的牛皋、汤怀、岳飞的结义；《三侠五义》的五鼠聚义，徐三哭弟；够多未活跃！他们也许可以反映出一些民间的“血兄弟”的精神出来罢。至于《水浒传》，比《三国志演义》是高明得多了。但其所描写的政治上的黑暗（千篇一律的“官逼民反”），于今读之，有时类乎“隔靴搔痒”。

赤日炎炎似火烧，田中禾黍半枯焦。

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水浒传》的基础，似就是建筑在这四句诗之上的。水泊梁山上的英雄们，

并不完全是“农民”。他们的首领们大都是“绅”，是“官”，是“吏”，甚至是“土豪”，是“恶霸”。而《水浒传》把那些英雄们也写得有些半想象的超人间的人物。

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

不要怕她是一部“秽书”。《金瓶梅》的重要，并不建筑在那些秽褻的描写上。

她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的景象。而这个充满了罪恶的畸形的社会，虽经过了好几次的血潮的洗荡，至今还是像陈年的肺病患者似的，在恹恹一息的挣扎着生存在那里呢。

于不断记载着拐、骗、奸、淫、掳、杀的日常上的社会新闻里，谁能不嗅出些《金瓶梅》的气息来。

郢歌般的小人物，王婆般的“牵头”，在大都市里是不是天天可以见到？

西门庆般的恶霸土豪，武大郎、花子虚般的被侮辱者，应伯爵般的帮闲者，是不是已绝迹于今日的社会上？

杨姑娘的气骂张四舅，西门庆的谋财娶妇，吴月娘的听宣卷，是不是至今还如闻其声，如见其形？

那西门庆式的黑暗的家庭，是不是至今到处都还像春草似的滋生蔓延着？

《金瓶梅》的社会是并不曾僵死的；《金瓶梅》的人物们是至今还活跃于人间的，《金瓶梅》的时代，是至今还顽强的在生存着。

我们读了这部被号为“秽书”的《金瓶梅》，将有怎样的感想与刺激？

正乱着，只见姑娘拄拐，自后而出。众人便道：“姑娘出来。”都齐声唱喏。姑娘还了万福，陪众人坐下。姑娘开口：“列位高邻在上。我是他的亲姑娘，又不隔从，莫不没我说去。死了的也是侄儿，活着的也是侄儿，十个指头，咬着都疼。如今休说他男子汉手里没钱，他就是有十万两银子，你只好看他一眼罢了。他身边又无出，少女嫩妇的，你拦着，不教他嫁人，留着他做什么！”众街邻高声道：“姑娘见得有理！”婆子道：“难道他娘家陪的东西也留下他的不成！他背地又不曾私自与我什么，说我护他！也要公道。不瞒列位说，我这侄儿平日有仁义，老身舍不得他好温克性儿。不然老身也不管着他。”那张四在傍，把婆子瞅了一眼，说道：“你好失心儿！凤凰无宝处不落。”只这一句话，道着了这婆子真病，须臾怒起，紫涨了面皮，扯定张四大骂道：“张四，你休胡言乱语，我虽不能不才，是杨家正头香主。你这老油嘴，是杨家那臊子的？”张四道：“我虽是异姓，两个外甥是我姐姐养的。你这老咬虫，女生外向行，放火又一头放水。”姑娘道：“贱没廉耻，老狗骨头，他少女嫩妇的，留着他在屋里，有何算计！既不是图色欲，便欲起谋心，将钱肥己。”张四道：“我不是图钱，争奈是我姐姐养的。有差迟，多是我；不过得日子，不是你。这老杀才，搬着大，引着小，黄猫儿，黑尾！”姑娘道：“张四，你这老花根，老奴才，老粉嘴，你恁骗口张舌的，好淡扯！到明日死了时，不使了绳子扛子！”张四道：“你这嚼舌头老淫妇，挣将钱来，焦尾靶，怪不的恁无儿无女！”姑娘急了，骂道：“张四贼老苍根，老猪狗！我无儿无女，强似你家妈妈子，穿寺院，养和尚，道士，你还在睡里梦里！”当下两个差些儿不曾打起来。

（《金瓶梅词话》第七回）

这骂街的泼妇口吻，还不是活泼泼的如今日所听闻到的么？应伯爵的随声附和，潘金莲的指桑骂槐，……还不都是活泼泼的如今日所听闻到的么？

然而这书是三百五十年前的著作！

到底是中国社会演化得太迟钝呢？还是《金瓶梅》的作者的描写，太把这个民族性刻划得入骨三分，洗涤不去？

谁能明白的下个判断？

像这样的堕落的古老的社会，实在不值得再生存下去了。难道便不会有一个时候的到来，用青年们的红血把那些最龌龊的陈年的积垢，洗涤得干干净净？

《金瓶梅》为什么成为一部“秽书”？

除了秽褻的描写以外，《金瓶梅》实是一部了不起的好书，我们可以说，她是那样淋漓尽致的把那个“世纪末”的社会，整个的表现出来。她所表现的社会是那末根深蒂固的生活着，这几乎是每一县都可以见得到一个普遍的社会缩影。但仅仅为了其中夹杂着好些秽褻的描写之故，这部该受盛大的欢迎，与精密的研究的伟大的名著，三百五十年来却反而受到种种的歧视与冷遇，——甚至毁弃、责骂。我们该责备那位《金瓶梅》作者的不自重与放荡罢？

诚然的，在这部伟大的名著里，不干净的描写是那末多；简直像夏天的苍蝇似的，驱拂不尽。这些描写常是那末有力，足够使青年们荡魂动魄的受诱惑。一个健全、清新的社会，实在容不了这种“秽书”，正如眼瞳中之容不了一根针似的。

但我们要为那位伟大的天才，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他为什么要那样的夹杂着许多秽褻的描写？

人是逃不出环境的支配的；已腐败了的放纵的社会里很难保持得了一个“独善其身”的人物。《金瓶梅》的作者是生活在不断的产生出《金瓶梅》、《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等等“秽书”的时代的。连《水浒传》也被污染上些不干净的描写；连戏曲上也往往都充满了龌龊的对话。（陆采的《南西厢记》、屠隆的《修文记》、沈璟的《博笑记》、徐渭的《四声猿》等等，不洁的描写与对话是常可见到的。）笑谈一类的书，是以关于“性”的玩笑为中心的。（像万历板《谑浪》和许多附刊于《诸书法海》、《绣谷春容》诸书里的笑谈集都是如此。）春画的流行，成为空前的盛况。万历板的《风流绝畅图》和《素娥篇》是刊刻得那末精美。（《风流绝畅图》是以彩色套印的；当是今知的世界最早的一部彩印的书。）据说，那时，刊板流传的春画集，市面上公开流行的至少有二十多种。

在这淫荡的“世纪末”的社会里，《金瓶梅》的作者，如何会自拔呢？随心而出，随笔而写；他又怎会有什么道德利害的观念在着呢？大抵他自己也当是一位变态的性欲的患者罢，所以是那末着力的在写那些“秽事”。

当罗马帝国的崩坏的时代，淫风炽极一时；连饭厅上的壁画，据说也有绘着春画的。今日那泊里（Nable）的博物院里尚保存了不少从彭培古城发掘来的古春画。明代中叶以后的社会的情形，正有类于罗马的末年。一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士大夫，乃至破落户，只知道追欢求乐，寻找出人意料的最刺激的东西，而平民们却被压迫得连呻吟的机会都没有。这个“世纪末”

的堕落的帝国怎么能不崩坏呢？

说起“秽书”来，比《金瓶梅》更荒唐，更不近理性的，在这时代更还产生得不少。以《金瓶梅》去比什么《绣榻野史》、《弁而钗》、《宜春香质》之流，《金瓶梅》还可算是“高雅”的。

对于这个作者，我们似乎不能不有恕辞，正如我们之不能不宽恕了曹雪芹《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初试云雨情，李百川《绿野仙踪》里的温如玉嫖妓、周璉偷情的几段文字一样。这和专门描写性的动作的色情狂者，像吕天成、李渔等，自是罪有等差的。

好在我们如果除去了那些秽褻的描写，《金瓶梅》仍是不失为一部最伟大的名著的，也许“瑕”去而“瑜”更显。我们很希望有那样的一部删节本的《金瓶梅》出来。什么《真本金瓶梅》、《古本金瓶梅》，其用意也有类于此。然而却非我们所希望有的。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郑振铎文集》第五卷）

关于醒世恒言

《醒世恒言》四十卷，卷为一篇，凡录宋、元以来话本四十篇。陇西可一居士序云：“此《醒世恒言》四十种所以继《明言》、《通言》而刻也。”故在“三言”里《恒言》实最后出版。其第一次印本为苏州叶敬池所刊。后又有衍庆堂翻刻本。叶氏本及衍庆堂本，均题可一居士评，墨浪主人校。

按叶敬池为明末苏州有名之出版家，曾为冯梦龙刊行了《新列国志》，又拟托冯氏继续的删订，改作《西汉演义》及《东汉演义》，惜均未及告成。疑冯氏删定之十余种传奇也均为叶氏所刊。

墨浪主人之即为冯梦龙，殆无可疑。冯氏自署墨憨斋主人。所谓可一居士当亦即冯氏之别一笔名。

冯氏初纂《古今小说》四十卷，继又辑《警世通言》四十卷。今所见初印本《恒言》，其首页也题作：

绘像古今小说《醒世恒言》

故颇疑《警世通言》及《恒言》，故皆应是《古今小说》的别名，其总题皆应作《古今小说》（《古今小说》，即题作“古今小说一刻”，明示读者将有“二刻”、“三刻”的续刊。《恒言》当即为“古今小说三刻”）。

姑苏笑花主人序《今古奇观》云：“墨憨斋增补《平妖》，穷工极变，不失本末，其技在《水浒》、《三国》之间。至所纂《喻世》、《醒世》、《警世》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领异拔新，洞心骇目。”即空观主人（凌濛初）序《拍案惊奇》云：“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书，颇存雅道，时著良规。”

按《拍案惊奇》刊于天启七年，《今古奇观》则为崇祯间所刊，离“三言”的刊出，均不过三五年或十余年，其见闻当然最真确，所云“墨憨斋”“纂《喻世》、《醒世》、《警世》”及“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书”诸语自确切可靠（墨憨斋及龙子犹均为冯氏之笔名）。

冯氏纂“三言”，录宋、元、明三代话本一百二十种，实为“话本”复活运动的最大功臣。嘉靖间，洪楹辑《清平山堂话本》，今所知者不过三十余种，《京本通俗小说》则仅知有十卷，其刊印之魄力，均不及冯氏的弘伟。

《恒言》刊于天启丁卯（七年），离《通言》的刊出不过三年。《通言》搜辑宋、元话本，已是“取之尽玃珠”。故《恒言》里，明代的话本独多。宋、元话本已甚罕见。那些明人作品，有确证者为：第三卷《卖油郎独占花魁》，第九卷《陈多寿生死夫妻》，第十卷《刘小官雌雄兄弟》，第十五卷《赫大卿遗恨鸳鸯缘》，第十六卷《陆五汉硬留合色鞋》，第十八卷《施润泽滩阙遇友》，第十九卷《白玉娘忍苦成夫》，第二十卷《张廷秀逃生救父》，第二十一卷《张淑儿巧智脱杨生》，第二十七卷《李玉英狱中讼冤》，第二十九卷《卢太学诗酒傲公侯》，第三十五卷《徐老仆义愤成家》，第三十六卷《蔡瑞虹忍辱报仇》，均是明代事，有年月可据。至其他各卷，大部分也可证其为明人之作。惟《勘皮靴单证二郎神》、《闹樊楼多情周胜仙》、《郑节使立功神臂弓》及《薛录事鱼服证仙》等数篇，笔致古朴而横恣，疑为宋、元人作（详见著者《中国文学论集》五八八页及以下）。

最可异的是，这些明人作品，作风大致相同，思想也十分的类似，疑出于一手。在《通言》里，《老门生三世报恩》已证实为冯氏手笔，则冯氏之写作《卖油郎》诸篇实为可能。且其作风也实极为相似。大抵冯氏纂《明言》、《通言》时，古代的材料已将用尽，惟欲凑足第三个四十篇之数，故不能不自己努力着手。虽极力模拟说话人的语气与格调，而明眼人一读而知其为有意的拟作。

衍庆堂翻刻叶敬池本《恒言》，遇“国朝”等字样仍为空格。但颇疑其为清初人所为。因《金主亮荒淫》一篇，已被删去。为什么其他淫秽之作不删，而独除去关于金主亮的一篇呢？这已可证其为清初的翻刻了。因为金主亮一篇被删，故不得已而将篇幅较长的《张廷秀逃生救父》分为上下二卷，以足四十卷之数。

今据叶敬池原刊本重印，故四十篇之数，完全无阙。张廷秀一篇，仍合为一卷。惟叶氏之图，则因所据本已阙之，故也不能据以印出，这实是一个大缺憾！

（《醒世恒言》，上海生活书店一九三六年九月版）

第三辑 书林杂记

向翻印“古书”者提议

翻印“古书”的风气，近来又盛行一时。这当然不是坏事。保存了一部分值得保存的“古书”，我们也认为是今日所应该做的工作。在我们研究中国文学的人看来，更觉得尤可同情，尤有益处。但对于近来翻印“古书”的人所走的路，我们却认为有讨论和纠正的必要。

翻印“古书”的方法，最常用者有两种：

（一）影印法即用原书照相，以石印或珂罗板印出；像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印的《四部丛刊》、《四库珍本丛刊》等都是。中华书局翻印《图书集成》也用此法。

（二）排印法即用铅字，翻排原书文字。像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等是。也有加以圈点或标点的，像商务印书馆的《国学基本丛书》等是。

这两个方法，各有利弊。石印法不改变原书行列款式，不会有什么错字，这是其利便、妥善处。然卷帙过于繁重，费工费时过多，售价过高，非一般人所能有，此是其弊。铅印法，比较的省篇幅省纸张，定价可以便宜些。此是其利。然其弊，则在校对疏忽，错字太多。

其实，这两个方法是可以相辅而相成的。我们必须先分别那些古书的性质，然后才可以决定某种书用石印法或珂罗板印法好，某种书用铅印法好。同时还须顾全到社会的经济状况，读者们的购买力，替他们打打算盘。而尤其重要的是，对于一部分有毒的，不必要的东西，更宜仔细的斟酌其应否重印，或虽值得重印，而须预防其流毒于社会。

先得审查“古书”的性质和价值。应该大量流通，或仅须翻印少数的部数以资保存，都须依据其性质而决定。

大抵古书之值得大量流通者，必须具有左列价值或资格的一种或二种：

（一）史料研究历史或专门学问所必需的，像《九通》、《二十四史》之流；

（二）参考图书一般从事于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以及其他学问所必需的；像《图书集成》、《佩文韵府》、《说文解字诂林》，以至比较古旧些的《太平御览》之类；

（三）文学名著值得大量流通、不妨成为公共读物的名著，像《水浒传》、《杜诗》之类；但必须注意其为无毒的。

（四）文学总集大部头的总集，像《全唐诗》、《全唐文》、《全上古汉魏六朝文》、《雍熙乐府》等等，也是普遍需要的东西。在其间，我们往往能得到极多的在史书上所得不到的材料；

（五）重要的丛书包含罕见的及重要的古书的，像《十三经》、《学海类编》、《格致丛书》、《夷门广牍》之类；有的流通极少，不易得见，有的流通虽广，而合于日常应用的本子却还不曾有。

这几类的古书是不妨大量散播出去的；就是一位研究社会科学家，他的案头，也是必须摆放着《九通》、《图书集成》的；一位植物学家的书室里，如果发现有一部《图书集成》，一部《太平御览》，也并不是可惊诧的事。

这一类应该大量流通的古书，必须以大多数读者的购买力为研究的对象而决定其印刷的方法。而且，在印刷的时候还必须注意到读者的翻阅与携带

的便利。故加以标点及索引是必需的；篇幅也不能过多，字迹倒不妨小些。我们为了便于诵读，往往用大字印书，实在太不经济，必须改用小字，特别是这类的参考书籍。中华书局新印的《图书集成》，最不近情理。图书集成局印行的铅印本，市面上还不罕见，市价不过五百圆。有破损水渍的不过三四百圆，殿版的，在故宫博物院便有四部，北平图书馆也有（涵芬楼也有一部，似已被焚），同文书局石印的底本，现在还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都并不难得、难见。如果我们要印这部书，第一，要篇幅缩小到最可能的缩小的地步；第二，售价低廉到最可能的低廉的程度。如此方才有益于人——也方才有益于书局。（薄利多售！）如今册数多至近千（？），售价高至八百圆（预约五百圆），普遍的人能够有力量购之乎？有力购之的，大概都已经购有。这笔最可做的大买卖，岂不白被糟塌掉乎？我们曾经想过，若以《英国百科全书》式或日本《大正大藏经》（洋装的）式的装订（每面可容原书十二页以上），每册至少可容二千面（两面印），最多不过五六十册便可了之。售价最高不到三百圆，或竟低到二百圆左右。对于读者们岂不便利！再加总索引一册二册，可另售。日本版的《佩文韵府》，只有二厚册，可挟之而趋，还有一薄册的索引，够多未便利！而他们在明治初年便已想到这未办了。商务印书馆印的《百纳本二十四史》也笨得可笑；完全为了搬弄古董，除了中国，没有一国肯这样的浪费纸张和印刷力的。如果为表彰宋版、元版，印一册“留真谱”已经足够的了。《二十四史》的本身，尽可根据宋、元、明、清等原版、古版，排印出来（或缩小石印亦可），而附以“校勘记”（仿《大正大藏经》式），这个工作，岂不是“不朽之盛业”乎！大约有二十四册或三十册便可够包容得下的。定价也不会过高。如今却是那样的浪费纸张、印刷力乃至读者们的金钱！最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嘉庆本《大清一统志》，这乃是一部通俗的必备之书，然售价高至一百馀圆，册数也多至二百册！谁买得起？照我们缩印的计划，则仅八册十册左右的书耳。为什么他们不会为自己的买卖打算一下呢——即使他们不肯替读者们打算。

像《二十四史》这一类的书，如果影印古本流传，还有一个可怕而想不到的危害。校勘是机械的工作。如果有好的可靠的版本，便可省却无数学者们浪费的校勘的时间。如今把古本影印出来，是否要使每个学者都费时力在校勘上！只有一二十个精细的人，在机械的工作着，便可永远的省却无数人的宝贵光阴。为什么不肯这么办呢？！没有一国的人，有像我们那末不会替别人乃至替自己打算的！

倒还是向来不被人重视的《万有文库》本的《国学基本丛书》之类，值得我们的同情与表彰。吴荣光的《历代名人年谱》如今是缩成小小的一册了；《四库总目提要》如今是只有四册。这够多未方便呢！

至于珍本、孤本，印出来只是为了保存的目的，或者，内容有毒，不值得大量流通的，像《金瓶梅词话》之流，则不妨在印刷者经济能力之所及，尽量的印些奢侈的版本，像日本印唐人手卷，印宋版《世说新书》之类，那也是就个人性之所近、嗜好之所在，随意为之，没有人可加阻止——也许还该加以赞颂。不过，也不宜印得多，不宜纯为了营业的目的。

但像《四库全书珍本丛刊》之类，却又当别论；他们虽是珍本，其中未始无可用户者，普通图书馆是必需的。为了他们的易于购买，似也宜照商务印书馆原定印行《四库全书》的方法（即缩小洋装本）印行之。则售价至少可减少到十之七八。然而为什么偏要照现在这样的《四部丛刊》式印行呢？这

他们怕也是漫无打算的。但图一时牟利，不计购者能力。这便是今日出版界的根本大病，非痛快下一针砭，叫他们改途重张不可！

如果有人以实际的有效的的工作，来打倒他们的愚昧无知的仅知图利的行径，则更是功德无量的了。

我们——乃至大多数的读者们必会站在革命者的一边的！

至于大规模的“丛书”，无所不包，像《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之类，我们也以为是不必需而浪费的事业。日本印行的是什么：日新月异的新的科学书与文学书！而我们却老在“古书”堆里作圈子。怎怪得不一败涂地呢！

而像《四部丛刊》之流影印古本的，特别有害；他们竟导引着一部分的人，以有用的时力，耗费在校勘的工作上了（这有许多事实证明之）。若个人人都成了钱遵王、黄尧圃、顾涧苹，还成了什么近代的国家！这可以说是流毒，不是流通。以宣传文化的美名而流布有毒的什么，未免可痛！

《四部备要》的编辑也是无聊的工作。有用的是并不好看的仿宋字，并且不将原书的篇幅减少了多少（约原书二册，《备要》合之为为一册）。在便利上——是谈不到的。分组发售，却是他们聪明的办法。但为什么不更为读者们打算一下，缩印成《国学基本丛书》的式样呢？

我们固希望古书的流通，却反对无计划、无意识的浪费的工作，无聊而有毒害的事业！

（《文学》二卷六号，一九三四年六月）

标点古书与提倡旧文学

离不了这样的一个圈套：“这部书写得如何如何的好，对于某问题有何高明的见解，而旧本又是如何的罕见（或好刻本是如何的少见，坊间所有俱为错字连篇者），所以把它标点出来，便利读者。”

从陈独秀以“赤日炎炎如火烧，公子王孙把扇摇”的一首诗，作为翻印《水浒传》的理由起，到徐志摩、胡适之辈的提倡《醒世姻缘传》止，一切的标点古书的序文，总脱不了这末一套话——或更加上些考据。

标点古书竟成了时行的风气。曾见到上海日报上刊登着整幅的大广告——许啸天标点的古书的广告。想不到这十几年来，标点的古书竟是这样的多——且还仅只是出于一人的手笔呢。从《古文观止》到《曾文正公家书》，好一批旧店新张的货色！

在新文学运动的初期，标点些《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一类的白话写成的小说，是情有可原的。把这些向来为士大夫所看不起的话小说，对着古文、宋诗投掷过去，确是一种挑战的举动。

但如今时代是不同了，无须乎再利用什么旧小说来鼓吹什么，来宣传什么。在今日而仍以五四时代的眼光，去标点什么《醒世姻缘传》、《今古奇观》、《娱目醒心编》一流的东西，其为“挂羊头，卖狗肉”，和标点本的《古文观止》、《曾文正公家书》等等是并无二致的。——且不必说《娱目醒心编》一类的小说和《水浒传》、《红楼梦》在描写技巧上是如何的隔着天渊。

为了旧小说写得如何如何的好，而加以标点，作为范本者，大概已经忘记了：今日的文坛已不是抱着旧小说而临摹着的时代了；旧小说——连《水浒》、《红楼梦》也在内——所能给予新文坛的东西，实在太少。即其仅有的白话文的描写技俩，也实在不足以为新文坛的模范。新文坛已经是远远的跑在他们前面去了。

新文坛所创造的白话文学，已是一种另外的新的东西，不再是什么语录式的、讲史式的、旧小说式的什么了。

那末，所谓标点旧小说以资流传者其意义究竟何在呢？

没有什么别的意思，老实说——和许啸天辈之标点《古文观止》等等，其实并没有两样——不过为了做一笔生意。

我们得明白：将许多旧小说里的有毒素的东西（像《醒世姻缘传》的刻薄的讥讽，和小学生们的玩皮与残忍的把戏）向年轻的学生们输送进去，是有极大的罪恶的；旧小说和旧思想是牢牢的固结为一的；我们如果要排斥旧思想旧观念，如何倒该去提倡什么旧小说呢？

救救孩子罢！

保存些不经见的旧文学的名著，并不是不应该做的事，但有一个条件，只是保存，不是提倡；只是小数量的流通，不该大量生产的广播于民间；只是一部份专门研究者的用作参考研究之资，不是要普及于一般的读者社会里（特别关于旧小说的一部份）。

所以，如果收集、保存若干旧文学的著作，以为研究的资料，我们是不该反对的（像博物院的收集古代珍品，先民艺术似的陈列着，如今是“恰是其时”）；如果小数量的印刷出来，以供少数专门学者的需要与应用，我们更是欢迎；如果在其间选取若干，作为样本似的（而且加以说明），使我

们得以很少的时间，明了旧的过去的文坛及许多伟大作品的概况，那也不是什么无益的事；若只是不分良莠，不识好歹的一味的标点着，提倡着，鼓吹着，宣传着，则非迎头给以痛击不可！

真实的伟大的名著，当然是具有永久的生命的，像六朝新乐府，唐、宋诗的一部份，元、明曲，明、清散文的一部份，像比较完美的《红楼梦》、《水浒传》诸小说，加以标点，“以广流传”，使一部份读者得以廉价得到比较可读的本子，那也不是坏事——但绝对的不该鱼目混珠，挂羊头卖狗肉！

随意吐一口痰在地上，也许会影响到社会的健全，何况千千万万的标点本的流布于世！

真该小心在意。救救孩子们！

我以为有许多书是尽够给他们标点的——而且也极该标点；较之群趋于《古文观止》和旧小说的标点者，功过不啻相差千百万倍！

（一）一般专门学者所需要的类书式的“通史”与“政书”，像《二十四史》、《九通》（还该加上明王圻的《续文献通考》和清末刘氏的《续皇朝文献通考》，共十一通）之类，应仔细的加以断句，标点，并各附以“索引”之类的附录。如果这些笨重异常的书籍，以近代印刷的方法缩印成为二十余册或十余册的插架之物，这对于一般学者是如何的便利呢？我梦想能够有可以“挟之而趋”的《文献通考》、《通志》（《九通》，浙局版，凡千册，即小字石印，模糊不清者亦有二百余册）；假如《通志》能印成一厚册，《史记》能订成一大本（这是很可能的），够多末有用！够多末方便！

（二）卷帙巨大的地志和史书，以及一切有用的参考书籍，也可用前法印刷出版；目的也为了便利学者。

（三）编辑《经济史长编》之类不加论断仅供给材料的书。

（四）重要的伟大的名著；或包罗较广的总集，像《乐府诗集》、《楚辞》、《诗经》、《全唐诗》、《杜工部集》、《白香山集》、《花间集》、《陆放翁集》等等，也用前法印刷出版，卷帙可以减少很多。

惟书籍必须加以仔细的选择，不宜仅为了营业起见，专拣一时可以畅销的；再则，必须缩印（最好是铅印）而加以标点，且每书之末必须附以索引。

有许多大路在那里，每条路都可以给你做些有益于社会的事，为什么专要趋时取巧，专要做些损人而又不甚利己的事呢？

（《短剑集》，一九三六年一月）

再论翻印古书

我们在本刊上曾写过一篇《标点古书与提倡旧文学》，主张：“在其间选取若干，作为样本似的，使我们得以很少的时间，明了旧的过去的文坛及许多伟大作品的概况，那也不是什么无益的事；若只是不分良莠，不识好歹的一味的标点着，提倡着，鼓吹着，宣传着，则非迎头给以痛击不可！”

“真实的伟大的名著，当然是具有永久的生命的，像六朝新乐府，唐、宋诗的一部份，元、明曲，明、清散文的一部份，像比较完美的《红楼梦》、《水浒传》诸小说，加以标点，‘以广流传’，使一部份读者得以廉价得到比较可读的本子，那也不是坏事——但绝对的不该鱼目混珠，挂羊头卖狗肉！”

这些话说得已够明白。自从《世界文库》的出版，在翻印“真实的伟大的名著”，“加以标点，以广流传，使一部份读者得以廉价得到比较可读的本子”的工作上是尽了相当的力量的。有一部份被埋没了的“名著”，有一部份久被忽视了的“名著”，以及有一部份可以显示出“时代精神”的作品，都曾被整理了翻印出来。那些整理的工作，确曾费了好些人的不少的时与力。——其所耗费的时与力是不在《世界文库》里的翻译部份的许多“名著”的写译之下的。

为什么不肯苟且塞责，照样翻印便了事呢？为什么必须广搜异本，仔细校勘，整理呢？有许多人便也已发过这样的疑问了。给一般读者们阅读的书何必加以如此的详尽的校勘记呢？这些校勘记对于他们有什么用处呢？

这是不肯盲目的翻印古书的一种表现；这是要使一部份读者“得以廉价得到比较可读的本子”——整理过的本子的一种努力；同时，这也是要节省无数“读者”的耗费在“校勘”这个传统的工作之上的时与力的。比《四部丛刊》、《四部备要》那样的照式翻印不知道要节省了多少认真的读者们的时与力的。虽然耗费了很多的力量，这整理却并不是无意义的。

在这整理的过程里曾经发现了古本的不少的脱漏与错误，发现了清版的古书的许多不必要的擅删擅改的地方——这是异族统治中国的可痛心的结果之一！这些，都已借着这番整理而为之清算一下。对于真实的伟大的名著，这番整理的工作，岂可算得是白费的！对于一般读者们这番整理的工作岂是完全无用的？

有一部份的作品，在其本身也许不能算作真实的不朽的“名著”，却充分的足以表现“时代的精神”，足以表现“民间”的——非官僚的供奉的文学的——最好作品的例子，或足以表现其在文学史上有着巨大的影响的，且其本身也不是有毒的东西，则其翻印与整理也不会成为一种浪费的工作。

如果一概的把将中国文字写成的古书都作为有毒的东西看待，把一切翻印与整理的工作都当作是反动的行为，则未免有些“幼稚”与“扭曲”事实了。

对于过去文化的绝对的绝缘是办不到的事；真实的伟大的名著是在任何时代里都不会消失其真实的价值的。如果觉得《吉诃德先生传》和《死魂灵》是值得翻译而《金瓶梅词话》和《指南录》之类则绝对的不值得翻印，则未免太藐视了在中国所产生的一切真实的伟大的名著了。名著何不幸而以中国文字写出之呢？

像《金瓶梅词话》那样的赤裸裸的暴露了流氓阶级的生活与心理的——

这种流氓的生活与心理至今还活泼泼的存在着——如何可以绝对的加以蔑视而排斥之呢？像《指南录》那样的一部描写在异族的侵略下的亡国之际的士大夫之愤激的心理和颠沛流离始终不屈的生活的书，如何可以因其为古书而遂不屑一顾呢？

这样的不分好歹，绝对排斥古书者的心理，和那些提倡读经而绝对排斥“禽兽能言”的白话文教科书者的心理是恰好相映成趣。——虽然对于前者我们是原谅而且敬重其热烈的情感的。

翻印古书正像介绍西洋文学一样，必须有所选择于其间；如因为西洋文学里有荷马，有莎士比亚，有杜思退益夫斯基，有高尔基，便应该不分好歹一概介绍过来，说得通么？同样的，如因为用德国文字写的书有了一部《希特拉自传》，便不分好歹一概不介绍德国名著，有此理么？

所可憾的是利用了翻印古书的名义，不知道有多少的书贾们是在经营着不可告人的翻印淫书和消闲书的事业的，大批的有毒的书，曾被他们翻印出来，而流通于市面。这诚然难怪一般前进的青年们的痛心与愤慨了！——我们早已是痛心与愤慨的了！

然而遂因噎而废食，却也是我们所期期以为不可的！

（《文学》六卷三号，一九三六年三月）

失书记

二十多年来，因为研究的需要和个人的偏嗜，收购了不少古书。一部部的从书店里挟在腋下带回来，都觉得是有用的。但一到了家，翻阅了一下，因为不是立即用到的，便往往将它向书箱里或书橱顶上一塞。有时，简直是好几年不曾再翻阅过。书一天天的堆积得多了。书箱由十二只而二十余只，而五十余只，而至一百余只，放在箱子里的书还有不少。因为研究的复杂，搜罗材料的求全求备，差不多不弃瓦石和沙砾。其实在瓦石和沙砾里，往往可以发现些珠玉和黄金出来。十年前，得到不少的弹词，宝卷，鼓词和平津到潮汕的小唱本。那些小唱本一批批的购入，或由友人们的赠贻，竟积至二万余册之多。“一二八”之役，我在东宝兴路的寓所沦入日人之手，一切书籍都不曾取出。书箱被用刀斧斫开的不少。全部的弹词，鼓词，宝卷及小唱本均丧失无遗。惟古书还保存得很多。三月间，将各余存的书全部迁出。那时，我不在上海。高梦旦先生和家叔莲菴先生曾费了许多的力量去设法搬转。许多的书箱都杂乱的堆在高宅大厅上。过了半年，方托人清钞一份目录。除仍留一部分存于高宅外，大多数都转送到开明书店图书馆寄存。四五年来，我因为自己在北平，除了应用的书随身带去者外，全都没有移动。在北平，又陆续的购到几十箱的古书，其中尤以明版的小说及戏曲为多。前年夏天南旋时，又全都随身带了下來。幸免于和那个古城同陷沦亡。但有一部分借给友人们的书，却一时顾不及取回了。二年以来因为寓所湫狭，竟不能将寄存之书取储家中。“八一三”战事起后，虹口又沦为战区。开明书店图书馆全部被毁于火。我的大多数的古书，未被毁于“一二八”之役者，竟同时尽毁于此役。所失者凡八十余箱，近二千种，一万数千册的书。其中有元版的书数部，明版的书二三百部；应用的书，像许多近代的丛书所失尤多。最可惜的是，积二十年之力所收集的关于诗经及文选的书十馀箱竟全部烬于一旦。在欧洲收集到的许多书（多半是关于艺术的及考古学的），也全都失去了。尚有清人的手稿数部，不曾刊行者也同归于尽！不能无介介于心；总觉得有些对不起古人！连日闸北被敌机大肆轰炸，纸灰竟时时飘飞到小园中来。纸灰上的字迹还明显的可辨。这又是什么人家的文库被毁失了！在今日抗战开始之后，像这样的文化上的损失，除了万分惋惜之外，是不会比无数人民的性命财产的牺牲更令人沉痛和切齿的。而无数前敌将士们正在喋血杀敌，为国作战，我们这些损失又算得了什么！北平图书馆的所藏，乃至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乃至无数私家的宝藏之图籍还不是全都沦亡了么？我们这些损失又算得了什么？但我所深有感者，乃在没有国防的国家根本上谈不上“文化”的建设。没有武力的保卫，文化的建设是最容易受摧残的。阿速帝国的文库还不是被深埋在地下么？宋之内府所藏图籍，还不是被捆载而北么？希腊，罗马的艺术还不是被野蛮民族所摧毁而十不存一么？无数文人学士们的呕尽心血的著作曾不足当野蛮的侵略者的一焚！这是古今一致，万方同慨的事！要保全“文化”，必须要建立最巩固的国防！失者已矣！“文化”人将怎么保卫文化呢？当必知所以自处矣！无国防，即无文化！炮火大作，屋基为之震动。偷闲重写“失书”的目录为一卷。作失书记，附于后。以自警，亦以警来者！

民国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记

(一九三七年《烽火》)

求书目录

如果能够尽一分力，必会有一分成功。我十分相信这粗浅的哲学。只要肯尽力，天下没有不能成功的事。我梦想着要读到钱遵王(《也是园书目》)里所载许多元明杂剧。我相信这些古剧决不会泯没不见于人间。他们一定会传下来，保存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藏家手里。他们的精光，若隐若现的直冲斗牛之间。不可能为水、为火、为兵所毁灭。我有辑古剧本为《古剧钩沈》之举，积稿已盈尺许。惟因有此信念，未敢将此“辑逸”之作问世。后来读到丁芝孙先生在《北平图书馆月刊》里发表的《也是园所藏元明杂剧跋》，我惊喜得发狂！我的信念被证明是确切不移的了！这些剧本果然尚在人间！我发狂似的追逐于这些剧本之后。但丁氏的跋文，辞颇隐约，说是读过了之后，便已归还于原主旧山楼主人。我托人向常熟打听，但没有一丝一毫的踪影，又托人向丁氏询访，也是不得要领。难道这些剧本果然像神龙一现似的竟首不见尾了么？“八一三”战役之后，江南文献，遭劫最甚。丁氏亦已作古。但我还不死心，曾托一个学生向丁氏及赵氏后人访求。而赵不騫先生亦已于此役殉难而死。二家后人俱不知其究竟。不料失望之余，无意中却于来青阁书庄杨寿祺君那里，知道这些剧本已于苏州地摊上发现。我极力托他购致。虽然那时，我绝对地没有购书的能力，但相信总会有办法的。隔了几天，杨君告诉我说，这部书凡订三十余册，前半部为唐某所得，后半部为孙伯渊所得，都可以由他设法得到。我再三地重托他。我喜欢得几夜不能好好的睡眠。这恐怕是近百年来关于古剧的最大最重要的一个发现罢。杨君说，大约唐君的一部分，有一千五百金便可以购致，购得后，再向孙君商议，想来也不过只要此数。我立刻作书给袁守和先生，告诉他有这末一会事，且告诉他只要三千金。他和我同样的高兴，立刻复信说，他决定要购致。我立刻再到来青阁去，问他确信时，他却说，有了变卦了。我心里沉了下去。他说，唐君的半部，已经谈得差不多，却为孙伯渊所夺去。现在全书俱归于孙，他却要“待价而沽”，不肯说数目。说时，十分的懊丧。我也十分的懊丧。但仍托他向孙君商洽，也还另托他人向他商洽。孙说，非万金不谈。我觉得即万金也还不算贵。这些东西如何能够以金钱的价值来估计之呢！立刻跑到袁君的代表人孙洪芬先生那里去说明这事。他似乎很有点误会，说道：书价如此之昂，只好望洋兴叹矣。我一面托人向孙君继续商谈，一面打电报到教育部去。在这个国家多难，政府内迁之际，谁还会留意到文献的保全呢？然而教育部立刻有了回电，说教部决定要购致。这电文使我从失望里苏生。我自己去和孙君接洽，结果，以九千金成交。然而款呢？还是没有着落。而孙君却非在十几天以内交割不可。我且喜且惧地答应了下来。打了好几个电报去。款的汇来，还是遥遥无期。离开约定的日子只有两三天了！我焦急得有三夜不曾好好的睡得安稳。只有一条路，向程瑞霖先生告贷。他一口答应了下来，笑着说道：看你几天没有好睡的情形，我借给你此款罢。我拿了支票，和翁率平先生坐了车同到孙君处付款取书。当时，取到书的时候，简直比攻下了一个名城，得到了一个国家还要得意！我翻了又翻，看了又看，慎重地把这书捧回家来。把帽子和大衣都丢了，还不知道。至今还不知是丢在车上呢，还是丢在孙家。这书放在我的书房里有半年，我为它写了一篇长文，还和商务印书馆订了合同，委托他们出版。现在印行的《孤本元明杂剧》一百余剧，便是其中的精华。我为此事费尽了心力，受尽了气，担尽了心事，也受尽了

冤枉，然而，一切都很圆满。在这样的一个动乱不安的时代，我竟发现了、而且保全了这未重要、伟大的一部名著，不能不自以为踌躇满志的了！中国文学史上平添了一百多本从来未见的元明名剧，实在不是一件小事！我们政府的魄力也实在可佩服！在这未军事倥偬的时候还能够有力及此，可见我民族力量之惊人！但也可见“有志者事竟成”，实在不是一句假话。但此书款到了半年之后方才汇来，程先生竟不曾催促过一声，我至今还感谢他！他今日墓木已拱，不知究竟有见到这书的印行与否。应该以此书致献于他的灵前，以告慰于他！呜呼！季札挂剑，范张鸡黍，千金一诺，岂足以比程先生之为国家民族保存国宝乎！

这是我为国家购致古书的开始。虽然曾经过若干的波折，若干的苦痛，受过若干的诬蔑者的无端造谣，但我尽了这一分力，这力量并没有白费；这部不朽的弘伟的书，隐晦了近三百年，在三百年后的今日，终于重现于世，且经过了那末大的浩劫，竟能保全不失，不仅仅保全不失，且还能印出问世，这不是一个奇迹么！回想起来，还有些“传奇”的意味，然而在做着的时候，却是平淡无奇的。尽了一分力，为国家民族做些什么，当然不能预知有没有成绩。然而那成绩，或多或少，总会有的，有时且出于意外的好。我这件事便是一个例子。

“但管耕耘，莫问收获”。

我今日看到这一堆的书，摩挲着，心里还十分的温暖，把什么痛苦，什么诬蔑的话都忘记得干干净净。为了这末一部书吃些苦，难道不值得么？

“狂牖文献耗中年”，龚定庵的这一句话，对于我是足够吟味的。从“八一三”以后，足足的八年间，我为什么老留居在上海，不走向自由区去呢？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然而我不能走。许多朋友们都走了，许多人都劝我走，我心里也想走，而想走不止一次，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我有我的自信力。我自信会躲过一切灾难的。我自信对于“狂牖文献”的事稍有一日之长。前四年，我耗心力于罗致、访求文献，后四年——“一二八”以后——我尽力于保全、整理那些已经得到的文献。我不能把这事告诉别人。有一个时期，我家里堆满了书，连楼梯旁全都堆得满满的。我闭上了门，一个客人都不见。竟引起不少人的误会与不满。但我不能对他们说出理由来。我所接见的全是些书贾们。从绝早的早晨到上了灯的晚间，除了到暨大授课的时间以外，我的时间全耗于接待他们，和他们应付着，周旋着。我还不曾早餐，他们已经来了。他们带了消息来，他们带了“头本”来，他们来借款，他们来算帐。我为了求书，不能不一一的款待他们。有的来自杭州，有的来自苏州，有的来自徽州，有的来自绍兴、宁波，有的来自平、津，最多的当然是本地的人。我有时简直来不及梳洗。我从心底里欢迎他们的帮助。就是没有铺子的揹包的书客，我也一律的招待着。我深受黄丕烈收书的方法的影响。他曾经说过，他对于书船到的时候，即使没有自己想要的东西，也要选购几部，不使他们失望，以后自会于无意中有意惊奇的发现的。这是千金买马骨的意思。我实行了这方法，果然有奇效。什么样的书都有送来。但在许多坏书、许多平常书里，往往夹杂着一二种好书、奇书。有时十天八天，没有见到什么，但有时，在一天里却见到十部八部乃至数十百部的奇书，足以偿数十百日的辛勤而有馀。我不知道别的人有没有这种经验：摩挲着一部久佚的古书，一部欲见不得的名著，一部重要的未刻的稿本，心里是那么温热，那末兴奋，

那末紧张，那末喜悦。这喜悦简直把心腔都塞满了，再也容纳不下别的东西。我觉得饱饱的，饭都吃不下去。有点陶醉之感。感到亲切，感到胜利，感到成功。我是办好了一件事了！我是得到并且保存一部好书了！更兴奋的是，我从劫灰里救全了它，从敌人手里夺下了它！我们的民族文献，历千百劫而不灭失的，这一次也不会灭失。我要把这保全民族文献的一部分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我做了许多别人认为傻的傻事。但我不灰心，不畏难的做着，默默地躲藏的做着。我在躲藏里所做的工作，也许要比公开的访求者更多更重要。每天这样的忙碌着，说句笑话，简直有点像周公的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有时也觉得倦，觉得劳苦，想要安静的休息一下，然而一见到书贾们的上门，便又兴奋起来，高兴起来。这兴奋，这高兴，也许是一场空，他们所携来的是那末无用、无价值的东西，不免感到失望，而且失望的时候是那末多，然而总打不断我的兴趣。我是那末顽强而自信的做着这事。整整的四个年头，天天过着这样的生活。这紧张的生活使我忘记了危险，忘记了威胁，忘记了敌人的魔手的巨影时时有罩笼下来的可能。为了保全这些费尽心力搜罗访求而来的民族文献，又有四个年头，我东躲西避着，离开了家，蛰居在友人们的家里，庆吊不问，与人世几乎不相往来。我绝早的起来，自己生火，自己烧水，烧饭，起初是吃着罐头食物，后来，买不起了，只好自己买菜来烧。在这四年里，我养成了一个人的独立生活的能力，学会了生火，烧饭，做菜的能力。假如有人问我：你这许多年躲避在上海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我可以含糊的回答他说：为了抢救并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献工作，没有人来做，我只好来做，而且做来并不含糊。我尽了我的一分力，我也得到了这一分力的成果。在头四年里，以我的力量和热忱吸引住南北的书贾们，救全了北自山西、平津，南至广东，西至汉口的许多古书与文献。没有一部重要的东西曾逃过我的注意。我所必须求得的，我都能得到。那时，伪满的人在购书，敌人在购书，陈群、梁鸿志在购书，但我要的东西决不会跑到他们那里去。我所拣剩下来的，他们才可以有机会拣选。我十分感谢南北书贾们的合作。但这不是我个人的力量，这乃是国家民族的力量。书贾们的爱国决不敢后人。他们也知道民族文献的重要，所以不必责之以大义，他们自会自动的替我搜访罗致的。只要大公无私，自能奔走天下。这教训不单用在访求古书这一件事上面的吧。

我的好事和自信力使我走上了这“狂狷文献”的特殊的工作的路上去。

我对于书，本来有特癖。最初，我收的是西洋文学一类的书；后来搜集些词曲和小说，因为这些都是我自己所喜爱的；以后，更罗致了不少关于古代版画的书籍。但收书范围究竟很窄小，且因限于资力，有许多自己喜爱的东西，非研究所必需的，便往往割爱不收。“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现在，有了比自己所有的超过千倍万倍的力量，自可“指挥如意”的收书了。兴趣渐渐地广，更广了；眼界也渐渐地阔大，更阔大了。从近代刊本到宋元旧本，到敦煌写经卷子，到古代石刻，到钟鼎文字，到甲骨文字，都感到有关联。对于抄校本的好处和黄顾（黄蕘圃、顾千里）细心校勘特点，也渐渐地加以认识和尊重。我们曾经有一颗长方印：“不薄今人爱古人”，预备作为我们收来的古书、新书的暗记。这是适用于任何图籍上的，也表明了我们的态度：“不薄今人爱古人”。对于一个经营图书馆的人，所有的图书，都是有用的资料：一本小册子，一篇最顽固、反动的论文，也都是“竹头木屑”，用到的时候，全都能发生价值。大概在这一点上，我们与专门考

究收藏古本善本的，专门收藏抄校本，或宋元本，或明刊白绵纸本，或清殿板，或清开花纸书的人有所不同。他们是收藏家。我们替国家图书馆收书却需有更广大，更宽恕，更切用的眼光，图书馆的收藏是为了大众的及各种专家们的。但收藏家却只是追求于个人的癖好之后。所以我为自己买书的时候，也只是顾到自己的癖好，不旁鹜，不杂取，不兼收并蓄，但为图书馆收书时，情形和性质便完全不同了。

这使我学习到不少好的习惯和广大的见解；也使我对于过去从未注意到或不欲加以研究的古代书册，开始得到些经验和知识。

若干雕镂精工宋刊本，所谓纸白如玉，墨若点漆的，曾使我沉醉过；即所谓麻沙本，在今日也是珍重异常，飘逸可爱。元刊本，用赵松雪体写的，或使用了不简笔字、破体字的民间通俗本，也同样的使我觉得可爱或有用。

明刊本所见最多，异本奇书的发见也最多。嘉靖以前刊本，固然古朴可喜，即万历以下，特别是天启、崇祯间的刊本，曾被列入清代禁书目录的，那一部不是国之瑰宝，那一部不是有关民族文献或一代史料的东西！

清初刊本，在禁书目录里，固然可宝贵，即嘉道刊本，经洪杨之乱，流传绝罕的，得其一帙，也足以拍案大叫，浮白称快！

即民国成立以来，许多有时间性的报章，杂志，我也并不歧视之。其间有不少东西至今对于我们还可以有参考的价值。

至于柳大中以下的许多明抄校本，钱遵王、陆敕先辈之批校本，为先民贤哲精力之所寄的，却更足以使我摩挲不已，宝爱不忍释手了。

可惜收书的时间太短促，从二十九年的春天开始，到了三十年的冬初，即“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即告结束，前后不过两年的工夫。但在这两年里，我们却抢救了、搜罗了很不少的重要文献。在这两年里，我们创立了整个的国家图书馆。虽然不能说“应有尽有”，但在“量”与“质”两方面却是同样的惊人，连自己也不能相信竟会有这末好的成绩！

说是“抢救”，那并不是虚假的话。如果不是为了“抢救”，在这国家存亡危急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再向国家要求分出一部分——虽然是极小的一部分——作战的力量来作此“不急之务”呢？

我替国家收到也是园旧藏元明杂剧，是偶然的事；但这“抢救”民族文献的工作，却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为什么在这时候非“抢救”不可呢？

“八一三”事变以后，江南藏书家多有烬于兵火者。但更多的是，要出售其所藏，以贍救其家属。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燹矣，楼中普通书籍，均荡然一空，然其历劫仅存之善本，固巍然犹存于上海。苏州“滂喜斋”的善本，也迁藏于沪，得不散失。然其普通书也常被劫盗。南浔刘氏嘉业堂，张氏适园之所藏，均未及迁出，岌岌可危。常熟赵氏旧山楼及翁氏、丁氏之所藏，时有在古书摊肆上发现。其价极奇廉，其书时有绝佳者。南陵徐氏书，亦有一部分出而易米，一时上海书市，颇有可观。而那时购书的人是那末少！谢光甫君是一个最热忱的收藏家，每天下午必到中国书店和来青阁去坐坐，几乎是风雨无阻。他所得到的东西似乎最多且精。虽然他已于数年前归道山，但他的所藏至今还完好不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书库，值得骄傲的。我也常常到书店里去，但所得都为“奇零”，且囿于小说、戏曲的一隅。张尧伦、程守中诸位也略有所得，但所得最多者却是平贾们。他们犖犖北去，获利无算。闻风而至者日以多。几乎每一家北平书肆都有人南下收书。在那个时候，他们有纵横如意、垄断南方书市之概。他们往往以中国书店为集中的地点。

一包包的邮件，堆得像小山阜似的。我每次到了那里，总是紧蹙着双眉，很不高兴。他们说某人得到某书了。我连忙去追踪某人，却答道，已经寄平了，或已经打了包了。寄平的，十之八九不能追得回来，打了包的有时还可以逼着他们拆包寻找。但以如此方法，得到的书实在寥寥可数，且也不胜其烦。他们压根儿不愿意在南方售去。一则南方书价不高，不易得大利；二则我们往往知道其来价，不易“虎”人，索取高价；三则他们究竟以平肆为主，有好书去，易于招揽北方主顾。于是江南的图籍，便浩浩荡荡的车载北去。我一见到他们，便觉得有些触目伤心。虽然我所要的书，他们往往代为留下，但我的力量是那末薄弱，我所要的范围，又是那末窄小，实在有类于以杯水救车薪，全不济事。而那两年之间，江南散出去的古籍，又是那末多，那末齐整，那末精好，而且十分的廉价。徐积馀先生的数十箱清人文集，其间罕见本不少，为平贾扫数购去，打包寄走。常熟翁氏的书，没有一部不是难得之物，他们也陆续以低价得之。忆有《四库底本》一大堆，高及尺许，均单本者，为修绠堂孙助廉购去。后由余设法追回，仅追得其“糟粕”十数本而已。沈氏粹芳阁的书散出，他们也几乎网罗其全部精英，我仅得其中明刊本《皇明英烈传》等数种耳。又有红格抄本《庆元条法事例》，甚是罕见，亦为他们得去。他们眼明手快，人又众多，终日蟠据汉口路一带，有好书必为其所夺去。常常觉得懊恼异常。而他们所得售之谁何人呢？据他们的相互传说与告诉，大约十之六七是送到哈佛燕京学社和华北交通公司去，以可以得善价也。偶有特殊之书，乃送到北方的诸收藏家，像傅沅叔、董绶经、周叔韬[弢]那里去。殿板书和开花纸的书则大抵皆送到伪“满洲国”去。我觉得：这些兵燹之余的古籍如果全都落到美国人和日本人手里去，将来总有一天，研究中国古学的人也要到外国去留学。这使我异常的苦闷和愤慨！更重要的是，华北交通公司等机关，收购的书，都以府县志及有关史料文献者为主体，其居心大不可测。近言之，则资其调查物资，研究地方情形及行军路线；远言之，则足以控制我民族史料及文献于千百世。一念及此，忧心如捣！但又没有“挽狂澜”的力量。同时，某家某家的书要散出的消息，又天天在传播着。平贾们也天天钻门路，在百计营谋。我一听到这些消息，便日夜焦虑不安，亟思“抢救”之策。我和当时留沪的关心文献的人士，像张菊生、张咏霓、何柏丞、张凤举诸先生，商谈了好几次。我们对于这个“抢救”的工作，都觉得必须立刻要做！我们干脆地不忍见古籍为敌伪所得，或大量的“出口”。我们联名打了几个电报到重庆。我们要以政府的力量来阻止这个趋势，要以国家的力量来“抢救”民族的文献。

我们的要求，有了效果。我们开始以国家的力量来做这“抢救”的工作。

这工作做得很秘密，很成功，很顺利，当然也免不了有很多的阻碍与失望。其初，仅阻挡住平贾们不将江南藏书北运，但后来，北方的古书也倒流到南方来了。我们在敌伪和他国人的手里夺下了不少异书古本。

“八一三”后的头两年，我以个人的力量来罗致我自己所需要的图书，但以后两年，却以国家的力量，来“抢救”许许多多的民族文献。

我们既以国家的力量，来做这“抢救”文献的工作，在当时敌伪的爪牙密布之下，势不能不十分的小心秘密，慎重将事。我们想用私人名义或尚可公开的几个学校，像暨大和光华大学的名义购书。我们并不想“求”书，我们只是“抢救”。原来的目的，注重在江南若干大藏书家。如果他们的收藏，有散出的消息，我们便设法为国家收购下来，不令其落于书贾们和敌伪们的

手中。我们最初极力避免与书贾们接触。怕他们多话，也怕有什么麻烦。但书贾们的消息是最灵通的，他们的手段也十分的灵活。当我们购下苏州玉海堂刘氏的藏书，又购下群碧楼邓氏的收藏之后，他们开始骚动了。这些家的收藏，原来都是他们“逐鹿”之目标，久思染指而未得的。在这几年中，江南藏书散出者，尚未有像这两批那末量多质精的。他们知道力不足以敌我们，特别是平贾们，也知道在江南一带已经不能再得到什么，便开始到我家走动，不时的携来些很好、很重要的“书样”。我不能不“见猎心喜”，有动于中。和咏霓、柏丞二先生商量了若干次，我们便决定也收留些书贾们的东西。

这一来，书贾们便一天天的来得多，且来的更多了。我家里的“样本”堆得好几箱。时时刻刻要和咏霓、菊生、柏丞诸先生相商，往来的信札，叠起来总是有一尺以上高。——这些信札，我在“一二八”以后，全都毁去，大是可惜。惟我给咏霓先生的信札，他却为我保存起来。——我本来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收书的范围越来越广。所收的书，越来越多。往往弄得拮据异常。我殚心竭力地在做这件事，几乎把别的什么都放下了，忘记了。我甚至忘记了为自己收书。我的不收书，恐怕是二十年来所未有的事。但因为有大目标在前，我便把“小我”完全忘得干干净净。我觉得国家在购求搜罗着，和我们自己在购求搜罗没有什么不同。藏之于公和藏之于己，其结果也没有什么不同。我自己终究可以见到，读到的。更可喜悦的是，有那末多新奇的书，精美的书，未之前见的书，拥挤到一块来，我自己且有眼福，得以先睹为快。我是那末天真地高兴着，那末一股傻劲的在购求着，虽然忙得筋疲力尽也不顾。咏霓先生的好事和好书之心也不下于我。我们往往是高高兴兴地披阅着奇书异本，不时的一同拍案惊喜起来！在整整两年的合作里，我们水乳交融，从来没有一句违言，甚至没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咏霓先生不及看“升平”而长逝，我因为环境关系，竟不能抚棺一恸！抱憾终生！不忍见我们所得的“书”！谨以此“目录”奉献给咏霓先生，以为永念！

我们得到了玉海堂、群碧楼二藏书后，又续得嘉业堂明刊本一千二百余部。这是徐森玉先生和我，耗费了好几天工夫从刘氏所藏一千八百余部明刊本里拣选出来的。一举而获得一千二百部明本，确是空前未有之事。本来要将嘉业堂藏书全部收购，一以分量太多，度藏不易；二则议价未谐，不如先撷取其精华。这些书最初放在我家里，简直无法清理，堆得“满坑满谷”的，从地上直堆到天花板，地上更无隙地可以容足。我们曾经把它们移迁到南京路科发药房堆栈楼上。因为怕不谨慎，又搬了回来。后来科发堆栈果被封闭，幸未受池鱼之殃。——虽然结果仍不免于被劫夺。

蕴辉斋张氏，风雨楼邓氏，海盐张氏，和涉园陶氏的一部分残留在沪的藏书，也均先后入藏。从南北各地书贾们手中所得到的，也有不少的东西。

最后，南浔适园张氏藏书，亦几经商洽而得全部收归国有，除了一部分湖州的乡邦文献之外。这一批书，数量并不太多，只有一千余部，但精品极富，仅黄菱圃校跋的书就在一百种左右。

这时，已近于“一二八”了，国际形势，一天天的紧张起来。上海的局面更一天天的变坏下去。我们实在不敢担保我们所收得的图书能够安全的度藏。不能不作迁地为良之计。首先把可列入“国宝”之林的最珍贵古书八十多种，托徐森玉先生带到香港，再由香港用飞机运载到重庆去。这事，费尽了森玉先生的心与力，好容易才能安全的到了目的地。国立中央图书馆接得

这批书之后，曾开了一次展览会，听说颇为耸动一时。其余的明刊本、抄校本等，凡三千二百余部，为我们二年来心力所瘁者，也都已陆续的从邮局寄到香港大学，由亡友许地山先生负责收下，再行装箱设法运到美国，暂行度藏。这个打包邮寄的工作，整整地费了我们近两个月的时间。叶玉虎先生在香港方面也尽了很大的力量。他在港、粤所收得的书也加入其中。

不料刚刚装好箱，而珍珠港的炮声响了，这一大批重要的文献，图书，便被沦陷于香港了。至今还未寻找到它们的踪迹，存亡莫卜，所在不明。这是我最为疚心的事，也是我最为抱憾、不安的事！

我们费了那末多心力所搜集到的东西，难道竟被毁失或被劫夺了么？

我们两年间辛苦勤劳的所得难道竟亡于一旦么？

我们瘁心劳力从事于搜集，访求，抢救的结果，难道便是集合在一处，便于敌人的劫夺与烧毁么？

一念及此，便捶心痛恨，自怨多事。假如不寄到香港去，也许可以仍旧很安全的保全在此地吧？假如不搜集拢来，也许大部分的书仍可楚弓楚得，分藏于各地各收藏家手里吧？

这个“打击”实在太厉害了！太严重了！我们时时在打听，在访问；然而毫无消息。日本投降，香港接收之后，经了好几次的打听，访问，依然毫无踪影。难道果真完全毁失了，沉没了么？但愿是依然无恙的保存在某一个地点！但愿不沉失于海洋中！但愿能够安全的被保存于香港或日本的某一个地方，我不相信这大批的国之瑰宝便会这样的无影无踪地失去！我祈求它们的安全！

今日翻开了那寄港书的书目，厚厚的两册，每一部书都有一番收购的历史；每一部书都使我感到亲切，感到羞歉，感到痛心！他们使我伤心落泪，使我对之有莫名的不安与难过！为什么要自我得之，复自我失之呢！

虽然此地此时还保存着不少的足以骄傲的东西，还有无数的精品、善本乃至清代刊本，近代文献。然而总觉得失去的那一批实在太可惜太愧对之了！我们要竭尽全力以寻访之，要“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寻访之！

政府正在组织一个赴日调查文物的团体，我希望这团体能够把这一批书寻到一个下落——除非得到了他们的下落，我的心永远是不能安宁的！

“一二八”后，我们的工作不能不停止。一则经济的来源断绝；二则敌伪的力量已经无孔不入，决难允许像我们这样的一个组织有存在的可能；三则，为了书籍及个人的安全计，我不能不离开了家，我一离开，工作也不能不随之而停顿了。

那时我们还不知道香港的消息如何，我们还在希望香港的书已经运了出去，但又担心着中途的沉失与被扣留。而同时存沪的书却不能不作一番打算。“一二八”后的一个星期内，我每天都在设法搬运我家里所藏的书。一部分运藏到设法租得之同弄堂的一个医生家里；一部分重要的宋、元刊本，抄校本，则分别寄藏到张乾若先生及王伯祥先生处。所有的帐册、书目等等，也都寄藏到张、王二先生处。比较不重要的帐目、书目，则寄藏于来薰阁书店。又有一小部分古书，则寄藏于张芹伯先生和张葱玉先生叔侄处。整整忙碌了七八天，动员我家里的全体的人，连孩子们也在内，还有几位书店里的伙友们，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忙碌地搬着运着，为了避免注意，不敢用搬场车子，只是一大包袱、一大包袱的运走。因此，搬运的时间更加拖长。我则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着，生怕中途发生了什么阻碍。直等到那几个运送的人平安的

归来了，方才放下心头上的一块石，这样，战战兢兢地好不容易把家里的书运空，方才无牵无挂地离开了家。

这时候，外面的空气越来越恐怖，越来越紧张，已有不少的友人被逮捕了去，我乃不能不走。我走的时候是十二月十六日。我没有确定的计划，我没有可住的地方，我没有敷余的款子。——我所有的款子只有一万元不到，而搬书已耗去二千多。——从前暂时躲避的几个戚友处，觉得都不大妥，也不愿牵连到他们，只随身携带着一包换洗的贴身衣衫和牙刷毛巾，茫茫的在街上走着。那时，爱多亚路、福煦路以南的旧法租界，似乎还比较的安静些，便无目的向南走去。这时候我颇有殉道者的感觉，心境惨惶，然而坚定异常。太阳很可爱的晒着，什么都显得光明可喜，房屋、街道、秃顶的树、虽经霜而还残存着绿色的小草，甚至街道上的行人、车辆，乃至蹲在人家门口的猫和狗，都觉得可以恋恋。谁知道明天或后天，能否再见到这些人物或什么的呢！

我走到金神父路，想到了张耀翔先生的家。我推门进去，他和他的夫人程俊英女士，十分殷勤的招待着；坚留着吃饭和住宿，我感动得几乎哭了出来。在他那里住了一宿。但张先生是我的同事，我不能牵惹到他。第二天一清早，便跑到张乾若先生处，和他商量。乾若先生一口气答应了下来，说，食宿的事，由他负责。约定黄昏的时候，再来一趟，由他找一个人带我去汝林路住下。我再到张宅，取了那个小包袱，还借了一部铅印的《杜工部诗集》，辞别了他们，他们还坚留着我多住若干时日。我不能不辞谢了，说不出什么感激的话。那天下午在乾若先生那里，和他商定了改姓易名的事，和将来的计划。他给我以许多肯定而明白的指示。到了薄暮的时候，汝林路的房主人邓芷灵先生和夫人来了。匆匆地介绍一下，他们便领我到寓所那里去。电灯已经亮了，我随着走了不少不熟悉的路，仿佛走得很久，方才到了他们那里。床铺和椅桌都已预先布置好。芷灵先生年龄已经很大，爽直而殷勤，在灯下谈了好些话，直到我连打了好几次的呵欠。那一夜，我做了不少可怕的梦，甚至连汽车经过街上，也为之惊慌起来。

第二天，我躲在房里读杜诗，并且摘录好几首出来。笔墨砚纸等也是向张家借得的。

过了几天，心里渐渐安定了下来，又到外面去走走，然而总不敢走到熟悉的人家去，只打了一个电话回家说是“平安”而已。这样的便和“庙弄”的家不相往来！直到我祖母故世的时候，方才匆匆的再回来一趟，又匆匆的走了，一直在外面住了近四年的时候。

在这四年之间，过的生活很苦，然而很有趣。我从没有过这样的生活过。前几次也住到外面过，但只是短时期的，也没有这次那末觉得严重过。有时很惊恐，又有时觉得很坦然有一天清晨，我走出大门，看见弄口有日本宪兵们持枪在站岗。我心里似被冰块所凝结，但又不能退回去，只好假装镇定的走了出去，他们并没有注意。原来他们在南头的一个弄堂里搜查着，并不注意到我们这一弄。又有一夜，听见街上有杂沓的沉重的皮鞋声，夹杂着兽吼似的叫骂声，仿佛是到了门口，但提神停息以听时，他们又渐渐地走过了，方才放心下来。有时，似觉得有人在后面跟着，简直不敢回过头去。有时，在电车或公共汽车上，有人注意着时，我也会连忙地在一个不相干的站头上跳了下去，我换了一身中装，有时还穿着从来不穿的马褂，眼镜的黑边也换了白边。不敢在公共地方出现，也不敢参与任何的婚、丧、寿宴。

我这样的小心的躲避着，四年来如一日，居然能够躲避得过去，而且在躲避的时候，还印行了两辑的《中国版画史图录》，有一百二十本的《应览堂丛书》，十二本的《长乐郑氏影印传奇第一集》和十二本的《明季史科丛书》，这不能不说是“天幸”！

虽然把旧藏的明刊本书、清刊的文集以及《四部丛刊》等书，卖的干干净净，然而所最喜爱的许多版画书、词曲、小说、书目，都还没有卖了去，正想再要卖出一批版画书而在恋恋不舍的时候，“天亮”的时间却已经到了。如果再晚二三个月“天亮”的话，我的版画书却是非卖出不可的。

在这悠久的四个年头里，我也曾陆续的整理了不少的古书，写了好些跋尾。我并没有十分浪费这四年的蛰居的时间。

在这悠久的四个年头里，我见到、听到多少可惊可愕可喜可怖的事。我所最觉得可骄傲者，便是到处都是温热的友情的款待，许多友人们，有的向来不曾见过面的，都是那末热忱的招呼着，爱护着，担当着很大的干系；有的代为度藏许多的图书，占据了那末多可宝贵的房间，而且还担当着那末大的风险。

在这些友人们里，我应该个个的感谢他们，永远地不能忘记他们，特别是张乾若先生和夫人，王伯祥先生，张耀翔先生和夫人，王馨迪先生和夫人！有一个时候，那位医生有了危险，不能不把藏在那里的书全都搬到馨迪先生家里去！张叔平先生，张葱玉先生，章雪村先生等等，他们都是那末恳挚地帮助着我，几乎是带着“侠义”之气概。如果没有他们的有力的帮助，我也许便已冻馁而死，我所要保全的许许多多的书也许便都要出危险，发生问题。

我也以这部《目录》奉献给他们，作为一个患难中的纪念。

我这部《目录》，只是从“日记”中摘录出来的。无关于“求书”的事的，便不录出。虽然只是“书”的事，却也不少可惊可愕可喜可悲的若干故事在着。读者们对于古书没有什么兴趣的，也许对之也不会有什么兴趣。且我只写着两年间的“求书”的经过，——从二十九年正月初到三十年十二月初——有事便记，无事不录。现在还不知道能写到多少。说不定自己觉得不必再写，或者读者们觉得不必再看下去了时，我便停止了写。

以上是序，下面是按日的日记体的纪录。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

一月四日（星期四）

昨夜入睡太迟，晨起，甚疲。叶铭三来索款，以身无一文，嘱其缓日来取。闻暖红室刘公鲁藏书，已售给孙伯渊。此人即前年卖出也是园元明杂剧者。本来经营字画古董，气魄颇大，故能独力将公鲁书收下。恐怕又要待价而沽了。拟托潘博山先生向其索目一阅。暖红室以汇刻传奇著于世，所藏当富于戏曲一类的书。惟自刘世珩去世后，藏书时有散出，我在十多年前便已收到好几部曲子；像用黑绸面装订的明末刊本《荷花荡》，就是其中之一。又有黄蕘圃旧藏之明初刊本《琵琶记》及《荆钗记》，为今日所知的传奇的最古刊本，亦曾归他所有。但《琵琶》已去，《荆钗》已坏，目中自决不会有的。公鲁为人殊豪荡，脑后发辫垂垂，守父训不剪去。时至上海宴游，偶作小文刊日报上。我和他曾有数面缘。他尝有信向我索《清人杂剧》，作《国

朝杂剧》，可知其沾染“遗少”气味之深。“八一三”后，敌军进苏州。他并未逃走。闻有一小队敌兵，执着上了刺刀的枪，冲锋似的，走进他家。他正在书房执卷吟哦，见敌兵利刃直向他面部刺来，连忙侧转头去，脑后的辫子一摇晃，敌兵立即鞠躬退出。家里也没有什么损失。然他经此一惊吓，不久便过世了。他家境本不好，经此事变，他的家属自不能不将藏书出售。但愿能楚弓楚得，不至分散耳。

傍晚，蔚南来电话，说某方对他和我有不利意。我一笑置之。但过了一会，柏丞先生也以电话通知此事，嘱防之。事情似乎相当的严重。即向张君查问，他也说有此事；列名黑名单里的凡十四名，皆文化教育界中人（此十四人皆为文化界救亡协会之负责人）。予势不能不避其锋。七时，赴某宅，即借宿一宵。予正辑版画史，工作的进行，恐怕要受影响了。夜梦甚多。

一月五日（星期五）

西禾至某宅访予。他知道了这事，连忙来慰看；谈久之，方别去。至新民村访予同，未遇，复至四合里，遇之。偕至锦江茶室喝茶。予云：我辈书生，手无缚鸡之力，百无一用，但却有一团浩然之气在。横逆之来，当知所以自处也。予同云：人生找结笔甚难。有好结笔倒也不坏。这是达观之论。十一时许，至中国书店，遇平贾孙实君等数人，知彼辈寄平之书，未到者甚多。且于十二月间，曾在火车上焚失不少邮包。先民文献，无端又遭此一劫，殊可悼伤！但此后彼辈辇书北去，当具若干戒心矣。向朱惠泉购得光绪二十八年成都木刻本《四川明细地图》一巨幅，价八元，作入川之准备。赴传新书店，购得元刊吴师道校注本《战国策》残本一册，《罗汉文征》一册，《粤海小志》一册等，共价十一元。抱书回高宅，翻阅过午，竟未及午餐。书癖诚未易革除也。午睡甚酣，至三时才醒。写《版画史》“引用书目”，以参考材料不在手头，未能完工；又誊清《版画史》自序，未及一叶，即放下，亦以手头无书之故。似此“躲避”生涯，如何能够安坐写作呢？可见在这样日月失光、沧海横流的时候，要想镇静宁心的从事于什么“名山事业”，恐怕是不大可能的。夜九时睡。

一月六日（星期六）

晨七时起。誊写《版画史》自序，殊见吃力。因为太矜持，反而写得慢，写得不大流利痛快了。下午五时许，至文汇书店，得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份《京报》十余册，系由新闻报馆排印者，价二元。晚至航运俱乐部晚餐。连日天气很暖和，很像暮春三月，但今天日落后，渐渐的冷起来。睡在床上，独自默念着：家藏中西图书，约值四五万元，家人衣食，数年内可以无忧。横逆之来，心仍泰然。惟版画史的工作，比较重要，如不能完成，未免可惜，且也不会再有什么人在这几年内去从事的，自当抛却百事，专力完成之。因此，便也不能不格外的小心躲避。然果无可避，则亦只好听之而已。身处危乡，手无寸铁，所恃以为宝者，唯有一腔正气耳。

一月七日（星期日）

晨起写《版画史》自序三页，仍极慢，至午后，方才写毕。即至伯祥处，托他将自序校阅一遍。傍晚，赴东华处。落日如红球，金光四射，满天彩霞灿烂。迎之而西行，眼看其落下地平线去，而天色则渐渐由红而紫而灰。天气有点冷飕飕的。觉得神清气爽。八时归，整理《太平山水图画》及《黄氏所刊版画集上》二册，所缺仍多，非赶印不可。

一月八日（星期一）

晨起，回“庙弄”一行。几天不曾回去，仿佛隔了几年，情绪有点紧张，也有点异样。一推开门，家中人声嘈杂，正在纷纷议论。一见我回来，争来诉说，方有巡捕十许人，押一青年人至宅，说曾住此处。其实，并不认识其人。纷扰数刻，刚刚离去。予匆匆取了应用之物若干，即出。有满地荆棘之感。“等是有家归未得”，仿佛为予咏也。下午，至传新书店，得《皇朝礼器图式》残本三册，图极精细。闻有九册，前为平贾王渤馥得去。如能合璧，大是快事。若英见予《劫中得书记》，赠予明刊锺伯敬、王思任集数种。翻阅数过，百感交集！夜，仍住某宅。

一月九日（星期二）

晨起，阴云密布，西北风大作，冷甚。赴校办公，无异状。作致菊生、咏霓二先生函。午后，杨金华带了《版画史》的锦函来，函尚潮湿，即将书签贴好，尚为古雅可观。访家璧，见他正在校对我所写《谈版画之发展》一文。箴有电话来，说，外间情形很紧张，以少出门为宜。在这个“危境”中，写些研究性质的东西都不可能了么？直不知人间何世！原来便不该做些“不急”“无补”之务的！愤懑之至！十时半睡。

一月十日（星期三）

晨起，整理《版画史图录》第一辑各册页子，仍缺少十余页，应催其早日印齐。今日之事，一天是一个局面，是一个结束，能够有一天，便可多作一天的工作，也便是一个意外的收获。谁知道明天是什么情形呢？每天早晨看见窗外的太阳光的时候，总要松了一口气，轻喟的自语道：这一天又可以算是我的了！为了要争取时间，便不能不急急忙忙的在工作着。九时，赴校上课。是这学期的末一课了，当敦勉各生安贫励志，保持身心的清白，为将来国家建设工作的柱石。国家所以不动员青年学生入伍，就要为将来的建设工作打下基础的。他们似均颇有感动。午后，至上海书林购王绶珊所藏《方志目》钞本二册，价六元。傍晚，过中国书店，遇平贾孙殿起。孙即编《贩书偶记》者，为书友中之翘楚。彼专搜清人诗文集及单行著作之冷僻者，颇有眼光，见闻亦广。谈甚畅。七时许，在暮色苍茫中，抱所得书及印样一包归。十一时，睡。

一月十一日（星期四）

晨七时起，甚觉疲倦，疑有些伤风。十时许，赴中国书店，又赴万有书

店，晤姜鼎铭，得嘉靖本《东坡七集》，明刊本《昌黎集》及明仿宋刊本《黄帝内经素问》，价三百五十元。此类明刊白绵纸书，予以其价昂，而上不及宋元本之精美，下不如清代板之适用，故不甚罗致之。然刻工之精者，往往能鱼目混珠，被书贾们染纸加蛀，冒作宋元刊本。且未经删改，尚存古本面目，藏书家固应收之。予力薄，仅能偶得一二种耳。吴瞿安先生锐志欲收此类嘉靖刊本书百种，尝颜其所居曰百嘉室。恐终未能偿其愿也。镇日心闷意乱，似觉伤风甚剧。八时即睡。

一月十二日（星期五）

连日天阴，欲雨不雨，正如予心境之灰郁。上午，整理《版画史图录》。下午，访家璧。自觉体力不支，头涔涔欲晕，勉强归所寓。即解衣睡倒，晚饭也不能吃。热度高至三十八度许。疑是伤寒，故以不吃为上策，吃了两颗阿司匹灵，中夜出了一身大汗。但热度仍不退。双眼耿耿待旦，殊无聊。倚枕读东坡诗。

一月十三日（星期六）

仍阴云满天，昨夜艰于入眠，偶一阖眼，即又醒来。天尚未明，微见朦胧之晨影。一灯茕茕，卧听远鸡相继而鸣。心头感触万端，觉得时间过得格外的慢，听得出床头小钟，一秒一分的在慢吞吞的走着。读东坡诗。不知不觉间，放手释卷，复又熟睡。八时起，热度仍在三十八度。请了郑宝湜医生来诊。他也疑是伤寒。吃了蓖麻油，洗清肠胃。终日不想吃什么，亦不觉饥。下午，服药两次，热度反而高到三十九度。柏丞先生来一信，说蒋复璁先生从渝来，有事亟待面洽。勉强打一电话给他，说明病情，请他先与张凤举先生谈洽。终日倚枕读《东坡集》，颇有所得，时睡时醒，竟不知是昼是夜。

一月十四日（星期日）

微有日影。热度已退，觉精神清爽，惟四肢无力耳。仅发热两天，不知如何，竟会这样的疲弱！郑医生云：心脏甚弱，肺部亦不甚强。向来好胜，今后当静养少动了。上午，十一时许，柏丞先生来。说起蒋复璁来此，系为了我们上次去电，建议抢救，保存民族文献事；教部已有决心，想即在沪收购，以图挽救。拟推举菊生先生主持其事。惟他力辞不就，已转推张咏霓先生。此事必当进行，惟亦须万分机密，且必须万分谨慎，免得将来有人说话。我不想实际参与其事，但可竭力相助。当与柏丞先生约定，在后天中午，与蒋、张诸位在菊生先生宅商谈此事。终日以牛奶、豆浆代饭，甚觉乏力。

一月十五日（星期一）

晨，天阴，下午，微雨。三时许即醒来，不久，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五时半，又醒来。天色尚未发白。倚枕听鸡声陆续而作，又闻窗外鸟声渐渐的喧闹起来。热度已退净，惟全身仍觉软弱无力，十余年来，未有大病过，以此次卧床两日，最为严重。早吃西米粥，中午，吃挂面及鲫鱼汤，渐觉体

暖有力。然上下楼梯，足尚颤战，不大得劲。午时，柏丞先生来电话，说复璁先生正在菊生先生处劝驾，未知有效否。要我下午也去一趟。午餐后，至潘博山先生处。谈起暖红室刘氏藏书事，说，中有元刻元印本《玉海》（刘世珩得此书，名其居为玉海堂），又有剧曲不少。惟书贾居奇，恐不易成交。但他必力促其成。又谈起群碧楼邓氏书，亦欲出售，中多精钞名校本。他想，将为此事赴苏一行。他说，意在不任中国古籍流失国外耳。保存文献，人同此心。博山为我辈中人，故尤具热忱。至良友，晤家璧，与他约定，每四个月，可出《版画史》四册。想来不会失约的。但须看第一辑销路如何而定继续与否。予向来有一自信：但肯做事，不怕失败。且往往是不会失败的。予计划颇多，每甚弘巨，且邻于不自量力。然竟每每成功者，以具有此种勇猛直前、鲁莽不顾之毅力也。予已过中年，然此毅力至今犹旺。不似其他中年人之兢兢于小利害，亦不似老年人之徘徊却顾，遇事不敢下手。以此，往往弄得生计窘迫，室人交谪。然天生好事，终未能改变也。四时许，至柏丞先生处，谈了一会。又至菊生先生处，以病辞，未见。颇为不快。至凤举先生处，相见甚欢。将此事经过，详细的告诉了他，他也十分的高兴。我们只负发动、鼓吹之责，成功则不必自我。当初一念发动，茫无把握，或已觉无望，乃至绝望，但却会意外的在灰心失望之后得到了成功。“自古成功在尝试”，此语诚不诬也。六时，归，仍吃挂面。八时许，即睡。

一月十六日（星期二）

阴雨终日。身体已复元，精神亦佳。四时许，醒。很早的便起身梳洗。八时许，到校办公，清理积牍。晤柏丞先生，谈及购书事，已决定由菊生、咏霓、柏丞、凤举四位及我负责。下午，回家一行，检出几部需用之书携带在身边。至中国书店，晤姚石子先生，谈甚畅。傍晚，至万宜坊，访蒋复璁先生。我们第一次见面，但畅所欲言，有如老友。他说起这次战事中中央图书馆的损失；说起内地购书的困难，说起将来恢复的计划；说起内地请人要他来此一行的原因，然后谈到我们的去电事。予则谈起江南各藏书家损失的情形，谈起平贾们南来抢购图书的情形；谈起玉海堂刘氏，积学斋徐氏藏书散失的经过；然后说到我们发电的原因和我们的购书计划。最后，说到我个人在劫中所得的东西，说到某某书，某某书失去了的可惜。我们谈到九时许，竟忘记了吃饭。出门，细雨霏霏。至大三元晚餐，用二元。回家，已近十一时，亲戚们很恐慌，不知予何在，恐怕会有什么事故。心头觉得惨怆而温暖。即睡。

一月十七日（星期三）

昨睡甚迟，意今晨必可晏起，但不到四时，又已醒来。眼睁睁的看电灯，看天花板，看黑漆漆的窗户，思潮起落不定。六时，穿衣起床。天色方见灰白。倚窗，见屋瓦皆润湿，知雨丝又在飞洒矣。九时，赴图书馆办公。翻阅几种书目。午餐后，回家一行，看望贝贝的病。他热度不高，惟大便未通，爱睡爱哭。在三楼，整理小说书及半。鼠粪甚多，灰尘不少。双手墨黑，屢洗屢黑。不知何故，老鼠总喜欢在书堆里做窝逞其破坏的惯技，恨不一一扑杀之。四时许，至中国书店，知有一批书要售出，群碧楼书亦要在年底以前

出脱。当嘱以款可设法，惟不能售给平贾或分散零售。八时许归。博山有电话来，说玉海堂刘氏书，可以谈判成功，目录可于星期日上午送来，闻之，甚为兴奋。晚餐，仍进挂面。

一月十八日（星期四）

阴雨终日。今晨又是睁了眼看天亮。此实生平所未有之经验。六时，起身。作一函，致菊生先生。清理《太平山水图画》二份，拟赠给慰堂先生。九时，赴校办公。陈某来谈，态度颇可疑，或有刺探之意。说起前日所传绑架事，谓出慰南误会；又说不过是神经战的一种。我不欲听他的话，但亦须十分戒备。“我有笔如刀”，书生的笔的诛伐的力量，也许还在戈矛之上。惟为了工作的关系，尚不能不隐忍自重，不欲多言招患。午餐后，回家整理小说书。大致已完结，共凡九箱，普通本子的小说已经应有尽有，惟“善本”尚不甚多耳。中国小说如此之贫乏可怜，实在令人骇异。历史不为不久，作家不为不多；然而数量却是那末少。曹雪芹只写了一部《红楼梦》，吴敬梓也只写了一部《儒林外史》。为什么他们不能多写些呢？为什么中国小说家没有像狄更司、托尔斯泰诸人的魄力呢？四时后，过中国书店。石麒云：来青阁收到《碧山乐府》一部，后附曲三种。立至来青阁取阅，乃是崇祯本之至后印者；所附者为南曲《次韵游春记》及《中山狼》。予原藏有两部，即弃之不顾。至传新书店，得清词数种。八时归。十时睡。

一月十九日（星期五）

小雨连朝不止，有暮春落花时节的样子。未明即起。九时许，赴校。至张咏霓先生处，商谈购书事。他提出两点意见：(1)对外宜缜密；以暨大，光华及涵芬楼名义购书。(2)款宜存中央银行。他因小病，未能赴菊生先生宅，故托我代达其意。正午，与柏丞先生同赴张宅。慰堂、凤举二位亦到。谈甚久。原则上以收购“藏书家”之书为主。未出者，拟劝其不售出。不能不出售者，则拟收购之，决不听任其分散零售或流落国外。玉海堂、群碧楼二家，当先行收下。我极力主张，在阴历年内必须有一笔款汇到，否则刘、邓二家书将不能得到。又主张，购书决不能拘于一格，决不能仅以罗致大藏书家之所藏为限。以市上零星所见之书，也尽有孤本、善本，非保存不可者在。不能顾此失彼。必须仿黄蕙圃诸藏家的办法，多端收书。但他们的意见，总以注意大批的收藏为主。最后，一致同意，自今以后，江南文献，决不听任其流落他去。有好书，有值得保存之书，我们必为国家保留之。此愿蓄之已久，今日乃得实现，殊慰！凤举与予，负责采访；菊生负责鉴定宋元善本，柏丞、咏霓则负责保管经费。予生性好事，恐怕事实上非多负些责不可。三时许散。至中国书店，又得《皇朝礼器图式》四册，装潢与前在传新所得者相类，仍是从一部中拆散出售者。叶铭三以抄本唐宋词六本见售，价四十元。向校借一百元，以须付富晋书款也。归来甚倦，晚餐后即睡。

一月二十日（星期六）

夜眠甚酣，六时方醒。窗外雪片飘舞。今年第一次见雪，天气要逐渐寒

冷了。十时，至来青阁，购《四库标注》一部，价三十元，即着人送到慰堂处。下午，至中国书店，与石麒谈购书事，费庚生送来装订好之《玉夏斋十种曲》，甚精雅。此书在平购得，久受“风伤”，触手即破，今则可翻读矣。每本装订费二元，似甚昂。四时，赴良友晤家璧，商《版画史》事。他觉得第二辑能否继续出版，尚未甚把握。五时归。六时半，赴胡咏骐宅晚餐。吴耀宗谈到内地旅行的经过，觉得前途有无限的光明，许多地方可指摘，但大体上还不错。我们对于现状，应该以望远镜看，不应该用显微镜看。乐观的成份究竟居多，很觉得兴奋。九时半归。雪尚未止。十时半睡。

一月二十一日（星期日）

雪止，微雨。天气又转暖。七时许起。博山来谈，约定下午至孙伯渊处看玉海堂书。二时许，偕博山同赴孙处。先看目录，不过十多部书，佳品不少。按目看书，一部部的翻阅一过。《玉海》二百册，确是元刻元印本。与后来所谓“三朝本”，补刻极多，字迹模糊不清者截然不同。其他元刻本数种亦佳。戏曲书凡二十余部，以明刻本《董西厢》、张深之本《西厢记》，及有附图的原刻本《画中人》为最好，余皆下驷耳。刘氏尝刻《暖红室汇刊传奇》，意其收藏善本戏曲必多而精，实则，浪得虚名也。伯渊索价二万五千金。当答以考虑后再商谈。归时，已万家灯火矣。

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晨起，即致函菊生、咏霓二位，详述玉海堂所藏的内容。因购书款须俟慰堂归渝后方能汇来，现在尚不能与书贾有何具体的商谈与决定，只能力阻其不散售，留以待我们全数收购耳。九时，赴校，与柏丞先生谈此事。他的意思，最好由菊生先生再去看一遍，作最后之决定。下午，赴中国书店一行，无所得。九时睡。

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二）

晨起，见薄雾蒙蒙，万家瓦上皆霜，胸襟寥阔凄清。读苏诗自遣。九时，赴校授课。饭后，至中国书店一行。无意中得《林下词选》二本，为之大喜。我收词集不少，未见此书。今得之，于“词山”中又增一珍石了。《林下词选》为吴江周铭編集，凡十四卷，刊于康熙辛亥，首有尤侗序。所选皆闺秀词，自宋至清初，搜辑甚备。叶仲韶有《填词集艳》，沈慕燦有《初蓉集》，皆未刊，铭得之，遂增益之，以成此选，其间明清二代词，颇多失传之作。四时，归，灯下阅《词选》，颇高兴。

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三）

晨，赴校。饭后，至孙伯渊处，再细阅玉海堂书。菊生先生亦来。他见多识广，普通书甚难入眼。这批书似无甚足以使他留连惊喜者。《玉海》虽初印，然外间尚不难得。我自己则独恋恋于《董西厢》及张深之本《西厢记》。我自己搜集《西厢》异本已十年，所得不过二十种，明刊《董西厢》，迄未

得一本，而张深之本《西厢》，图出陈老莲手，精彩夺人；曾于北平一见，遍访未能获之。今睹此本，数数翻阅，未肯释手。如得之，必当将图收入《版画史图录》中。武进董氏尝印《千秋绝艳图》，中亦收入张本插图，然刷印不佳，且有半页系补绘的，神采已失，故有重印必要。归时，已万家灯火矣。

一月二十五日（星期四）

与咏霓、柏丞先生商购玉海堂书事，决定不任流散。书价则托博山与孙伯渊磋谈。博山说，伯渊已允减让，但必须于废历年内解决。我们不能肯定的答复，怕那时候渝款未必能到。但又不能不姑允之，以免他人下手。下午，赴中国书店等处，见平贾辈来者不少，殆皆以此间为“淘金窟”也。今后“好书”当不致再落入他们手中。

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五）

晨起，精神不振，恐怕又要伤风了。连忙喝热茶数钟。下午，至中国书店，无一书可取。又至他肆，也没有什么新到的东西。在来青阁偶见明黄嘉惠刊本《山谷题跋》四卷，姑购得之。我对于宋人题跋，很喜观看。汲古阁本《津逮秘书》里收得不少。但单行明刊本却不多见。这些题跋，在小品里是上乘之作，其高者常有“魏晋风度”，着墨不多，而意趣自远。灯下，读《山谷题跋》，不觉尽之。

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

博山来电话，云：玉海堂书，伯渊已允减让到两万元。与张、何二位相商，仍觉得太昂。下午，至来青阁，闻平贾某曾购得爱日精庐旧藏书数种，为之诧异，即追踪觅之，已不可得。仅知其中有红格抄本《庆元条法事例》，绝佳。某贾必欲辇之北去，售给董康。迹其来源，知系得之老书贾汪某。汪与我交易有年，绝无好书。前偶得《杂剧新编》一部，为之惊喜欲绝。但只是“昙花一现”耳。今闻其数数至虞山，得书不少。皆售之平贾，坚不肯说出为何家之物。此人连年潦倒，能稍得润馀，聊慰晚景，我也要为之高兴的。即访之，坚嘱其有好书必要为我留下，价可不论。

一月二十八日（星期日）

连日无甚动静，恐怕只不过是谣言。住在外边，种种不方便。晨起，即回家。想把书籍整理一过。但堆积太多，无可下手处。我向来买书，不加编目，也无排列次序，除了小说、戏曲及词，均分开来入藏外，别的书都是乱堆乱放的，故找起来很不容易。要决心编目，已不止三四次，但总是中途而废。今天起，想要彻底的清点一下。不知有此恒心否。整理了半天，倦甚。夜，住在家中。中夜，还有些不安之感。

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一）

博山来电话云：孙伯渊催解决玉海堂事。当答以书价如能再减让若干，即可成交。九时，至校。即与柏丞先生详商。以待渝款寄来，恐必不及，拟先付给定洋若干。归饭时，即致函咏霓先生，说到我们的意见。他也表示同意。无论如何，这一批书必须由我们截留下来。下午，博山来谈，说，伯渊已肯减让到一万七千金，不能再少，且须早日解决。否则，他因年内需款，有意他售，我说，三天以内，一定有确定的回答给他。博山走后，我踌躇了好久；三天后果有办法么？款果有着落么？玉海堂书固未必为上乘之收藏，但弃之也十分可惜。但我相信：到了那个时候一定会有办法的。

一月三十日（星期二）

晨起，即致函咏霓先生，述昨日交涉经过。九时，赴校又与柏丞先生谈起这事。他们都主张，书价一万七千金可以同意；此时只能先付定洋若干。馀款须俟渝款到时再付。当即致电慰堂催款。下午，至中国书店，得《遵生八笺》一部。此书，我少年时候很喜欢它；虽然包含明人的浅薄的“养生”知识不少，但其中也有很有用的材料。关于鉴别古书的一部分，很有见识。灯下翻阅，如见故人。童年好弄，尝信其言，欲植小荷花于碗中，终于无成。然在北平，实亲见小杯中，所植之红白荷花，莲叶，花藕，无不具体而微，则其所说固非无稽也。

一月三十一日（星期三）

未明即起，四无人声。梳洗后，阅王征译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此书刊本甚多，以崇祯间武位中刊本为最可靠，图式皆准确无错。后来新安书坊所刊者，已大为改动，谬讹百出，像齿轮之类，刻工每图省事，往往刻作圆形，与原意已大为不同。如果按图制器，必当终岁无成。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此等事可作为一例。《图书集成》曾收入此书，亦系用新安本，故图式亦均大错。可见此书出后，一时颇为流行，而好事之徒，按图作器者，则恐鲜其人，故能任其谬种流传也。否则，一经试作，纰谬立见，必不至将“伪图”辗转翻刻也。此本亦是新安刊本之一，题新安后学汪应魁校订，刻工为黄惟敬，图中符记，尚用AE，未改甲乙，但图式亦均失原形。武位中本并不难，不知《图书集成》编者何故收新安本而不收正确之武本？王征序云：“奇器图说，乃远西诸儒携来彼中图书，此其七千馀部中之一支。”在明末时代，西学本来可以大盛，所译各书亦多可观者。惜未能大量译出。且不久便遇“国变”，科学之萌芽遂遭摧残以尽，驯至二百馀年后，方再有“西学为用”的口号提出，百事遂都落人后了。阅此，感触万端。下午，至中国书店。无所得。

二月一日（星期四）

晨起，赴校。博山来电话，催问玉海堂书事。当与柏丞先生商定，先借数千金为定洋，馀款允于旧历年内付清。下午，至中国书店，得《宝古堂重修宣和博古图录》卷第二十三、卷第二十四残本两册，极为得意。此是明刊白绵纸初印本，已均挖去“宝古堂”三字，且都是竹纸本，神采还不及此本。

明刊书籍，其版片往往辗转贩卖。得之者每挖去原刊者姓氏及斋名，即作为自刻之书。论述版本者常易弄错。像《博古图录》和所谓《仇绘列女传》便是转手最多的。其实，原本只是一个，后印者所加种种堂名斋名，皆是幻化之物。根本上，原书版片并不曾改动过。《列女传》版片，至清代犹存，尝为知不足斋所得，重印若干部，故今往往误为知不足斋本，实则仍是明刊原本也。我历年得到《博古图录》好几部，今始发现其祖源，其喜悦可知！《列女传》我亦收到了三本，一是后印之“知不足斋本”，二是明刊竹纸本，三是明刊白绵初印本。后二者虽均是残本，然可考见其授受之迹，故甚珍之。由平南归后，一本为孝慈假去不归，一本亦遍寻不得，至今惆怅不已！

二月二日（星期五）

晨九时，赴校。下午，至中国书店，又至三马路各古书肆，无所得。知平贾辈南来者不少，有所企图，目的在苏州群碧楼邓氏书。邓氏书曾刊有书目二种，《群碧目》中所有者已扫数售于中央研究院，其《寒瘦山房鬻馀书目》中物，则方在“待价而沽”之中。此目所载，宋元本不足道，明本颇多，而佳妙者亦少，其精华所在为若干精钞名校本。有《全唐诗集》一部，为季沧苇稿本，《全唐诗》全窃之，却不说明来历。如能得此，可证断三百年前的一重公案。惟恐所求太奢，不易应付耳。然必当设法得之，不任其零星售出，散失四方。

二月三日（星期六）

晨起，博山来电话，说，孙贾催促甚急，以早日决定为宜。当答以三日后可有确定之办法，即致函咏霓先生，并到校与柏丞先生商谈，决定先付给定洋三千金，馀款一万四千金，于半个月內付清取书。下午至博山处，将此办法告诉他。他觉得孙贾当可同意。至中国、来青等肆，得残本《六十一家词》六册，系愚园图书馆散出者，初印甚精。我从前所用《六十一家词》是博古斋石印小本，取其廉，便，颇想得原本一读。此虽残帙，亦足快意。淮海、小山二家，均为予所深喜，亦均在其中。灯下，披卷快读，浑忘门外是何世界。

二月四日（星期日）

晨，有书贾某来谈，谓群碧楼书求售甚急，平贾辈亦志在必得，有集资合购说。孙伯渊亦为此事赴苏州。此事殊感棘手。这批书一旦落于书贾之手，必将抬价甚高，我辈或不易有此力量购得之。惟其中钞本、校本，佳者极多；如失了去，大是可惜，故仍须用全力设法购致。下午，至三马路各书肆，无所得。

（1945年11月1日至12月24日《大公报》文艺副刊）

蛰居散记（摘录）

烧书记

我们的历史上，有了好几次的大规模的“烧书”之举。秦始皇帝统一六国后，便来了一次烧书。“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这是最彻底的烧书，最彻底的愚民之计，和一般殖民地政府，不设立大学而只开设些职业、工艺学校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后，烧书的事，无代无之。有的烧历史文献，以泯篡夺之迹；有的烧佛教、道教的书籍，以谋宗教上的统一；有的烧淫秽的书，以维持道德的纯洁。近三百年，则有清代诸帝的大举烧书。我们读了好几本的所谓“全毁”“抽毁”书目，不禁凛然生畏；至今尚觉得在异族铁蹄下的文化生活的如何室塞难堪！

“八一三”后，古书、新书之被毁于兵火之劫者多矣。就我个人而论，我寄藏于虹口开明书店里的一百多箱古书，就在八月十四日那一天被烧，烧得片纸不存。我看见东边的天空，有紫黑色的烟云在突突的向上升，升得很高很高，然后随风而四散，随风而淡薄。被烧的东西的焦渣，到处的飘坠。其中就有许多有字迹的焦纸片。我曾经在天井里拾到好几张，一触手便粉碎；但还可以辨识得出些字迹，大约是教科书之类居多。我想，我的书能否捡得到一二张烧焦了的呢？——那时，我已经知道开明书店被烧的情形——当然，这想头是很可笑的。就捡得到了又有什么意义，还不是徒增切怛与愤激么？

这是兵火之劫；未被劫的还安全的被保存着。所遭劫的还只是些不幸的一二隅之地。但到了“一二八”敌兵占领了旧租界后，那情形却大是不同了。

我们听到要按家搜查的消息，听到为了一二本书报而逮捕人的消息，还听到无数的可怖的怪事，奇事，惨事。

许多人心里都很着急起来，特别是有“书”的人家。他们怕因“书”惹祸，却又舍不得割爱，又不敢卖出去——卖出去也没有人敢要。有好几个友人，天天对书发愁。

“这部书会有问题么？”

“这个杂志留下来不要紧么？”

“到底是什么该留的，什么不该留的？”

“被搜到了，有什么麻烦没有？”

个个人在互相的询问着，打听着的。但有谁能够说明哪几部书是有问题的，或哪些东西是可留的呢？

我那时正忙于烧毁往来有关的信件，有关的记载，和许多报纸、杂志及抗日的书籍——连地图也在内。

我硬了心肠在烧。自己在壁炉里生了火，一包包，一本本，撕碎了，扔

写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系作者回忆上海“孤岛”时期生活及亲身经历、所见所闻的一组散文。发表于当时《周报》上。1951年，作者自编成集，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1982年，福建人民出版社重版。本次仅收其中关于“书”的三篇。

进去，眼看它们烧成了灰，一蓬蓬的黑烟从烟通里冒出来，烧焦了的纸片，飞扬到四邻，连天井里也有了不少。

心头像什么梗塞着，说不出的难过。但为了特殊的原因，我不能不如此小心。

连秋白送给我的签了名的几部俄文书，我也不能不把它们送进壁炉里去。

我觉得自己实在太残忍了！我眼圈红了不止一次，有泪水在落。是被烟熏的罢？

实在舍不得烧的许多书，却也不能不烧。踌躇又踌躇，选择又选择。有的头一天留下了，到了第二三天又狠了心把它们烧了。有的，已经烧了，心里却还在惋惜着，觉得很懊悔，不该把它们烧去。

但有了第一次淞沪战争时虹口、闸北一带的经验——有征倭论一类的书而被杀，被捉的人不少——自然不能不小心。对于发了狂的兽类，有什么理可讲呢！

整整的烧了三天。我翻箱倒筐的搜查着，捧了出来，动员孩子们在撕在烧。

“爸爸，这本书很好玩，留下来给我罢。”孩子在恳求着。

我难过极了！我也何尝不想留下来呢？但只好摇摇头，说道：“烧了罢，下回去买好一点的画给你。”

在这时候，就有好些住在附近的朋友们在问，什么书该烧，什么书不必烧。

我没法回答他们，领了他们到壁炉边去。

“你自己看吧。我在烧着呢。但我的情形不同。你自己斟酌着办罢。”

这一场烧书的大劫，想起来还有馀栗与馀憾！

不烧，不是至今还无恙么？

但谁能料得到呢？

把它们设法寄藏到别的地方去罢。

但为什么要“移祸”呢？这是我所绝对不肯做的事。

这是我不能不狠心动手烧的一个原因。

但也实在有些人把自认为“不安全”的书寄藏到别人家里去的。

这还是出于自动的烧。究竟自动烧书的人还不多。大量的“违碍”的书报还储藏在许多人家。有许多人不肯烧，不想烧，也有人不知道烧，甚至有人压根儿没有想到这件事。

过了不久，敌人的文化统制的手腕加强了。他们通过了保甲的组织，挨户按家的通知，说：凡有关抗日的书籍、杂志、日报等等，必须在某天以前，自动烧毁或呈缴出来。否则严惩不贷。

同时，在各书店，各图书馆，搜查抗日书报，一车车的载运而去，不知运向何方，也不知它们的运命如何。

这一次烧书的规模大极了！差不多没有一家不在忙着烧书的。他们不耐烦呈缴出去，只有出于烧之一途。最近若干年来的报纸、杂志遭劫最甚。有许多人索性把报纸、杂志全都烧毁了，免得惹起什么麻烦。

外间谣传说，连包东西的报纸，上面有了什么抗日的记载，也要追究、捕捉的。

因之，旧报纸连包东西的资格也被取消了。

最可怜的是，有的朋友已经到了内地去，他们的书籍还藏在家里，或寄存在某友处。家里的人到处打听，问要紧不要紧，甚至去问保甲处的人。他们当然说要紧的，甚至还加上些恫吓的话。

于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他们把什么书全都付之一炬；只要有字的，无不投到了火炉里去。

记得清初三令五申的搜求“禁书”的时候，有许多藏书家的后人，为了省得惹祸，也是将全部古书整批的烧了去。

这个书劫，实在比兵，比火，比水等等大劫更大得多，更普遍而深入得多了！

这样纷扰了近一个多月，始终不曾见敌伪方面有什么正式的文告。又有人说，这是出于误会，日本人方面并没有这个意思。

于是烧书的火渐渐的又灭了，冷了，终至不再有人提起这件事。

不烧的人，忘了烧的人，特地要小心保存这类抗日文献的人，当然也有。

许多抗日文献还保存得不少。像文汇年刊之类，我家里便还保存着，忘记了烧。

书如何能烧得尽呢？“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以烧书为统制的手法，徒见其心劳日拙而已。

但愿这种书劫，以后不再有！

“废纸”劫

收集故纸废书之风，发端于数载之前，至去岁而大盛，至今春而益烈，迨春夏之交，则臻于全盛之境矣。初仅收及废报及期刊，作为所谓还魂纸之原料。继则渐殃及所谓违碍书，终则无书不收，无书不可投入纸商之大熔炉中矣。初仅负贩叫卖者为之，继则有一二小肆亦为之。后以利之溥而易获也，若修绠堂，修文堂，来青阁，上海旧书店诸大古书肆亦为之矣。初仅收拾本肆中难销之书，残阙之本，论担称斤以售出，继则爪牙四布，搜括及于沪杭沪宁二铁路线之周围矣，又进而罗织至平津二市矣。于是舍正业而不为，日孳孳于惟废纸破书之是务。予尝数经来青阁、修文堂及上海旧书店之门，其所堆积者，无非造纸之原料也。有教科书，有圣经，有杂志，有大部涩销之古书，有西书，有讲义，自洋装皮脊之过时百科全书，年鉴，人名录，以至石印之十一朝东华录，经策通纂，九朝圣训，以及铅印之图书集成残本，无不被囊括以去。每过肆，语价时，肆主人必曰：此书论斤时，亦须值若干若干，或曰：此书之值较论斤称出为尤廉，或曰：此书如不能售，必将召纸商来，论斤称付之。此或是实情实事。肆主人如急于求售，与其售之于难遇难求之购书者，诚不如贬值些，须售之于纸商之为愈也。商人重利，利之所在，趋之若鹜。岂有蝇蚋嗅得腥膻而不飞集者！于是古书之论值，除善本、孤本外，必以纸张之轻重黄白为别。轻者黄者廉，而重者白者昂，其为何等书则不问也。其不能即售者，则即举而付之纸商，其为何等书则不问也。其书之可留应留与否则亦不问也。尝过市，有中国书店旧存古书七十馀扎，凡五千馀本，正欲招纸商来称斤去。予尝见其目，多普通古书，且都为有用者，若江刻五十唐人小集，两浙轺轩录，杨升庵全集，十国春秋，水道提纲，艺海珠尘等书，都凡七八百种。此类书而胥欲付之大熔炉中，诚可谓丧心病狂之至者矣！肆主人云：如欲留，则应立即决定，便可不至使之成废纸矣。予

力劝其留售，肆主人不顾也。曰：至多留下二十许种市上好销者，馀皆无用。并且指且言曰：某也不能销，某也无人顾问，不如论斤秤出之得利多而速也。予喟然无言。至他肆屡以此数十扎书为言，力劝其收下。彼辈皆不顾，皆以不值得，不易售为言。自晨至午，无成议，而某肆主急如星火，必欲速售去。予乃毅然曰：归予得之可也！遂以六千金付之，而救得此七八百种书。时予实窘困甚，罄其囊，仅足此数，竟以一家十口之数月粮，作此一掷救书之豪举，事后，每自诩少年之豪气未衰也。属有天幸，数日后，有友复济以数千金，乃得免于室人交谪，乃得免于不举火。每顾此一堆书，辄欣然以为乐，若救得若干古人之精魄也。且此类事为予所未知者多矣。即知之，然予力有限，岂又能尽救之乎？戚戚于心，何时可已！每在乱书堆中救得一二稍可存者，然实类愚公之移山也。天下滔滔，挽狂澜于既倒者复有谁人乎？惘然忧之，愤懑积中。尝遇某人，曰：家有清时外务部石印大本图书集成一部，欲售之，而无应者。以今日纸价论之，若作废纸称去，亦可得二万馀金也。予俯而不答。呜呼，人间何世，浩劫未艾！今而后，若求得一普通古书，价廉帙巨，而尚为纸商大熔炉劫火未及者，恐曷乎其难矣。今而后，若搜集清代普通刊本，晚清石印、铅印本书，恐必将不易易矣。兵燹固可惧，然未必处处皆遭劫也，穷乡僻壤，必尚有未遭兵燹之处，通都大邑，亦必尚有未遇浩劫之地。禁毁诚可痛，然亦未必网罗至尽也；千密一疏，必有漏网者在；有心人不在少数，疏忽无知者，尤不可胜计；此皆鲁壁也。而今则大利所在，竭泽而渔，凡兵燹所不及，禁毁所未烬者，胥一举而尽之。凡家有破书数架，故纸一篓者，负贩辈必百计出之。不必论何种书也；不必视书之完阙也；不必选剔书之破蛀与否也。无须涇涇议价，更无须专家之摩挲审定，但以大称一，论担称之足矣。于是千秋万世之名著，乃与朝生暮死之早报等类齐观矣；于是一切断烂朝报，乃偕精心结构之钜作同作废纸入熔炉矣。文献之浩劫，盖莫甚于今日也！目击心伤，回天无力。惨痛之甚，几有不忍过市之感。彼堆积于市门者何物也？非已去硬面之西书，即重重叠叠之故纸旧书。剥肤敲脑，无所不至。（精明之贾，每截下一书空白之天头，以为旧纸，供修书之用。余谥之曰敲脑。）予但能指而叹曰：造孽，造孽！而市人辈则嬉笑自若，充耳不闻也。经此大劫，大江南北以及冀鲁一带之文献乃垂垂尽矣！伤哉！

售书记

嗟食何如售故书，疗饥分得蠹虫馀。

丹黄一付绛云火，题跋空传土礼居。

展向晴窗胸次了，抛残午枕梦回初。

莫言自有屠龙技，剩作天涯稗贩徒。

以上是一个旧友的售书诗，这个旧友和我常在古书店里见到。从前，大家都买书，不免带点争夺的情形，彼此有些猜忌，劫中，我卖书，他也卖书，见了面，大家未免常常叹气，谈着从来不会上口的柴米油盐的问题。他先卖石印书，自印的书，然后卖明清刊本的书。后来，便不常在古书店见到他了。大约书已卖得差不多，不是改行做别的事，便是守在家里不出门。关于他，有种种的传说。我心里很难过，实在不愿意在这里再提起，这是一位在这个大时代里最可惜、惨酷的牺牲者。但写下他抄给我的这首诗时，我不能不黯然！

说到售书，我的心境顿时要阴晦起来。谁想得到，从前高高兴兴，一部部，一本本，收集起来，每一部书，每一本书，都有它的被得到的经过和历史；这一本书是从哪一家书店里得到的，那一部书是如何的见到了，一时踌躇未取，失去了，不料无意中又获得之；哪一部书又是如何的先得到一二本，后来，好容易方才从某书店的残书堆里找到几本，恰好配全，配全的时候，心里是如何的喜悦；也有永远配不全的，但就是那残帙也很可珍重，古宫的断垣残刻，不是也足以令人留连忘返么？哪一本书虽是薄帙，却是孤本单行，极不易得；哪一部书虽是同光间刊本，却很不多见；哪一本书虽已收入某丛书中，这本却是单刻本，与丛书本异同甚多；哪一部书见于禁书目录，虽为陋书，亦自可贵。至于明刊精本，黑口古装者，万历竹纸，传世绝罕者，与明清史料关系极钜者，稿本手迹，从无印本者，等等。则更是见之心暖，读之色舞。虽绝不巧取豪夺，却自有其争斗与购取之阅历。差不多每一本，每一部书于得之之时都有不同的心境，不同的作用。为什么舍彼取此，为什么前弃今取，在自己个人的经验上，也各自有其理由。譬如，二十年前，在中国书店见到一部明刊蓝印本清明集和一部道光刊本“小四梦”，价各百金，我那时候倾囊只有此数，那末，还是购“小四梦”吧。因为我弄中国戏曲史，“小四梦”是必收之书。然而在版本上，或在藏书家的眼光看来，那清明集，一部极罕见的古法律书，却是如何的珍奇啊！从前，我不大收清代的文集，但后来觉得有用，便又开始大量收购了。从前，对于词集有偏嗜，有见必收，后来，兴趣淡了些，便于无意中失收了不少好词集。凡此种种，皆寄托着个人的感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谁想得到，凡此种种，费尽心力以得之者，竟会出以易米么？谁更会想得到，从前一本本，一部部书零星收得，好容易集成一类，堆作数架者，竟会一捆捆，一箱箱的拿出去卖的么？我从来不肯好好的把自己的藏书编目，但在出卖的时候，买书的要先看目录，便不能不咬紧牙关，硬了头皮去编。编目的时候，觉得部部书本本书都是可爱的，都是舍不得去的，都是对我有用的，然而又不能不割售。摩挲着，仔细的翻看着，有时又摘抄了要用的几节几段，终于舍不得，不愿意把它上目录。但经过了一会，究竟非卖钱不可，便又狠了狠心，把它写上。在劫中，像这样的“编目”，不止三两次了。特别在最近的两年中，光景更见困难了，差不多天天都在打“书”的主意，天天在忙于编目。假如天还不亮的话，我的出售书目又要从事编写了。总是先去其易得者，例如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之类。四部丛刊，连二三编，我在前年，只卖了伪币四万元，百衲本二十四史，只卖了伪币一万元。谁想得到，在今年今日，要想再得到一部，便非花了整年的薪水还不够么？只好从此不作收藏这一类大部书的念头了。最伤心的是，一部石印本学海类编，我不时要翻查，好几次书友们见到了，总要怂恿我出卖，我实在舍不得。但最后，却也不得不卖了。卖得的钱，还不够半个月花，然而如今再求得一部，却也已非易了。其后，卖了一大批明本书，再后来，又卖了八百多种清代文集，最后，又卖了好几百种清代总集文集及其他杂书。大凡可卖的，几乎都已卖尽了！所万万舍不得割弃的是若干目录书，词曲书，小说书和版画书。最后一批，拟目要去的便是一批版画书。天幸胜利来得恰如其时，方才保全了这一批万万舍不得去的东西。否则，再拖长了一年半载，恐怕连什么也都要售光了。但我虽然舍不得与书相别，而每当困难的时光，总要打它的主意，实在觉得有点对不起它！如果把积“书”当作了囤货——有些暴发户实在有如此的想头，而且也实在如此的做，听说，有

一个人，所囤积的四部丛刊便有二十余部——那末，售去倒也没有什么伤心。不幸，我的书都是“有所谓”而收集起来的，这样的一大批一大批的“去”，怎么能不痛心呢？售去的不仅是“书”，同时也是我的“感情”，我的“研究工作”，我的“心的温暖”！当时所以硬了心肠要割舍它，实在是因为“别无长物”可去。不去它，便非饿死不可。在饿死与去书之间选择一种，当然只好去书。我也有我的打算，每售去一批书，总以为可以维持个半年或一年。但物价的飞涨，每每把我的计划全部推翻了。所以只好不断的在编目，在出售；不断的在伤心，有了眼泪，只好往肚里倒流下去。忍着，耐着，叹着气，不想写，然而又不能不一部部的编写下去。那时候，实在恨自己，为什么从前不藏点别的，随便什么都可以，偏要藏什么劳什子的书呢？曾想告诉世人说，凡是穷人，凡是生活不安定的人，没有恒产、资产的人，要想储蓄什么，随便什么都可以，只千万不要藏书。书是积藏来用，来读的，不是来卖的。卖书时的惨楚的心情实在受得够了！到了今天，我心上的创伤还没有愈好；凡是要用一部书，自己已经售了去的，想到书店里去再买一部，一问价，只好叹口气，现在的书已经不是我辈所能购致的了。这又是用手去剥创疤的一个刺激。索性狠了心，不进书店，也决心不再去买什么书了。书兴阑珊，于今为最。但书生结习，扫荡不易，也许不久还会发什么收书的雅兴罢。

但究竟不能不感谢“书”，它竟使我能够度过这几年难度的关头。假如没有“书”，我简直只有饿死的一条路走！

漫步书林

引言

在路上走着，远远地望见一座绿荫沉沉的森林，就是一个喜悦，就会不自禁地走入这座森林里，在那里漫步一会儿，仅仅是一会儿，不管是朝暾初升的时候也好，是老蝉乱鸣的中午也好，是树影、人影都被夕阳映照得长长地拖在地上的当儿也好，都会使我们有清新的感觉。那细碎的鸟声，那软毯子似的落叶，那树荫下的阴凉味儿，那在枝头上游戏够了，又穿过树叶儿斑斑点点的跳落在地上的太阳光，几乎无不像在呼唤着我们要在那里留连一会。就是地上的蚂蚁们的如何出猎，如何捕获巨大的俘虏物，如何把巨大的虫拖进小小的蚁穴等等的活动，如果要仔仔细细地玩赏或观察一下的话，也足够消磨你半小时乃至一小时的工夫。

从前的念书人把“目不窥园”当作美德，那就是说，一劲儿关在书房里念书，连后花园也不肯去散步一会的意。如今的学生们不同了。除掉大雪天或下大雨的时候，他们在屋里是关不住的了。三三两两地都带了书本子或笔记本子到校园里、操场上、或者公园里去念。我看了他们，就不自禁有一股子的高兴。我自己在三四十年前就是这样地带了书本子或带了将要出版的书刊的校样到公园里工作的。

可是言归正传。以上所说的只是一个“引子”的“引子”。“书中自有黄金屋”是一句鼓励念书人的老话。当然，我们如今没有人还会想到念书的目的就是去住“黄金屋”。不，我们只明白念通了书，做了各式各样的专家，其目的乃是为人民服务。在念书的过程里，也就是说，在进行研究工作的过程里，在从事这种劳动的当儿，研究工作的本身就会令人感染到无限喜悦的。——当然必须要经过摸索的流汗的辛苦阶段，即所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阶段。在书林里漫步一会儿，至少是不会比在绿荫沉沉的森林里漫步一会儿所得为少的。

书林里所能够吸引人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决不会比森林里少。只怕你不进去，一进去，准会被它迷住，走不开去。譬如你在书架上抽下一本《水浒传》来，从洪太尉进香念起，直念到王进受屈，私走延安府，以至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你舍得放下这本书么？念《红楼梦》念得饭也吃不下去，念到深夜不睡的人是不不少的。有一次有好些青年艺术工作者们抢着念《海鸥》，念《勇敢》，直念到第二天清晨三时，还不肯关灯。结果，只好带强迫地在午夜关上了电灯总门。有人说这些是小说书，天然地会吸引人入胜的。比较硬性的东西恐怕就不会这样了。其实不然。情况还是一般。譬如我常常喜欢读些种花种果的书。偶然得到了一部《汝南圃史》，又怎肯不急急把它念完呢。从这部书里知道了王世懋有一部《学圃杂疏》，遍访未得。忽然有一天在一家古书铺里见到一部《王奉常杂著》，翻了一翻，其中就有《学圃杂疏》，而且是三卷的足本（《宝颜堂秘笈》本只有一卷），连忙挟之而归，在灯下就把他读毕，所得不少。有一个朋友喜欢逛旧书铺，一逛就是几个钟头，不管有用没用，临了总是抱了一大包旧书回去。有时买

这是作者 1956 年，应《人民日报》之约，所写的一组读书笔记的总题。以专栏形式，始发表于当年 7 月 23 日该报，止于同年 11 月 25 日该报。

了有插图的西班牙文的《吉呵德先生传》，精致的德文本的《席勒全集》，尽管他看不大懂西班牙文或德文，但他把它们摆在书架上望望，也觉得有说不出的喜悦。有的专家们，收集了几屋子的旧书、旧杂志，未见得每本都念过，但只翻翻目录，也就胸中有数，得益非浅。有时“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东西，就在这一翻时“得来全不费工夫”。宋人的词有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样的境界在漫步书林时是经常地会遇到的。

书林是一个最可逛，最应该逛的地方，景色无边，奇妙无穷。不问年轻年老的，不问是不是一个专家，只要他（或她）走进了这一座景色迷人的书林里去，只要他在那里漫步一会儿，准保他会不断地到那儿去的，而每一次的漫步也准保会或多或少地有收获的。

以上只是一个开场白。下面想把我自己在这座书林里漫步的时候的所见所得，择要地“据实道来”。只要大家不怕厌烦，我的话一时完不了。

王祯：农书

书林浩瀚如大海，“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呢？只能就自己所熟悉的谈谈吧。“民以食为天”。农业生产乃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环节。首先介绍几部古代的有关农业的书籍是有意义的。中国夙称“以农立国”，但有关农业的书却不很多，远不如兵书之多，更不如医书的“汗牛充栋”。

《四库全书》所著录的自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以下凡十部，其附存目则自唐陆龟蒙《耒耜经》以下凡九部。其他书目里，著录的农书也很少。但如果把有关经济作物的书，有关花、果、药物的书，水利的书，和有关牛马等牧畜的书一同统计在内，则也可成一巨帙。记得二十多年前曾有《中国农业书目》一册印行，惜今已罕见。我之所以收集农书，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它们有木刻的插图。后来，连类而及，就连没有插图的农书也兼收并蓄之了。在有木刻插图的农书里，我最喜欢元代王祯撰的《农书》。这是一部篇幅相当大的书。我曾于某氏处见到一部明嘉靖九年（公元一五三一年）的山东刊本，凡六册，首有临清阎闾序。书中插图，浑朴有力，气象甚为阔大，是木刻画里的上乘之作。因着意欲收购一部。访之南北各肆，乃获残本一部，凡五册，仅阙《农器图谱》集之十六至二十。虽非全书，亦自满意。此书包罗甚广，凡分三部分。首为《农桑通诀》，分六集。（《通诀》目录下注云：“古之文字皆用竹帛。逮后汉始为纸疏，乃成卷轴，以其可以舒卷也。至五代后汉[按“汉”应作“唐”]明宗长兴二年，诏《九经》版行于世，俱作集册。今宜改卷为集”。内聚珍本无目录，却改集为卷。）自“农事起本”，“牛耕起本”，“蚕事起本”，“授时篇”，“地利篇”，“孝弟力田篇”，“垦耕篇”，“耙劳篇”，“播种篇”，“锄治篇”，“粪壤篇”，“灌溉篇”，“劝助篇”，“收获篇”，“蓄积篇”，“种植篇”，“畜养篇”，“蚕缲篇”到“祈报篇”，是“通论”性质的书，特别着重说明南北各地的土宜。“北方农俗所传：春宜早晚耕，夏宜兼夜耕，秋宜日高耕。中原地皆平旷，旱田陆地，一犁必用两牛、三牛或四牛，以一人执之，量牛强弱，耕地多少，其耕皆有定法。南方水田泥耕，其田高下阔狭不等，以一犁用一牛挽之，作止回旋，惟人所便。此南北地势之异宜也。”（“垦耕篇”）像这一类的“因地制宜”，切合各地需要的话是随处可以读到的。次为“农器图

谱”，分二十集：“田制门”、“耒耜门”、“鑿耒门”、“钱镈门”、“铨艾门”、“杷机门”、“箕笠门”、“ò蒺门”、“杵臼门”、“仓廩门”、“鼎釜门”、“舟车门”、“灌溉门”、“利用门”、“麦门”、“蚕缂门”、“蚕桑门”、“织纴门”、“纺絮门”及“麻苧门”，凡农桑所需的器物，无不毕具，绘图立说，极为详尽。第三部分为“谷谱”，分十一集：集之一至二为“谷属”，集之三为“蓆属”，集之四至五为“蔬属”，集之六至八为“果属”，集之九为“竹木”，集之十为“杂类”（苳麻、木绵、茶等），集之十一为“饮食类”（这类内阙“豳七月诗说”及“食时五观”二篇，各本皆同）。

这部书作于元皇庆癸丑（公元一三一三年），离今已有六百四十多年了，读起来还觉得语语翔实，通俗合用，不仅总结了古代农业科学的好的经验，而且，更有新的见解和新的创造。《四库提要》云：“《图谱》中所载水器，尤于实用有裨。”的确，在“灌溉”、“利用”二门里，有的水器是很重要的创作。王祯自云：“既述旧以增新，复随宜以制物，或设机械而就假其力，或用挑浚而永赖其功。”（“灌溉门”引言。）《图谱》的最后，附有法制长生屋，造活字印书法等。造活字印书法乃是乾隆时的《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出版前的一篇最详尽的叙述活字印书的方法的文章，极为重要。其中说，有用烧熟瓦字的，有铸锡作字的，又有雕板木为字的。从宋代毕升创作胶泥活字版后，到了十四世纪的初期，已进一步地用到锡活字和木活字了（欧洲用活字印书开始于十五世纪中）。叙述检字方法，说：“凡置轮两面，一轮置监韵板面，一轮置杂字板面，一人中坐，左右皆可推转摘字。盖以人寻字则难，以字就人则易。此转轮之法，不劳力而坐致字数，取讫又可铺还韵内，两得便也。”这也是一个创造。我从前见排板的工人们皆立而摘字，所谓“以人寻字”的，却没有利用到六百四十多年前就已发明的这种坐而摘字，“以字就人”的科学方法。

这部《农书》是徐光启《农政全书》出版之前最详尽的农业科学的总集，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创造性地而又结合实际地叙述着许多耕种、缂织的技术。没有一句空谈，没有不能见之实用的幻想。作者是把农民们的实际的经验总结起来的，所以，决不是一部“闭门造车”的书。我们应该把这部书作为农业学校里的必读的教科书才是。

这部书的作者王祯，生平不详，只知道他“字伯善，东平人，曾官丰城（按疑应作“永丰”）县尹。”他自己说，曾任宣州旌德县县尹。我在顺治十三年刊本的《旌德县志》卷七《官师志》里，果然找到了有关于他的一段材料：“元贞元年（一二九五年）任。东鲁人。修学宫，建尊经阁，治坛、庙、桥、路，施药济人。”《农书》就在那时候开始写的。因为要印行《农书》，所以创造了木活字。“试印本县志书，约计六万馀字，不一月而百部齐成，一如刊板，始知其可用。”后二年，他迁任信州永丰县。曾将这副活字携而之官。这时，他的《农书》已经写成了。“方欲以活字嵌印”，却知江西已经命工刊板，遂中止。

《农书》的版本，除嘉靖本外，我曾上海见到一部明“万历二载甲戌（一五七四年）济南府章丘县刊行”的本子（福建重刻《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中的《农书》即从此万历年刊本出），显然是翻刻那部嘉靖本。钱曾《读书敏求记》载王氏《农书》，说：“《农桑通诀》六，《农器图谱》二十，《谷谱》十，总名曰《农书》。”其内容正与嘉靖本同。惟他未注明版本，不知

所收的是嘉靖本还是万历本。清乾隆纂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里辑出这部《农书》来。按《大典》目录，卷之六百二十五到卷之六百四十，共十六卷，所收皆为《农书》，惟在《农书》十四、十五下，注：“农桑辑要”，在《农书》十六下，注：“农桑衣食辑要”。在《农书》一至《农书》十三下，则并未注有书名。《四库全书·农书提要》云：“《永乐大典》所载并为八卷”。则其中有八卷是王祯《农书》。至所馀五卷究是何书，则今已不可得而知了。我曾将从《大典》本书的内聚珍本《农书》和嘉靖本对校了一下，异同不多，可见《大典》所收乃是王氏全书，且是最近于王氏原本的本来面目的。惟《大典》本有王氏的《农书》原序，云：“为集三十有七，为目二百有七十”（嘉靖本无此序）。《大典》既并之为八卷，内聚珍本又分之为二十二卷，只有嘉靖本作三十六集，尚存原本规模。究竟内聚珍本分作二十二卷有何根据呢？据《提要》说，是根据《读书敏求记》的。但我们所见的各本《敏求记》从没有将《农书》分作二十二卷的。不知当时馆臣所见的是何本《敏求记》。好在原书的篇目次第俱在，固不难于恢复原本的本来面目。这部分作三十有七集的恢复本来面目的《农书》希望能够早日重印出版。现在，不要说嘉靖本，或万历本《农书》已在市上绝迹，就是内聚珍本，福建重刻《聚珍版丛书》（江西和浙江重刻的《聚珍版丛书》，均无《农书》在内），广东广雅书局重刻《闽聚珍版丛书》，乃至石印小字本、铅印本的《农书》，也都成了“可遇不可求”之物。像这样的一部重要的而且必读的农业科学的古典著作，是值得几位专家们尽快地花费若干时日，把它整理一下的。

刘基（传）：多能鄙事

《多能鄙事》是一部流传得相当广的民间日用书，从饮食、服饰、器用、百药、农圃、牧养，一直到阴阳、占卜等类，凡人民日常所必需的科学常识，以及吉凶趋避之术均具于书中。全书分春、夏、秋、冬四卷，每卷又分三卷，共十二卷。今所见最早的刊本是明嘉靖十九年（一五四一年）青田县儒学教谕程法所刊的，又曾见一部稍后的本子（万历刊），亦有程法的序。这书的作者相传是刘基。“刘伯温”这个名字，在民间是人人知道的，他的知识广博，多能鄙事，未占先知，料事如神，也是人人都晓的。流传很广的预言书之一《烧饼歌》，就相传是他作的。这部书从第八卷起，足足有五卷，述的都是：“大小六壬课”、“营造吉凶”、“营生杂用”、“上官出行”、“麻衣道言”、“杂占法”等，依托于他的所作，是不足怪的。惟第一至第七卷则多实用的知识，像“造酒法”、“造醋法”、“糖蜜果法”、“洗练法”、“染色法”、“理容方”、“种水果法”、“种药物法”、“养治六畜法”等，大类《齐民要术》、《饮膳正要》、《农书》所述的，有时且加详，补其所未备。可能有些“经验”良方，是很有用、有效的。像“理容方”里的乌须方，治落发方等，不知有人试过没有。又像“洗糶铁骊布法”云：

“松子肉研细糶之，不脆”。

又法：“用好茶末少许入糊糶之，或煎浓茶入香油一滴糶，亦佳。”（卷之四服饰洗练法）

“铁弥布”，在明代很风行，今日似已不大见到（比湖南浏阳出产的夏布更薄、更细、更脆硬）。像这样的小小经验，都是出于实际的多次试用的结果，然后才加以推广的。但有些经验却颇为怪诞，是属于民间的迷信、禁忌的一流，则是五百多年以前的社会里所不免会产生的。不过，我们对于推广那些“经验良方”等等，却要特别加以小心。非得有确实的试验的结果，不宜冒失地便加以采用。我有一个想法：对于古代流传的许多种植法，食物、水果保存法，酒酱酿造法，理容法，养治六畜法，以及经验良方等等，应该分别由有关部门，像农业研究所，食品工业部门，医药卫生部门等等，加以有组织、有系统的试验。是好的，就要发扬之。是有害的，就要加以批判、驳斥，不能听任其“谬种流传”。总之，在保存和发扬古代优良的传统和经验的同时，还要对人民的健康和生产安全负责。这一段话，不仅是专指《多能鄙事》这部书说的，也适用于一切我底下所谈到的好些类似的书籍。不然的话，不免要成为胡乱介绍若干谬诞的经验和方法了。

无名氏：居家必用事类全集

像这样一类书，为民间日常所需要的，历代都有不少，惟不易流传下来耳（今所知的，在宋代、元代就有不少部。唐代和唐代以前的却绝少保存下来）。人民是需要这一类日常顾问式的百科全书的。在二十多年前，商务印书馆印的《日用百科全书》就颇受欢迎。上次述的一部《多能鄙事》，也就是其中之一。这部《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无撰者姓氏——像这一类的书都是不易知道确实的作者的——是明代万历初年的经厂刊本。分甲至癸十集。甲集是“为学”和“家书通式”等。乙集是“家法”、“家礼”，末为“族葬图法”。丙集是“仕宦”，却有“周公出行吉日”、“百怪断经”、“梦寐因想”三项包罗在内，足征仕宦者的“患得患失”的心理。丁集为“宅舍”，并及“牧养良法”。戊集为“农桑类”，却附以“文房适用”、“宝货辨疑”。己集为“诸品茶”以至“酒曲类”、“饮食类”。庚集为“饮食类”、“染作类”、“香谱”、“闺阁事宜”。辛集为“吏学指南”。壬集为“卫生”，以“养老奉亲书”、“治诸病经验方”为主。癸集为“谨身”，以“三元参赞延寿之书”及“修养秘论”为主。其中，以丁、戊、己、庚、壬五集为最有关于民生实用，甚类《多能鄙事》。其他五集则专为仕宦和学人们准备的，和老百姓关系不大了。其中有许多种植、牧畜、酿造之法和治诸病的经验良方可与《多能鄙事》相印证相补充。“宝货辨疑”是典当铺的教科书，相传的都是钞本。这却是最早的见于“刻本”里的。明胡文焕刻《格致丛书》，却把它抽出作为一部单行的书印出。

邝璠：便民图纂

这部书很有用，但不多见。钱曾《读书敏求记》云：“《便民图纂》不知何人所辑。镂板于弘治壬戌（一五二二年）之夏。首列农务、女红图二卷。凡有便于民者，莫不俱列。为人上者，与《豳风图》等观可也。”章钰云：“《明史·艺文志·农家类》邝璠《便民图纂》十六卷。是书为璠撰无疑。同治《苏州府志·名宦》：璠字廷瑞，任丘人，进士。弘治七年（一四九五年）知吴县，循良称最。”（《敏求记校证》卷三之中）我所藏的一部明万

历癸巳（一五九三年）刊的《便民图纂》，于永清序上就说：“邝廷瑞氏《便民图纂》，自树艺占法以及祈涓之事，起居调摄之节，刍牧之宜，微琐制造之事，捫摭该备，大要以衣食生人为本。是故绘图篇首而附纂其后，歌咏嗟叹以劝勉服习其艰难。一切日用饮食治生之具，展卷胪列，无烦咨诹。听称便民者非耶？”北京图书馆也藏有一部嘉靖甲辰（一五四四年）蓝印本，有欧阳锋、吕经二序，黄昭道、王贞吉二跋。惟弘治原刊本则未见。嘉靖本为十六卷，万历本则只有十五卷。盖以万历于永清本，把农务、女红二图并作一卷了。其余“耕获类（麻属附）”、“桑蚕类”、“树艺类（二卷）”、“杂占类”、“月占类”、“祈禳类”、“涓吉类”、“起居类”、“调摄类”、“牧养类”及“制造类（二卷）”等，凡十一类十四卷，则嘉靖、万历二本皆同，文字也没有什么歧异。惟嘉靖本的农务、女红图甚为粗率，有的几乎仅具依稀的人形。万历本的插图，则精致工丽，仪态万方，是这个时代的最好的木刻画之一。农务凡十五图，女红凡十六图，出于傅汝光、李楨、李援、曾中、罗琦诸人所刻。他们都是这时代的北方刻工之良者。这个“耕织图”可信是从宋代楼㮮的本子出来的。邝璠题云：“宋楼㮮旧制耕织图，大抵与吴俗少异。其为诗又非愚夫愚妇之所易晓。因更易数事，系以吴歌。其事既易知，其言亦易入。用劝于民，则从厥攸好，容有所感发而兴起焉者。”他所撰的吴歌的确是平畅易晓，特别是用了“山歌”体，吴人是会随口歌之的。像“下壅”云：

稻禾全靠粪烧根，豆饼河泥下得匀。
要利还需着本做，多收还是本多人。

于施肥的功效说得简单而明了。又像“喂蚕”云：

蚕头初白叶初青，喂要匀调采要勤。
到得山上成茧子，弗知几遍吃艰辛。

这些，都是可以顺口歌唱出来的。楼㮮写的《耕织图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加以著录，却没有“图”。今所见的“耕织图”的刻本，当以此书所附的“农务”、“女红”二图为最早了。“耕获类”的开宗明义第一章便是“开垦荒田法”：

凡开久荒田，须烧去野草，犁过，先种芝麻一年。使草木之根败烂，后种五谷，则无荒草之害。盖芝麻之于草木，若锡之于五金，性相制也。务农者不可不知。

如果这个法子试之有效，则对于今天开垦荒地的农民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在“调摄类”里，有治“鼓胀”（血吸虫病）方三。不知中医们知道不知道，有没有用过。这于南方好几省的农民们关系很大，故录之如下：

[紫苏子汤]苏子（一两），大腹皮、草果、厚朴、半夏、木香、陈皮、木通、白术、枳实、人参、甘草（各半两），水煎，姜三片，枣一枚。

[广茂溃坚汤]厚朴、黄芩、益智草、豆蔻、当归（各五钱），黄连（六钱），半夏（七钱），广茂、升麻、红花（炒）、吴茱萸（各二钱），甘草（生）、柴胡、泽泻、神

曲（炒）、青皮、陈皮（各三分），渴者加葛根（四钱）。每服七钱，生姜三片，煎服。

[中满分消丸]黄芩、枳实（炒）、半夏、黄连（炒，各五钱），姜黄、白术、人参、甘草、猪苓（各一钱），茯苓、干生姜、砂仁（各二钱），厚朴（制一两），泽泻、陈皮（各三钱），知母（四钱），共为末，水浸蒸饼，丸如桐子大。每服百丸，熔热白汤下。

这部书的全部都可以说是适合于农民们日常应用的，与《居家必用》至少有半部是为“学士大夫”们所适用的不同。我想，虽然其中不免有迷信、禁忌之语，但大体上是“便民”的，也应该在加以整理后印出，供农业部门和医药卫生部门等专家们的参考。

无名氏：墨娥小录

在一家古书店的架上，看到一函袖珍本的书，题作《墨娥小录》。这书名甚奇，不知道书里究竟讲的是什么。便取下来看，原来是《多能鄙事》这一类的东西，也不知是何时人写作的。首有一序，题光绪癸未（一八八三年）武林玉书振麟氏隶。又有学圃山农一序，明说是明隆庆间胡君文焕所重刊的。其中多有制造秘方、种植巧技和养禽宜忌，香谱、牙牌谱等。小小妙术，多有“谈言微中”之处。后在上海，得明刻本一部，已将书名改过。回到北京后，又在邃雅斋获明胡文焕刻本一部，即所谓《格致丛书》本的。为了要搞清楚这一部的来源，又到北京图书馆检阅馆藏的（一）天一阁旧藏明蓝格抄本和（二）明隆庆辛未（一五七一年）吴继刊本。这两部恐怕都不是全书。胡文焕本凡十四卷，天一阁本却只有头五卷，吴继刊本却只有头六卷。第七卷以后，不知吴本为何脱落了。颇疑原来是完全的。吴继的序说道：“自文艺、种植、服食、治生，以至诸凡怡玩，一切不废。如元凯武库，随取具足。不知辑于何许人，并无脱稿行世。晦且湮者亦既久矣。客有访余，出共阅之。以为民生日用所需甚悉。《居家必用》及《多能鄙事》、《便民图纂》类诸所未备者，聿皆裁之。按简应事，则愚可明，拙可巧。锲而广之，亦觉世之一道也。”按种植、服食、治生诸类在第八卷到十一卷里。由此可证吴继刊本并不缺，惟北京图书馆所藏吴本，却是一个残本耳。光绪间刻的袖珍本也非全书。独胡文焕本最为完备。本书所述的秘方妙诀，有不少的确可补《多能鄙事》请书之所未备。但荒诞无稽的话却更多。修真养性，丹房烧炼，乃是明代中叶以来一部分士大夫们的幻想。居然有人信以为真，以为仙人可致，仙境可登。像屠隆所作的《修文记》剧曲，就真的是“满纸荒唐言”也。这个风气越传越盛。直到农民大革命起来之后，官僚地主们的修仙迷梦方才被惊醒了。但除了那些不经的荒诞之谈以外，《小录》里毕竟还有不少科学技术方面的好的成就和经验的记录。这些成就和经验，其创始者和发明者们，虽都已姓氏湮如，但在日常应用上和科学技术史上，却大是值得注意保存之，甚至应该加以发扬光大之的。譬如，造浆糊就有两法：

[糊法]乳香、白芨粉（即膩粉），明矾黄蜡胶，更兼白石钳（石灰也），永保百年牢。

[粘合糊]糊内入白芨末、豆粉少许，永不脱。

粘瓷器法是：“糯米粥和鸡子清，研极胶粘，入粉些少，再研用，妙甚。”这些都是可以在试验有效后加以推广的。像这一类的“玩意儿”还多得很呢。又像“打饼三五日尚软条”云：“和面时入盐、蜜各少许在内，可留三五日

永不硬。”这方法如果试之有效，和民生是颇有关系的。其中“艺术戏剧”一门（卷六），尤多有关古代的“化学变化”的话。像造“烟火”就有很多的方子。像“铅化锡”就有两个方子。染色的方法尤多。他们把那些化学变化都叫做“艺术戏剧”，正如把“火药”的发明，用作炮仗和烟火一样。在那些游戏项目里，可能会找出些新的东西来。又这书的每个本子，可能都会“后来居上”，新增些“东西”进去。吴继的刻本，就比明抄本多出若干则来。像千里茶（卷四）以下三则，枯痔药方（卷五）以下五则，都是抄本所无而为刻本所增的。像这一类书，明代中叶以后，写作得甚多。在《格致丛书》、《夷门广牍》和《宝颜堂秘笈》里就收有不少部。独高濂（作《玉簪记》的）的《遵生八笺》是单行的。它们往往包罗万象，而尤着意于养性修真、打坐炼丹诸术，与《墨娥小录》大体是同一类的东西。我只举最早的一部《墨娥小录》谈谈，不再话及其它的了。

汪懋孝：梅史

古书之失传者多矣。幸而孤本相传，偶一遇之，得不像爱护头眼似地爱护它么？我在杭州一书肆，获见《梅史》，即诧为未见书，亟购得之。携之行篋，不离左右，可谓珍惜之至。作者汪懋孝，字虞卿，休宁人，大概是一位画家。吴子玉的序道：“予邑汪伯子虞卿，乃独耽而专焉，为一时邑之画学所称。”书为万历间（约一六〇〇年）所刻，甚精，刻工为黄时卿，是一个徽派版画刻工的能手。首有“写梅叙论”七则：原起、名法、楷模、笔墨、造妙、师承及郑重。以下就是“插图”了。穷态极妍，尽“梅”的清奇与古拙之致。宋代有宋伯仁的，曾刻《梅花喜神谱》。乾隆间，沈氏曾翻刻之。知不足斋鲍氏也刻之，收入“丛书”第二十六集。《夷门广牍》里有《罗浮幻质》一卷。明末，黄氏刻画谱八种，其中也有《刘雪湖梅谱》。关于论画梅的书是“我道不孤”的。独此《梅史》为最罕见。今人翻刻古画，于精致的界画，飘拂的衣袖，纤丽的蜂蝶，乃至博古、人物，均能不失原作的精神，但于翻刻老干嫩枝时，则笔力大弱，仅具形似，少有生气，完全抹煞了“疏影横斜”的风度。黄时卿刻《梅史》，则刀法极有力，也能表现出画家的本意来。这里面一定有些道理，应该加以深刻的研讨。

余象斗：列国志传

这部书大有历史。它是一家上海古书铺的“专家”，到徽州收书的时候，从废纸堆里“救”出来的。这件事还曾见之于新华社的上海通讯。这末一部小说有什么了不起，值得这样“大张旗鼓”地宣传着呢？这里面有文章。余象斗是明代万历年间（一五七三——一六一九年）的福建省建安县的一个“出版家”。曾经刻过不少书，而以小说书刻得最多。他刻过《水浒》，刻过《三国》，刻过《两晋志传》，刻过《四游记》。这部《列国志传》也便是他所刻的。他不仅刻书，他还编书。《四游记》里有《南游记》和《北游记》，就是他自己动手编辑的。他是一位与人民大众密切结合的出版家。我们要知道，在封建社会里，编刻“小说”的人是多末被“卫道之士”看不起！不是说他们诲淫、诲盗，就是咒诅他们要被“天火”烧家。然而，老百姓们是多末需要看些不是颂扬皇上圣明的，与他们自己有些益处的，且是能够使他们

感动，使他们兴奋，使他们惊叹，使他们时而泣，时而笑，时而喜，时而悲的文学作品啊。余象斗，还有其他有勇气而不顾“世俗”讪笑的出版家们（主要是在建阳、南京、苏州、杭州一带的），便供应了他们的这种需要。我们到今天还能够见到许多“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可以说应该感谢他们。然而这一类的“闲书”看的人越多，便越容易散失、毁灭。倒不是被烧掉——当然，有些“卫道之士”是要聚而焚之——而是因为看得人多，借来借去，看抛掉，看散失了，甚至看得纸张腐烂了，就此完蛋。所以，这些受老百姓们欢迎的小说书等，最难流传得下来。还有，古代好版本的书，像宋刻本、元刻本、明钞本等等，藏书家们还知道十分宝爱，逃难时，每每挟之而逃，故能够历劫犹存。像这些小说书呢，原是消闲之物，“不登大雅之堂”的，谁还肯慎重地保存、保护着他们呢？以此便消灭得更快、更易了。建安版的小说书，而每在安徽出现，这说明了安徽省，特别徽州一带地方，变乱比较少，罕遭兵燹，故“闲书”等等，还比较地能够保存下来。我曾到过建阳（即建安），那里是什么也没有了。书店早已歇业——可能在清初，至迟在清代中叶，就不见有建版的书了——要找一本明代建版的书，难如登天，更不用说什么宋、元时代的建版书了。只剩下夕阳斜照在群山上，证明那里曾经是“盛极三朝”（宋、元、明）的一个出版中心而已。余氏世业刻书。所谓宋余仁仲本的《礼记郑注》更有大名。这个余象斗，可能就是宋代（南宋：一一二七——一二七九年）余家的后裔吧。那末，他的一家，经营出版事业，至少已有三百多年了。世界上有像他家似的历史那末悠久的一家出版商么？

余象斗字文台，号三台山人。他所刻的书，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继承了宋、元以来的建安版书籍的型式，特别着重于“插图”，就像现在印行的“连环图画”似的，上层是插图，下层是文字。图、文并茂，使读者们阅之，兴趣倍增。这部《列国志传》也就是刻成这样古老的型式的。插图虽是狭长的一条，人物形象虽小，却十分生动活泼，一望而知，绘、刻的工夫不浅。内容方面曾与陈眉公本的《列国志传》相对读，差别不大。

这部书，上海古书铺一下从徽州得来，只残存一册，即最后的第八册。像这样的小说残本，我们为什么如此的看重它呢？倒不完全为了它是明代余象斗的刻本，刻得精美，流传得极少之故，更重要的原因，还为了它是从废纸堆里“抢救”出来的。原来，禁止以古书造纸，早已有了明令。但未能贯彻下去，各地造纸厂，不知毁坏了多少有用的好书和资料。四川省曾经抢救出“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的日记的稿本，足足有百册。浙江省救出了太平天国时代做过上海道，和帝国主义者勾结起来，组织“长胜军”的吴煦家里所保存的档案。南京赵世暹先生曾从论担称斤的旧书里，获得了宋刻本的《金石录》三十卷的全书。上海方面，也在造纸厂所收集的将作纸浆的旧书里，找出了不少好书、好资料。没有被发现而在不声不响之中被毁灭了的好书、好资料，更不知道有多少！一旦失去，从此不见天日！安徽省是一个文献之邦，徽州一带，尤为古旧书籍集中之地。据上海的那位“专家”告诉我，一扎一扎的古书，不知道有多少，在等待着“入锅化浆”。他想仔细地检查一番，但造纸厂的人却不耐烦了，只好草草地收场回来。又曾看见炮仗铺里，用明朝白绵纸印的书，撕得一页半页的作为鞭炮的心子，据说，用这种好纸做炮仗，会放得特别响。他和他们商量，能否在纸堆里检些什么出来。但他们干脆地拒绝了，连纸捆子也不让打开。这不是很可伤心的事么？不仅安徽

省得好好地、大力地杜绝这样的糟蹋、毁坏文献和科学研究的资料的事的继续进展下去，别的地方也应该同样努力地防止把古书作为废纸，作为造纸浆的原料。有的地方，收废纸的人为了怕文化部门的人打麻烦，在打包运出之前，就把整本、整部的书，故意地先行撕破扯烂，省得有人来检拾什么，正像收集“废铜”的“社”，收到古代青铜器或旧的铜佛像等等，便先行打烂敲碎，碎得一片片地，一小块一小块地，以免“文管会”等等的人来挑选。我们不明白，这是什么一种心理在作祟！这一册《列国志传》是幸运地不至“冤沉海底”了，但其他“七册”呢？已化为纸浆了！见此一册的得“救”，益盛感他册，乃至无数他书的不能及时“救”出的痛心！这便是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大张旗鼓”宣传这部、或这一册书的主要原因了。

玄烨：康熙几暇格物论

对于事物有新鲜的感觉有缜密的考察，因而发现或发明些科学原理或规律，或有益于人类的动、植物的新品种的，在中国古代实“大有其人”。且举一个比较新鲜的例子吧。

丰泽园中，有水田数区，布玉田谷种。岁至九月，始刈获登场。一日，循行阡陌。时方六月下旬，谷穗方颖。忽见一科，高出众稻之上，实已坚好。因收藏其种，待来年验其成熟之早否。明年六月时，此种果先熟。从此生生不已，岁取千百。四十馀年以来，内膳所进，皆此米也。其米色微红而粒长，气香而味腴。以其生自苑田，故名御稻米。一岁两种，亦能成两熟，口外种稻，至白露以后数天，不能成熟。惟此种可以白露前收割。故山庄稻田所收，每岁避暑用之，尚有赢余。曾颁给其种与江、浙督抚、织造，令民间种之。闻两省颇有此米，惜未广也。南方气暖，其熟必早于北地。当夏、秋之交，麦禾不接。得此早稻，利民非小。若更一岁两种，则亩有倍石之收，将来盖藏，渐可充实矣。

这一段话见于《康熙几暇格物论》（《御制文》第四集卷二十六至卷三十一），亦见引于乾隆本《援时通考》。清末，宗室盛昱亦曾将此编六卷抽出，录为两本，石印行世。只为了在丰泽园的阡陌上走走，留一下子神，便发现了“御稻米”这个“嘉谷”，“利民非小”！今此种“御稻米”，不知北京附近尚有种之者否？想不至绝种。应该大大地提倡一下方是。在同书里（卷二十六），又有“白粟米”一则云：

粟米（《本草》，粟米即小米）有黄白二种。黄者有粘有不粘。《本草》注云：粟粘者为秠，北人谓为黄米是也。惟白粟则性皆不粘。七年前，乌喇地方树孔中，忽生白粟一科。土人以其播获，生生不已，遂盈亩顷。味既甘美，性复柔和。有以此粟来献者，朕命布植于山庄之内。茎干叶穗，较他种倍大，熟亦先时。作为糕饵，洁白如糯稻，而细腻香滑殆过之。

这也是偶然的“发见”。而“白粟”的一种，便自此传遍各地了。玄烨是一位英明的人物，他对于“新鲜事物”，处处留神，事事研究。现在故宫博物院里还藏有不少他所用的仪器。有的仪器，还是从英国来的，但也有中国自己制造的。康熙这一个时代（一六六二——一七二二年），很值得我们历史学家们和科学史家们研究一下。又，我国各地区的稻、麦诸“谷”，品种丰

富极了。我相信，可能还会有像发见“御稻米”和“白粟”那样的“嘉谷”的优良种子的机会。只要大伙儿仔细留神，处处注意，就会有碰到这个机会的可能。农村的“合作社”里，有经验丰富的“老农”，也有学过农业科学的青年们，他们短不了天天在阡陌上跑，倒要留点神，多观察观察，可能会有什么优良的新品种给他们发见出来呢。那便于国计民生，关系非浅了。

王世懋：学圃杂疏

这是一部老老实实在地讲究种花植果的书。一切平易近人，可以见之实用，没有怪诞可惊的议论与方法。此书凡三卷，第一卷是“花疏”，第二卷是“果疏”、“蔬疏”（附水草）、“瓜疏”、“豆疏”及“竹疏”，第三卷为拾遗，除补第一、二卷所未及者外，并附录慎懋官的《华夷花木考》里的若干则，那些是他自己所未曾述及的。我们最怕的是辗转抄袭、陈陈相因的书。好的书却是语语从自己经验中来的，不仅是第一手的材料，也是第一流的文章。像世懋这部书可以当得起这样的好评了。他随笔札记自己的种植花果的经验，不抄掇前人的只字片语，的确是一部有用的好书。就散文而论，似淡而实浓郁，似浅而实深厚，也可列入明文的上乘。《宝颜堂秘笈》曾收入此书，却只有一卷，是把原书的第一、二卷合并为一的。首有万历丁亥（一五八七年）世懋的序。世懋为世员弟，谈艺多崇慕世员语。但《四库提要》以其间有不赞同王、李语，便大加赞许，所以只有那部《艺圃撷馀》是收入“四库”的，其余的像《学圃杂疏》等书，就都被列于存目里了。我这部《学圃杂疏》是在《王奉常杂著》里的。《杂著》卷前有“翰林院”印，当即是当时“馆臣”所用的那一部了。

周文华：汝兰圃史

上海的旧书店在清理底货。我听说修文堂清出此书来，亟向之购取，则已为北京来薰阁所得。回京后，乃向来薰阁取得。在论园艺的书里，这是一部比较详明的好书。凡十二卷，从“月令”、“栽种十二法”、“花果部”、“木果部”、“水果部”、“木本花部”、“条刺花部”、“草本花部”、“竹木部”、“草部”，到“蔬菜部”、“瓜豆部”，条理甚为明悉，栽种的技术也叙述得颇详细。序目均作“致富全书”，显系后来挖改。盖后人以种植花果足以“致富”，乃为易此名。首有万历庚申（一六二二年）陈元素序，又有王元懋序及自序。他自云，得顾长佩手订《花史》十卷，乃周允斋所辑。“稍恨其诠集未该”，遂以耳目睹记，加以增补。周允斋的《花史》，书中引作《允斋花谱》，今未见。但这部《圃史》却是后来居上的。他的确增加了不少自己的经验进去。有许多的种植方法和经验，是今天还应该加以重视的。周文华字含章，吴郡人。吴郡的“花农”现在还驰名遐迩，的确是积累了丰厚的传统的优良经验的。在搞农业副产方面，像这一类的书是极有用的，还应该多搜集，多流传，多加以实验，并于实验后，多加以推广才是。

谈买书

买“书”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也不是派某某总务科的工作人员，

出去到书店里跑一趟就能解决问题的。买“书”是要花费一些工夫的，是要有些经验的。就个人说来，在书店里东张西望，东挑西选，其本身就有无穷乐趣。到布店里买花布，还得东挑西拣，何况乎买“书”。“书”是多种多样的，花色最为复杂。有中文书，有外文书。中文书里又分新书、旧书、古书，平装书、线装书，文艺书、科学书、经书、子书，和史部书、集部书等等。外文书的门类更为繁多了，除了文字的不同，像俄文、法文、英文、日文等等之外，又除了大批的文艺作品之外，单是自然科学一类，就有无数的专门项目，非搞这一行的专家来挑选，是连“书名”都不会弄得明白的。买外文杂志，更为麻烦，也必须经过专家的指定，方才可去订阅。否则花了大价钱，买了回来，“张冠李戴”，全无用处，未免要一场懊丧。国家的外汇不应该花得这样冤枉！

且说，自从提倡向科学进军以来，各个学术研究机关，各个大专学校，都在大量的添购新书，特别是新成立或将要成立的研究机构和学校，买“书”更为积极。他们常派了专人到北京和上海来买“书”。来一趟，总是满载而归。不要说新书了，就是古、旧书也有“供不应求”之慨。一家古书店印出了一册书目，不到几天，书目里的古书，不论好板、坏板，明板、清板，全都一扫而空。有若干种书，仅只有一部的，却同时有好几个单位来要。“到底给谁好呢？”他们常常这样的迟疑着。比起去年“门可罗雀”的情况来，真有天渊之别。现在看看他们几家老铺子的书架上，陈年老古董已经出脱得差不多了。架上渐渐地空虚起来。他们有些着急。“来源”问题怎么解决呢？而买的人还是源源而来，而且气魄来得大。

“你们这里一共有多少书？”一个外来的顾客向刚开张三天的上海古籍书店里的人问道。

“有十五万册上下。”

“这十五万册书，我全要！请在几天之内就开好书单，我好付款。”这家店里的许多伙计，乃至经理等，全给他吓唬住了。只开张了三天，而“书”全卖空了，以后将怎么维持下去呢？而这一大笔买卖又难于推却。怎么办呢？大费踌躇。下文不知如何？好像是不曾成交，而被他们用婉辞给挡回去了。否则，那家“古籍书店”不会到今天还开张着。这位黑旋风式的顾客，可谓勇敢无比，大胆之至的了。在那十五万册古书里，有多少复本书，有多少没用的书，有多少种的书，非对某种科目特别有研究的某些专家是根本上用不着的，甚至也不会看得懂的，他却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古脑儿“包买”了下来。前几年，有过这么一回事。每到年底，某某机关或某某大学，购书的经费有剩馀，就派人到新华书店，不管有用没用，每部买个一本到三本。“我全要！”如闻其慷慨之声。更干脆的是，“替我配个三万元的书！”于是，每年在新华书店积压不销的书，至此乃出清一大部分。听说，上述的那位顾客是替一个正在筹备中的大学买“书”的。而那个大学在开头几年之内，还只办“理科”，没有“文科”。那末，买这十五万册古书何用？是为了“未雨绸缪”，生怕以后买不到？

又是一个笑话。一个买主到了上海来薰阁，看见一堵墙面的几个书架上还满满地堆满了古书，就问道：“这些架上都是些什么书？”

“是集部书。”

“是集部书，我全要！”口气好大！也不知后来究竟成交了没有。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长陶孟和先生告诉我：有某一个设在外省的研究

所，派人拿了好几册国际书店印的外文杂志目录，要求图书馆替他们全部预订一份。如闻其声：“我全要！”但全部是三千多种呢！门类复杂得很，也有些只是“年报”或“会务报告”性质的东西，买了来，根本没用。陶先生翻了翻，就把他给顶回去了。

“要好好地挑选一下，不能全买！”

这个态度是对的。要有一个“关口”，审查一下那些乱花钱、乱买“书”的莽汉们的所作所为方是。否则，笑话还要层出不穷。闹笑话倒不打紧，损失国家有用的资金，积压应该供给别的专家们的研究的资料，那才不是“小事”呢。

我建议：如果要买“书”，书目非由“专家”开出不可。各研究单位或大学图书馆的人员，只是综合了各位“专家”所开的单子去“买”书而已。就是公共图书馆也应该时时请教当地的专家们，了解他们的需要，再动手“买”。

没有拿“书单子”而来买大批“书”的人，不论新古书店或国际书店，均可以有权给他们顶回去。

“要买什么，请拿书单子来！”

开得出“书单子”来的，那便是一位专家，或至少是一位接近于“专家”的颇有道理的、有些专门修养的人了。

谈访书

“天涯何处无芳草”，这句话对访书者说来，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哪里没有好书、奇书，有用、有益的书呢？只要有心去访求，一定可以找出不少好东西来的。我在广州图书馆里，就看到宋版的《杨诚斋集》，那是清末从日本流回广东的。向来《杨诚斋集》只见抄本，未见宋刻本，虽然这部书破烂得很，却是一个最晶莹的珍宝。广州图书馆从论担称斤的书堆里把它救出来了。如今是，物得其所，广东省把它送给北京图书馆，成为其中最好的宋版书之一。最近，北京隆福寺的文渊阁，从福建找到了不少抄本的好书，其中有一部章潢的《图书编》，是明抄的，有彩图。还没有仔细地 and 明刻本对读过，不知其异同如何。但可肯定的是，这抄本比刻本早，彩色插图，尤为重要。虽残阙十多册，北京图书馆亦收之。我也得到了三册《闽产录异》，二册《海错百一录》（均郭柏苍著，光绪间刻本），虽是近刊，却极不多见，以其是第一手的材料书，故收之。研究海产和南方的动植物者必当一读，有许多记载是第一次见之于这两部书里的。

搜集革命文献的人更常常在破烂纸堆里找到极有价值的图书资料。也是最近，北京同文书店得到了全套的《妇女日报》。他们极为高兴。这家书店的主人刘君，对于这一门文献，特别有研究。他曾从四川，从两湖、两广，从没有人注意的地方，耐心地细致地为国家得到了很多好东西。像那些的深入探索，不怕费时费力地去访求，我们的工作同志们似乎是不大有其人的。把书送上门去，有时还嫌其多事，摆出“老爷架子”，呼叱指责，动不动便戴之以“暴利”的帽子，怎能不把他们的访书的积极性，弄得像把一盆冷水泼在热炭上似的烟消灭了呢！所谓“访书”，是应该细心地耐心地急起直追地去访求的。作为一个为图书馆采访的干部，一个负责国家搜集文献的部门的人，绝对地不能坐在家里等人送书上门。那样的老爷架子千万摆不得。

那是十足的官僚主义的表现！至于送上了门还要嫌其多事，那末，那样的人物是没有资格从事于这一部门工作的。

我自己十分地困惑：为什么我去年冬天到了苏州，就会发现苏州那里有三个地方在论担称斤地把古书卖给了收废纸的人，其中一处就在城内。为什么我今年春天到了杭州，也就会发现同样的事件发生？这岂是“适逢其会”！在我未到之前，或在我离去之后，可以想象得到，这一类的事件是在不停地不断地发生着。苏州的文物干部问我：“难道《绅缙录》一类书也有用？”我说：“有用之至！这些书是原始史料的一种。”他说：“某处已经都称斤作废纸去了，足足有几大堆。”我问：“追得回来么？”他摇摇头。常熟翁家夹巷里的古书，已被卖给收废纸的了，急急地去追录，只追回来一小部分。杭州吴煦家里的太平天国的和其他有关帝国主义者们的侵略的资料和档案，已被卖作废纸了，亏得杭州某书店收了大部分下来。而未被某书店收下的七八百斤的资料，却已被造成纸浆，无法追回了。这是应该“传令嘉奖”的事，却反而大受批评一顿。有好些地方的同志们，平时高枕无为，自己绝不动手，耳无所闻，目无所见，等到有人“发现”了什么，便摆出“权威”面孔来，抬出“保存地方文献”的金字招牌，禁止出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境之内流通，怎么会叫做“出口”？有某一个省，知道了北京的书店的人去买了不少书，就说：“不许动，我们自己要买的。”他们到底买不买呢？其实只是“禁止出口”而已，他们自己未必买。但当地古书店的收书的积极性，就受到很大的打击了。

我建议：凡到各地收古旧书刊的人，都应该受到当地文化部门的协助和鼓励。凡收得好书、好资料的，就应该加以表扬。当地如果的确有需要，可以转向他们购买下自己所需要的那一部分，完全不必要摆出那一副“禁止”、“不许动”的官僚架子。凡是能够发现好书、好资料的人，就是对国家的科学研究事业有功劳，就应该加以协助和鼓励。我们没有力量、没有时间去发掘出好书、好资料来，而那些古旧书店的收书的专家们，却能发挥其特长，为科学研究事业作出有效、有益的贡献，怎能不加以表扬呢？自从提倡科学研究和古旧书店公私合营以来，书店的营业顿时兴旺起来，好书、奇书，有用、有益的书，从前轻易看不到的，如今竟不时的出现了。像《石仓文选》（明曹学佺辑）就是新出现的一部好书。最全的一部《石仓诗选》，已被我们不肖的子孙卖到海外去了。我着意搜集此书，将近三十年，已有三大箱，所缺尚多。北京图书馆藏的那部《石仓诗选》，也不全。而这部《石仓文选》却很少有人知其名（李之鼎《丛书举要》著录）。虽只二十卷，而其中好资料不少。这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近来好书的确是像山间的清泉似地涌流不息。明刻本的《西游记》和《封神传》也已出现了。北京的古旧书店的收书专家们都已深入江南、湖、广的乡间去了。我们相信，他们将会有更多更好的收获的。

访书之道，亦不限于收书专家们的四出访购。还有更重要的一条大路，我们正要走而未走。二千年前，汉成帝就曾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派遣若干的“访书”工作团呢？在土改里，在接收各个机构的藏书时，有不少是被保存在各地文化馆里，乡、区、镇的人民委员会里，县的财政科里，其中，有的是胡里糊涂地被当作废纸卖出去了；有的是被废物利用，反折过来，当作习学簿或帐簿去了。最好的运命是被封存起来，以待处理。那些被封存的图书，究竟数量多少，很难估量。但为数极多，是可

想象得到的。我亲自见到的被封存在莆田文化馆里的书，就有四万多册。最近，据江西省的文化干部报告，他的省里有万册以上图书的文化馆就不在少数。假如，全国有二千个文化馆或其他保存书籍的地方，每一处以一万册计，则已有二千万册的图书可以得到了。这二千万册图书的获得，对于科学研究工作的进行将有多末大的作用啊！而这些被保存的图书，如果不及时地加以集中，加以整理，加以使用，则必将于短时期内有散失或霉烂之虞。举一个例：苏州同里镇的人民委员会的财政科（？）里就保存了很多的古书、古画，全堆在地上，有的已经开始霉烂了。立刻就得开始工作！我建议：由中央组织十个或十个以上的“访书工作团”，每团只要一二个干部，组织古旧书店里的三四个收书专家们，一同到各省、市去，再加入各省、市的文化部门的工作同志们或专家们，就可以成为若干的分团了。他们分头工作，不出几个月，至少收集和整理的工作一定可以告成的。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老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这不是十足的官僚主义是什么！应该起而立行，克服一切困难而立即开始！何况这个工作并不会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困难呢。

谈整书

最苦恼的是找书。我常常说，如果有书而找不到，还不如到图书馆去借更方便些。但说起图书馆里的“书”来，实在是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谈起好。图书馆里的“书”，找起来又何尝是容易的事！有些朋友把图书捐给北京图书馆之后，自己要用，再去借，却再也“找”不到了。有一位管普通书的人对赵万里先生说：你们尽量把书挑选到善本部去吧，算是救出了它们。在我们这里是“冤沉海底，不知何年何月才得重见天日”。的确，一箱箱，一捆捆，一包包的书，东藏一批，西放一批，有时还要像老鼠搬家似的被赶到东，或被迁到西。足足有一百八十万册的图书，没法整理、编目，与读者们见面，供研究者们使用。其中，不完全是中文古书，也不完全是复本的“朱批谕旨”之类，尽有很重要的，现在正在需要的图书，甚至包括若干新的俄文书籍在内。有一位外国专家到北京图书馆参观，问道：

“你们馆里藏了多少册书？”

“有四百万册上下。”馆长答道。

“有多少册已经上架了呢？有多少册已经整理、编目，可供读者们阅读的呢？”

馆长答道：“有二百二十多万册已经上架，已经整理、编目，可供读者们的借阅，其余一百八十万册还没法整理。”

“那末，”那位专家说道，“你馆的藏书数量，只能说是二百二十万册，不能说，是四百万册。”

这是很尖锐的批评，也是很正确的意见。不能流通使用的书，的确难于统计到图书馆的藏书数里去的。更惨的是，有的书，因为长久搁在箱里，十多年不见天日，有一次偶然开出几箱出来看看，箱里的书却已经碎成纸屑，没法收拾的了。这是多么大的损失呢！

也曾作过几次的努力：“要整理！”就是现在，也正在努力整理！前几年，为了整理十万册不到的俄文书，还曾动员了不少人。但那些努力只是断断续续地，有时松时紧之感。总之是，劲头不大，没有彻底解决的办法。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地方供给他们整理，即使陆续整理出来了，也没法上架。

是不是永远没法解决这个困难？不是的！应该可以解决，而且本来已经可以解决的了，而突然的阻碍横生，忽有变卦，致使可以解决的困难，又成了不可解决的。原来在北京市政规划里，文津街一带是划作北京图书馆区的，这是我亲自和北京市几位市长们谈定的。首先说定的是，北海里的肺病疗养院迁出后，即归北京图书馆使用。这个疗养院面积不少，有二百多间房子，虽不能全部解决北京图书馆的问题，但对于目前的困难，得此二百多间房子是可以解决的。不知什么时候，据说是，经过一次市长办公会议的决定，这个疗养院的房子便划归北海公园自用了。我不知道北海公园要这二百多间房子何用。市长办公会议的决定未必便是“法律”，尽可以再议再变的。北京图书馆如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能够更好地、更多地为科学家们服务，也便是北京市的一个光荣，其间并无矛盾之处。我希望他们能够维持原定计划才好。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其关键性所在是科学研究的进展。而科学研究工作的进行，其基础之一是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乃是中国唯一的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必须克服一切困难，使库藏的四百多万册书都能为科学家们和其他专家们使用才好。

以上多谈了些北京图书馆的事，那是因为我对它比较熟悉，且特别有感情之故。“天下老鸦一般黑”。我们看看天下的图书馆，能够充分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的，能够尽了为科学服务的责任的到底有几个？死气沉沉，暗无天日（指没有阳光而言）的不在少数。西安市是一个那末重要的地方，但其图书馆是何等样子呢！他们和我谈过，新书少极了，外文书更少，购书的费用少得可怜。如何能够尽其为新的大西安市的科学研究服务呢？即旧有的尘封的古书，也有许多还没有整理出来。我曾经把他们的意见反映过，不知这一年来有没有改进。

就在北京，把书堆在那里没有整理的有多少？有图书馆的单位，自己去检查一下吧。每一万册里已经编目上架，可供使用的有多少册？从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开始，把束之高阁的未编目上架的书籍，全部陈列出来，群策群力地做一番彻底的整理工作吧。有书而不加整理，不给人使用，不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让它们为科学研究服务，那就是把持资料、垄断学术的霸道行为。也许，这句话说得分量太重了些，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种种的客观条件所限制，特别是，房子问题，不能全怪主持的人们没有诚意，没有计划。

有一个外省的大学的图书馆，曾经向北京大学图书馆提意见道：“两年之内，你们的图书馆如果还没有整理好，那末，我们就要来分了。”

“不激不发”。我相信，有一百万册或数十万册书还没有整理的图书馆，应该尽量发挥主动的力量，做好整理编目的工作，使之在两年之内，把那末许多不见天日的有用的图书，从箱子里，从堆在黑房的一包包一捆捆里解放出来，给想使用、十分需要使用它们的读者们阅读。

有一个督促加速整理的办法，凡新书没有整理好的，暂时停止买新书，古旧书没有整理好的，暂时停止买古旧书，外文书刊没有整理好的，暂时停止买外文书刊。等到把旧的整理好了，才能买新的。否则越积越多，何年何月才能清理完毕呢？再者旧的没有整理好，特别像古旧书之类，也没有法子再去购买，因为不知究竟已经有了没有这些书。这虽是“因噎废食”，但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新书、外文书待用迫切，也许不适用这个办法，但像古旧书，就完全可以用之了。

关于整理编目的方法，应该是“卑之无甚高论”，不要高谈什么式的“分类法”，只要能找到书就行。一本排架目录，比没有目录总强得多。书按整理的先后上架，目录就照此写下去。这个工作就是没有学过任何分类法的人也都可以做。然后，再写“著者索引”和“书名索引”，那便更方便读者们的检书了。“行有馀力”，然后才再从事于“分类索引”的编制。现在的整理工作，进行得十分缓慢之故，其原因之一，就是要先行分类编目，然后再分类上架。这是最笨的方法。应该学习别的国家的大图书馆的排书上架的办法。小型的图书馆当然应该分类编目，但大型的图书馆则不妨先行按大类上架，甚至全不分类即行上架，然后再编“著者”、“书目”、“分类”三个索引。

古书的分类编目，大可不必“中外统一”，那是王云五的坏方法。《史记》、《汉书》固然应该归到“历史类”去，但像占古书里分量很大的《梦溪笔谈》、《西溪丛话》、《紫桃轩杂缀》、《分甘馀话》等等，应该归到那一类去？我的想法，古书的分类，还是不要多生枝节，老老实实地照“四库”编目，先行编出，供给需要使用这些书的人应用为是。不必老在“分类法”上兜圈子，想主意，而总编不出“书目”来。

谈分书

书是要读、要用的。从前的藏书楼，像宁波范氏天一阁，只是藏书而已。不要说外边的人，即范氏的子孙们也只许每一年在晒书时候和书见面一次。清初，钱谦益藏有奇书，常常“讳莫如深”，不肯给人知道，更不肯借给人看。但现在却大为不同了。私人的大藏书家，已经一天天地少了。即有若干小藏书家，即有些珍罕的好书，也藏不住，总得借给需要它的人使用。许许多多的大大小的图书馆，更是彼此互通有无，谁也没有“保密”的必要和可能的了。书是天下之公物，谁也不能拥而私之。古语所谓“坐拥百城，虽南面王不易也”的“私诸个人”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专家们的书房里，多多少少地总会有些书，那是自己使用的东西，像家具、茶杯似的，用惯了的，总不能老去借用别人的。也可能，在其间有些光彩焕发的好书，甚至仅仅对于他，那个专搞这一行业的专家，十分有用的书。除了他和他的徒弟们，是不必引人人为“同行、同道”的，那末，似乎也不必要大事宣传。

在把“不见天日”的许多大图书馆里的未编目上架的书整理出来之后，一定会有许多复本。据我所知，北京图书馆就有不少部雍正的朱批谕旨，不过没有多大用处而已。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里也有不少部铅印的清代各帝御制文集，听说，也都分配到各个图书馆去了。

把复本书，把自己所不需要的或不合用的书，分配给了别的图书馆，那是“功德无量”的事，那是使“书”发挥了更大的更广泛的作用的事，那是毫无私心的光明磊落的事。我在《谈访书》一文里所说的广州图书馆把宋版《杨诚斋集》送给了北京图书馆的事，就是典型的一个好例子。

也有出了偏差的，像北京院校调整的时候，原来也预备分书的，因为争夺得太厉害，甚至有一个音乐机构，要把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所有的音乐书籍，包括许多要从整套丛书里拆散出来的本子在内，全都提了走。结果是不欢而散，一部书也没有分成。

像那样枝枝节节地“分”书，当然会发生问题。应该有一个通盘的计划，

先把各地集中的初步整理好的书籍，根据中央及各地的需要，分别先后缓急，一批批地调拨出去。绝对地不应该有地方观念或“肥小公而忘记大公”的思想。各个大图书馆的复本书或待分配的书，也应该先行编个草目，以待统一分配，不宜自作主张，先行分配出去。那是会造成混乱现象的。全国有多少个图书馆需要朱批谕旨或御制文集的呢？

有不少大图书馆还存在着本位主义。自己不用，也不许别人用。像一个工业学校图书馆，收藏着十分丰富而重要的关于西洋文学的图书，就是不肯调拨出去，给十分需要这些书籍的研究机构或学校使用。不明白其“道理”何在！这也是属于把持或积压研究资料的一类行为，对于我国科学研究工作的进行是有害的。

在各省、市集中了的图书，当然首先要供应各省、市的本身的需要。从前说，“宰相要用读书人”。我们现在深切地感觉到，专署的专员或县里的县长应该要用些有文化的读书人才好。每个县长，至少要了解他那个县的一切事情才是，换一句话说，他首先必须翻翻那一个县的“县志”——即那一个县的“百科全书”——才能明白那个县的古往今来的事，那个县的地下、地上的资源，各种土特产，以至地理知识和古迹名胜之区。否则，就会做错了事，连他自己也还不知道。像绍兴市的某些负责同志，连陆放翁和绍兴的关系也还不知道，宁波市的负责文化部门的干部，连天一阁在那里也还茫无所知（这是一九五一年〔？〕我到宁波去的事，现在当然是已经很熟悉的了）。所以我建议，各个地方的各种版本的“县志”、“府志”，或其他有关的地方文献资料，应该留在各该地方的专署、县人民委员会里或图书馆、文化馆里，作为“学习”资料的一种，而且是一部干部必须学习的读物。不过，像明刻本的或康熙刻本的“方志”，已成了“珍本”、“古本”而不切实用的东西，则仍应该集中起来，分配给其他重要的图书馆保存起来，作为参考资料。

我初步估计一下，在各省、市的集中、整理工作的进行中，一定会有大量的、有用的图书，包括不在少数的“古本”、“珍本”的图书在内，被我们发现的。这样彻底地做一番合情、合理，并且切合实际需要的调拨、分配工作，对于中国的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是会有很大的作用的。

这就是说，应“分”者，我们必须使之“分”，使之分配得“得当”。然后，书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能够使需要读它的人看得到，而不至埋没于灰尘寸重的黑漆漆的屋角里。

同时，也还应该说明一下，不应该“分”的书，是绝对地不能使之“分”的。有的古代的藏书楼或图书馆，原是十分完整地，自有其历史的意义与作用的，保存在一起，那末，就会发挥其应有的很大的作用。一旦分散开了，就会碎割零切，不成片段，起不了什么作用，除了毁灭了一个古老的好的图书馆之外别无其他的好处。且举几个实际的例子。像宁波天一阁、上海徐家汇图书馆、上海中华书局图书馆、上海亚洲文会图书馆等等，都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天一阁的历史是四百五十年，徐家汇图书馆的历史是四百年）。其藏书的性质也是各树一帜的。把他们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是有其必要的，也有其需要的。像徐家汇图书馆，其度藏各省方志的书库，是一省一省地做好了书架的，检阅起来十分方便。何必加以更变，徒增纷乱呢？我们不应该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甚至有害的事。又像中华书局图书馆，搜罗清末以来的各级各种的教科书最多，是研究近百年的教育史的和从事教育工作的

同志们所最需要的一个大的丰富的宝库。如果“分”散了，有何意义呢？又像亚洲文会图书馆里的藏书，以整套的有关东方学的书刊为主。如果中国科学院一旦成立“东方学研究所”（？）之类的机构，将它作为一个图书馆的基础，乃是一个十分合乎理想的，也是十分切合需要的事。如果把它“分”散了之后，再要建立起像那样规模的一个图书馆来，便非十年、八年不为功了。学术研究的“甘苦”，在图书馆需要方面最能表现出来。国家对于科学研究事业是以大力发展之的，对于像这种有关整个科学研究事业发展前途的图书分配、调拨工作，是应该细致地、慎重地、合理地，而且还应该十分迅速地进行的。

谈印书

古书常是孤本传世，难于广泛地流通。有些是原稿本，那末，更是天壤间只此一帙了。数量少而欲读之者多，那末，势非出于重“印”之一途不可。仅仅只印它百部、千部吧，已经是化身为百，为千，能够供给千百个人或更多的人使用的了。有些旧报纸，极为珍贵的“孤本”，为了找材料的人太多，已经被翻阅得字迹都磨消了，纸张都松脆了，已经到了不可再阅的地步，然而还有人在翻阅。为什么不赶紧地重“印”它若干份呢？有些旧杂志，从第一号起，已经将近几十年或百年了，全份的不可再得，特别是外文的、专门性的杂志，那末，翻印个五六百份乃至千份，也是完全必要的。这实在可算是直接地为科学研究服务了。

但那些外文的整套的旧杂志的翻印方法，却大大地值得考虑。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向达先生向我诉苦，他那里藏有外文的全套数学杂志等等，翻印者们向他借出重印。怎能不借给他们呢？等到印毕归还，原书已经松脆得不能再读了。原来是用了“龙门”式的影印方法，将原书拆散了，一页页地直接上版印出的。这个方法，可谓鲁莽灭裂之极。对于新出版的书籍的重印，或者可以如此做，因为原书还不难得，糟蹋一部、两部的，还不会怎么心痛。对于宝贵的图书馆的珍藏品，也用如此的方法处理之，实在未免只顾眼前，不问后果了。如何对得住国家的宝贵财产呢！为什么不多花些功夫，多用些费用，改用石版或胶版的照相影印的方法呢？原书既可不受损伤，版面也格外显得清晰，预约者所要花的钱也并不会增得太多的。何乐而不为呢？这样地粗暴地对待国家所有的珍贵的图书的态度和办法是不能再容许继续下去了。

说起照相影印来，对待原本古书的态度岂是更谨慎、更仔细注意于保护原书些？一般说来，爱护原本古书的基本思想是建立起来了，但有的出版社态度还不免粗暴。原书是被拆散了照相的，等到还原时，式样就有些更变了。有的装订得四不像，十分地狼狈。我有一册《水浒传》的插图，被一个出版社借去照相制版。等到若干月之后还给我时，许多页上都贴满了白纸，写了不少说明，要一撕下，原书的页子，就会随之而破裂了，只好随它那样满身披挂了碎纸条下去。怎不令人气愤呢？

不过尽管有些重“印”的办法不对头，重“印”还是一件好事，而且是一件必要的事。

印书的办法多矣。这里只谈谈古书的重印。按重“印”古书的办法，有照原书影印的，有用铅字排印的，有加以标点的，更有加以新的注解的。

在过去，总爱经史子集一道印，所谓《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之类，流行甚广，恰好配合所谓“国学必读书目”之类的风行于世，大是无聊，只不过让有钱人的客厅里有一套新颖的陈设而已。在其间，《四部丛刊》是采用善本加以影印的，《四部备要》则是采取通行本加以排印的。《四部备要》里的若干照“古本”排印的书，其实只是窃之于《四部丛刊》的，像唐《孟浩然集》，就是一个证据。还有《国学基本丛书》则是加以标点的，《学生国学丛书》则是新的选本，并加以新的注解的。他们都是用“国学”或“四部”的大招牌，包罗了不少东西。但所有那些东西，给专家们使用是万万不够的，给初学者们使用却又嫌其太艰深，同时，没有用的东西也太多。还不如像从前世界书店出版的“四书五经”、《诸子集成》、《文选》等，反而大有用处，廉价而使用方便。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补编》则是供给专家们使用的。

现在如果重“印”古书，应该取过去之所长，而弃去其所短，换一句话，就是说，包罗万有的东西不应该再有了，除非说明是专门供给中、小型图书馆用的。其实，连中、小型的图书馆，对于那一类的“四部”、“国学”也是不会欢迎的。其中有多少是“废物”！但比较专门化的东西却是必要的，且无论对于专家们或初学者们都是需要的。

所谓专门化的东西，指的是，凡“印”书一定要成“类”成“门”，像《二十五史补编》或《诸子集成》那样。现代的读者们，专家们，需要的是自己本行的东西和应该参考的东西，而不是“包罗万有”的“丛刊”、“备要”、“文库”之类。我们悬想：应该重印的专门书有多少？医药卫生的书不是很需要么？不仅给中医看，也要给学习中医、中药的医生和药剂师看。但这一类的书，印错了一个字，排错了药品的分量，就会出大毛病，甚至会死人；所以，必须慎之又慎地重印，而且对于古本医书，应该用原著或最好的、最可靠的本子影印。其整理、排印的一部分更必须三校、五校，以至尽善尽美为止。人命关天，岂同儿戏！农业科学的书，也是今日所急需的。那末重要的一部《农政全书》（明徐光启著），今天还没有新版子呢。我们古代的农业科学的知识多么丰富，且是切合于本国、本地的需要的；它们乃是千万年的农事经验的总结。怎能不搜集起来，作为一部乃至若干部“中国农业丛书”、“中国花木种植丛书”等等，陆续出版呢？这是有关于国计民生的事。乃至小说、戏曲、历史、地理等部门，也都是亟需有一套套的大大小的丛书出版的。单就历史而言，关于《史记》的注解与考证就可以出一部大丛书。宋代、元代、明代的史料书，更是汗牛充栋，决不是一两部丛书所能包括得了的。其他，前代学者们未刊的著作，更不知有多少。今天把他们搜集起来，为他们延千百年的寿命，且化身千百，各地乃至各国都有机会读到，岂不是盛事！像宋代写本的《洪范政鉴》，孤帙单传，至今将近千年，不仅未有刻本，亦且未有其他传钞本。这书乃是“双鉴楼”傅增湘氏的“双鉴”之一“鉴”，由其后人捐献给政府的。作为一部“政治学”的参考书看，它是很重要的。为什么不急急地付印呢？

像这一类重“印”书，范围要广、要多，每类每门，各自成一丛书，只供专家们的参考，完全不必要推广，只是研究的或参考的资料而已。如古代的戏曲，重“印”成《古本戏曲丛刊》，如出齐了，就有一千六百多种。那些还只是以南北曲写成的戏本呢，如果包括地方戏的剧本在内数量要更多，更大了。不是搞中国戏曲史的，不是搞“戏改”或搞戏曲创作的人，要它何

用。一般的中国文艺研究者不必要完全读或看那末多的戏曲的。其它影印的大部丛书，其供给的对象也是如此的有限度。这只是把一部部地钞写，或者十部或几十部的打字或钞写油印，改为照相石印而已。不仅可以留真，省下繁重的校对力量，且也比较美观、省费，百部、二百部即可以印，三千、五千部也可以印，伸缩性很大。所以我主张，凡小量印行的内部参考资料式的专门性古书，都可以用这种办法重“印”，如果嫌每页照相重印纸张太费，则对于纯粹参考性质的书，像《皇明献征录》、《皇明经世文编》之类，可以用缩本《四部丛刊》或中华书局重印《图书集成》的办法，每四页或六页缩成一页印出，则大可以省功、省料。不过，要精读的书，像《农政全书》之类，或版本十分精良的书，像明弘治刻本《西厢记》，宋蜀刻本《陈后山集》之类，就不能用这个办法，而应该用《古本戏曲丛刊》或《四部丛刊》的式样重“印”了。

凡需要量比较大，而且应该加以重新整理，甚至必须加以新注、新解的古书，像《十三经》，《二十四史》之类，则我们得集中些专家们组织专门的编辑委员会，分别进行整理工作，俾能于几年或十几年之内，有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十三经》、《二十四史》出版。在这方面，说来话长，拟写专文论之，这里不多谈了。

也还有不少重要的古书，需要有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新版本的。所谓“新版本”，必须具备的条件是：（一）最近于原本的面貌，校勘精确，力求没有错字。（二）加以分段及标点。远在汉代，“章句”之学就是很重要的了。（三）附索引及其他必要的附录；还有比较详明的序言，这序言，的确是出于专家的手笔，不是草率敷衍的。如果有新的注解，那末，更是一部专门的新著了。

重“印”的专门化的内部参考资料，搜罗得要广、要备。重要的必需的一般参考书，校印得要精审，要使读者们检阅便利。主要的“读本”一类的书或最常被阅读的文艺书，更要有精良的“新版本”。总之，专门的丛书要多种多样，以完备不漏为主。重要的一般的古书，选择得要精，要严，以版本精良为主。又，“选本”的作用最大。用新的眼光来选古诗文，是有必要的，对于一般读者们是最有益处的。新的“选本”和新的“版本”的印行，同是今日当务之急。

第四辑 序·跋

中国短篇小说集序

我们一讲起中国的短篇小说，便须对于“短篇小说”的意义先考察一下。

短篇小说有广狭两种意义。就广义言之，则凡一切古代至近代的短篇的故事，都可谓之“短篇小说”。就狭义言之，则只有近代新发生的一种具有特殊体裁的短篇文字，才可适用这个名称；凡一切古代的，非那种特殊体裁的短篇作品，都不能算是“短篇小说”。美国的伟大的短篇小说作家爱伦坡（Edgar Allen Poe）说：短篇小说是一篇用散文写的叙述文字，“我们读之，只需半点至一点或两点钟的工夫的。”这个定义便是广义的。如中国唐代作家所作的《南柯太守传》、《霍小玉传》等，以及《京本通俗小说》、《剪灯新话》、《今古奇观》、《聊斋志异》等书中的全部故事，如阿剌伯的《一千零一夜》中无数的故事，如意大利鲍卡西奥（Boccaccio）所著的《十日谈》（Ten Days Entertainment）中的一百篇故事等等，都可在这个广义的定义之下，称之为“短篇小说”。

赫密尔顿（Clayton Hamilton）在他的《小说法程》（Materials and Methods of Fiction）里，也曾把短篇小说下了一个定义。他说：

The aim of a short story is to produce a single narrative effect with the greatest economy of means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utmost emphasis. 见原书第一百七十七页。

（译意：短篇小说的目的是要用最经济的手段，连结着最有力的文情，以发生一个单纯的叙述文的感应的。）

这个定义便是狭义的。在这个定义里，有几点需要说明。第一，所谓“单纯的叙述文感应”，盖指：短篇小说虽包含动作、人物、环境之要素，而常重其一而轻其二；有时其目的在发生动作感应，有时其目的在发生人物感应，有时其目的却在发生环境感应。作者及读者的注意力常都集中于一个要素上。第二，所谓“最经济的手段”，盖指：短篇小说应删尽一切繁文枝词，使它的文辞节省至无可再节省的地位。两个人物在文中已足用，便不必再加进第三个，一事实已足用，便只须叙此一事。第三，所谓“连结着最有力的文情”，盖指：短篇小说虽须以最经济的手段写之，却又不可因文辞太节省之故而使它的感动力减低。如文中原写两个人物，如欲使它更有力而再添写一个人物时，却又不可拘于“经济”的见解而不去添写。正如爱伦坡所说的：简而不当，与长而不当是同样的不对的。这就是“最经济的手段”必须“连结着最有力的文情”之故。

照这个定义看来，则短篇小说的性质与通常的简短的故事完全不同。简短的故事是一幅仅具轮廓的图画，是一幅缩小的地图，可以添绘放大的；短篇小说却是一幅虽短小而完美的山水画，不能再添一笔，也不能再缩小一点的。它又像古拙的盆松，虽矮小而有凌霄的气概，决不能——也不必——再用什么手段把它增高增大的。照这个定义，则无论中国的无数短篇作品，无论《一千零一夜》及《十日谈》中的许多故事，都很难当此“短篇小说”的称谓。包尔文教授（Professor Balwin）说：《十日谈》中的百篇故事，以近代批评眼光论之，仅有二篇足以称为短篇小说的。据我们的臆测，则在中国的无数的短篇故事里，恐平均百篇之中更难有二篇足以当现代的所谓短篇小

说之称号的。因为无数的中国的短篇故事，大概都要算作长篇小说的缩短的东西；他们差不多都是一个长故事的节略；我们很容易把他衍放成很大一部长小说或长剧本的。如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汤显祖可以将他衍放成四十出那么长的《南柯记》，薛调的《无双传》，陆采也可以将他衍放成四十出那么长的《明珠记》。至于近代的莫泊桑、柴霍甫诸短篇小说作家的作品，却决不能照那么样的方法把他衍放成什么更长更大部的东西。所以，我们如果用狭义的短篇小说定义来衡量中国的短篇故事，则我们很怀疑，在“中国的短篇小说”这个名词之下，究竟能否集有十篇以上的作品。

本书所选集的中国短篇小说，乃是根据于短篇小说的广义的定义而选集的。因此，所选的便不免较多。我们所持以选集这些短篇故事的标准是如此：第一，自然以那些故事本身的文艺价值为断；第二，由那些故事中，可以略略的窥见某时代社会生活的一斑，而故事的文艺价值也并不十分差的，也将入选，这些材料是我们在史书上，在典雅的诗、古文词上，在文人的无量数的别的作品上最不易看到的；第三，有许多中国的短篇故事，是后来著名的剧本、小说以及民间故事的渊源。我们如果不知道那些故事，便不能充分的了解以后的许多剧本，小说以及民间故事。这正如我们不明白希腊神话便不能读欧洲诸国的文艺一样。所以这类的故事，我们选录得特多，唐人所作的故事，以这一类的为最多。白行简的《李娃传》，是元人杂剧《曲江池》的题材的渊源，也是明人传奇《绣襦记》及无数的民间小说、唱本、剧本中的李亚仙、郑元和的故事的渊源。陈鸿的《长恨歌传》，是白朴的《梧桐雨》、洪升的《长生殿》的渊源。李朝威的《柳毅传》是尚仲贤的《柳毅传书》、李渔的《蜃中楼》的渊源。此外，不能一一枚举。

然第二、第三的选集标准虽使本书取材不免稍宽，编者却不欲因此而选及内容太卑下、文辞太粗鄙的作品。总之，本书所选的东西，自信不至于有很多的无聊的干枯的作品。

中国之有短篇小说，中国人之著意于作短篇小说，乃始自唐之时。许多人都说，在唐以前，我们已有了短篇小说，如《列子》中的“愚公移山”及《搜神记》、《世说新语》中的数则较长的文字之类，然他们不是太零碎、太无故事的意味，便是整片的论文中的一节，不能独立取出而称之为短篇小说。所以本集所选录的作品，始于唐；唐以前的文字，概不选入。

自唐以后，我们中国的短篇小说，可分为二大系：第一系，是“传奇系”；第二系，是“平话系”。传奇系创始于唐，其流派极多且杂。由唐之《古镜记》、《玄怪录》等等，宋之《江淮异人录》、《稽神录》等等，明之《剪灯新话》等等，以迄清之《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现代林氏之《技击余闻》等等，千馀年间，其作家未尝中绝过，可谓极盛！平话系创始于宋；十数年前发见的《京本通俗小说》残本，便是这一系的元祖。此后明人及清初人作此者不少，选本也甚多，传于今者尚有《醒世恒言》、《拍案惊奇》、《醉醒石》、《石点头》、《今古奇闻》、《今古奇观》等数种。此系到了清之乾、嘉间，作者却似已中绝。《今古奇闻》二十二卷《林蕊香行权计全节》里，虽有“庚申发逆之乱”的话，或有人疑其为咸、同间人所作，然此一卷的文字体裁，与上面的二十一卷完全不同，实是一篇传奇系的作品而误被后人窜入者。至于平话系的小说所以没有传奇系之盛，且作者至清中叶而忽中绝者，其原因不外二端：一，平话系的作品不易作，且系用白话作的，古文家之流，不能做，也不屑去做；二，当时在上者以其淫秽，曾禁止其印

售。

平话系与传奇系的作品，最显明的区别，便是前者以民间日常所口说的语言写的，后者是以典雅的古文或章文写的。平话系的作者在开篇每先写一段引子，或用诗词，或用相类或用相反的故事一二则，然后才入正文。如《通俗小说》中的《碾玉观音》，先引许多春词，然后才叙韩蕲王游春，才叙秀秀养娘进王府。又如《今古奇闻》中的《脱网罗险遭医师屠割》，先论一段庸医之误人，又引一段医师误诊未婚女为有孕而被病家所殴打的趣事，然后才叙一个凶险的医生的故事的正文。传奇系的作品，则不用此种引子。这是二者不同的又一点。

选平话系的作品易而选传奇系的作品难。因平话系的作品不很多，而传奇系的小说集则不可胜数，不独遍读为难，即搜集也决难完备。本书所选传奇系小说的范围，以编者个人所见的书为限。难免有不少很好的作品被遗落了而未入选。这是要请读者原谅而且指教的。

本书受鲁迅先生的帮助与指导不少，特此致谢！

编者，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中国短篇小说集》第一集，一九二八年四月）

中国短篇小说集第一集序言

这一集所选的短篇小说，都是唐代人所作的。有的相传为唐代人所作的作品，如托名为韩偓作的《开山记》、《迷楼记》，而实乃北宋人所作之类，俱不选入本集。

唐人小说，在文艺上的价值很高，有几篇如《南柯太守传》、《霍小玉传》之类，其叙写的绵密美丽，其题材之宛曲感人，俱为唐以前所未有、唐以后所少有者。后来的许多小说、剧本——尤其是剧本——都喜把他们取来作为题材。我们读了这一册内所选的短篇作品，不仅感受得他们的本身的文艺价值，且可以知道许多元、明人的戏曲或小说的“本事”。

唐人小说，通常分为左别的四类：

一、别传（即史书所不载的轶事）遗闻，如《李卫公别传》、《东城老父传》、《长恨歌传》、《太真外传》、《高力士传》等。

二、恋爱的小说，如《霍小玉传》、《柳氏传》、《会真记》、《李娃传》之类。

三、剑侠的故事，如《虬髯客传》、《红线传》、《昆仑奴传》、《聂隐娘传》之类。

四、神怪的故事，如《南柯记》、《元无有》、《枕中记》、《东阳夜怪录》、《杜子春传》、《灵应传》之类。

本集所选者，大约都可包括于这四类的大题目之下。第一类的“别传”，有文艺的价值的极少，本册只选了二三篇，如《李卫公别传》之类，毫没有可使人感动的地方的作品，都割舍了。第二类的恋爱小说，是最可爱的；差不多所有较好的，本集都已收入了。第三类的剑侠故事，叙写得活跃的作品也不少。第四类的神怪故事，太多了，本集不能收集得许多，只拣了最好的几篇选入。

唐人小说，开始于《古镜记》及《白猿传》，然直至天宝之后，作者始盛。如著名的“传奇”作者元稹、白行简、陈鸿、李公佐、蒋防、沈亚之、沈既济、牛僧孺等，都是生在元和、会昌前后的。最后的作者则有裴铏、杜光庭等。

唐人小说所以至唐的后半期才盛者，其原因不外二端：第一，以前的人颇看不起做小说一类的人，稍有声望的人都不屑去做这一类的东西，然至天宝以后，文坛风尚却大变了。牛僧孺既以居高位而喜作小说，韩愈、柳宗元、元稹之流的大作家也开始去作《毛颖传》、《蚺传》一类的小品文字及《会真记》一类的小说，于是当时成为风气。作者每喜著笔写幽怪、恋情或豪侠的故事，以相传诵，于是小说作家便盛极一时。第二，开元、天宝的故事，流传民间者，多为人所艳称、所乐闻，于是文人便载笔以记之。当时藩镇专横，官吏贪虐，刺客亦多。于是国法之所不能制裁者，便有人希望能有一种来去无踪的剑侠以制裁之。这便是剑侠故事的创造的大原因。又那时选举不公，文士多不平之气，于是《南柯太守传》、《枕中记》一类的鄙夷仕宦富贵的小说以及《灵应传》一类的叙述第二世界的荣华显赫的作品，便应运而生。

唐人小说，大都为《太平广记》、《唐代丛书》、《龙威秘书》、《古今逸史》所采录。《唐代丛书》诸书，谬误极多，惟《太平广记》成于北宋人之手，最为可靠，故本书所选，大都依据于《广记》。

编者，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中国短篇小说集》第一集，一九二八年四月）

中国短篇小说集第二集序言

这一集选录自宋初至明末的短篇故事。

在这一个时期内，平话系的小说突然的兴起，叙写的逼真与宛曲，皆为传奇系作家所不及。然在同时，传奇系的作品也出产不少。现在将本册分为上下两部，上部载传奇系的作品，下部载平话系的作品。

传奇系的作家，在宋初尚有几个，如乐史，如秦醇，他们都是追踪于陈鸿、白行简、李公佐之后，以叙述奇踪艳闻为务。无名氏的《海山记》及《梅妃传》，也并不弱于《长恨歌传》之类的作品。然叙剑侠故事的作品，却没有唐代之盛，叙怪异故事的作品，也干枯丑陋，无复有《南柯太守传》诸作之清隽可爱。到了后来，“随笔”之作极盛，而“传奇”反为萧索。南宋之时，郭彖作《睽车志》，洪迈作《夷坚志》，篇幅甚多，而叙载琐屑，直无一篇是有情致的作品。只有无名氏的《李师师传》写得很有趣。自元至明，好的作者更不多，瞿佑、李祯虽盛为当时所称，然佳作却殊少。只有祯的《鸾鸾传》，结局能超脱于寻常的“团圆”之定则，尚可读之不至生厌。马中锡的《中山狼传》，是一篇很有趣的寓言，叙写的手段也不坏，在此时是不易得的作品。

因为这一期传奇系作品的贫乏，所以选录得不多。凡是琐屑的“笔记”中的文字，大多数不录，仅仅录了较好的几则，如张齐贤的《白万州遇刺客》（《洛阳搢绅旧闻记》）、洪迈的《侠妇人》（《夷坚志》）等以为例。

因为这一期传奇系作品的贫乏，所以虽文辞不见得十分可爱，而材料却是后来有名传说的起源的，如曾巩的《杂识》（叙狄青事），张邦几的《王魁》（叙王魁负桂英事），洪迈的《猪精》（叙岳飞事）等也都选录进去。

这一期的短篇作品，所可夸耀者乃是平话系的作品。平话系的作品，在北宋时才产生。他们与传奇系的作品，有几点大不同的所在。第一，传奇系作品，好用典雅的文句，到了瞿佑一流的作品，简直每个人物一开口便是骈俪之气逼人，而平话系的作品则一洗此习，完全以清莹流顺的口语文来叙写，每个人物的说话，差不多都是逼肖的。第二，传奇系的作品，所取的材料大都是“贵族”，不然便是“神怪”，便是“侠客”。但平话系的取材，则差不多完全是取之于民间的，取之于市井的。他们的人物都是平平常常的人物。便是叙写鬼怪，也是近于人情的。第三，我们在传奇系作品中，几看不出作者的个性、时代及地域，在平话系的作品中，却可清清楚楚的看出人物的个性、时代与环境来。这于历史家也是极有用处的。

平话系作品的元祖，就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是《京本通俗小说》，以后《永乐大典》中亦采录甚多，可见宋、元时平话作者不少。明之初年及中叶，未见有什么这一类的作家。到了末叶，却有一个大作家冯梦龙出来，编纂“三言”，大畅这个平话系的流派。当时作者受其影响很深，如即空观主人，如古狂生，如天然痴叟，都步于其后而有所继作。惟他们所作的，与宋人的平话，却已有个不同。这便是：宋人的平话，大都是“为说故事而说故事”的态度，冯梦龙他们所作的，却已带了很浓厚的道德色彩，变了“为教训而说故事”了。但他们所作，也并不完全是教训的，有时也叙写些“无关道德”的有趣的故事，如《唐解元玩世出奇》之类。平话系作品，现在尚流传于世的，自宋至明，有下列的几种：

（一）《京本通俗小说》不知作者，大约是“说话人”的底本吧。今所

传者为残本，自卷十至卷十六，凡存七卷，共有七篇小说，即：

- 卷十 碾玉观音
- 卷十一 菩萨蛮
- 卷十二 西山一窟鬼
- 卷十三 志诚张主管
- 卷十四 拗相公
- 卷十五 错斩崔宁
- 卷十六 冯玉梅团圆

尚有《金主亮荒淫》一种亦为《京本通俗小说》中所有，而《烟画东堂小品》所刊《通俗小说残本》不收，另有长沙叶氏的单刻本。故合计之，宋人平话之传于今者凡有八种。

(二)《喻世明言》为冯梦龙所编，今传本少见。《今古奇观》系选冯氏“三言”及《拍案惊奇》以成书者，共四十卷，每卷一篇，其中除选于《醒世恒言》的十一篇，选于《拍案惊奇》的十篇，及第三十回一篇未知所本外，其余十八篇，乃是《喻世明言》及《警世通言》之文。(《明言》文凡八篇)

(三)《警世通言》亦为冯梦龙作，今传本少见。有十篇被选于《今古奇观》中。王士禛言：“《警世通言》有《拗相公》一篇，述王安石罢相归金陵事，极快人意，乃因卢多逊谪岭南事而稍附益之。”《拗相公》是《京本通俗小说》中的一篇，乃亦见于《通言》，由此可知《通言》中必多旧作，未必全为梦龙所作。

(四)《醒世恒言》亦梦龙作，今尚存。凡四十卷，共三十九事。中有《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一篇，即《错斩崔宁》。可见《恒言》中亦不全是梦龙的创作。《恒言》中的小说，曾被《今古奇观》选入十一篇，《今古奇闻》中亦选入四篇。

(五)《拍案惊奇》凡三十六卷，共收小说三十六卷。即空观主人的序说：“龙子犹(即梦龙)氏所辑《喻世》等书，颇存雅道，时著良规，复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观此，似此书亦为梦龙所著。然松禅老人在《今古奇观》的序上，却说：“即空观主人壶矢代兴，爰有《拍案惊奇》之刻。”可见此书实是即空观主人所自作的。此书被《今古奇观》选入七篇，其余二十九篇，曾被书贾加入《今古奇闻》中的一篇，改名为《续今古奇观》。

(六)《石点头》为天然痴叟作，共十四回，冯梦龙曾为之作序作评。今人曾把它改名为《五续今古奇观》。

(七)《醉醒石》为东鲁古狂生所作，共十五回。

以上七种是现在所知的。今皆每种录有一二篇或三四篇在本集中。至于明以后人所作的，如《今古奇闻》之类，这里不录，待选入第三集中。

平话系的作品，在初时，差不多都是叙写当时或近代的故事的，如《京本通俗小说》八篇中，有七篇是叙南宋之事的，只有一篇《拗相公》是叙北宋王安石事，然年代相去还不远。到了冯梦龙他们，便有叙春秋、汉、晋、唐、宋之故事的，如“伯牙碎琴”、“庄子劈棺”以及羊角哀的故事之类都是；也有将唐人传奇演衍成文的，如《李公穷邸遇侠客》之类都是。但究竟以叙当时事及近代事为多。大概，叙古事，叙写便不真切，叙时事，描状便活泼。故本集所选，都取其叙时事的。

平话系小说流传于世者，除《今古奇观》外，其他各书都不易得。本集

内所录的几篇，搜罗颇费些力。希望将来能有人将这些书陆续印出。

编者，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三日。

（《中国短篇小说集》第二集上册，一九二八年四月）

中国短篇小说集第二集下册序言

这一集的上册，选录宋至明末的短篇故事不少，但还有许多，因篇幅关系，不能容纳于那一册之内的，因再编成这一册。

传奇系的作品，在这时代实在是贫乏得可怜。在上一册里，我们还看见《梅妃传》、《李师师外传》、《中山狼传》等几篇较好的作品，然而已不能与本书第一集内所选的唐人诸传奇相提并论了。到了选录这一册时，却连《梅妃传》、《中山狼传》那么样完整的作品也没有了。所有的，除了《三山福地记》、《阿留传》、《辽阳海神记》以外，都不过是琐杂的“笔记”中的一鳞一爪而已。这些极简单的仅具有故事的雏形的东西，他们的本身，原没有什么价值，其价值乃在于下面的二点：

- 一、是后来的传奇杂剧或小说的题材的来源；
- 二、对于后来的作家曾给与不少的影响与暗示。

关于第一点，如《韩湘子》，如《陆务观》诸篇都是；关于第二点，如《王榭》，如《浮梁张令》，如《王泰》诸篇，后来的作品，受其影响与暗示不少，像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便有好几篇是受到这样的影响的。《梁太祖》、《韩魏公》诸篇写得虽像是散漫，却很有描写力，能使被写的人物栩栩如生现在纸上。

这是编者于上册所选录者外，再选录这十几篇的原因。

然而“这一期的短篇作品，所可夸耀者，乃是平话系的作品”。上册里已经选载了十余篇，但是编者总觉得太少。所以这里又选载了九篇。这九篇的来源，除了《京本通俗小说》、《醒世恒言》、《拍案惊奇》、《石点头》、《醉醒石》诸书，上册里已经有选录者外，尚有《西湖二集》，为上册里所未及收及者。

《西湖二集》凡三十四卷，附《西湖秋色》一百韵，周清原著。以所叙者皆为关于西湖之故事，故谓之“西湖二集”。而谓之“二集”者，想当更有初集，然今绝不可得见。每卷载故事一篇，凡得三十四篇，皆平话系之作品也。清原，武林人，自号济川子，其名未详。生于明之末叶。大约生平殊困厄。尝自谓：“败壁颓垣，星月穿漏，雪霰纷飞，几案为湿。盖原宪之桑枢，范丹之尘釜，交集于一身。予亦甘之。而所最不甘者，则司命之厄我过甚，而狐鼠之侮我无端。予是以望苍天而兴叹，抚龙泉而狂叫者也。”（见《湖海士序》）所以他在这部《西湖二集》上颇多愤慨不平之言。这部书传本殊少见，今录其三篇，可见一斑。

《江东老蟬》序《醉醒石》，谓：“大凡小说之作，可以见当时之制度焉，可以覘风俗之纯薄焉，可以见物价之低昂焉，可以见人心之诡譎焉。于此演说果报，决断是非，挽几希之仁心，断无聊之妄念，场前巷底，妇孺皆知，不较九流为有益乎！”这都是说小说之实际上的功效的，未免带了太多的功利主义的色彩。但即就这些功效而言，也只有平话系的小说，才能有此，传奇系的作品却不足以预于这个荣誉。我们见到的传奇系的作品，差不多都是空想的产物，毫无时代性的文字，汉、晋人之所作，与唐、宋人之所作，相差未远，唐、宋人之所作，与元、明、清人之所作，亦相差未远。我们所能于其中见“当时之制度，覘风俗之纯薄，物价之低昂，人心之诡譎”者，乃仅可在平话系作品中求之；而作者之能使“场前巷底妇孺皆知”者，亦仅平话系之作品有此魔力而已。

《碾玉观音》中之叙南宋军阀的威势，叙贵人家中收用养娘之制度，《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之叙明时的丐头制度等等，皆为一切史书中所绝无的材料，而却正是编辑社会史的人所最需要的东西。姑举一二例，此外可知。

传奇系的作品，大多数只有叙述而没有描写，能如《霍小玉传》之有深刻的描写力者极不多见。平话系的作品，则专以描写见长，已具有近代的小说的作风，不管他叙的是山精海怪，幽灵狐魅，不管他写的是空想的神仙故事，怪诞的民间传闻，而总有一种活泼泼的生气，不知不觉的会把这些邪神妖鬼，故事传闻，都人格化了，人情化了，写得他入情入理，不殊于人世上日常所见的事，所见的人。而其描写人间的世态人情，尤为真气逼人。试举本册里的几篇故事为例，《滕大尹鬼断家私》中的滕善继夫妇的霸产的心理，写得如何的好，《灌园叟晚逢仙女》中之张委的横行，《惟内惟货两存私》中之魏进士与他的妻之不同的心思的对照，《陶家翁大雨留宾》中之蒋震卿的得妻，又写得如何的真切而近情。

许许多多的长篇小说、长篇传奇都叙的是：某生某女的会合，如何的奇巧。小姐私奔，虽暂为奸人所欺，而终于是“佳人才子的重圆”。这里，在《陶家翁大雨留宾》里，却把这个打不破的惯例打破了，私奔的小姐却终于跟随了误认的“才子”而去。

许许多多的长篇小说、长篇传奇，都写的是：佳人才子的恋爱的始终，其中必有如何的波折，必有严父的阻挠，必有如何的奸人从中播弄，必有一场兵灾人祸，把他们生生的拆散了。这里，在《吹凤箫女诱东墙》里，却又把这个打不破的惯例打破了。作者写潘用中与杏春小姐的相恋，如何的近情在理，再看那些空想的做作的传奇小说来，真如粪土。它那里没有奸人，没有兵祸，没有心肠冰冷如铁的父母，只淡淡的写来，却已足动人。

无论他们的题材是如何的空想、怪诞，然如像那末逼真的近情在理的叙写，在中国一般小说中已是不容易得到的了。

本集二册中，所选的不过一隅而已。将来有机会，很想能一部部的将他们介绍给大家。

编者，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

（《中国短篇小说集》第二集下册，一九二八年四月）

中国短篇小说集第三集上册序言

本集所选的，都为近代的作品，自清之初叶起，到了民国之初年为止。在这个时代，传奇系的作品，是多至不可胜数；自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开其端，继其后者无虑百数十家。如袁枚之《新齐谐》、沈起凤之《谐铎》、和邦额之《夜谭随录》、纪昀之《阅微草堂笔记五种》、乐钧之《耳食录》、王韬之《遁窟谏言》、《淞隐漫录》、宣鼎之《夜雨秋灯录》、俞樾之《右台仙馆笔记》是其中最有名者，然或者琐屑过甚，不能成一篇完全之故事，或者故为简练，读之毫无情意，或者借述于狐鬼之行动，而悬教训之旨，有类于寓言，或者极力模仿唐人传奇，欲以诡异之恋情及侠义行动见长；然求其足成为首尾完整，有情有节的故事者，却不易多觐；惟《聊斋志异》尚有几篇着意经营之作，如《婴宁》，如《马介甫》，如《竹青》，都可算为清代无量数的短篇杂记中的杰作。他们不仅是一篇结构完美的故事，而且也叙写得十分真切动人；虽然情节不能免于诡异，而主人翁之性格却很活泼，世态人情，亦写得曲折尽致。如《婴宁》之类，实可上比肩于唐人之名作《霍小玉传》之类，虽然他们的情调之间是很不相同的。像《婴宁》那样的轻盈巧笑的喜剧的作品，在中国短篇故事中真是不容易见得到的东西。《阅微草堂笔记》虽负盛名，而琐细已甚，简练太过，且篇篇都是大发议论的结局，屡欲选入几篇，而实无可选。这些东西，乃非完整的故事，而为一种“寓言”或小记事。论者每以他们足以与晋六朝人的《搜神记》诸作相颉颃许之，实则，这种回复到远古去的作品，在现在看来，却是不足取的。其不足取，正如现在去拟作像《诗经》那样格式的四言诗，或像《尚书》那样的拙奥的古文似的。

当清之初叶，在《聊斋志异》之前，却也有几篇好的传奇系的作品，他们却不似《聊斋志异》之类之会集为一书，乃是散篇的；有张潮者，曾把这些东西集为《虞初新志》一书，其中如吴伟业的《柳敬亭传》、无名氏的《小青传》等，却都是很坏的东西。在明、清之交，全个中国沦没入残酷无比的流寇与异族的劫略中，当然是会产生不少好的记载与故事出来的。

平话系的作品，在这时却衰微已甚。平话集之出版于此时者仅有下列三部：

（一）《十二楼》这是李渔所作的，亦名为《觉世名言》，题觉道人编，实则觉道人乃李渔之笔名。其中共有故事十二篇，大约都是他自己所作的，不像冯梦龙的“三言”，乃多收古代作品也。这些故事，每一篇都是与“楼”有关系的，故谓之十二楼。哪十二楼？即：

闻过楼	三与楼
十叠楼	鹤归楼
生我楼	夏宜楼
拂云楼	夺锦楼
奉先楼	合影楼
萃雅楼	归正楼

其中之大病，乃在好发教训之言，然偶然亦有很新鲜的见解，很僻怪的议论，一望而知其为作《一家言》及《十种曲》的笠翁之所说。

这个短篇集，刊于清初，有顺治戊戌序。

（二）《今古奇闻》这是光绪十三年上海东璧山房刊行的。据王寅（字

冶梅)的序说,这个集子乃是他由日本带回来翻刻的。然其中不尽为平话系的作品,如第二十二卷之《林蕊香行权计全节》乃完全是传奇系的文字。又杂有“三言”之文不少,如卷一之《张淑儿巧智脱杨生》,卷二之《刘小官雌雄兄弟》,卷六之《陈多寿生死夫妻》,卷十八之《十五贯戏言成巧祸》,皆为选自《醒世恒言》者。又卷十之《梅屿恨迹》,乃为选自《西湖佳话》者。大约是:王寅自日本得到“三言”的残本,为之改编了一过,而又补上几篇,如咸、同间之作品《林蕊香行权计全节》等而刊行者;不然,即日本当清之中叶,原有如此的一个选本,而王寅则为之补上了最后一篇(即《林蕊香》)者。故卷首题着“东壁山房主人编次”。

(三)《西湖佳话》这部书作于清康熙间,与《西湖二集》相类,亦为专叙关于西湖的故事者。全书凡十六卷,包含十六篇故事,每卷一篇,即:

葛岭仙迹	白堤政迹
六桥才迹	灵隐诗迹
孤山隐迹	西泠韵迹
岳坟忠迹	三台梦迹
南屏醉迹	虎溪笑迹
断桥情迹	钱塘霸迹
三生石迹	梅屿恨迹
雷峰怪迹	放生善迹

这部书的作者,自署为古吴墨浪子,未知其真姓名。有的时候,他把他的故事写得很活跃,有的时候却很干涩。他的文笔也很可怪,不是如“三言”及《十二楼》、《西湖二集》一样的流利的语体文,乃是另一种的夹杂了不少古文的句调的语体文,很像《三国演义》,也许比它更文。

在清之末叶及民国的初元,又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也产生了不少的好的短篇作品。待下册再选入。

本集所选,与上面几集一样,其中有不少是民间流行之故事及小说、剧本的主源。如《李姬传》及《柳敬亭传》曾为孔尚任的剧本《桃花扇》的故事来源,《小青传》乃为吴炳的传奇《疗妒羹》的故事来源,《雷峰怪迹》亦为白蛇故事之最初形式,为读《白蛇传》传奇及《义妖传》弹词者所不可不参考者。此外,如《圆圆传》亦为陆次云的剧本《升平乐》(亦名《圆圆曲》)之本事,《补张灵崔莹合传》为《十美图》及《乞食图》的本事,《大力将军》及《雪遘》亦为蒋士铨之传奇《雪中人》的本事。读了这些短篇故事,便亦可知道了不少民间及文艺界最流行的故事了。

编者,一九二六年九月八日。

(《中国短篇小说集》第三集上册,一九二八年四月)

《北平笺谱》序

诗笺之作由来已久，迨明季胡曰从《十竹斋笺谱》出，精工富丽，备具众美，中国雕版彩画至是叹为观止。李克恭序云：“昭代自嘉隆以前，笺制朴拙，至万历中年，稍尚鲜华，然未盛也，至中晚而称盛矣，历天崇而愈盛矣。”就今传明人简牍之用笺观之，足证斯言之不谬。清初陈洪绶、萧云从主持画坛，《离骚图》、《博古页子》传刻遍天下，八口之家至赖以举火。时工之著者有黄子立、鲍承勋等，皆以镂象世其家。康乾之际，盛况犹昔，世传成亲王笺，秀丽不减胡氏。嘉道以还始渐衰。同光之时尤为零落，光绪末，北京画师李钟豫、刘锡玲、朱良材、王振声辈尝为肆人作笺，意在谐俗，乃坠恶道。至宣统中，林琴南先生独取玉田梦窗词意制为山水笺，情趣盎然，文人为笺作画殆始于此。民国初元，陈师曾先生为墨盒作画稿，镌成，试拓以墨，付淳菁阁制笺，乃别饶奇趣，后续成诗笺万千幅，无不佳妙，抒写性情，随笔点染，虽小景短笺，意态无穷，于十竹斋、萝轩外，盖别辟一境矣。姚茫父先生继之作唐画砖笺、西域古迹笺，虽仅仿古，不同创作，然亦开后来一大派。时六龄童子陈福丁信手涂抹，独见天真，亦得付之匠氏，足征作笺之事，颇亦为时人所歆羡矣。近十馀年，作者辈出，齐白石、吴待秋、陈半丁、王梦白、溥心畲诸君子，均高雅不群，惟制笺固以画稿为主，刊印亦贵精良。李克恭云：“笺板有三难，画须大雅，又入时眸，为此中第一义；其次则镌忌剽轻，尤嫌痴钝，易失本稿之神；又次则印拘成法，不悟心裁，恐损天然之韵。去其三疵，备乎众美而后大巧出焉。”近代刻笺名手首推山西张启和，居琉璃厂西门，陈、姚诸作皆出其手。张氏既逝，继起者有张东山、杨华庭等皆能不失本稿神采，而刷印之工亦足以副之，众美亦已备乎。然盛极则难为继。今厂肆已有弃其成法，投合时好者。尝见松古斋为西人制笺，纸劣工粗，墨浮色涩，林陈之风荡然。又见豹文斋复刻黄瘦瓢人物笺，草率尤甚。清秘阁尝仿刻十竹斋数笺，丰韵十去其六，然规模固在也，近得其新印者则板片错乱，色泽不匀，是并刷印之工亦不可恃矣。意者刻笺之业其将随此古城之荒芜而销歇乎！鲁迅先生于木刻画夙具倡导之心，而于诗笺之衰颓，尤与余同有眷恋顾惜之意，尝数与余言之，因有辑印《北平笺谱》之议，自九月始工，迄十二月竣事，其间商榷体例、访求笺样，亦颇费苦辛。入选者凡三百四十幅，区为六册，首仿古诸笺纪所始也；次戴伯和、李伯霖、李钟豫、王振声、刘锡玲及李瑞清、林琴南诸氏所作，迹光、宣时代之演变也；次陈衡恪、金城、姚华之作；次齐璜、王云、陈年、溥儒、吴徵、萧、江采、马晋诸氏之作，征当代文人画之流别也。而以吴汤等二十家梅花笺、王齐等数家壬申笺、癸酉笺殿焉。今日所见之诗笺，盖略备于兹矣。谭中国版画史者或亦有所取乎。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长乐郑振铎序。

（《北平笺谱》，鲁迅、郑振铎编，荣宝斋，1933年）

元人小令集序

陈乃乾先生曾将张祿《词林摘艳》里的一卷《南北小令》，重刊单行本，有功于元曲研究者不浅。现在又加入了许多材料，将那一卷的东西扩充许多倍，成为现在式样的《元人小令集》。这更使我们爱读元人散曲的兴奋而且欢喜。

元剧的研究，明万历间已很热闹了。臧氏百种曲外，选刊元曲的不下七八家。独有元人散曲，则染指者寥寥。山东李中麓家藏词曲最富，号称词山曲海，然他所刊行的，不过乔、张二家的小令罢了。清人于词最为致力，而于曲很少措意。《四库总目》仅列乔、张二家于存目。朱竹垞、厉樊榭是精工此道的，也不曾做过辑录的工作。乾隆间，曾刊小令数种，在竹垞《叶儿乐府》、樊榭散曲、板桥《道情》之外，仍只录了乔、张二家的小令。姚梅伯《今乐府选》，录书较多，然而此选迄未流传于世。

清末，词学盛到了极点，王氏四印斋、吴氏双照楼、朱氏彊村，莫不以刊布宋、元词人的著作为职志。而散曲则寂寂无闻。

吴瞿安先生是第一位着手收集元、明以来的散曲的；颇有意于流布曲集。《奢摩他室曲丛》方始印行，而涵芬楼的巨劫突来。善本精刊，一时扫地以尽。吴氏书亦多波及，致吴氏有“曲者不祥之物也”之叹。

然当宋、元词的研究不能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之时，学人们的转而趋向于散曲的探讨，乃是必然的现象。

友人任中敏、卢冀野二先生于此最为致力。中敏的《散曲丛刊》，实集十馀年来散曲研究的大成。

现在距中敏结集之时，又六七年了。在这六七年间，奇书异本，日出无穷，多有中敏当时所未见者。《吴骚合集》、《吴歆萃雅》、《雍熙乐府》之类，已成为易得之书；而《吴骚集》、《吴骚二集》、《南音三籁》、《乐府群珠》，以及元、明人诸专集，亦渐为我们所得到。

现在的研讨元人散曲，实有点像王、吴、朱诸氏竞刊词集时候的情形。

乃乾此书在这个时候出现，正足鼓励同道者，唤起他们不少的勇气。年来颇有辑集元、明以来散曲的心愿，只因搜罗未备，未敢问世。乃乾乃先获我心，成此巨著。读之，能不汗颜乎？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郑振铎序。

（《元人小令集》，一九六二年十二月）

中国小说史料序

研究中国小说的方向，不外“史”的探讨与“内容”的考索。但在开始研究的时候，必须先打定了一种基础；那便是关于小说本身的种种版本的与故事的变迁。不明白这种版本的与故事的变迁，对于小说之“史”的及内容的探讨上是有多少的不方便与不正确的。记得有人论《水浒传》的社会，而所据的版本，却是金圣叹腰斩的七十回本，于是便纵谈到“作者”为什么要把卢俊义的梦境作为结束的原因。这岂不是“一着错全盘都错”了么？又有人真的相信陈忱的《后水浒传》乃是明人作的，因为“序”上有万历字样，又有人相信它是元人的东西，因为首页的中缝，有“元人遗本”四字。这岂不是颠倒了历史的事实了么？所以“版本”“目录”的研究，虽不就是“学问”的本身，却是弄“学问”的门径。未有升堂入室而不由门循径者，也未有研究某种学问而不明瞭关于某种学问的书籍之“目录”“版本”的。而于初学者，这种“版本”“目录”，尤为导路之南针，照迷的明灯。有了一部良好的关于某种学问的书籍目录，可以省掉许多人的暗中摸索之苦。我们都是经过了“摸索”的境界，吃尽了苦的，故对于“版本”“目录”的编著者，往往是抱着很大的敬意的。这一种为人而不为己的吃力的工作，略知学问的门径的人，都得拥护他们，帮忙他们，敬重他们。所以，关于某种专门学问的“目录”，较之摆起了“导师”之面目的什么“国学书目”之类的不伦不类的东西，自然是高明有用得多的。

而种种故事的变迁的研究，对于中国小说的探讨上，也有了很重要的价值。中国的小说，以讲史为最多，即非讲史，而所取的“题材”往往是“古已有之”的。在当代的日常生活里取材的实在是寥寥无几。故研究其故事的来源和变迁，也和“版本”“目录”之研究，有了同样的重要性。但可惜这一类的材料，零星散在诸家笔记里的最多。搜集起来，最为困难。蒋瑞藻氏的《小说考证》用力殊劬，而内容芜杂。鲁迅先生的《小说旧闻钞》取材最为可靠，但所收的“小说”不多。现在孔另境先生的这部《中国小说史料》，是就鲁迅先生的《旧闻钞》而加以扩充的。费了好几年的功夫，所得已不在少。可以省掉我们许许多多的翻书的时间。这是我们所不得不感谢他的。

在孙楷第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之后，继之以孔先生这类《中国小说史料》的出版，对于中国小说之版本的和故事的变迁的痕迹，我们已可以很明瞭的了。而初学者也可以不至有迷途之苦。想起了我们前从的暗中“摸索”之苦，实在不能不羡慕现在初学者们的幸运！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四日。

（《中国小说史料》，一九五七年五月）

晚清文选序

我编辑这部《晚清文选》曾用了很大的努力与耐心；一来是因为材料的不易得；二来也因为材料的过多过杂，选择起来觉得非常的困难。如果编一部《古代文选》或《唐宋文选》之类，那些材料却还比较容易找得到，且也还比较容易选取其精华。但《晚清文选》的材料却一桩桩都要自己下手去搜罗的；可以说是无所依傍的工作。在各个图书馆里，这一类的材料简直不大有。他们都不会注意这个最有关系的时代。几种清末的《续经世文编》、《经世文新编》以及《畜艾文编》之类，当然给我的帮助不少。可是多偏于一方面，未能见其全。同时，往往不注出处，有时无从知道其来源。而当时的定期刊物、秘密刊物是那样的多——特别是关于革命的文献——也令人有挂一漏万之感。要是仔细的“求全”“求备”下去，就再费个三五年的工夫也不容易编得成功。只好这样的“急就章”的编完它。盼望专门的收藏家们和学者们的指教或补充。“椎轮为大辂之始”，苟能因此引起大家对于这一时代的文献和文学的注意，则更完备的工作，“成功正不必自我”。

说起来有些痛心，如果东方图书馆不曾被日机烧掉的话，其中所储藏着的晚清作品颇多，尽足以作为我这部书的选材的基础。但如今一本本的书却都要以个人的力量去搜罗了！不知有多少个黄昏曾为了它而耗费在几家旧书之肆的摊头。就连旧书肆，对于这一类的较近代的作品，也很不注意；往往数日的搜访，所得不过三两部书而已。旧杂志尤为难得；像《民报》、《复报》之类，即悬重金以购之，也不见得立时有。即如马建忠的《适可斋记言记行》，前七八年还可得，今则已成绝无仅有的难得之物了。

这部从辛苦艰难里编成的东西，对于我格外觉得亲切；编成了之后，自己读了一遍，觉得这劳力并不白费！

我自己是重温了一遍转变期的中国的历史；对于读者们似也不无特别的作用，除了作为“文选”读之外。

我在《选文小记》（《中流》一卷四期）里曾经说起过：

这样的作着“选文”的工作时，不免时时有些感触。对于老维新党奋发有为、冒万难而不避、犯大不韪而不移的勇气，与乎老革命党的慷慨激昂、视死如生、掷头颅、喷热血以求得民族自由与解放的精神，我同样的佩服。对于魏源、马建忠、林纾、严复、梁启超们所做的介绍与启蒙的工作，我也同样的表示敬意。

但特别有所感的是：老维新党所做的工作，至今还有待于我们的继续，他们所说的话，至今还有一部分是有用；这可见我们这古老的国家，进步实在慢；而顽固的守旧势力，却是如何的伟大；而老革命党虽然推翻了满清政府，而民族解放的工作，却也还不曾告了结束；反之，外来的帝国主义的压迫，更日益加甚，民族的危机也一天天的加重、加深；读了他们在二三十年前所发表的愤激的鼓励民族精神的文章，真不禁还觉得并非过时之作。

所以，这一册里有许多文章，对于我们这一个时代，还是对症之药，并非泛泛的搜集名篇佳文的一部“文选”而已。

为了要从多方面的取材，有许多已不为人所注意的晚清文集、报章及定期刊物，便不得不广泛的检读一过。在那里面，我们真可以得到不少的好文章；这些好文章是久已随了“时代”的过去而几乎成了“过去”，而为读者们所忘记了的。

假如工作者有时为他自己的工作的成就所沉醉的话，我这时的心境便是如此。我读了一遍两遍。我觉得这工作对于我自己有益；我相信对于一般读者们也会有益。

阿英先生和吴文祺先生的帮助，我永远不会忘记。阿英先生收藏晚清的作品最多。很难得的《民报》全份、《国闻报汇编》、《黄帝魂》等等，都是从他家里搬来的。

所用的若干参考书，附目于《文库》的“月报”里。我希望有两三个图书馆对于这一类的有重要性的书籍能够尽量的搜罗、收藏，不要以其“不古”而弃之。

十月三十一日。

（《晚清文选》，一九三七年七月）

跋所藏散曲目

散曲自来无专目，有之自此目始。余喜收藏宋、元以来歌词剧本，因并及散曲焉。积二十年，以所得写为此目，不意竟成一帙，物集于所好，信不诬也。明人曲选，每杂糅剧曲清曲为一书，清代词集，亦往往附曲，故并录焉。数经丧乱，南北迁徙，道路之间，不免散佚。今藏于东区之图籍万数千册又陷于敌，闻已尽付一炬，凡此已佚之书，概不入目焉。方今倭人扰我中华，壮士舍生于炮林弹雨之中，老弱流离转徙于后方，时不免罹酷祸。余既未能驰驱于疆场之上，乃独坐斗室，一灯荧然，务此不急之事，诚自愧也。惟念积书盈屋，不乏孤本，所得既半烬于敌火，此未烬者且不知命在何时，不及今存一目，则一旦若荡为云烟，则并作者之姓氏亦将不可考知，不其有负先民著述之苦心乎？遂以数日之力，写定此目，并手自刷印十馀册分贻友好。炮火稍间，将复次第写印他目焉。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午夜，郑振铎跋。时繁星满天，机声正轧轧盈耳，惟祝卫国男儿健康无恙也。

（《救亡日报》，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十竹斋笺谱》跋

右《十竹斋笺谱》四册，重镌之工始于民国二十三年春末，告成于三十年夏六月，此七载中，大变迭起，百举皆废。余又南北迁徙卒卒鲜暇，故镌版之业作辍靡恒，盖因于资力者半，而人事之乖迁，亦居其半焉，然终于斯时得竟全功。丧乱之中，艰辛备尝，同好之士，初赞其议，而未能睹其成者，不只一人也。前尘回顾，悲忻交集，是乌能不纪数语以告世人，且有以慰亡友之灵也。初，鲁迅先生与余既辑印《北平笺谱》，余曰：“尝于马隅卿许见王孝慈所藏胡曰从《十竹斋笺谱》，乃我国木刻之精华，继此重镌，庶易流传，北平印工当能愉快胜任。”鲁迅先生力促其成。余北归，乃毅然托赵斐云先生假得孝慈藏本，付荣宝斋复印然。复印之工至为繁重，荣宝斋主人杨君初有难色，强之而后可。自复绘以至刷印之工，余曾目睹，故能语其层次：初按原谱复色分绘，就所绘者一一分刻然，犹是未拼成之板块也；印者乃对照原本逐色套印，浅深浓淡之间，毋苟毋忽，虽一丝一叶之微，罔不目注手追，惟恐失样，用力之重轻，色之缓急，意匠经营，有逾画家，印成持较原作，几可乱真。余乃信其必有成矣。时在岁暮，第一册竣事。适孝慈至平，遂以复本贻之，是为余与孝慈订交之始。未几，隅卿亦归，每次晤言必语及版画，而于《十竹斋笺谱》尤著意焉，即微疵点污，亦必指令矫改，以期尽善。斐云与徐森玉、魏建功、向觉明诸先生亦间有参议，友朋之乐，于斯为最。适余赴沪，持是册示鲁迅，赏览之余，喜如所期。然第二册付镌后，工未及半，燕云变色，隅卿讲学北大，猝死于讲坛之上，余亦匆匆南下，以困于资，无复有馀力及此，故镌工几致中辍，时时以是为言者，惟鲁迅先生一人耳。迨第二册印成，先生竟亦不及见矣。其后孝慈又故，遗书散出，此书幸归北平图书馆，可期永存。良友云亡，启馀无人，日处穷乡，心力俱瘁，竟无意于续镌矣。故都沦陷后，北望烟云，弥增凄感，原书何在，尚不可知，遑问其他。又逾年，忽发大愿，辑印《中国版画史》，必欲遂成诸亡友之志，拟续镌笺谱，收入画印图录之中，姑驰书斐云，询其踪迹，不意历劫竟存，且得斐云之助，第三册继付剞劂，迄今一载有半，全书毕工，征斐云之力不及。此固不只余之私衷感荷无既也。呜呼！此书虽澄，亦尝饱经世变，备历存歿之故矣！抑余重有感者，二十年来，余罗致版画书不下千种，于此书最为加意，几得复失者数数，初闻涉园陶氏有旧藏，比余询及，则已与他书归日本文求堂矣。为惆怅者久之，后见文求堂书目，此书尚在，飞函商购，得复谓已他售。盖托辞如是，欲自藏也。上海狄氏亦有此书，然不可见。闻某君购得一册，余意即一册亦佳，询以能否相让？则云：已售去。孝慈故后，此书又先为北平图书馆所得，缘慳如是，余更不作收藏想矣。终假孝慈珍本，复印毕工，慰情胜无，每自感悦，然此本中阙若干页，以无他本可补，姑置之。去冬徐贾绍樵竟于无意中为余获此书于淮城，书至之日，乐忘晨饥。尤可欣者，孝慈本中所阙诸页，此本则一一俱在，刊书将成，余亦得偿素愿，缘遇巧合有如此者。惟镌工已就，所阙者未能补入耳。他日痛饮黄龙，持书北上以与孝慈藏本相校勘，斐云其将何以贺余耶！补刻之举，当在彼时，云日、重昭此愿终偿，斐云知我必首肯也。

中华民国三十年六月二十七日
长乐郑振铎跋。

（《十竹斋笺谱》，鲁迅、郑振铎编，荣宝斋，1941年初版，1952年重版；
《中国版画史图录》）

跋心史

郑所南《心史》，世所传者多为钞本，刻本殊罕见。此是崇祯十三年刻本，题页上有刊者识语：

先生名思肖，字亿翁，闽福州人。宋末徙吴门。其孤忠介节，详《辍耕录》诸书，而其文未传。崇祯十一年，岁戊寅冬十一月八日，吴门承天寺中浚井，获一铁函，启之，乃得是集，系先生手书，纸墨完好。考緘固沉井，为宋德祐癸未，至今戊寅，三百五十六年矣。诚足异也！详校缮梓，以传先生之心，后学者之责也。悦安草堂识。

悦安草堂，据曹学佺序，当为新安人汪权奇。权奇名骏声，他本有其跋文一则，此本已夺去。林古度序云：

取其诗文，名曰《心史》，用蜡封固，而函以锡，锡复函铁，沉于承天寺狼山中房古井中，以待千载后人得见其生平，此其立志不亦奇欤！果今三百五十六年，一旦为予友君慧上人浚井而得之，其事尤奇。寺僧多以酿为活，独慧公酷好诗文，非先生之灵自为呵护，即慧公是其身后身转世，不可知也。……予何幸，垂老而适同高钟陵会府，得见于叶雁湖民部署中，共相惊异。雁湖、钟陵与予皆郡后学，急谋较梓，以传先生之心。友人汪权奇欣任其事，雁湖、钟陵捐资助成，表章先贤，皆急忠义者。

《四库总目提要存目》云：

《心史》七卷，旧本题宋郑思肖撰。

又云：

文词蹇涩难通，纪事亦多与史不合。必明末好异之徒，作此以欺世，而故为眩乱其词者。

按，思肖生丁亡国之痛，故持民族观念至坚，主夷夏之防至严，一字一语，均含血泪。“吾观吾之身，天地之身，父母之身，中国之身，读圣贤书，学圣贤事，是与圣贤为徒，奚敢化为贼而忘吾君吾父母也！欲弯弓射贼，曷能顾母存亡；欲偷生事母，何以扶国颠覆。舍忠不足为孝，舍孝不足为忠。以是迟迟二三百日间，双睛望穿天南之云。天道何为尚未旋？蚤夜以思，狂而不宁。泪苦流胆，心亦凝血。挺然语孤忠，孑然立大义。与世相背，独立无涯。我母龙钟，忧愤成疾。旦暮无期，奚生奚生。叫日而日未出，泣夜而夜何长！愈久愈不变！愈不可为愈为！”心烦意乱，语重情迫，更岂是作伪欺世之文？徐乾学以此书为明海监姚士舜所伪托，《四库提要》之语当本于此。然士舜刊书甚多，《秘册汇函》中何不收入此书，而必欲待林古度诸人出而始为之表章？曹石仓、林古度诸人，多见古书，皆不作妄语者，何所为而造作此漫天大谎？当崇祯十三年之际，奴酋尚未有猾夏之举，流寇势亦未大炽，曹、林辈何所为而预行写下此种不祥之文字？此皆理所万不可通者。徐乾学与《提要》作者，所以必欲证其为伪书者，盖深恶其措辞过于激烈也。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后人乃为所蒙蔽，众口一辞曰：《心史》是伪书。呜

呼，是殆未尝读《心史》一字者也！是殆甘为其颠倒黑白之伎俩所欺骗者也！至《禁书目录》成，《心史》被收入“全毁”目中，而此书乃益晦不显矣。若必欲以《心史》为伪书，则作伪者当为明之遗黎古老。刊书之年月，必非崇祯十三年，而当为弘光、永历之际。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倒填年月，以避网罗。斯乃最近情实之推测。斯则林古度辈之用心亦犹夫所南翁之用心也。以梨枣代铁函，以传布代沉井，其技益进矣。然此亦只是推测之辞而已。曹学佺殉节甚早，此序何为乎来哉？刊本式样，亦明明是崇祯时代之物。且一入清代，文禁立严，文网大密。彼时古老遗黎方遁世避祸之不遑，又何能公然刊布此“禁书”哉！林古度时方穷愁蛰居，以诗身隐，又何敢公然刊布此书而自弁其前？若必执为明季遗黎之所为，则林古度辈必自隐其名矣。故知《心史》决非伪书也。晦三百五十六年而显，显而复晦，至今复二百数十载而始复显。何此书之多厄也！所南翁所著，传于世者，有《一百二十图诗集》一卷及《文集》一卷，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及《四部丛刊续编》本。然《姑苏志·所南小传》中断句，如《过徐子方书塾》云：“不知今日月，但梦宋山川。”《题郑子封寓舍》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别受一人恩。”《寒菊》云：“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今皆不见于《心史》及《诗集》中，则知所佚者多矣。《宋遗民录》卷十三无名氏《宋郑所南先生传》中亦录有《题郑子封书塾》等诗。此本予得于传新书店，仅存五卷，凡《咸淳集》一卷，《大义集》一卷，《中兴集》二卷，《久久书》一卷，未为全书。尚有《杂文》一卷，《大义略叙》一卷，后附序五篇及《疗病咒》一则，皆阙，当从他本补写足之。

（《前线日报》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重印《十竹斋笺谱》序

中国木刻画始见于 868 年，较欧洲早五百四十余年。彩色木刻画则于 16 世纪末已流行于世，至 17 世纪而大为发达，饴板、拱花之术相继发明，亦有先以墨色线条勾勒人物、山水、花卉之轮廓，而复套印彩色者，但总以仿北宋人没骨画法者为主，雅丽工致，旷古无伦，与当时之绘画作风血脉相通。十竹斋所镌画谱、笺谱尤为集其大成，臻彩色木刻画最精至美之境。十竹斋主人为徽人胡正言，正言字曰从，流寓金陵，以制笺、篆印为业，时亦出版他种图籍，寿至九十以上。笺谱印行于明崇祯十七年，即 1644 年，迄今三百馀载，传本至为罕见，予尝于王孝慈先生许一遇之，时方与鲁迅先生编《北平笺谱》，知燕京刻工足胜复印之责，遂假得之付荣宝斋重刻，时历七载，乃克毕功，鲁迅、孝慈二先生均不及见其成矣。今又经十馀年，即此重刻之本亦不可得，荣宝斋新记欲再版行世，予尝获此谱第二部于淮上，以较前刻，凡第一部阙佚之页，一一俱在，遂加补刻，终成完帙。我国彩色木刻画具浓厚之民族形式，作风健康、晴明，或恬静若夕阳之明水，或疏朗开阔若秋日之晴空，或清丽若云林之拳石小景，或精致细腻若天方建筑之图饰，隽逸深远，温柔敦厚，表现现实或不足，而备具古典美之特色，推陈出新，取精用弘，今之作者或将有取于斯谱。

1952 年 5 月 14 日郑振铎序于北京。

影宋本楚辞集注跋

右宋朱熹（一一三——一二 年）所定《楚辞集注》八卷，《辩证》二卷，《后语》六卷，为熹孙朱鉴于宋理宗端平乙未（一二三五年）所刊本。这是今日我们所见《楚辞》的最古和最完整的一个刻本。黎庶昌尝于日本获见一元刊本的朱氏《集注》，已惊为秘笈，亟为之覆刻，收入《古逸丛书》中。今得此宋本，又远胜于《古逸》本了。我曾把这两个本子，初步对读了一下，即发现元刊本有不少错误失真之处。如宋本朱熹序中“世不复传”四字，元本作“世复不传”，一字颠倒，语气便大有出入。又宋本《辩证》卷上中“然其《反骚》，实乃屈子之罪人也”一句，元本佚去“然”字，作空格。“楚辞卷第一”下，宋本仅有“集注”二字，元本则增为“朱子集注”四字。又宋本《后语》之末，附有邹应龙、朱在、朱鉴的三篇跋文，元本均佚去，令人无从知道《后语》成书与印行的经过，以及朱在刊书的始末。可见书贵古本，不仅因其“古”而贵之，实在是为了实事求是，要得到一个最准确、最无错误的本子，作为研究的依据，以免因一字之差，而引起误会，甚至不正确的论断。朱熹为宋学大家，毕生勘定了不少经典古籍，很有些特见，足以纠正汉儒的谬解。《楚辞》的最早的本子，为汉刘向所写定，凡十六卷。后汉王逸为之章句，续增了他自著的《九思》一篇，定为十七卷。宋洪兴祖为之补注。这是代表汉学家的一个注释本子。宋晁补之又择后世文辞与《楚辞》相类似者，编为《续楚辞》二十卷，凡二十六人，计六十篇；又择其馀文赋或大意祖述《离骚》、或一言似之者，为《变离骚》二十卷，凡三十八人，通九十六首。朱熹根据了王逸和晁补之二家的书，加以增删，附入注释，定为此本。他的《集注》八卷，是依据王逸所定的本子，删去了《七谏》、《九怀》、《九叹》、《九思》四篇，而增入贾谊的《吊屈原》、《赋》二篇，并将扬雄的《反离骚》一篇，附录于后。他的《后语》六卷，则是根据晁补之的《续楚辞》、《变离骚》二书而加以增删者，所取凡五十二篇。他的《辩证》二卷，则为他自撰的不能附入注释中的考证之语。这是一个比较的最完备的楚辞集子，包括屈原的全部作品，和受屈原影响的许多历代（到宋为止）的最好作品。今日晁补之的二书已不传，王逸《章句》和洪兴祖《补注》二书的宋刊本也已不可得而见，则朱熹的这个注本，可以说是很难得的一个古刻本了（《四部丛刊》所收《楚辞补注》乃是明翻宋本）。王逸的注释，多牵强附会之处，未脱汉儒说经的习气。朱熹的注释是比他进了一步的。在《辩证》里，他曾把王逸的错误与附会之处，详加批判。在《楚辞》的许多注释本里，这也可算是比较好的一个本子。朱熹作《辩证》的时间，在宋宁宗庆元己未（一一九九年），是在他死的前一年。他的《后语》则是未完成的本子（只注释了前十七篇，以后三十五篇无注）。他的《集注》则大约是完成于一一九五左右。赵希弁云：“公之加意此书，则作牧于楚之后也。或曰：有感于赵忠定之变而然。”（涵芬楼影印宋本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卷第五下）按熹作牧于楚，是一一九三年的事。赵汝愚罢相，则在一一九五年。是他成书的日子，当在一一九五年至九六年之间。这个《集注》，先曾刊行。今存者有嘉定癸酉（一二一三年）江西刊本，《辩证》二卷，并附于后。但《后语》六卷，则于熹死后，始由其子朱在为之印出（一二一七年）。现在，这个朱在本也已失传了。再经过十六年，他的孙子朱鉴，才集合了这三部分，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一部书。他把这《集注》和《后语》

里的重复的三篇删去了（《集注》里已收贾谊的《吊屈原》、《 赋》二篇，又附载扬雄的《反离骚》一篇，《后语》里又收此三篇。朱鉴本则于《集注》部分里删去《反离骚》一篇，于《后语》部分里删去《吊屈原》、《 赋》二篇，避免复见），以见全书的整齐划一。他这个刊本，可以说是朱熹这部书的今存的最早的最完备的刊本，且也是最后的一个定本了。明蒋之奇堂重刊宋度宗咸淳三年（一二六七年）潭州湘阴令施南向文龙的一个刻本，而那个本子却是刻在朱鉴刻本出来以后的三十二年。这部仅存于世的朱鉴刻本，为山东聊城海源阁旧藏，后为东莱刘氏所得。去年，由刘少山先生捐献给中央人民政府，现藏北京图书馆。今年是屈原逝世的二千二百三十年。我们藉此机会，把这部最古的最完备的《楚辞集注》定本，影印出来，作为对于屈原这位古代伟大的爱祖国、爱人民的诗人的一个纪念。同时我们想，这部书的出版，对于研究屈原的专家们也将会有些贡献与帮助。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日郑振铎跋。

（《楚辞集注》，一九五三年六月）

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序

二十多年前，孙楷第先生编辑《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我曾替他做了一篇序。现在，读了孙先生的新著《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还不能不说几句话。在中国文学里，小说的研究是最晚着手，也最难着手。小说与戏曲，在过去，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封建社会的“卫道之士”，视之如洪水猛兽，必欲禁之、焚之以为快。但它们是与广大人民密切的结合在一起的。它们是属于广大人民的。它们是为广大人民所喜见乐闻的。凡生根于人民的土壤之上的东西，谁还能毁弃灭绝得了它们呢？因之，所谓“士大夫”们虽鄙视之，虽痛斥之，虽曾禁之、焚之，但它们还是蓬勃而有生气的在人民之间，生长着，发育着，成为近一千年来最重要的两种文学形式，产生出不少无愧于世界人类所骄傲的伟大的作品，像《西厢记》、《水浒传》、《三国志演义》、《红楼梦》等等。这些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也便是最重要的古典名著，得花费很多篇页来详细的研究它们的。但对于戏曲的研究，比较还不太困难。一则文献有征，从元代钟嗣成的《录鬼簿》，明代吕天成的《曲品》，到王国维的《曲录》，有着比较完整的记录和依据。二则，历代均有较大规模的“戏曲集”刊行，从臧懋循的《元曲选》，沈泰的《盛明杂剧》初、二集，毛晋的《六十种曲》到吴梅的《奢摩他室曲丛》，商务印书馆的《孤本元明杂剧》，一般的重要的名著，是不难在那里获得的。讲到小说，情形就很不相同了。既没有什么比较完整的记载可资依据（像蒋瑞藻的《小说考证》，所考证的还是以戏曲为多），更没有像《元曲选》、《六十种曲》那样流行的结集，虽有《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诸集，而流传不广，极不易得，且也只限于短篇的小说。至于长篇的名著，像《三国》、《水浒》、《红楼》，则流传的多是金圣叹之流的批本、改本、删本，我们不能见到原著的本来面目。要得到一部比较近于“原著”的面目的旧刻本，是极为困难的。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奠定了研究的基础，而根据了《小说史略》去找原著，却大是不易。以此从事小说的研究者便远较研究戏曲的为苦。孙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是最好的一部小说文献，给我们开启了一个找书的门径。二十多年来的小说研究者们，对于这部书是重视的，对于孙先生的这个工作是感激的。在这二十多年里，孙先生又由“目录之学”而更深入的研究小说的流变与发展。他从古代的许多文献材料里，细心而正确的找出有关小说的资料来，而加以整理、研究。像沙里淘金似的，那工作是辛苦的、勤劳的，但对于后来的人说来，他的工作是有益的、有用的。这一部《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虽只收了他历年所作的五篇论文，但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小说的人看来，都是极有用的。许多见解是很精辟的，许多材料是第一手的，足以供研究者作为依据的。我很高兴这部书能够出版，能够和读者相见。我想，读者一定会像我自己一样的欢迎它。孙先生还写有一部《小说旁证》，专证好些小说的故事的来源，我盼望它也能早日印行。凡是有益、有用的书，都是值得，而且应该为读者所见到。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日郑振铎序于北京。

（《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一九五三年十一月）

第五辑 西谛题跋

西谛题跋（摘录）

宋六十名家词九十卷

明毛晋编 一九二一年上海博古斋影印本 三十二册

久欲购此书，今日始到博古斋将他买回，同时并得纳书楹一部。西谛。一九二三年三月十七日。

奢摩他室曲丛目录一卷

吴梅撰 抄本 一册

此为第一次草目，计二百六十四种，后减为一百五十种。西谛。民国十八年一月十七日。

坐隐先生精订冯海浮山堂词稿存一卷

明冯惟敏撰 明汪氏环翠堂刊四词宗合刻本 一册 存卷上

二十六年四月四日购于杭州石渠阁，价二元。虽非全帙，亦足珍也。西谛。

远碧楼善本书目五卷

刘晦之藏 郑振铎辑 稿本 一册

罗子经、施韵秋二君以刘晦之氏《远碧楼经籍目录》见示。目凡十二册，分三十二卷，所收图籍近二万四千部，七八万册。自宋元刊本至现代坊刊、杂志论文，无所不有。足俪一大规模市邑图书馆之度藏。以量而论，其弘富殆近于嘉业堂，他更无论矣。惜龙蛇莫辨，眉目难分，翻检至为不易。余穷数日夜之力，为写定善本书目五卷，俾时省览焉。此目所收，以宋元刊本、抄校本及明刊精本为主。清代刊本及通行本皆弃去不录。毕工后，以原目还之刘君。刘君二十年前求书甚力，凡著录于《四库目》中者无不收。盖意欲完成一刻本之《四库全书》也。刻本不可得者，则罗致旧抄本，并传钞文渊阁本以实之。有志竟成，《四库》书之未得者仅数十种耳。而溢出《四库》外者，亦十居三四。以一人之力而获致若斯之巨藏，二酉三阁，无多让焉。惟《四库全书》之编纂，本为清帝消灭我国文化之一手段，其祸酷于秦火。古书之面目为之尽失其真。于宋、明二代之著述，刘夷尤烈。余尝谓四库存目之书，每足重视。而存目未收者，则尤为民族之瑰宝。刘君以《四库目》为准则，而忽于存目所著及未收之图籍，其溢出《四库目》外者，亦每为清人后出之著作，大是憾事，深感不足。且择焉不精，所以每多下驷。庞杂无伦，仅知充目，诚非藏书家之藏书也，更不足以语读书者之藏书。编目甫成，

《西谛题跋》原附在1963年由北京图书馆编，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西谛书目》中，为第六卷。收作者题跋173则。本次系从中摘录，并且按时间先后调整了顺序。

乃欲空藏求售。索四十万金，而宋元善本与方志一千余种尚不在其中。价昂不称，惟有望而却步耳。而宋元精本八九种，则由李君紫东之介，或得归公有。既得千里马，则駉駉千乘皆可弃而不顾矣。还目彷徨，为之三叹。但愿此目中物胥能得所耳。民国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长乐郑振铎。

医藏目录一卷

明殷仲春撰 陈氏慎初堂抄本 一册

民国三十年一月二十日，假范君所藏明刊本校勘一过。明刊本半叶九行，行十八字，并附《痧疹心要》。钞本多讹，是正不少，二十二日校毕。西谛。

道光二十六年日月刻度通书一卷

清道光二十六年刊本 一册

此为今存之第一部中西合璧历书，于东西文化交通史上关系极大。予从郭石麒处得之，为之狂喜不已！石麒盖从吴县胡玉缙氏遗书中搜得者。胡氏书已尽为南北各书贾所购，散于各地。予于此书外，仅获清代文集数十种耳。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幽芳阁主记。

秦词正讹存一卷

明秦时雍撰 练子鼎辑 明嘉靖刊本 二册 存卷上

予收书喜收善本异本，于词曲之少传本者尤宝爱之，每见必收。然近来异书日罕，无论宋元刊本之词，即明刊本之词曲亦可遇而不可求。惟劫中亦偶有所得，书友徐绍樵为予自江北购来万历本《词林摘艳》，朱遂翔售予万历本《乐府先春》，最为惬意当心。壬午秋日，北平邃雅斋书友许奇亮南来收书，告予曰：尝于扬州某家见《秦词正讹》二本，为嘉靖黑口本，以中缝有挖补，疑其不全，故未收。予闻之惊喜，力嘱其为予购之。其时犹以为是秦《淮海词》之明刊黑口本。予藏明刊本词不多，故甚欲得之。数日后许君北上，半月后复至沪，示予《秦词正讹》云：果是不全书。凡四十五翻，书名下亦有挖去痕迹，当是二卷而仅存其半者。予略一翻阅，即惊为奇书。盖是秦时雍作者，非《淮海词》也。虽仅存半部，亦是未见难得之书，因亟收得之。予之藏曲得此，大是生色矣。时雍号复庵，其曲仅见于诸明人选本中，不过寥寥数阙耳。不意今乃获其曲集，且复是嘉靖黑口本，诚奇遇也。可见凡事须留心，求书尤须不厌其琐琐求详。如以为《淮海词》不全本而不收，则必失之交臂矣。复庵曲生辣活泼，写情入骨，不类沈宁庵派之浮烂，实是明代南曲之最上上品。无意得之，欣喜无已，亦劫中杜门索居时一乐也。纫秋。

艺风藏书再续记一卷

缪荃孙撰 一九四一年燕京大学铅印本 一册

癸未三月，托圣老向北平文奎堂购得。记中书多曾目睹，读之如与故人相见也。纫秋馆主。

秋虎丘传奇存一卷

清王 撰 清康熙刊本 一册 存卷上

癸未秋，王志鹏持此书来，予以其罕见，虽残本亦收之，价二百金。北平图书馆有此书全部，不知何日方得抄补之？纫秋馆主书。

百家词一百三十一卷

明吴讷编 一九四 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八册

吴讷《唐宋百家词》旧藏天津图书馆，不知劫中尚存否？此复印本，并虎贲中郎之似而无之，然绝难得。盖植板京华，而由香港刷印，印成后，即逢港变，存书都作一炬，仅有数部运平。此系丁英桂君为予由平购得者，价八百十四金。纫秋。民国三十三年三月十五日。

中国绘画史不分卷

陈衡恪撰 一九二五年济南翰墨缘美术院铅印本 一册

甲申六月一日以三十五金得于汉学书店。陈师曾画绝清隽，此书乃草草无特见，殆寻常课徒之作耳。幼舫。

目录学发微一卷

余嘉锡撰 北京大学铅印本 一册

此书未完，不知余氏当日曾否写成？以无别本，始购存之。甲申六月九日，以百金得于友人吴氏所设之文华阁。友荒。

明清两朝画苑尺牘蘧庵遗墨不分卷潘承厚辑一卷

潘承厚绘 一九四二年潘氏影印本 七册

此书在博山故世后，方始装订成册，阅之不胜有人琴之恻。忆博山贻予《明清藏书家尺牘》时，病犹未深。不意一月之别，遽成古人。人生诚若朝露，哀哉！纫秋。甲申仲秋。

西厢觴政一卷

清康熙刊本 一册

此《西厢觴政》一卷康熙刊本，予未之前见。乙酉春三月五日晨过葱玉寓，承以此本见贻，予之版画书库中又多一精品矣。纫秋。

同时在葱玉处，获见宋刊本《韩昌黎集》、宋巾箱本《陶渊明集》二种，皆滂喜斋后人出而求售者。陶集为天禄琳琅故物，刊印尤精，滂记未著录，殆以帝室旧藏，未便登载欤？又见《南北宫词纪》初印本，《北宫词纪》卷首有图，予向藏有一本，即同此本。惜为孝慈借阅失去，今见之如睹故人也。纫秋又记。

玉茗堂批评异梦记二卷
明刊本 四册

沈氏粹芬阁藏书于劫中散出，多经叶铭山手，予倾囊得其七八种，其中万历刊本《皇明英烈传》尤为白眉。此《异梦记》予亦思取之，以困于资力，略一踌躇已为平贾所攫，携之北去。六七年来，犹往来梦寐中，未能去怀。去冬，书友孙实君获盐城孙氏书数十种，予见其目，此书赫然在焉。予惊喜过望，力促实君邮来，不匝月，此书果至。予翻阅数过，如见故人。而实君索值三万三千金，予时囊空如洗，无以应之，姑嘱其留下，意知其必非吾有矣。不一月，果于友人张叔平先生案头见之。叔平曰：予有即君有，且为君得之可也。予亦不欲夺叔平之所好，遂置之不问。顷过叔平书斋，复见此书，知已于今春如值购之矣。叔平见予深喜之，乃慨然曰：即以贻君如何？予大喜，遂挟之以归。报之以明刊本《冯氏经济类编》百册，然此为孤本，《类编》则不难得，固未能相提并论也。叔平慷慨好义，乐成人之美，生平所为多类此。此举虽小事，然予实深感之也。从此予之曲库中复多一奇书矣。亟欲印入影刊传奇第二集中，以广流传。惜入春以来，物力艰难，救死不遑，万无闲情及此，其将待之来春万物苏生时为之乎？民国三十四年五月十三日纫秋记。

同时睹鄞县孙祥熊氏散出之《女贞观重会玉簪记》白棉纸印本二册于富晋书社，索十万金。斯书予与隅卿、斐云游鄞时，尝见之，并录其目，意以为必不可得。今可得矣，而复无力以得之，吁！可叹也已！世间遇合之缘殆皆如此欤？友人张葱玉近亦留意于此类图籍，葱玉有得之之力者也，当能致之于架上欤？偶忆及，并记于此。纫秋又书。

烟草谱四卷
清陈琮撰 清嘉庆刊本 一册

张君尧伦收烟草书不少，独无陈琮此谱。劫中钱君尽鬻图籍以去，临别以此书见赠。良友之贻，固当珍什藏之。予集得插图书累数百种，此谱卷首有图二帧，亦予书库中罕见物之一也。纫秋。乙酉仲夏。

石濂和尚集附图
清康熙刊本 一册

此《石濂和尚集》卷首附图也。予于劫中两见此集，皆未能有之，而独得此图，亦一奇也。石濂尝与潘稼堂交恶，稼堂贻书痛诋之，然后印本《遂初堂集》已删去此书，予所获初印墨钉本遂初堂集有此书殆以石濂后为清帝所杀，故恩怨俱泯欤？乙酉夏五月，纫秋。

扬州东园题咏四卷
清贺君召辑 清乾隆刊本 一册 有图

劫中以百金得此书于上海来青阁。余幼客扬州二载，尝游法海寺。此贺氏东园则久已荡为荒烟茂草，无可踪迹矣。沧海桑田，何独一东园为然哉！可叹也已！纫秋乙酉仲夏书，时距得书已将三载矣。

录鬼簿二卷元钟嗣成撰续编一卷
明抄本 二册

十七八年前，赵斐云先生自北平南下访书。时马隅卿先生方归四明杜门读书，我辈偶发豪兴，欲至甬访之，借以登天一阁观未见书。海上台风适大作，未能成行。便先至杭州，转绍兴，至宁波。中途赶车，独雇大汽车一，飞驰而去。西湖、鉴湖之胜，皆不暇揽之矣。至则与隅卿先生日夕欢谈，意兴豪甚。隅卿出札记数册相示，皆有关小说戏曲之掌故与史料也。予与斐云大喜过望，竟抄数十则。又有明代版画刻工姓氏录一册，予睹之如获异宝。隅卿云：此录创始于陈大镡氏，王孝慈得之，复加增补若干人。隅卿从孝慈处钞出，又就所知补入若干。予请于隅卿，穷半日之力，复传录之。就所忆及者，又补入若干。隅卿更就予所补者补入焉。此数日放诞高论，旁若无人，自以为乐甚。夜寓隅卿老宅东厢，屋顶作半穹形，大似明代版画中之图式，古趣盎然。予尝笑谓二君曰：是入王伯良校注《西厢记》之画中矣。隅卿曰奔走谋一登天一阁，而终格于范氏族规，不得遂所愿。盖范氏尝相约，非曝书日即子孙亦不得登阁也。于是我辈乃谋访鄞地各藏书家，尽数日之力，于冯孟颛、朱鄮卿、孙蜗庐诸氏所藏，皆得睹其精英焉。孟颛所藏姚梅伯稿本甚多，予抄得姚氏《今乐府选》全目，殊为得意。鄮卿藏曲子亦不少。蜗庐于书深藏秘钥，而于我辈则尽出其佳品。《女贞观重会玉簪记》是白绵纸本，劫中曾出现于沪市，予无力收之，为徐君伯郊所得。而为余辈所最惊心动魄相视莫逆于心者，乃是明蓝格钞本《录鬼簿》一书，后附无名氏《续录鬼簿》一卷，为研究元明间文学史最重要之未发现史料。余辈丐求携归细阅一过，蜗庐慨然见允，他书遂亦无心相赏矣。立携书归，竭三人之力，于灯下一夕抄毕。后此抄本北大曾付之影印。又于大西山房见姚氏之《今乐考证》，亦矜为秘笈。后为隅卿所得，北大亦尝为之覆印。此得所获良多，归装固不俭也。今者世事大变，隅卿墓木已拱，蜗庐亦已下世。隅卿所藏书尽散。蜗庐所藏，顷亦为杭贾挟之沪上求售。予见此明蓝格钞本《录鬼簿》，不能不动心，索六十万金，乃举债如其数得之。亟函告斐云，斐云云：将为一跋以记之。予乃述我辈访书经过，以示斐云。呜呼！当时少年气盛，豪迈不可一世，今友朋之乐尽矣。谁复具好书之癖如我辈者，而斐云与予亦垂垂老矣。民国三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郑振铎。

佩文斋广群芳谱一百卷
清汪灏等撰 清同治七年江左书林刊本 三十六册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日购自北京隆福寺文渊阁，价六万五千元。西谛。

图绘宝鉴五卷补遗一卷
元夏文彦撰 宸翰楼影元刊本 二册

此为宸翰楼影元刊本。坊本所刊落者，此本一一俱在。余以三万六千元得于北京文渊阁书店。一九五二年七月二日，西谛。

西园题跋四卷

明张萱撰 邵锐抄本 一册

是书为明张萱著。萱刻《云笈七签》，撰《西园闻见录》等。此是邵铭生君钞本，不知有无单行刊本？余以十万金得之北京。一九五二年七月三十日，西谛。

中秘日录四卷

袁励准撰 邵锐抄本 一册

是书为近人袁励准撰，未刊传于世。邵铭生君从手稿录出。予方从事于搜集溥仪携出故宫之书画，得此足资稽考。一九五二年七月三十日，西谛。

王氏书苑十卷补益十二卷

王氏画苑十卷补益四卷

明王世贞编 一九二二年泰东图书局石印本 三十二册

一九五二年七月二日购于北京隆福寺文渊阁，价拾万元。西谛。

一九五二年八月三十一日，天朗气清，风日佳丽，颇有凉意，未入寒时。晨起，步小园中，饮苦茶，殊自怡悦。借得明嘉靖覆宋本画书十数种，因与《画苑》对校一过，尽数种。年来百事猬集，久失窥园之兴，偶得半日之休沐，遂事此不急之务。心情旷阔，所得颇多也。西谛。

无声诗史七卷

清姜绍书撰 清康熙刊本 二册

此本写刊极精，久访未获。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一日葱玉为予购之邃雅斋，甚感之。价二万金。西谛。

归石轩画谈十卷

息柯杂著六卷

清杨翰撰 清同治十二年刊本 五册

《息柯杂著》六卷、《归石轩画谈》十卷，北平杨翰著。传本罕见，予得之京肆。秋日照古松上，苍翠可喜，展卷略读，殊自怡悦也。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二日，西谛。

书画书录解题十二卷

余绍宋撰 一九三二年北平图书馆铅印本 六册

此书颇便检阅。惟分类不当，论证疏陋，所见复不甚广，聊备一格而已，不足引为典据也。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四日，西谛。

销夏录六卷

清高士奇撰 刘坚删订清修洁斋刊本 二册

此本颇罕见。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得于北京文渊阁，价三万元。西谛。

贞观公私画史一卷

唐裴孝源撰 明刊续百川学海本 一册

此当是明刻本《续百川学海》的零种。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日购于北京富晋书社，价一万元。西谛。

画石轩卧游随录四卷

清朱逢泰撰 清嘉庆画石轩刊本 一册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郭石麒为予购得，价三万元。西谛。

绘事发微一卷

清唐岱撰 清康熙五十五年刊本 一册

此书原刊本甚罕见。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得于京肆，殊为得意。时晴日满窗，残雪未消，间有鸟雀飞鸣觅食。披卷一过，心旷神怡。西谛。

楚辞图

郑振铎辑 一九五三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本 一册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农历}_{端午节}上午九时人民文学出版社送来。此书搜集、排比，颇费心力，今重繙一遍，觉得尚称完备，颇自高兴也。西谛。

双忽雷本事一卷

刘世珩辑 清宣统三年贵池刘氏石印本 一册

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大小忽雷自沪至，欣喜无已！翌日，启书篋，检得双忽雷本事一册，当年购此时，初未期得睹双忽雷也。今此二乐器归于公藏，人人均得而见矣。西谛。

元人集十种五十三卷

明毛晋编 明末汲古阁刊本 十二册

汲古阁刊元十家集最为难得，商务印书馆曾影印之，今并此影印本亦遍觅无有。富晋书社为余得此原刊初印本，为海丰吴氏旧藏，亟收之。价四十五金。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九日，西谛。

定庵文集三卷
清龚自珍撰 清刊本 一册

得《定庵文集》原刻本于北京来薰阁，足与先得之原刻本诗集相匹配矣。暖日晴窗，展卷自喜。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西谛。

国朝百名家诗选八十九卷
清魏宪辑 清康熙枕江堂刊本 三十册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得于北京邃雅斋，价二十四金。此类书在三十年前为学人争取之目标，今则知音绝稀。实则论述清初诗者，此书仍是第一手材料之一也。谛。

历代正闰考十二卷
明沈德符撰 清抄本 四册

此沈德符《历代正闰考》钞本，甚旧，余于一九五六年春得之杭州古书肆，亦一罕见书也。二月十七日，西谛。

齐鲁韩三家诗释十六卷
清朱士端撰 清吉金乐石山房抄本 四册

此是朱士端未刊稿本，我购自北京琉璃厂通学斋，价六十元。劫中曾见朱氏宜禄堂收藏《金石记》稿本数十册，与印行之六卷本大异。惜已付之劫火！此吉金乐石山房^{朱氏斋名}蓝格本子，更宜珍惜之。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七日，西谛。

摭古遗文二卷
明李登撰 明万历三十一年文茂堂刊本 一册

此是金文编的前身，嘉惠研究古器物的人不少。惜于每一异形字下概未注明来源，未免令人有难于进一步探索之憾，甚至颇疑其多向壁虚造之处也。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七日，西谛记。

雒林冗笔四卷
清李调元撰 清刊本 一册

此书《函海》未收，余得之修绠堂。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七日，西谛。

王奉常杂著十四种
明王世懋撰 明刊本 四册

隆福寺修绠堂从上海得前翰文斋潜藏书一批，皆善本也。偕斐云、梦家同往观之，余得此书及通津草堂本《论衡》。此书是《四库》底本，有翰林院印。其中《学圃杂疏》三卷是全本，与丛书所收者不同，乃余所久访未获者。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七日，西谛。

昭代箫韶存十七卷

清王廷章、范闻贤等撰 清嘉庆十八年内府刊朱墨套印本
二十二册 存卷一之上至
卷七之上、卷八之下至卷九之下、卷十之下

予欲得《昭代箫韶》者三十年矣，以其价昂不能下手，实亦难遇全本也。五三年来着手影印《古本戏剧丛刊》，乃亟思获此剧收入丛刊中。遍访厂肆，适值其参加社会主义改造，清产估价，凡陈年尘封之古本，胥得重见天日。乃于来薰阁得此书十册，于邃雅斋得此书六册，于修绠堂得此书八册，去其重复，凡得十七册。仅阙七卷之下、八卷之上及十卷之上三册耳。再加探访，当不难成一部全书也。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七日，西谛。

宋元诗六十一一种二百七十三卷

明潘是仁编 明万历四十三年刊天启二年重修本 四十八册

修绠堂有此书，余初未之知，后从琉璃厂书肆中人得此消息，急驱车往，取之归。余旧有此书残本半部，殊珍视之。今获全书，益感书福大佳矣！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西谛。潘是仁辑宋元名公诗集于王李七子拟古之风既熄之后，三袁、钟、谭诸家方起之际，诚豪杰士哉！惜采撷未广，取舍难当人意，犹是明人急就成章之习。书分北宋、南宋、元初、元末四编，编各有序目。检其目，间有有目无书者，如北宋一编阙王曾、晁端友、孙觉、晁补之、李植五集，南宋一编阙鲍由、贺铸、刘克庄、方岳、江端友、李清照六家，元初一编阙黄潜、戴表元、王沂、黄清老、欧阳玄五人，独元末一编不阙。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汉籍目录载此书，所阙亦同。岂潘氏当日并未全刻欤？《丛书书目汇编》录其全目下注阙者，与此本亦均合。每家自数卷至十数卷，实则每卷有仅一二页者，是故炫人目也。以其为选辑宋元集之祖祚，故漫收之。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郑振铎。

唐诗二十六家存二十一家四十卷

明黄贯曾编 明嘉靖刊本 十五册

此是明嘉靖间黄贯曾刊《唐二十六家诗》，中阙李峤、王昌龄、崔颢、崔曙、祖咏五家。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得于修绠堂。西谛。

农书二十二卷

元王祯撰 清乾隆武英殿聚珍版印本 十册

余偶购石印本《农书》于邃雅斋，此本从内聚珍本出，遂欲更得一内聚珍本，遍访厂肆不获。今晨偕晓铃至修绠堂，适斐云亦在，获见好书不少，

明刊本《朝鲜日本图说》其白眉也，谊应归北京图书馆。闲谈及《农书》，助廉乃取出此本，索四十金，余立偿之，挟书以归。予所见《农书》并此凡五种。一九五六年七月八日，西谛。

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存七卷

明熊大木撰 陈氏尺蠖斋评明周氏大业堂刊本 七册

余尝于三年前从孙实君处得明周氏大业堂刊本《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六册，虽是不全本，亦以重值收之。盖明刊小说书最为难得，大业堂镌小说不少，余一本都无，故遇此书犹不肯放过。今晨偕晓铃访书隆福寺，晓铃云：有粹雅堂至今尚是单干户，颇有零本好书。因同过之，主人张君出此相示云：彼旧曾经营三友堂，知三友堂所得小说戏曲书多归余，孙实君之唐传亦系彼所售，中阙五六两本，今此第六本理应亦归之余。余额之，乃以四十金取归。不知其第五本，何时复可得也？一九五六年七月八日，西谛。

石田集不分卷

明沈周撰 明刊本 六册

予既于修绠堂得陈明卿刊《白阳集》，兹复于邃雅斋见《石田集》，此集亦是明卿所刊，予一见即惊为双璧，因并收之。首有邓正闇手书题记，又有九峰旧庐珍藏书画之记一章，盖近五十年间已历邓、王二家矣。正闇云：《白阳山人集》则目所未见，明卿刻其先集，必更精审，他日遇之当为两画师破擘囊，一介绍使相见也。予先得《白阳集》，继乃得此，正闇未遂之愿，予乃成之矣。《石田集》刻本甚多，成化、弘治、正德三本予未能全得。两月前，乃得崇祯间瞿氏刻本《石田诗钞》。在明代画人集中，以沈、唐二家为较易得，文、徐亦多遇之，若陈道复集则予所藏者当是孤本矣。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八日，西谛。

陈白阳集不分卷明陈淳撰

附录一卷

明刊本 四册

孙助廉语予云：近得一明代画家《陈白阳集》。予心动，亟索阅之，果是道复集也。乃其从孙陈仁锡所镌，写刻甚精。首有钱功父序，人间恐无第二本，乃购得之，为书斋所得画人集之冠。先是于上海修文堂得耕石斋《石田诗钞》大类牧斋《初学集》。当是一人所写，已是得意。今获此，更胜《石田诗钞》一筹矣！画人集不可多得，幸非时人所着意，当不难徐徐聚之。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九日，西谛。

沈南疑先生携李诗系四十二卷

清沈季友辑 清康熙三十年敦素堂刊本 十六册

此书甚是罕见。去岁曾得一残本，顷复从北京通学斋得此全帙，价十六金，恰与残本同价。一九五六年九月二日，西谛。

临野堂文集十卷诗十三卷诗馀二卷尺牋四卷

清钮琇撰 清康熙刊本 六册

钮琇作《觚剩》，流传甚广。此《临野堂集》却不多见。首有汪启淑藏印。大雨中，得之来薰阁。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西谛。

十二家唐诗二十四卷

明许自昌编 明万历三十一年霏玉轩刊本 八册

许自昌刻过《太平广纪》，刻过李杜集，此《十二家唐诗》却甚少见。今日见之来薰阁，亟收之。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二日，西谛。

简松草堂全集七十七卷

清张云璈撰 清道光简松草堂自刊本 二十九册

此书得之邃雅斋，遇合甚奇。初见来薰阁书目有《张氏腊味小稿》，索之，已为他人取去，颇为怅怅！又欲得其《选学胶言》，亦久觅未有。今乃于无意中得其全集，大是快意！凡八种，七十三卷，疑是全书。其中《四寸学》一种，尤为罕见。清人小小考据语，多可喜处。宜汇为一丛书行世，以嘉惠学人也。一九五六年十月九日灯下，西谛。

三唐人文集三十四卷

明毛晋编 明末汲古阁刊本 二册

顷欲购汲古阁铸诸唐人集，而极不易得，遍搜坊肆，仅获此集及《八唐人集》耳。一九五六年十月九日，西谛。

文选章句二十八卷

梁萧统辑 明陈与郊章句明万历刊本 十册

一九五六年十月九日得于北京邃雅斋。陈与郊即作《灵宝刀》等传奇者。西谛。

闽中十子诗二十九卷

明马棖辑 明万历刊本 四册

《闽十才子诗》，予初得清末郭氏刊本，不自足。今果于北京来薰阁得明万历原刊本，甚可喜也。闽地在唐时犹为化外，读顾况诗可证，至今称丈夫为唐夫。至欧阳詹出，闽之文学始有可称者。明初，林鸿、高廷礼等十子，提倡唐诗，起宋元江西诗派之纤细，是天下士，非闽中一地所能囿也。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七日，西谛。

新刻山海经图二卷

明刊格致丛书本 二册

此《格致丛书》本也，却不多见。予已有明镌有图本《山海经》二种。董会卿得此书于上海，予见之，亟向之购得。并此乃得三矣。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七日，西谛。

南陵无双谱一卷

清金古良撰 清康熙刊本 一册 有图

金古良《无双谱》，予曾收得数本，皆不惬意。此本虽为儿童所涂污，犹是原刊初印者，纸墨绝为精良。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八日午后，阳光甚佳，驱车至琉璃厂。于富晋书社得李时珍校刊之《食物本草》，于邃雅斋得此书，皆足自怡悦也。董会卿云：有康熙本《艺菊志》、明末彩绘本占卜书，即可邮至，亦皆予所欲得者。论述美术史及园艺史者，首应广搜资料，而图籍尤为主要之研究基础。予所得园艺及木刻彩绘之书近千种，在此基础上进行述作，当可有成也。天色墨黑，时已入夜，犹甚感兴奋。西谛。

夷门广牍存五十七种

明周履靖编 明万历二十五年刊本 四十三册

周履靖编的《夷门广牍》收入奇书异籍不少，惟全书究竟有多少种，迄无总目。涵芬楼影印本是最多者，但仍非全书，其中讲修真的几种稍涉褻语，便有意删去不印。惟亦有失收者，像这个残本里的《续易牙遗意》就是一个例子。予收得《广牍》零种不少，却未能配全。此一本是今春萧新祺送来的，亟收之。他颇懂书，常访得异本归予，价亦不甚昂也。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西谛。

蛾术编八十二卷

清王鸣盛撰 清道光二十一年沈懋德世楷堂刊本 二十四册

沈氏世楷堂藏书今春方论担售出，然无佳者，疑其善本别度他处。沈懋德在道光间刊书甚多。《昭代丛书》、《国朝文徵》、《国朝古文汇钞》等皆卷帙浩瀚，而他能独力刊之，有功文献不浅。此王西庄《蛾术编》亦其所刻，颇少见。讲考据之学者此为必备之书，久觅方得，甚为高兴。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西谛。

梅村集四十卷

清吴伟业撰 清康熙刊本 二十册

此是《梅村集》原刊本，钱谦益的序还在，故收之。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五日，西谛。

食物本草二十二卷首一卷

题元李杲辑 明崇祯刊本 二十四册

一九五六年十月朔过隆福寺修绠堂，见窗下有破书篋，题曰：《食物本草》。予大为惊诧，亟索阅之，乃李杲原著、李时珍校订者，益感其重要，因嘱其为予留下。数日后再过之，询及此书，则云：原是富晋书社物，已取去。予立电富晋，坚持欲得之意。那日下午至富晋先取二册归，与沈李龙辑《食物本草会纂》校读数卷，异同不大。但重其为明刊，仍收之。十月三十一日灯下，郑振铎。

四益馆经学丛书十种
廖平撰 清光绪刊本 十六册

久思得廖氏此书，因循未果。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傍晚，过琉璃厂富晋书社取《食物本草》，见架上有此书，因收之。西谛。

廖氏是今文学派的健者。论述近百年思想史者，应读此书。

娄东杂著五十六种
清邵廷烈编 清道光十三年刊本 八册

太仓为江南人文渊藪之一，明清之交，文学之士尤多。王氏诸贤外，张天如、吴梅村皆领袖群伦，力能奔走天下士，非复一乡一郡之彦也。道光间，邑人邵廷烈辑太仓文人所著零圭寸宝凡五十六种，为《娄东杂著》一书，其中多第一次刊传于世者，固是原始资料之一也。惜传本甚为罕见。予二十年前曾于沪肆数次遇之，皆失之交臂。昨在北京隆福寺修绠堂复见此书一部，因亟收之。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四日，西谛。

南峰杂著七种七卷
明杨循吉撰 明刊本 一册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四日午后狂风怒号，予却至琉璃厂访书，得书数十种。此《南峰杂著》及《龙眠风雅》乃其中白眉。忆数月前，潘景郑来书云：苏郡某肆忽出现南峰杂著七种，今不知何往？不意乃由邃雅斋董会卿手终归于予，喜可知也。南峰为明弘正间名士，不守绳墨，惯作讽喻语，曲子尤佳。今得其诗文等七种，殆是人间孤本。论述明代弘正时文学史者，得此乃可添若干新页矣。郑振铎灯下书。

累瓦编初编十卷二编十二卷
明吴安国撰 清道光十三年吴锡祺刊本 八册

此《累瓦编》初二编虽是清代覆刻本，而颇不多见。至其三编则《四库》存目，今转不易得焉。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购于带经堂。西谛。

玉台新咏存六卷陈徐陵辑
续玉台新咏五卷
明嘉靖刊本 三册

此嘉靖刊本《玉台新咏》十卷、《续玉台新咏》五卷，诸家书目皆未见著录。带经堂从广州购书数百种，中有此书，予一见即收之。虽中阙五至八卷，亦无伤也。欲夺之者颇众，但终归予有。西谛。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灯下。

木犀轩旧本书目有嘉靖仿宋本，当即此书。

七国地理考七卷

清顾观光撰 清光绪五年刊本 五册

讲考古学者，此类书是案头必备之物也。今咸阳、临淄、长沙、寿春、邯郸、新郑、洛阳、浑源、易县诸地古物大出，七国地理势不能不研究。惜此书尚未能详尽，有待我辈作进一步的论述也。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西谛。

幔亭集十五卷

明徐燧撰 明万历刊本 八册

《幔亭集》十五卷明徐燧撰，予得之南京萃文书店。明人集今都成珍品，名目稍僻便成众人追逐之目的。此集亦是僻书之一，幸未为他人入目，乃得归予有。燧为徐燧昆仲，集是禁书，尤罕见，不知何时能得之？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西谛。

五唐人诗集二十六卷

明毛晋编 明末汲古阁刊本 八册

汲古阁刻诸唐人集传本颇罕见，予初未之收。今岁着意广搜唐宋人集，始留心及之，有见必取，然已不易得矣。十二月初，在上海古籍书店架上见有汲古刻《孟东野集》二册，虽是《五唐人诗集》之一，以其为初印，漫购之。数日后至来青阁，偶翻架上书，乃得此集全书，价奇廉，甚是高兴。今所阙不过三唐人诗等三数种，想不难配全也。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西谛记。

镌竹浪轩珠渊十卷明王路清辑

菜根谈二卷

明洪自诚撰 明万历刊本 六册

《珠渊》十卷，明王路清辑，附《菜根谈》二集，明洪自诚著。路清一名路，字仲遵，曾辑《花史左编》，盖明末一好事之徒也。此书未见著录。文奎堂从广东购得，予见之亟收入玄览堂书库。虽非大著作，亦一秘笈也。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九日，西谛。

格致丛书存六十六种

明胡文焕编 明胡氏文会堂刊本 三十八册

此是胡文煊《格致丛书》的一部分，不知坊贾何时伪增王世贞序，并题李攀龙辑。查丛书书目《格致丛书》的评诗部分四十余种，除魏庆之《诗人玉屑》、李攀龙《诗学事类》篇幅较钜者外，余书几皆在内。亦有溢出目外者，像游宝《直庵三法》、唐庚《文录》、李攀龙《五伦诗选》、方昕《世范集事诗鉴》等。总之，是利用旧板巧立名目的东西，然颇有用，故聊亦收之。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九日，谛。

徐诗二卷

清徐夜撰 清康熙王士禛刊本 一册

王士禛刻《徐夜诗》，予初见之而未取。后乃知曾入全毁书目，后印本《渔洋全书》未必有之，乃复购得。裴效先此次南下所得多凡品，似此类书已不多有。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灯下，西谛记。

启祯两朝遗诗存八十二家

明陈济生编 清初刊本配清抄本 二册

此是《启祯两朝遗诗》的残本，予久想得此书，而历访南北各肆竟未一遇。今从效先阁得此残本一册，岂是获得全书的先兆欤？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灯下，西谛。

乐府余音一卷

明杨廷和撰 明嘉靖刊本 一册

《乐府余音》一卷，明杨廷和撰，明嘉靖刻本。明本散曲予收得不少，独无廷和此作。二十年前尝于北京图书馆见到此书一部，欣羨不已，即钞录一部存于行篋。文奎堂从粤东购得莫天一、李文田旧藏书不少，予仅得其数种。此虽非莫、李所藏，然实罕见善本也。亟收得之，为玄览堂中的妙品之一。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九日，西谛。

自怡悦斋书画录三十卷

清张大镛撰 清道光十二年虞山张氏刊本 十册

久觅此书未得，今日过修绠堂忽于架上见之，乃亟收得，价六十金，颇昂也。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西谛。

哲匠金桴存四卷

明杨慎辑 明隆庆刊本 四册 存卷二至五

此明隆庆刊本《哲匠金桴》五卷，写刻至精。是《佩文韵府》等书的先声。各家书目皆未载。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晴空碧静，心意畅恰，偕王君崇武至隆福寺文渊阁，得《水明楼》、《纺授堂》诸集，骤若贫儿暴富，快意之极！复同往中国书店询常熟所购《邓志谟五局传奇》消息。店中人云：书已寄到。即取出阅之，果是百拙生之作，即挟之归。他们复取出明

板书数种，《哲匠金桴》亦在其中，予以其罕见，虽阙佚首卷亦收之。似斯类奇书稍纵即逝，固不能论全阙也。西谛记。

唐六名家集四十一卷
明毛晋编 明崇祯汲古阁刊本 十二册

汲古阁刊诸唐人集，予先后收得《唐人选唐诗》、《三唐人文集》、《八唐人集》、《五唐人集》。今又于北京隆福寺修绠堂得此《六唐人集》，则所阙者仅《三唐人集》及《四唐人集》耳。唐《三高僧集》亦未有，想均不难购得也。天寒地冻，炉暖灯红，披卷读之，心身俱恰。时为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余五十八初度日也。西谛记。

钓台集三卷
明刊本 一册

此明万历刻本《钓台集》三卷，疑非全书。序云十卷，但目录实只三卷，不知何故？惜未得他本一证之。王富山从宁波购得残本书不少，此亦其一。又有明刻《国雅》数册，恰能配齐前收之不全本也。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西谛记。

奇觚室乐石文述存二卷
清刘心源撰 清光绪刊本 二册 存卷一至二

《奇觚室乐石文述》，求之十载未得。今春过沪上，恰遇各肆清理存书，乃于修文堂见之，即收之入库。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西谛。

蔬食谱一卷
清抄本一册

《蔬食谱》单行者未之前见，此本疑仍是某书的一部分。钞本甚旧，多切实用语，当可普传天下，为蔬食者大增口福也。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傍晚得于修绠堂。西谛。

疑耀七卷
明张萱撰 明万历刊本 四册

《疑耀》七卷，题李贽著，张萱订，《四库总目提要》则迳作张萱撰。按萱所刊书甚多，如《云笈七签》、《北雅》等皆不没作者之名。此书若果为萱自著，何故必假名卓吾？此甚可疑也。虽有数则似出萱手，或是其增入之语，未可因此遂没杀卓吾此一著作也。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购于富晋书社。西谛。

唐皮日休文藪十卷唐皮日休撰
皮从事唱酬诗八卷

唐皮日休、陆龟蒙撰 明万历三十六年许自昌刊本 四册

许自昌刻皮日休《文薮》十卷、唱酬诗八卷，予得之北京来薰阁。数年来，予发愿欲治唐人诗，惜所得不多，未敢即行着手。然俟材料俱备，则将待之何年何月乎？只好一面广搜诸本，一面进行校读耳。许氏所刻诸唐人集，予已得不少，今复获皮氏《文薮》，自是快意。不知何时始能并得陆鲁望《甫里集》也！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灯下，西谛记。时万籁俱寂，枯笔着纸之声可闻也。

焦氏澹园续集二十七卷
明焦竑撰 明刊本 四册

焦竑《澹园续集》二十七卷，明刊本。禁书总目入全燬目中，故传本甚罕见。予旧有不全本《澹园集》，故于富晋书社见此续集，即复收之。明人集浩如烟海，四库失收者多矣！或出于有意，或出于无意。当时四库馆臣诋諆明人著作无所不用其极，是自有其政治作用。今日我辈正应实事求是，为许多明代作家鸣不平也。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西谛。

纺授堂集八卷二集十卷文集八卷
明曾异撰 明崇祯刊本配清康熙刊本 八册

《纺授堂诗集》八卷、《二集》十卷、《文集》八卷，明曾异撰著。禁书目录入全燬目中。带经堂从福建购来，我一见即收之，故价乃奇昂。得读奇书即是一福，固不必问值也。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灯下，西谛记。

古夫于亭杂录五卷
清王士禛撰 清康熙刊本 二册

《渔洋全集》未收《古夫于亭杂录》，殆以后刻之故。此录又有五卷本、六卷本二种。此是五卷本，为蒋静山所刻，由俞兆晟补板印行者。《渔洋集》旧极易得，今年则历访南北各肆，未一遇之，仅获其笔记若干种耳。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西谛记。

此录为萧新祺送来。他颇懂得版本之学，时有奇书。有的书像《夷门广牘》的残本，多今本所未收者，大有道理。盖实经过一番研究者。

庶物异名疏三十卷
明陈懋仁撰 明崇祯刊本 四册

《庶物异名疏》三十卷，明陈懋仁辑。以怪异罕知之名辞为主，加以分类诠释，并徵引诸书条徵字证。自天部至鬼神部凡分二十五部，自黄甲至佩阿凡二千四百五十有二条。体例颇为谨严。亦采集事物名辞者，必须参考之一书也。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傍晚得于北京隆福寺文奎堂。西谛。

水明楼集十四卷

明陈荐夫撰 明万历刊本 六册

隆福寺带经堂从福建购得好书不少，此陈荐夫《水明楼集》与曾异撰《纺授堂集》乃是其中白眉，而皆为予所得，自诧书运不浅也。夜寒天冻，阴闇不见星月，将雪未雪，赖有此种好书慰我寂寥耳。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灯下，西谛记。

酣酣斋酒牌一卷

明刊本一册 有图

路工于安徽屯溪得明酣酣斋制《酒牌》一册，予甚羨之。这次他又到那个地方去，又得到这个《酒牌》一册，乃以归予，殊感之。酒牌之制为时颇古，明人尤尚之。陈老莲《水浒》、《博古》二牌，传遍天下。此册是明万历末所镌，亦出新安黄氏手，较老莲二牌犹早数十年也。一九五七年一月六日，西谛。

四书集注存三卷

宋朱熹撰 清明善堂刊本 一册 存学庸三卷

怡府所刻书最不多见，此《四书集注》虽仅存《学庸》一册，亦收之。今所见有明善堂、安乐堂藏书印记者，都为善本好书，故一旦获睹怡府所刻书，便喜悦不禁也。风日晴和，虽严冬而稍有春意，偕路工、刘哲民游隆福寺，途遇赵万里，同到宝会斋询新出《永乐大典》消息。偶见架上有此书，遂取之归。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西谛。

国朝诗选十四卷

清彭廷梅等辑 清乾隆据经楼刊本 十二册

此书见抽燬书目，身价遂高。实则以诗体分卷，远不如沈氏的《国朝诗别裁》，更不足与《诗慰》、《国雅》、《诗的》、《诗持》、《诗观》相提并论也。于得《诗慰》后二日，见修绠堂架上有此书，遂携归入库。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西谛记。

冯元成宝善编选刻二卷

明冯时可撰 明承训堂刊本 二册

余尝见明冯时可《宝善编》，惜失收，不知为何人所取。此冯氏《宝善编选刻》二卷，乃其续集也。世无知者。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三日过隆福寺修绠堂，见案上澹生堂抄本《萨天锡集》、钱求赤校韩柳文等，已悉为他人捷足先得，颇感懊恼。最后见此书，乃携之归。此一明人传记书，实亦大有用也。时暮色苍茫，将雪未雪，履冰访肆，兴自不浅。西谛记。

倪鸿宝先生代言选五卷

明倪元璐撰 明末刊本 四册

倪元璐集，今传世者凡数种。独此《三刻代言选》五卷，乃陆贽制诰、苏轼内外制的同类，却未见传本。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九日傍晚至隆福寺修绠堂，检阅案上乱书得之。大喜携归。王思任、文震孟、王铎三序，尤能阐发作者的用心。觉斯以书名，予数见其墨迹，无当意者；此序却写得潇洒飞动，大见精神，名下诚无虚士也。西谛记。时方集数残本《石仓大明一统名胜志》，细细查对，尚阙十馀卷，未得成一完书，殊见闷损，而夜已深矣。

楚辞十卷

汉王逸章句 宋朱熹注 明末刊本 二册

此本乃明末坊贾所为，折衷汉宋王朱二注，复附以刘辰翁、张凤翼、钟伯敬诸家注评。卷首王世贞序疑亦是窃取之他本者。作为《楚辞》读本之一，固亦未必遂逊陆时雍、蒋之翘也。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九日过隆福寺修绠堂购得。西谛。同时在三友堂见吕晚村评选《唐宋八家古文》。

唐人四集十二卷

明毛晋编 明末汲古阁刊本 一册

余先后收得汲古阁刊诸唐人集，独未有《三唐人集》、《唐人四集》二书。顷于来薰阁架上见此《唐人四集》，盖方收得者，因亟取之。毛氏所刊唐人集，校勘颇精，盖以所据底本都为宋刻或旧钞也。唐诗应该重编，但非从广搜异本下手不可，即此汲古阁本已不可多得，况其他精抄、善刻乎？《唐英歌诗》与《唐风集》，汲古刊《三唐人集》亦收之，不知即是一个板子否？独阙方干《元英集》八卷耳。一九五七年正月十三日西谛记。

乾隆搢绅全书不分卷

清乾隆刊本 四册

前见滂喜斋潘氏有《顺治搢绅录》，诧为罕见，跋之者颇多。三年前，予于杭州得《崇祯搢绅录》，则当为今知的最早的一部了。顷于琉璃厂邃雅斋复见乾隆戊戌^{四十三年即公元一七七八年}的《搢绅全函》，虽时代较晚，而内容包罗甚广。

于輿图外，每府均注出要缺、中缺、简缺，以及风俗、学校、土产和养廉银数。每县更有地丁银数、杂税银数、仓谷石数和办公银数。是大好的清代中叶的经济史料也，不仅仅记载职官姓氏而已。因亟收之，与崇祯一部并度于架上。时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日，日色大佳，渐透春意。西谛记。

韵谱本义十卷

明茅濂辑 明万历三十二年自刊本 十册

茅濂《韵谱本义》十卷，诸家书目都未见著录。予得之修绠堂。初破烂不堪着手，经装修一过，乃完好可展阅矣。一九五七年三月五日灯下，西谛记。

唐皮日休文藪十卷
唐皮日休撰 明刊本 四册

唐皮日休《文藪》十卷，予先得明许自昌刻本乙部，后有正德庚辰袁表跋。今复于北京隆福寺修绠堂得此本，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镌工甚为工整。疑即袁表所刊本，惟表跋已夺去。《四部丛刊》所据本亦是明刊，亦分十卷，却是软体字本，不知为何人所刻。《四库简目》标注云：万历中新安许自昌刊本八卷。许自昌是吴人，非新安人，所刻是十卷，非八卷也。此三本暇当细校一过，自当以袁表本为佳。清嘉道间，秦氏翻明本即用袁本为底子。一九五七年三月五日西谛灯下记。

七颂堂诗集八卷
别集空中语一卷诗馀一卷文集二卷
清刘体仁撰 清同治刊本 四册

读王渔洋诸作每称道刘公勇，但刘集予迄未得见，仅见其《识小录》耳。宋蜀刻诸唐人集每有公勇藏印，令人想见此公的风流好事，且鉴赏力甚高，其保存文献之功甚伟。今从西安澍新书店得《七颂堂诗文集》，乃知其诗、古文之造诣殊深，非渔洋、钝翁诸子所得而牢笼之者。故国情深，触事生感，应于更进一层处读之。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西谛记于西安。

白醉琐言二卷
明王兆云撰 明刊本 二册

王兆云，明万历时麻城人，与王世贞为友好，著说部书，有：《湖海搜奇》、《挥麈新谈》、《说圃识馀》、《漱石闲谈》各二卷，《乌衣佳话》四卷。此《白醉琐言》二卷，亦王氏杂记之一，予二十馀年前得于北京某肆，破烂不堪触手。今春始付修绠堂重装，装竟乃可展读矣。只是随手杂记，但亦有掌故可资考索。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九日，西谛。

徐文长先生秘集存四卷
题明徐渭辑 明刊本 二册

此《徐文长秘集》存《调雋》、《籟叶》、《丽章》、《笔华》四卷，不知原书究有若干卷？题武林孙一观我生父校，疑即孙氏所选辑，而托名文长者。别有钟伯敬《秘集》十五种，自《艳编》、《逸籟》、《彩笔》、《韵声》、《雋调》至《致品》，种各一卷，似亦即此书而易名炫众者，惜未得一读以证实之。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九日西谛记。

古今文综不分卷
张相辑 一九一六年中华书局铅印本 四十册

一九一五年予在温州十中肄业，此书方出，一陈姓同学购得之。予健美

无已，乃假得之，穷一暑天之力，尽录其中论文之作，集为二册，题曰《论文集要》，殆是我从事纂集工作之始。今经四十余年矣，此二册钞本尚存行篋。顷过中国书店，见架上有此书，乃购之归，因追纪少年时代一段艰苦求书之事实。西谛。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

重校琵琶记四卷

元高明撰 明万历刊本 四册

得此本《琵琶记》已二十余年，近始付中国书店装成四册，可翻阅。一九五八年一月六日，西谛。

新锲徽本图像音释崔探花合襟桃花记存一卷

明金怀玉撰 明末刊本 一册

此是孤本。金怀玉所作仅见此曲，故虽残存下卷，亦收之。西谛。一九五八年一月七日灯下。

梁陶贞白先生文集存一卷

梁陶弘景撰 明嘉靖三十一年黄省曾刊本一册存 卷二

予锐意欲收六朝及唐人集，惜入手已迟，所得无多，不能不兼及断简残编。此《陶贞白文集》虽仅存下卷，重其为五岳山人刻本，故亦购之。

从修绶堂购得西谛。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七日，即阴历除夕也。

六朝诗集五十五卷

明薛应旂编 明嘉靖二十二年薛氏刊本 十二册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九日到琉璃厂藻玉堂购得此书。方治汉魏六朝人诗，得此明刻六朝人集中的白眉，喜可知也。西谛。

新铸女贞观重会玉簪记二卷

明高濂撰 明刊本 二册

当我第一次见到这部书的时候离开现在将近三十年了。那时，赵斐云将赴宁波访书，马隅卿恰好闲居在家乡，斐云约我同行，我少年好事，一诺无辞。海上飓风适大作，不能作海行，乃经杭州、绍兴，乘大汽车达宁波。我们住在隅卿老宅的东厢，昼夜豪谈。谋登天一阁不得，则访书于冯孟颢、朱蕩卿、孙祥熊三家。孟颢、蕩卿皆尽出所有，以资探讨。孙君独吝，迟迟乃出明蓝格抄本《录鬼簿》后附有续编者，及明白绵纸刻本《女贞观重会玉簪记》二书。二书出，他书皆然失色。我们相顾动容，细细翻阅数过，于《玉簪记》的插图，尤为欣赏不已，然终不得不捧书还之。独于《录鬼簿》则不忍一释手，以其中的戏剧资料均为第一手的，少纵即逝。乃向主人力请一假，约以次日归赵。孙氏慨允我们之请。我们心满意足，抱书而回。就在当夜，

拆书为三，由我们三人分写之，这是值得通夜无眠地来抄写的。这部抄本后来由北京大学付之影印，人人均可得见之了。过了十多年，在一九四六年的冬天，杭贾赴鄞，购得《录鬼簿》及《玉簪记》，欲以归予。我久不购书，且方在穷乡，亦无力以得之。然如见老友，实在舍不得放开他们。不得已乃举债以得《录鬼簿》，却无能并获《玉簪记》了。后闻《玉簪记》已为徐伯郊所有，则不复更作收藏想。不意年初上海古籍书店函告云：有白绵纸本《女贞观重会玉簪记》欲得之否？颇疑即是前书，姑函索阅，书至，果即是孙氏物也。三十年梦魂相思，终得有之，能不谓为书缘有合乎？十多年前，鱼与熊掌势不可得兼，不意于十多年后，二书竟能璧合。此书索价至四百金，可谓昂甚，然不能不取之。聚书满家，独此二物萦系心头，似灿灿作光。不仅书是白眉，即遇合亦甚奇也。一九五八年四月十日郑振铎记。时小园中红梅正含苞欲放，丁香海棠均茁嫩叶，而郊外柳色已黄，春光徘徊，中人欲醉。

旧业堂集十卷

明凌儒撰 明天启刊本 五册

明凌儒《旧业堂集》十卷，天启刻本，诸家书目皆未见著录。曾藏谢光甫处。光甫死将十载，其藏书近二年方大散出，此书为北京中国书店所得。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四日过该店，倾囊中金得之。西谛。

新镌赤心子汇编四民利观翰府锦囊八卷

题赤心子辑 明明雅堂刊本 二册

此明代坊间编刊的日用书之一，亦是建本而出于徽郡者。冶秋为作合得之某君。此类书予收得不少，将作一综合的研究。闻某君尚藏有小说书数种，想亦可见到。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日，西谛记。

王百谷诗文杂著八种

明王穉登撰 明刊本 四册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日晨起，天阴欲雨。效贤阁送书十数种来，中有洪樾刻本《六臣注文选》、明嘉靖金陵刻本《唐荆川集》及此书，价皆甚廉，因收之。《百谷诗文杂著》凡二十一种，此仅八种不及其半，然求全不易，即有此八种亦足自慰。旧有《明月编》、《青雀集》、《野谋集》三种，合之则共得十一种矣。西谛记。

忠义水浒全书一百二十四回

元施耐庵撰 明李贽评 清杨定见刊本 三十二册

我于十多年前曾购得杨定见本《水浒全传》一部，今遍觅不获，不知于何时何地失去，亦不忆曾为何人所借去。偶于北京中国书店见到此书一部，踌躇欲购之，却又怕旧藏本可能突然出现。今晨想起《水浒》研究工作亟待进行，此书乃是决不可少的一个本子，便下了决心到中国书店，尽倾囊中所有，携书而归，不可谓非豪举也。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四日西谛记。

唐三僧诗四十六卷

明毛晋编 明末汲古阁刊本 六册

予收汲古本诸唐人集，各本皆络绎集予斋中，独阙《唐三僧诗》，久觅未得。前晨到琉璃厂，见有此书，乃挟之归。汲古镌唐人集除方干《元英集》外，乃皆备之矣。一九五八年六月四日灯下西谛记。

宝制堂录二卷

明刘节撰 清刘斯来辑 清嘉庆五年刊本 二册

刘节为明嘉靖间人，所辑《广文选》、《周诗遗轨》等均有刊本传世。独其文集则清嘉庆初始印行，故颇少见。西谛。一九五八年六月五日。

汉魏六朝名家集四十种一百七十七卷

丁福保编 清宣统三年无锡丁氏铅印本 三十册

予旧有此书，不知于何时失去。今岁方动念集六朝人集，急切中却不易遇之。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二日下午过琉璃厂荣宝斋，观张效彬藏画，便到来薰阁少坐，乃获得此书。西谛记。

皇朝礼器图式十八卷

清允禄等撰 清乾隆内府刊本 十六册

十六七年前，予得残本《皇朝礼器图式》六册于上海传薪书店，闻别有所册，已归北京王渤甫。今日饭后无事，冒雨驱车到隆福寺修绠堂，得此十册配成全书，喜可知也。正是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三日西谛记于雨声淅沥中。
王某物

湫澆斋丛书十一种

陈准编 瑞安陈氏湫澆斋刊本 八册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三日雨中得于隆福寺东雅堂。西谛。

陶靖节集八卷晋陶潜撰

年谱一卷

宋吴仁杰撰 明万历四十七年

杨时伟刊忠武靖节二编本 四册

此八卷本陶集疑是明汪士贤刻本。陶集有宋曾集刊不分卷本，有宋汤汉注四卷本，有明嘉靖覆宋十卷本，此本独分八卷，不知有更古的根据否？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九日得于修绠堂。西谛。

此杨时伟刻本也。一九五八年八月八日记。

新镌古今大雅北宫词纪六卷

南宮詞紀六卷

明陳所聞輯 明萬曆三十二年三十三年

陳氏繼志齋刊本 十二冊

予于三十餘年間，先後收得陳所聞選的《南北宮詞紀》八部之多。初收的几部，但求其少爛板斷板而已。後乃進而求其初印無缺字者，但終不免每卷均有缺頁、並頁之處。《北宮詞紀》卷五及卷六的目錄中，間有各附插圖一頁的。得之，已為之驚喜不置。不意最後乃獲初印的《北宮詞紀》和《南宮詞紀》各半部，《北宮詞紀》卷首並有詞人姓氏三頁，插圖四頁，但其中仍有並頁之處。數年之後，復得一初印的殘本，恰好配成全書。其《南宮詞紀》卷四的第四十九頁、第五十頁，各本皆缺者，復于別一本里湊齊之。于是，這部百衲衣似的《南北宮詞紀》，乃終於成為一部完整無缺的本子了。像這樣完整的《南北宮詞紀》，恐怕是很少見的，可能是人間無上的本子也。不讲版本之學的人，其能想像得到，一書之求全求備，乃艱苦至此乎？這不是什麼好奇、好事之舉。研究元明文學者能舍散曲不談么？談散曲者能不備這部《南北宮詞紀》么？作為科學研究的必備之書，其能沒有最完整不缺的好本子作為研究的根據么？把這部書好不容易地拼湊成為完整不缺的一部，當不是什麼沒甚意義玩弄版本的事。今天中國書店把這部書裝訂好送來，整舊如新，乃可閱讀。于燈下細細翻看，頗自喜慰，遂捉筆漫記如上。一九五八年九月三日深夜西諦記。

第六辑 劫中得书记

劫中得书记

新序

《劫中得书记》和《劫中得书续记》曾先后刊于开明书店的《文学集林》里。友人们多有希望得到单行本的。开明书店确曾排印成书，但不知何故，并没有出版。这次，到了上海，在旧寓的乱书堆里，见到这部书的纸型，也已经忘记了他们在什么时候将这副纸型送来的。殆因劫中有所讳，不能印出，遂将此纸型送到我家保存之耳。偶和刘哲民先生谈及。他说，何不在现在将它出版呢？遂将这副纸型托他送给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看看可否印行。在我回到北京后不久，他们就来信说，想出版这部书，并将校样寄来。我仔细地把这个校样翻读了几遍，并校改了少数的“句子”和错字。像翻开了一本古老的照相簿子，惹起了不少酸辛的和欢愉的回忆。

我曾经想刻两块图章，一块是“狂牖文献耗中年”，一块是“不薄今人爱古人”。虽然不曾刻成，实际上，我的确是，对于古人、今人的著作，凡稍有可取、或可用的，都是“兼收博爱”的。而在我的中年时代，对于文献的确是十分热中于搜罗、保护的。有时，常常做些“举鼎绝膑”的事。虽力所不及，也奋起为之。究竟存十一于千百，未必全无补也。我不是一个藏书家。我从来没有想到为藏书而藏书。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书，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头应用所需的。有时，连类而及，未免旁鹜；也有时，兴之所及，便热中于某一类的书的搜集。总之，是为了自己当时的和将来的研究工作和研究计划所需的。因之，常常有“人弃我取”之举。在三十多年前，除了少数人之外，谁还注意到小说、戏曲的书呢？这一类“不登大雅之堂”的古书，在图书馆里是不大有的。我不得不自己去搜访。至于弹词、宝卷、大鼓词和明清版的插图书之类，则更是曲“低”和寡，非自己买便不能从任何地方借到的了。常常舍去大经大史和别处容易借到的书而搜访于冷摊古肆，以求得一本两本自己所需的东西。常有藏书家们所必取的，我则望望然去而之他。像某年在上海中国书店，见到有一部明代蓝印本的《清明集》和一部清代梁廷楠的《小四梦》同时放在桌上，其价相同。《清明集》是古代的一部重要的有关法律的书，“四库”存目，外间流传极少，但我则毅然舍去之，而取了《小四梦》。以《小四梦》是我研究戏剧史所必需的资料，而《清明集》则非我的研究范围所及也。像这样舍熊掌而取鱼的例子还有不少。常与亡友马隅卿先生相见，他是在北方搜集小说、戏曲和弹词、鼓词等书的，取书共赏，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颇有“空谷足音”之感。其后，注意这类书者渐多，继且成为“时尚”，我便很少花时间再去搜集它们了。但也间有所得。坊友们往往留以待我，其情可感。遂也不时购获若干。谁都明白：文献图书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必需的工具之一。过去，图书文献散在私家，奇书异本，每每视为珍秘，不轻示人。访书之举，便成为学士大夫们的经常工作。王渔洋常到慈仁寺诸书店，盛伯希、傅沅叔诸君，几无日不坐在琉璃厂古书

《劫中得书记》一书，包括《劫中得书记》、《劫中得书续记》及“附录”一。《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二。《清代文集目录序》，三。《清代文集目录记》。

肆里。今非昔比，大大小小的公共图书馆，研究机关、学校、专业部门的图书馆，访书之勤，不下于从前的学者们。非自己购书不可的艰辛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从事于科学工作者们是完全可以依靠于各式各样的图书馆而进行工作的了。访书之举，便将从此不再是专家们所应该做的工夫之一了么？不，我以为不然！我有一个坏癖气，用图书馆的书，总觉得不大痛快，一来不能圈圈点点，涂涂抹抹，或者折角划线做记号；二来不能及时使用，“急中风遇到慢郎中”，碰巧那部书由别人借走了，就只好等待着，还有其他等等原因。宁可自己去买。不知别的人有没有和我有同样的癖习？我还以为，专家们除了手头必备的专门、专业的大量的参考书籍之外，如有购书的癖好，却也是一个很好的癖好。有的人玩邮票，有的人收碎磁片，有的人爱打球，有的人好听戏，好拉拉小提琴或者胡琴。有的人就不该逛逛书摊么？夕阳将下，微颺吹衣，访得久觅方得之书，挟之而归，是人生一乐也！我知道，有这样癖好的人很不少。我这部《得书记》的出版，对于有访书的癖好的人，可能会有些“会心”之处。《得书记》所记的只是一时的、一地的、且是一己的事。天下大矣，即就一时一地而论，所见的书，何止这些。只能说是，因小见大，可窥一斑而已。在两篇《得书记》之外，这次又新增入了“附录”三篇。《跋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一文，在《得书记》之前写成，且也在《文学集林》上发表过。因为此文比较长，且非自己所购致的，故便不列入《得书记》里。其实，我在劫中所见、所得书，实实在在应该以这部《古今杂剧》为最重要，且也是我得书的最高峰。想想看，一时而得到了二百多种从未见到过的元明二代的杂剧，这不该说是一种“发现”么？肯定地，是极重要的一个“发现”。不仅在中国戏剧史的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们说来是一个极重要的消息，而且，在中国文学宝库里，或中国的历史文献资料里，也是一个太大的收获。这个收获，不下于“内阁大库”的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出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抄本的发现。对于我，它的发现乃是最大的喜悦。这喜悦克服了一言难尽的种种的艰辛与痛苦，战胜了坏蛋们的诬陷。苦难是过去了。若干“患得患失”的不寐的痛苦之夜是过去了。“喜悦”却永远存在着。又摩挲了这部书几遍，还感到无限愤喜交杂！故把这篇跋收入《得书记》里印出。一九四一年之后，我离开了家，隐姓埋名，避居在上海的“居尔典路”。每天不能不挟皮包入市，以示有工作。到那里去呢？无非几家古书肆。买不起很好的书了。但那时对于清朝人的“文集”忽然感到兴趣。先以略高于称斤论担的价钱得到若干。以后，逐渐地得到的多了，也更精了，遂写成一个目录。那篇“序”和“跋”都是在编好目录后写成的，从没有机会印出。现在，是第一次在这个“附录”里和读者们相见。又在《得书记》里，有几则文字是应该改动的。因为用的是旧纸型，不便重写，故在这里改正一下：（一）《得书记》第五十三则“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图”里，说我所得的那部“残本”是“元刊本”。这话是错的。今天看来，恐仍是明嘉靖间蒋珧的翻刻本。向来的古书肆，每将蒋序撕去，冒充作元刊本。（二）《得书记》第八十六则“陈章侯水浒叶子”里，说起，我所得的那部水浒叶子是黄子立的原刻本。其实，它仍是清初的翻刻本。潘景郑先生所藏的那一部才是真正的原刻本。那个本子后来也归了我。曾仔细地对看了几遍，翻刻本虽有虎贲中郎之似，毕竟光彩大逊。（三）《得书续记》第十则“琅嬛文集”里，说：张宗子的许多著作，都无较古的刻本。其实不然。近来曾见到清初刻本的《西湖梦寻》，刻得极精。其他书，恐怕也会有

较早的本子，只是没有见到耳。

一九五六年八月七日郑振铎序于青岛。

序

凤凰从灰烬里新生

金赤的羽毛更光彩灿烂

——见 The Physiologus，及 Herodotus (ii.73)，Pliny (Nat hist.x.2)

Tacitus (Ann.vi.28)

余聚书二十馀载，所得近万种。搜访所至，近自沪滨，远逮巴黎、伦敦、爱丁堡。凡一书出，为余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无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节食不顾也。故常囊无一文，而积书盈室充栋。每思编目备检。牵于他故，屡作屡辍。然一书之得，其中甘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辄识诸书衣，或录载簿册，其体例略类黄茱圃藏书题跋。大抵余之收书，不尚古本、善本，唯以应用与稀见为主。孤罕之本，虽零缣断简亦收之。通行刊本，反多不取。于诸藏家不甚经意之剧曲、小说，与夫宝卷、弹词，则余所得独多。诗词、版画之书，印度、波斯古典文学之译作，亦多入度架。自审力薄，未敢旁鹜。“一二八”淞沪之役，失书数十箱，皆近人著作。“八一三”大战爆发，则储于东区之书，胥付一炬。所藏去其半。于时，日听隆隆炮声，地震山崩，心肺为裂。机枪拍拍，若燃爆竹万万串于空瓮中，无瞬息停。午夜伫立小庭，辄睹光鞭掠空而过，炸裂声随即轰发，震耳为聋。昼时，天空营营若巨蝇者，盘旋顶上，此去彼来。每一弹下掷，窗户尽簌簌摇撼，移时方已，对话声为所喑哑不相闻。东北角终日夜火光熊熊。烬馀焦纸，遍天空飞舞若墨蝶。数十百片随风堕庭前，拾之，犹微温，隐隐有字迹。此皆先民之文献也。余所藏竟亦同此蝶化矣。然处此凄厉之修罗场，直不知人间何世，亦未省何时更将有何变故突生。于所失，殆淡然置之。惟日抱残馀书，祈其不复更罹劫运耳。收书之兴，为之顿减。实亦无心及此也。而诸肆亦皆作结束计，无书应市。通衢之间，残书布地，不择价而售。亦有以双篮盛书，肩挑而趋，沿街叫卖者。间或顾视，辄置之，无得之之意。经眼失收者多矣。书籍存亡，同于云烟聚散。唯祝其能楚弓楚得耳。战事西移，日月失光，公私藏本被劫者渐出于市。谢光甫氏搜求最力，所得独多。余迫处穷乡，栖身之地，日缩日小；置书之室，由四而三而二；梯旁榻前，皆积书堆。而检点残藏，亦有不翼而飞者，竟不知何时失去。然私念大劫之后，文献凌替，我辈苟不留意访求，将必有越俎代谋者。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因复稍稍过市。果得丁氏所藏《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六十四册，归之国库。复于来青阁得丁氏手钞零稿数册。友人陈乃乾先生先后持明刊《女范编》、《盛明杂剧》及孙月峰朱订《西厢记》来。余竭阮囊，仅得《女范编》与《西厢记》。而于《盛明杂剧》虽酷爱之，却不果留矣。乃乾云：有李开先刊元人杂剧四种，售者索金六百。余力有未逮，竟听其他售。至今憾惜未已。中国书店收得明刊方册大字本《西厢记》，附图绝精，亦归谢氏。但于戊寅夏秋之交，余实亦得隽品不鲜。万历板《蓝桥玉杵记》，李玄玉撰《眉山秀》、《清忠谱》，程穆衡《水浒传注略》，螺冠子《咏物选》，冯梦龙《山歌》，萧尺木《离骚图》以及《宣和谱》，《芙蓉影》，《乐府名

词》等，皆小品中之最精者，综计不下三十种。于奇穷极窘中有此收获，亦殊自喜。然其间艰苦，绝非纨绔子弟、达官富贾辈，斤斤于全书完阙，及版本整洁与否者，所能梦见。及今追维，如嚼橄榄，犹有馀味。每于静夜展书快读，每书几若皆能自诉其被收得之故事者，盖足偿苦辛有馀焉。今岁合肥李氏书，沈氏粹芬阁书散出。余限于力，仅得《元人诗集》（潘是仁刊本），《古诗类苑》，《经济类编》，《午梦堂集》，《农政全书》与万历板《皇明英烈传》等二十余种。初，有明会通馆活字本诸臣奏议者，由传新书店售予平贾，得九百金。而平贾载之北去，得利几三数倍。以是南来者益众，日搜括市上。遇好书，必攫以去。诸肆宿藏，为之一空。沪滨好书而有力者，若潘明训、谢光甫诸氏皆于今岁相继下世。余好书者也，而无钱。有力者皆不知好书。以是精刊善本日以北，辗转流海外，诚今古图书一大厄也。每一念及，寸心如焚。祸等秦火，惨过沦散。安得好事且有力者出而挽救劫运于万一乎？昔黄梨洲保护藏书于兵火之中，道虽穷而书则富。叶林宗遇乱，藏书尽失。后居虞山，益购书，倍多于前。今时非彼时，而将来建国之业必倍需文献之供应。故余不自量，遇书必救，大类愚公移山，且将举鼎绝膑。而夏秋之际，处境日艰。同于屈子孤吟，众醉独醒。且类曾参杀人，三人成虎。忧谗畏讥，不可终日。心烦意乱，孤愤莫诉。计惟洁身而退，咬菜根，读《离骚》耳。乃发愿欲斥售藏书之一部，供薪火之资。而先所质于某氏许之精刊善本百二十余种，复催赎甚力。计子母须三千馀金。不欲失之，而实一贫如洗。彷徨失措，踌躇无策。秋末，乃以明清刊杂剧传奇七十种，明人集等十种归之国家，得七千金。曲藏为之半空。书去之日，心意惘惘。大似某氏之别宋板《汉书》，李后主之挥泪对宫娥也。然归之公藏，相见有日，且均允录副，是失而未失也。为之稍慰戚戚。立持金取得质书。自晨至午，碌碌不已。然乐之不疲。若睹阔别之契友，秋窗翦烛，语娓娓不休。摩挲数日夜，喜而忘忧。而囊有馀金，结习难忘，复动收书之兴。兹所收者乃着眼于民族文献。有见必收，收得必随作题记。至冬初，所得凡八九百种。而馀金亦尽。不遑顾及今后之生计何若也。但恨金少，未能尽救诸沦落之图籍耳。每念此间非藏书福地。故前后所得，皆寄度某地某君所。随得随寄，未知何日再得展读。因整理诸书题记，汇为数册，时一省览，姑慰相思。夫保存国家征献，民族文化，其苦辛固未足埒攻坚陷阵、舍生卫国之男儿，然以余之孤军与诸贾竞，得此千百种书，诚亦艰苦备尝矣。惟得之维艰，乃好之益切。虽所耗时力，不可以数字计，然实为民族效微劳，则亦无悔！是为序。

离 骚 图

萧云从绘 十卷三册 清顺治二年刊本

余初得罗振常复印陈萧二家绘《离骚图》四册，以未见陈章侯、萧尺木二氏原刊本为憾。后于中国书店得陈氏绘《九歌图》初印本，须发细若轻丝，黑如点漆，大胜罗氏所据之本。然于萧氏书则遍访未得。武进陶氏模本《离骚图》出，虽经重绘，甚失原作精神，然明晰却过于罗氏本。民国十九年冬，余至北平，即历访琉璃厂、隆福寺诸肆，搜购古版画书，所得甚多，而于萧氏《离骚图》则未一遇。后二年，乃终于文禄堂得之。价甚昂，《天问图》且阙其半，以陶氏本配全。虽于心未惬，而甚自喜。其衣冠履杖，古朴典重，雅有六朝人画意，若“黄钟大吕之音”，非近人浅学者所能作也。国军西撤

后，古籍狼藉市上，罕过问者。三五藏书家，亦渐出所蓄。余以友人之介，获某君所藏《山歌》及《离骚图》。虽亦在朝不保夕之景况中，竟毅然购之，不稍踌躇。一以敬重某君之节概，一亦以过爱此二书也。此本大胜余在平所得者，极初印，且完整不阙。访求近十五年始得其全，一书之难得盖如此；诚非彼有力之徒，得之轻易，而惟资饰架者所能知其甘苦也。尺木为明遗民，故绘《离骚》以见志；仅署“甲子”而不书“顺治”年号。李楷序云：“尺木穷甚于洛阳、河东，能以歌呼哭啼尚友乎骚人。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余于此盖有不忍悉者矣！”清辑《四库全书》时，为补绘《九章》、《卜居》诸图，大非尺木原意，而图亦庸俗不足观。陶氏模本首附扉页，有“书林汤复”语，惜此本无之。

童痴二弄山歌

冯梦龙辑 十卷四册 明刊本

《童痴二弄山歌》十卷，与《楚辞图》同时自某君处散出。余先得《离骚图》，以《山歌》有新印本，姑置之。然实酷爱此书。明代民歌刊本，传世者绝少，且为冯梦龙所辑，与《挂枝儿》[童痴一弄]（？）同为明末民歌集中之最丰富最杰出者，尤不宜失之。因复毅然收入曲藏中。是时，欲得之者不止数人。余几失，而终得，可谓幸矣！《山歌》初为传经堂朱瑞轩所购得，影钞一部，邮致北平顾颉刚先生。友辈传观，诧为罕见。因劝其重印行世。颉刚为之句读，余等均有序。原书则先已归之某君，不意终为余有，可谓遇合有自矣。惟《童痴一弄》之《挂枝儿》，始终未见全书。余所见不足百首，恐不敌原书四之一。不知何日二书方能合璧也。

古今女范

黄尚文编 次四卷四册 明万历三十年刊本

乃乾得《古今女范》四册，曾持以示余。图近二百幅，为程伯阳绘，黄应泰、黄应瑞（伯符）昆仲所刊，线条细若毛发，柔如绢丝，是徽派版画书最佳者之一。余渴欲得之，屡以为言，而乃乾不欲见让。后在北平王孝慈先生处亦见此书一部，印本相同。他处则绝未一见。屡访各肆，皆无之。十馀年来，未尝瞬息忘此书也。丁丑冬，国军西撤，乃乾忽持此书来，欲以易米。余大喜过望，竭力筹款以应之，殆尽半月之粮，然不遑顾也。斗室避难，有此“豪举”，自诧收书之兴竟未稍衰也。数日后，过中国书店，复于乱书堆中得《女范编》残本三册。

女范编

刘某增订本 残存三卷三册

此书即黄尚文《古今女范》，残存三册，缺第一卷一册。价奇廉，故复收之。印本较后，程伯阳及黄氏昆仲之署名，皆被挖去，而补入刘金煌、刘玉成、刘振之、刘汝性诸名，盖刘氏得其板而掩为己有者。未又增入《刘宜人》、《吴氏节》、《天佑双节》、《节妇刘氏》、《贞烈汪氏》数则，皆与刘氏有关者。但所增数则之图，亦典雅精整，足与黄氏媲美。

水浒传注略

程穆衡撰稿本 王开沃补 二卷四册

为章回小说作注者，于此书外，未之前闻。程穆衡引书凡数百种；自《史》《汉》以下至耐得翁《都城纪胜》、吴自牧《梦粱录》，僻书颇多。《水浒》多口语方言，作者于此亦多详加注释，不独着意于名物史实之训诂。故此书之于语言文字研究者亦一参考要籍也。穆衡《自序》云：“乃数百年来，从无识者。即自诩能读矣，止窥其构思之异敏，用笔之飞幻。若其炉锤古今，征材浩演，语有成处，字无虚构，余腹笥未可谓俭，然且茫如望洋焉。……余为是役，盖直举秘书僻事以发厥奥。俾知奥由于博，斯其为学也大矣。”其用力盖至勤且深。此原稿本未刊。王氏所补数十则，皆分别粘签于其上。余于暮春，偶过来青阁，见此书，即敦嘱留下。后见者数人，皆欲得之。谢光甫先生亦以为言。寿祺问可见让否？余执不可，乃终归于余。彼等皆欣羨不已。余所藏小说注本，未刊者，于《红楼梦微言》外，仅此书耳。宜亟为刊布，俾不没作者苦心。作者所据为金圣叹本，似未见明刊诸本，不无遗憾，然于“天下太平四个青字”条下注云：“按《水浒传》正本不止于此。在梁山泊分金大买市方终耳……乃坊本毅然并此后俱删去，使全书无尾，真成憾事。”并引《录鬼簿》所载高文秀、杨显之、康进之诸《水浒》剧以证“七十卷以后”非“续本”，其识力不可谓不高。

王氏补注中有关于“图像”一条，云：“今俗本《水浒传》前有画像，每页一人。此崇祯时陈章侯所图，后人摹之入卷。”余近得雍正刊本《第五才子书》及陈章侯《水浒叶子》，知此语亦确。（补记）

汪氏列女传

十六卷八册 明万历年间刊知不足斋初印本

汪氏《列女传》图绘笔致同汪廷讷之《人镜阳秋》。盖亦万历年间徽郡人士所辑也。故书中多叙述徽郡节烈妇女，尤以汪姓为多。知不足斋得此书版片，重为印行，而加注“仇十洲绘图”字样，其实，图非十洲笔。余初得知不足斋后印本，图已模糊。后在中国书店得白绵纸残本二册，每则之后，“汪”字皆尚为墨钉，洵是最初印者。又于杭州某肆得竹纸印残本二册，亦尚为明代初印本。有汪辉祖藏印。携以至平。孝慈见之，赞叹不已，因以贻之。而白绵纸本始终珍秘之。不意人事粟六，竟失所在，遍觅不获。战后，树仁书店以此本求售，价尚廉，且较初印，因复收之。忆竹纸本及白绵纸本，于“烈”部较今本均多出数十则，皆是宋末殉难之妇女。知不足斋本皆去之，殆以违碍故也。惜今不可得而补入矣！余得此书后，不数日，树仁书店不戒于火，存书尽毁，此书以归余，幸免于劫。

朱西厢记

孙矿评点 二卷四册 明末诸臣刊本

此朱墨本《西厢记》，题孙月峰评点。余得明刊本《北西厢记》十馀种，所见亦多，却绝不知有此本。乃乾以此书及《盛明杂剧》见示。余时正在奇窘中，竭阮囊得此书。以《盛明杂剧》余已藏有残本，且尚有复刻本，不如此书之罕见也。首附图二十页，凡四十幅，殆集明代《西厢》图之大成。其中有从王伯良校注本摹绘者，但多半未之前见。刻工为刘素明，即刻陈眉公评释诸传奇者。绘图当亦出其手。素明每尝署名于图曰：“素明作”。明代刻图者多兼能绘事。盖已合绘、刻为一事矣。已与近代木版画作者相类，不仅是“匠”，盖能自运丘壑，匪徒摹刻已也。

宣和谱

介石逸叟撰 二卷二册 清康熙间刊本

以《水浒传》为题材之杂剧，元明二代最多。高文秀至有黑旋风专家之称。明传奇则有沈璟《义侠记》，许自昌《水浒记》，沈自晋《翠屏山》等，至今传唱不衰。但诸作皆同情于《水浒》英雄，惟《宣和谱》作翻案笔墨（又名《翻水浒》），以王进、栾廷玉、扈成等剿平水浒诸寇为结束。殆受金圣叹腰斩《水浒传》之影响，并又为俞仲华《荡寇志》作前驱。余得之来青阁，甚得意。春夏间，来青阁收得明刊戏曲不少，皆归余，殊感之。

新鐫汇选辨 真昆山点板 乐府名词

鲍启心校 二卷二册 明万历间岩镇周氏刊本

此书余得于来青阁。从此明刊乐府集又多一种矣。凡选传奇《琵琶记》以下三十四种，散曲《步步娇》“闺怨”（万里关山）以下二十一套。不知何以于散曲后，更杂入《金貂记》传奇一种。所选传奇，中有《四节记》、《减灶记》、《合璧记》较罕见。然如《京兆记》，则巧立名目，故为眩人，实即汪道昆四剧中之《京兆眉》耳。明人故多此恶习，而于俗本、坊本尤甚。

古今奏雅

无撰人姓名 存卷六一册 明末刊本

此书余亦于来青阁得之。写刻至精，首附图八幅亦小巧玲珑，虽尺幅而有寻丈之势。惜仅残存一卷。不知原书究有若干卷。马隅卿先生亦曾藏有残本一册。惜未记为第几卷。所选皆散曲。此第六卷，为“黄钟调”“越调”“双调”三种，近九十页。颇疑此书与《怡春锦》等为同类，半选剧曲，半选清曲也。至多八卷而止，似不当更超此数。若全选清曲而有八卷之多，则诚足为南曲选中之一巨帙矣。

眉山秀

李玉撰 二卷四册 清顺治十一年刊本

李玄玉所著传奇至多，今传世者仅“一人永占”四种耳。此本题“一笠庵新编第七种传奇”，惜其他各种，未能一一发见也。书凡二卷，二十八出，

述苏氏父子兄妹事。以《今古奇观》之《苏小妹三难新郎》一话本为依据。明清之际，传奇作家每喜取材于“话本”，此亦其一种。惟所述情节较复杂，范围亦较广耳。首有顺治甲午某氏序，序末署名已被铲去，但有“题于拂水山房”语，当即钱谦益。此书，余得之来青阁。中华书局曾有复印本，易名《女才子》。以其少见，复收之。玄玉传奇，余更有《千钟禄》，《太平钱》二种，皆传钞本。原刻本殆极少见。得此，甚自喜也。

韩晋公芙蓉影 传奇

西泠长撰 二卷二册 明末刊本

此是明末《四梦》盛行时代，佳人才子传奇之一。述韩樵（晋公），与谢鹃娘相遇于道院芙蓉下，缔订姻缘，中经离散，终赖林太傅、卢侍御之维持，韩生得中状元，与鹃娘团圆终老事。全书二卷，三十二出，首附图十二幅，作圆形，与一笠庵原刻本“一人永占”之图相同，皆明末清初流行之板式也。书殊罕见。余得之来青阁。

吴门清忠谱
忠孝传

李玉撰 二卷二册 清顺治间刊本

偶过中国书店，唐某持《清忠谱》二册售余，余不论价，立携之归。曲藏中又多一种罕本矣。书为李玄玉作，叙述周顺昌事，而以颜佩韦等五人仗义就戮为关节。今所演《五人义》即其事。首有吴伟业序。盖作于清初者。明代阉寺流毒最久，而以魏阉之祸为尤酷且烈。东林诸贤，遭难之惨，过于汉之党锢。士人无不切齿。崇祯初，客魏失败，立有演其事为传奇小说者，如《喜逢春》等，均传于世。玄玉此作非创笔。题曰：“吴门啸侣李玉元玉甫著，同里叶时章雉斐、毕魏万后、朱素臣同编。”以其皆为吴人，故独以吴事为题材。词气激昂，笔锋如铁，诚有以律吕作锄奸之概，读之，不禁唾壶敲缺。毕魏，向作毕万侯，今乃知其名魏，字万后，非万侯，此亦重要之发现也。

蓝桥玉杵记

云水道人撰 二卷四册 明万历三十四年浣月轩刊本
末附：《蓬瀛真境》《天台奇遇》 二剧

余于来青阁收得明刊戏曲最多；战后半载间，寿祺凡有所得必归之余。戊寅秋日，寿祺电告余，收得明刊白绵纸本《蓝桥玉杵记》，末并附杂剧二种。余立即驱车至来青阁，细阅一过，爱不忍释。此书为杨之炯作，《曲品》列之下中品。题材为习见之裴航遇仙事。曲白均庸腐。然诸家目录，均未见有此书。盖佚已四百年。一旦获睹原刊本，诚堪自喜，何忍更剔瑕疵。所附插图，豪放而不粗率，犹有明初作风，不同于徽派诸名家所刊者。时正奇窘，然终以半月粮购得之。亟付装潢，面目焕然若新刊。诚是明刻传奇中之白眉，亦余曲藏中最可珍秘之一种矣。书刊于万历丙午（三十四年），首有《裴仙

郎全传》、《刘仙君传》（樊夫人附）、《裴真妃传》、《铁拐先生传》、《西王母传》，并有凡例。共二卷，三十七出。凡例云：“本传原属霞侣秘授，撰自云水高师。首重风化，兼寓玄铨。阅者斋心静思，方得其旨。”又云：“本传中多圣真登场。演者须盛服端容，毋致轻褻。”明代士大夫曾有一时盛信仙道，以幻为真，屠隆、周履靖辈皆堕此障，莫能自拔，杨之炯盖亦其中之一人。虎耘山人序云：“至若出入玄谷，吐咳丹朱，则烟霞之味，又在抚无弦者赏之。彼烟火尘襟，欲深天浅者，宁能作自观耶？”盖彼师徒辈入魔深矣！未附《蓬瀛真境》一套，有曲无白，无排场，疑为清曲。又附《天台奇遇》则为述刘阮事之杂剧也；诸曲目皆未著录。

文 通

明朱荃宰撰 三十一卷八册

明天启六年评漫堂刊本

此书得于来青阁。以其无甚独见，初不欲收。后念明人诗文评传世者不多，姑留之。然欲攘之去者竟不止数人，可见此书之罕见。绍虞闻余得此书，亦自平驰函索读。“是编考证经史子集制义两藏文章源流体格。”体例略类《史通》。而多引明人语，偶有己见，亦殊凡庸，固不足以与语“著作”，更不足与《文心雕龙》、《史通》比肩也。荃宰别有《诗通》、《乐通》、《词通》、《曲通》，“嗣刻”公世。然诸家书目皆未载，当均未成书。荃宰字咸一，黄冈人。此书则刻于南京。末卷为《论梦》，亦摹拟刘勰《文心雕龙》之《自序》。

自序（节录）

爰考诸书之书，汇成文、诗、乐、曲、词五编，皆以通名之。求以自通其不通也，匪敢通于人也。汇而言之：陈思品第，止及建安；士衡九变，通而无贬。吁嗟彦升，不成权舆。《雕龙》来疥驼之讥，《流别》竭捃摭之力。伯鲁广文恪之书，号称《明辨》，自述而皆不本之经史。吴详于文而略于诗，徐又遗曲。或饮水而忘其源，或拱木而弃其D。世无经学，故无文学。未有通于经而塞于文者也。今不揣固陋，会通古今谈经、订史、说诗、言乐、审音之书，弃短取长，明法究变，尊是黜非。每编汇为一通，每体汇为一篇。文则经史子集，篇章句字，假取援喻，条晰缕分，而殿以统说。诗自三百，乐府古近，题例艳趋，厘音叫响，而弁以总论。乐左书右图，诗曲右调左赞；经义宪章祖训，起弊维新。

螺冠子咏物诗

周履靖著 二十八卷十二册

明万历三十三年金陵书林叶如春刊本

螺冠子作《锦笺记》，最著于世。王国维《曲录》初未知螺冠子何名。余得明刊本《锦笺记》，乃知其为周履靖之别署。履靖曾刻《夷门广牍》，甚不易得。其中图谱数种，刊印尤精。余在北平曾见残本数十册，因循失收，甚憾惜！又得其所刻巾箱本《十六名姬诗》，珍为秘笈，不轻示人。兹复获其《咏物诗》。版式同《夷门广牍》，乃未收入《广牍》中。古人无专以“咏物诗”成专集者。履靖此书所咏自天文至花卉杂物，无所不包，近二千首，可谓洋洋大观。未附“诗馀”、“词馀”及酒歌、酒咏。诗词皆不俗。清人辑“咏物诗选”，未录履靖作只字，殆未见此书也。

唐宋
诸贤 绝妙词选

黄玉林辑 十卷二册 明万历四十二年秦 堦刊本

黄玉林《绝妙词选》原分“唐宋诸贤”与“中兴以来诸贤”二集。今所见于毛晋刊《词苑英华》本外，罕睹他本。《四部丛刊》所影印者为《英华》外之别一明刊本，所谓明翻宋本者是也，未知为何人何时所刻。余见万历丙寅秦堦刊本于朱瑞轩许，即《丛刊》所据之祖本也，以其价昂，未收。不数日，乃于来青阁得之，价已大削。虽仅为“唐宋诸贤”一集，未获全璧，亦自得意。首有茹天成一序，《四部丛刊》本已夺去。殆坊贾有意取下，以欺藏家，冒为明初本者。兹录茹序于下，以证刊刻源流。

重刻绝妙词选引

自汉武立乐府官采诗，以四方之声，合八音之调，而乐府之名所由始。历世以来，作者不乏。上追三代，下逮六朝，凡歌词可以被之管弦者，通谓之乐府。至唐人作长短词，乃古乐府之滥觞也。太白倡之，仲初、乐天继之。及宋之名流，益以词为尚。如东坡、少游辈，才情俊逸，籍籍人口，往往象题措语，不失乐府之遗意。然多散在各家之集。求其汇而传之者，惟玉林黄叔昉所选为备。自盛唐迄宋宣和间为十卷，自宋中兴以后，又为十卷。凡七百余年，得人二百三十，词千三百五十。词家之精英，可谓尽富尽美矣。盖玉林乃泉石清士，尤长于词，为当时名家所赏。观其附录三十八篇，隽语秀发，风流蕴藉，则其选可知矣。余友本婴泰太学堦，夙好古雅，每见其鼻祖少游词章，辄讽玩不休。今得是编，颇愜其向往之初心。既乐多词之妙丽，又慨旧刻之舛讹，遂详校而重梓之。余重玉林之词，嘉本婴之志，因缀数语，以引其端。万历岁在阙逢摄提格（甲寅）仲春上浣之吉，河内茹天成懋集甫书。

诗经类考

明沈万钶辑 三十卷十二册 存十一册
明万历三十七年刊本

此残本《诗经类考》，得于中国书店，阙第二十七及第二十八两卷。石麒以其残也，未加重视。余尝搜集宋元以来说《诗》之书近三百种，“八一三”之变，大都荡为寒烟。本无意于复收此书。以其廉，且明人说《诗》之作本不多，故遂收得之。在明人著述中，此书编例，实甚谨严。盖《诗》考之长篇也。凡例云：“是编只属丛记。蕲无漏，未蕲订定。故自经传子史，以至稗编琐录，靡不该收。盖宇宙间事未可执一。将以资详说，反之约也。”第一卷为《古今论诗考》，第二卷为《逸诗考》；第三卷以下为音韵，天文，时令，地理，列国，人物，宗族，官制，饮食，服饰，宫室，器具，珍宝，礼乐，井田，封建，赋役，刑狱，兵制，四夷，禽虫，草木诸考；第二十六卷以下则为国风，大小雅及三颂异同考；第三十卷为《群书字异考》。所录甚富；凡万历以上之著述，殆无不兼收并蓄之。《逸诗考》一卷，搜采亦甚备；且亦择取甚慎，不似他明人之随意选载“白帝子”等之伪诗入书也。

堂乐府

清黄兆森著 不分卷二册 清康熙五十五年刊本

余十馀年前获得石牧《忠孝福》传奇，未加重视。惟盼能得其所著《四才子》。然终不可得。真州吴氏藏书散出，为王富晋所购，待时索价，价奇昂。中有《四才子》之二（《郁轮袍》、《梦扬州》），装一函。余狂喜，不惜重值购之。后至苏州访吴瞿安先生，欲借其藏本，钞补《饮中仙》及《蓝桥驿》二种。但吴先生殊珍惜此书，颇有吝色。遂不再谈及钞补事。七年前在北平，坊贾以《忠孝福》及《四才子》半部求售。仍只有《郁轮袍》等二种。遂退还之。前日偶至来青阁闲坐。寿祺告余，新收得《堂乐府》一部。亟取阅之，即石牧所著《忠孝福》及《四才子》之全部也。久求不获者，乃忽于无意中获之。一书之得，诚非易也！首并有序，知刻于康熙丙申（五十五年，1716）。石牧生平，借此以知之者不少。而《堂乐府》之名至此始发现。可见“研究”较专门之学问，板本之考究，仍不能忽视。彼轻视“板本”者，其失盖与专事“板本”者同。总之，博闻多见，乃为学者必不可忽者也。

元名家诗集

明潘是仁编 存二十八家一百十七卷十六册

明万历四十三年刊本

- 一、元遗山诗集十卷（好问）
 - 二、刘静修诗集三卷（因）
 - 三、陈笏斋诗集六卷（孚）
 - 四、贯酸斋诗集二卷（云石）
 - 五、困学斋诗集二卷（鲜于枢）
 - 六、松雪斋诗集七卷（赵孟頫）
 - 七、吴草庐诗集六卷（澄）
 - 八、卢含雪诗集三卷（亘）
 - 九、马西如诗集三卷（祖常）
 - 一〇、范锦江诗集五卷（梈）
 - 一一、杨浦城诗集四卷（载）
 - 一二、虞邵庵诗集七卷（集）
 - 一三、揭秋宜诗集五卷（傒斯）
 - 一四、王柏庵诗集二卷（士熙）
 - 一五、薛象峰诗集二卷（汉）
- 以上元初
（元末诸名公姓氏爵里）
- 一六、萨天锡诗集八卷（都刺）
 - 一七、张外史诗集六卷（雨）
 - 一八、陈荔溪诗集三卷（旅）
 - 一九、贡南湖诗集七卷（性之）
 - 二〇、杨铁崖古乐府三卷（维桢）
 - 二一、傅玉楼诗集四卷（若金）
 - 二二、柳初阳诗集三卷（贯）

- 二三、张蜕庵诗集四卷（翥）
- 二四、泰顾北诗集一卷（不花）
- 二五、李五峰诗集二卷（孝先）
- 二六、余竹窗诗集二卷（阙）
- 二七、贡玩斋诗集三卷（师泰）
- 二八、成柳庄诗集四卷（廷珪）
- （下阙六家）

此书余得之来青阁，由合肥李氏散出。余所得李氏书，以此种为最罕见。余究心元剧，因傍搜及于元人著述；惜限于力，所得不多。故得此书，殊感喜慰。此书本名《宋元名家诗集》；凡录北宋十七家（内五家未刻），南宋二十家（内六家未刻），元初二十一家（内五家未刻），元末十九家。今此本于南北宋诸家全阙，于元初诸家中，仅阙释清琪《温石屋集》一家；于元末诸家中则阙倪瓚、陆景龙、迺贤、丁鹤年、龙从云、郑允端六家。以其罕见，虽为残本，亦亟收之。宋人集合刊者至多，自陈思、陈起而下，无虑七八家，而合刊元人集者，则于汲古阁《元十家集》，《元四家集》外，他无闻焉。《元诗选》所据诸集，今不知能有十之七八存世否？故此虽仅寥寥二十八家，而余亦甚珍视之。惟潘氏究未脱明人习气，未言各家集所据之本，且每与原集相出入；若《陈旅集》，此本仅有诗三十七首，实则《四库》著录之《安雅堂集》，诗凡三百二十八首，此仅十之一耳。疑罕见诸家，仍是从诸选本汇辑录入。潘氏实未睹原本也。

午梦堂集

叶绍袁辑明崇祯九年刊本

- 一、鹂吹集二卷鹂吹附集（沈定修撰）
- 二、百阅遗草一卷（叶世倬撰）
- 三、愁言芳雪轩遗集一卷（叶纨纨撰）
- 四、窃闻一卷（叶绍袁撰）
- 五、续窃闻一卷（叶绍袁撰）
- 六、返生香（疏香阁遗集）（叶小鸾撰）
- 七、鸳鸯梦（叶小纨撰）
- 八、伊人思（沈宜修辑）
- 九、梅花诗（沈宜修撰）
- 一、 岷雁哀（叶世倬等作）
- 一一、秦斋怨（叶绍袁撰）
- 一二、彤奁续些二卷（沈纫兰等撰）

此书近人叶德辉有翻刻本；惟印本至劣，大失原刻精神。余十五年前曾见原本一部，刊印极精。惜当时失收，至今耿耿！顷以低值获此，足慰夙愿。叶刻本凡十四种，尚有《灵萱》及《琼花镜》二种，为此刻所无。罗氏《续汇刻书目》所收，则仅八种。疑当时所刻，原无定本，随刻随增，故种数多寡，每本不同，非不全也。顷见日本某家书目，载此书细目，亦仅有十二种也。

佛祖统纪

宋志磐撰 五十四卷十册 明万历四十二年刊本

宋明单刊佛经，不多见。余前在北平，得宋至明初有图单刊本经近五百本，最为巨观。然以民间流行之《心经》、《陀罗尼经》、《观音经普门品》及《金刚经》为最多。无关“佛学”，更少禅宗之著作。合肥李氏书于夏间散出，悉为汉文渊所得，余初不知。偶于一夕，过来青阁，遇姚石子先生。且谈且翻阅案上新收书。中有明刊《午梦堂集》、《古逸民史》，潘是仁刊《元人诗集》等，余皆欲得之。复有佛书一堆，皆明刊禅学著作，余初不加关注。偶一翻检，觉刻本甚精，便嘱寿祺留下。议价妥后，抱书而回。《禅宗正脉》、《禅林僧宝传》，皆为写刻本，《吴郡法乘》则为旧钞本。明日，过汉文渊，所得书已售去过半。但余仍得《佛祖统纪》及《阅藏知津》等。《阅藏知津》虽阙末册，而每册皆有助刊人姓名，洵是原刊本。余甚珍之。《佛祖统纪》破蛀不堪，但实为诸书中之白眉。寿祺云：此批书中，“小部头”最精者皆已为余得。他若明刊《资治通鉴》、《文选》等巨帙，则余力不能收，即收得亦无馀地可藏也。高丽旧钞本《东国文献备考》一百册，则为叶揆初先生所得。

经济类编

明冯琦编 一百卷一百册 明万历三十二年刊本

《经济类编》仿《艺文类聚》等书例，分总类二十（自帝王类至杂言类），细目三百馀，约三百万言，自诸子百家以下，几无书不采，而尤着意于经济之言，故录载奏疏特多，实为后来诸“经世文编”之祖。体例集若“类书”，而实非“类书”；盖每录全文，不若诸类书之条文琐碎也。陈元愫于万历时，辑《经济文辑》，陈子龙于明末辑《皇明经世文编》，即仿其意。而子龙之书尤难得。

古诗类苑

明张子象编 一百三十卷五十八册 明万历年间刊本

“是编首自上古，下迄陈隋，一枝片玉，搜括无遗”（凡例），实全上古汉魏六朝诗之一总集也。而以类为主，不以时世为次。盖变冯氏《诗纪》之例者。其与《诗纪》不同者，惟兼收两京以后箴铭颂赞，于汉晋六朝之“乐府”，则“依郭茂倩旧次，汇为一部”，不复分类。其分类之部门，略依《艺文类聚》、《初学记》各类书，而微加详悉。于各类书、小说、《列仙传》、《真诰》所载之诗，亦均录入。既有《诗纪》，此等书似可不备。但当时编辑之意，当是便于士子涉猎之用。余以其罕见且廉，故收之。

古逸民史

明陈继儒辑 吴怀谦校 二十二卷六册一函
明万历二十六年刊本

眉公著述，余所得颇多；见者亦不少。惟大抵皆明季坊贾妄冒其名，或挖去作者姓氏，补印眉公名里，以资速售耳。《古逸民史》确为眉公所著之

一。《宝颜堂秘笈》未收，传本甚罕见。眉公著此书，实有所感。彼盖自托于“逸民”之列，正是做“山人”之张本也。所谓“逸民”，类多有托而逃。其末数卷所录诸宋末“逸民”，皆义人志士也。眉公果何所托而“逃”乎？明人曾有嘲“山人”诗、曲，盖正指眉公辈而言。惟眉公虽优游林下，享名甚盛，却非专事“飞来飞去宰相衙”者流。其殚心撰述，主持风雅，亦未可加以蔑视也。

东谷遗稿

汤胤绩撰 十三卷二册

明成化十四年刊本

余既得李氏书若干种于来青阁，复数过汉文渊，得《经济类编》等书。偶见案上有《东谷遗稿》，为成化黑口本，价至廉，却无人顾问。余以其附“词”，且平易浅近类口语，甚喜之，即携之归。作者为汤胤绩，明初功臣汤和裔，死于王事，盖武臣而能文事者。诗不甚佳，词具别致。余正辑明人词，故亟收得之。

农政全书

余前在北平，渴欲获得徐光启原刊本《农政全书》。数与书贾辈言之，均未有此书。后见邃雅斋架上有之，询价，乃奇昂。以绌于资，未及购。转瞬间，书已他售，为之懊丧者久之。由平至沪，仍以此书访问各肆，或言前曾售过，今未见。或以清代翻版者见示。前数月合肥李氏书散出，余见其目，有此书。询之林子厚，知为原版，但已售之富晋书社。立追踪至富晋处，卒获得之。十年求之不遇，而遇之一旦，殊自喜。书纸蛀甚，然尚可读。明末初得泰西机械法，介绍甚力，余既获王征《奇器图说》等数种，故于此书尤着意访求。不仅有关西学东渐之文献，且于版画研究上亦一要籍也。

鸣沙石室秘录

罗振玉编 不分卷一册 清末国粹学报社铅印本

此是最早之敦煌文书目录。惜所据仅为伯希和所见所知之若干种耳。

敦煌石室真迹录

王仁俊编 五卷三册 清宣统元年石印本

此书亦为敦煌书目，所据亦为伯希和所携来及所忆及者。甲卷上载石刻拓本三种。以后各卷亦多录原文。惟王序未及罗振玉，罗氏诸书亦未一及王氏，不知何故。当敦煌石室发现消息由伯希和传出时，仁俊正任学部编译图书局副局长。传录敦煌写本，当以王氏为最早。而其名为罗氏所掩，今知之者罕矣。而此书亦不甚易得。诚有幸有不幸也！

文始真经（关尹子）

宋抱一子陈显微注 三卷一册明 万历二十一年刊本

连日细雨绵绵，大有春意。颇思阅肆，因而阻兴。下午四时，借校中汽车，至开明书店一行，随转赴中国书店，遇杨寿祺及平贾数人在彼闲谈。得唐虞死耗，为之愕然！唐为经手买得半部清常道人校本杂剧者。几成交而为孙某所得。因此一转手，遂多费不少交涉与金钱。唐在沪设听涛山房，颇可交。不意其竟死于苏州。寿祺谈购李氏书事颇久。此次转售诸籍颇得利。并知有《石仓明诗选》四集为平贾所得，殊可惜！桌上有《文始真经》一册，因其为明代单刊本，购之。《关尹子》初仅《道藏》有之，后收入湖北崇文书局《百子全书》中。此为抱一子注本，颇罕见。

丽则遗音

元杨维桢撰 六册 明汲古阁刊本

此为铁崖赋集；汲古阁附刊于《铁崖古乐府》后。前数日下午，于中国书店遇姚石子先生，同检堆于桌上乱书。较可注意者，有《铁崖乐府》、《复古诗集》及此书，并为汲古阁刊本。且均初印者。余思得之而未言。惟嘱其留下《丽则遗音》。石子当时亦未言欲得之。明日再过，则肆中人言，《古乐府》及《复古诗集》已为石子购去。惜此《丽则遗音》因余一言，未能“璧合”。他日或当移赠石子，以成“完”书也。

辍耕录

元陶宗仪撰 三十卷四册 明玉兰草堂刊本

《辍耕录》为余常引用之书，然初收者却为铅印本及汲古阁刊本。后复得玉兰草堂初印本残帙二册。迨《四部丛刊》影元本出，诸本似皆可废。武进陶氏之影元刊本，亦已不足重视。今春过中国书店，睹一玉兰草堂刊本全帙，首附《秋江送别图》，为堵文明所绘，并有贝琼、赵俶、钱宰、牛谅、詹同、周子谅、张孟兼、王泽、富礼及宋濂诸人《送陶九成东归诗》，贝琼并有序。盖宗仪于洪武六年被荐至南京，以疾辞归。诸人喜其归而惜其别，乃追祖于龙江之上。“而文明工绘事，因写而为图。视其舫舟于岸者，行人欲发而未发也。引骑或前或却者，宾客之咸集也。波涛汹涌，云山惨淡。相与置酒劳劳亭上，俯仰金陵之景无穷，而古今之离思亦无穷也”。诸诗及图为各本所无。我所见玉兰草堂本无虑五六部亦均无之。余正搜集版画，观其图窃远有深趣，因亟收得之。某君意亦甚欲，但卒为余先得矣。此本别有万历甲辰王圻重修序。然此图却非圻所增入。盖《东归诗》页下仍均有“玉兰草堂”四字。同时并于文汇得万历戊寅徐球刊本，亦精。

孟兰梦

清严保庸撰 不分卷一册 清道光间刊本

余集清剧，编为《清人杂剧》初二集行世。“三集”因故迄未续印。《孟兰梦》亦为三四集中拟收之剧。柳翼谋先生曾以国学图书馆所藏传钞本影印。其实此剧本有严氏原刊本。余得此原刊于中国书店，未并附曲谱。殊得意。惟因未阙数页，拟借程守中先生藏本抄补，故至今尚未装潢成册

宋元名人词十六家

旧钞本 四册

宋元人词自《疆村丛书》出，罕传之作已少。友人赵万里先生及周泳先君并有补辑。大凡传世之词集，几无不被收入此三书中。然旧本亦自可贵。十年前，缪筱珊钞本《典雅词》散出，价甚廉。余思得之，而未果。后归北平图书馆。顷于听涛山房得旧钞本《宋元名人词》十六家。（张纲《华阳词》，高登《东溪词》，朱雍《梅词》，朱熹《晦庵词》，吴儆《竹洲词》，许棐《梅屋诗馀》，欧良《抚掌词》，文天祥《文山乐府》，赵闻礼《钓月词》，朱淑真《断肠词》，欧阳彻《飘然词》，赵孟頫《松雪斋词》，刘因《樵庵词》，萨都刺《雁门词》，倪瓚《云林词》，陶宗仪《南村词》）十年前，此十馀家皆秘笈也，足补毛氏《六十一家词》。今则皆行世矣。此书每册皆有陈仲鱼印，为坊贾伪托，然钞本甚旧，至晚亦在道、咸中。惜未知校辑者何人耳。

思玄集

明桑悦撰 十六卷八册 明万历间刊本

桑悦为明中叶一奇人。诗词作风均大胆，辟李贽、徐渭一途风气。集甚罕见。此本余得之来青阁，为万历徐威所注。然其注不详。于“词”则不加只字注释。每卷下，又题：“后学翁宪祥选”，疑非全本。恨未得原刊本一校之。

新刻魏仲雪先生评点琵琶记

上虞魏浣初批评 李裔蕃注释 二卷一册 明末刊本

此为明清之间写刊本；魏仲雪当亦为其时人。北平图书馆藏有一本，余尝从之借印数图。此本正文不阙，图则夺去。某贾从杭州回，因某先生之介，以此书归余。未有万里题云：“民国元年六月十八号，同乐之、中甫游永定门。途经琉璃厂，于旧书摊上，以铜元八枚易之。”盖陈万里先生手笔也。万里寓杭，其藏书当尽罹于劫。余于此书外，并得其所藏内府钞本曲数种。

谢禹铭五刻

明谢鏞辑 存二种一册 明天启间刊本

谢氏辑阴符、鬼谷、黄石、武侯、青田五家书刻之，故名“五刻”。皆兵家言也。“天时地利，将将将兵，大略具诸书中”谢氏盖有志于“请纓”者。此书仅存二种，《黄帝玉诀阴符经》及《鬼谷子》；余得于中国书店。明刻本诸子，甚可矜贵，余锐意欲多收之。于劫中见者多，失收亦多。及今挽救，已似亡羊补牢矣。

新刻皇明开运辑略

武功名臣英烈传

明 未知撰者 六卷十二册 明万历年间刊本

《皇明英烈传》刻本甚多。余有万历刊徐渭重订本，有通行本；内容均互异。今得此书，则又多一种矣。沈氏萃芬阁书散出。为余所最欲得者为万历版《异梦记》及此书。《异梦记》议价未妥，已为平贾所得。此书则终归余有。明刊传奇尚时时可见，惟小说则绝少。故亟收之。《萃芬阁书目》列此书于“史”部，且注为嘉靖刊本，实则为万历年所刻。其插图形式，大类罗懋登《三宝太监下西洋记》及周曰校本《三国志演义》，自是同时代之产物也。《英烈传》在清代为一禁书，不知所禁者为何本。此书遇庙讳皆抬头，述元人处则皆曰“胡”或“虏”。所禁或即此本也。作者未知何人。但可信为一最早之祖本。相传武定侯郭勋作此传以彰其先世郭英之功绩。有人更作《真英烈传》以纠之。《真英烈传》今不传。今所传诸《英烈传》，文字虽不同，而事迹则大致相类。此亦可证其为同出一源。

启隽类函

明俞安期纂 一百卷三十二册 明万历年间刊本

俞安期纂辑三《类函》；余先得《诗隽类函》及《唐类函》。《唐类函》废于东区，烬于此劫，复于劫中得一部。独阙《启隽类函》。《诗隽类函》及《唐类函》皆不足重视，惟《启隽类函》则搜集启札甚富，颇有资料。余求之十馀年未得。顷过中国书店，见案下有乱书一堆，为朱惠泉物，中有此书。盖某书贾曾购之，以其阙佚不全，复退回者。余乃收得之。所阙仅未数卷。明人启札集至多；以升庵、禹金二书为最流行。惟究以此书收明人作最多。（禹金所收均古作。）

西学凡

明艾儒略答述 不分卷一册 明天启三年刊本

此书题西海耶稣会士艾儒略答述；与《三山论学纪》合订为一册，版式亦同。盖天启时杭州单刊本，非《天学初函》之零种也。《西学凡》叙述十七世纪时欧洲学术之大凡；《三山论学纪》则记艾儒略与叶向高问答语，宣传耶教之作也。《论学纪》首有扉页，题“武林天主堂重梓”，“同会阳玛诺、费奇规、费乐德订，值会阳玛诺准，杭州范中，钱塘舒芳懋校”，皆西学西教东渐之重要文献也。

程氏墨苑

明程大约撰 六卷十二册 明万历年间彩印本

此“国宝”也！人间恐无第二本。余慕之十馀年，未敢作购藏想。不意于劫中竟归余有，诚奇缘也！初，徐森玉先生告余，陶兰泉先生处，有彩色印《程氏墨苑》。余将信将疑。于孝慈处，曾睹《墨苑》二十八宿图，符篆皆为朱色，意此即为彩印本。时正从事版画史，欲一决此疑。乃以森玉之介，访兰泉先生于天津。细阅此书竟日，录目而归。曾语兰泉先生：他书皆可售，此书于版刻史上、美术史上大有关系，不宜售。后兰泉迁居沪上，藏书几尽

散出。余意此书亦必他售矣。秋间，至友某君来沪，遇兰泉，余恳其询及此书。竟尚在。时余方归“曲”于国库，囊有馀金，乃以某君之介，收得此书。书至之日，灿灿有光，矜贵之极。曾集同好数人展玩至夕。复细细与他本《墨苑》相校，其中异同处甚多。施彩色者近五十幅。多半为四色、五色印者。今所知之彩色木版画，当以此书为嚆矢。元明之交，我国受欧洲中世纪手钞本的影响，一时盛行金碧钞本。今存者尚多。嘉靖间，宫妃布施经藏，亦每施以彩绘。惟皆于版画上手绘金彩。无以彩色施之版上者。此书各彩图，皆以颜色涂渍于刻版上，然后印出；虽一版而具数色。后来诸彩色套印本，盖即从此变化而出。《墨苑》后印诸本则皆渍墨，不复能加彩色矣。我人谈及彩色套版，每不知其起源于何时。得此书，则此疑可决矣。

顷阅日本《尊经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知阁中亦藏有彩色《墨苑》一部。则当时彩印之本必不止一二部也。

李卓 传 奇 五
吾评 种

十卷十册 明万历年间刊本

此书亦陶兰泉先生所藏，与彩印《程氏墨苑》同归于余。余方斥售明刊传奇数十种，乃复收此，结习难忘，自叹，亦复自笑也。此五种传奇为：《浣纱记》、《金印记》、《绣襦记》、《香囊记》及《鸣凤记》。其中《金印》、《鸣凤》、《香囊》三记尤罕见。图版精良，触手若新。《浣纱记》首有《三刻五种传奇总评》，甚关重要。初刻或为“荆刘拜杀”及《琵琶》，二刻当为《幽闺》、《玉合》、《绣襦》、《红拂》、《明珠》。合之，凡十五种。《荆记》尚有传本。“刘拜杀”则不可得而见矣。颇疑李卓吾只评《琵琶》、《玉合》、《红拂》数种。其后初刻、二刻、三刻云云，皆为叶昼所伪作，故合刻数种，殆皆为翻印本。不细校，不知原刻之精美也。

三刻五种传奇总评

浣纱尚矣！匪独工而已也，且入自然之境，断称作手无疑。若《金印》、若《香囊》，俱书生之技，学究之能，去词人远矣。可喜者《锦笺》一传，组局既工，填词亦美。虽未入元人之室，亦已升梁君之堂，近来一作家也。如《鸣凤》，原出学究之手。曲白尽佳，不脱书生气。而大结构处极为庞杂无伦，可恨也。噫，安得“荆刘拜杀”而与之言传奇也哉！安得“荆刘拜杀”而与之言传奇也哉！不独传奇已也。若至今日，诗文举子业皆不可言矣。奈何奈何！付之长叹而已矣！

秃翁

快书

明闵景贤辑刊 五十种五十册 明天启六年刊本

此书余曾读于巴黎国家图书馆。在诸明人杂辑丛著中，此书体例，尚称谨严。虽多巧立名目，而尚注出原书名称，并注明是删本或元本。殊非《小窗四纪》诸书揉杂群言者之同类。顷于文汇书局见一部，乃收得之。价甚昂。别有《广快书》五十种，为何伟然所纂，惜未得见。明末人最善于谈花评酒，穷奢极欲于生活上之享受，纯是“世纪末”之病态。余本有意于研究此一时

代，故每喜搜罗此类书。

渭南文集

宋陆游撰 五十卷十六册 明末汲古阁刊本

汲古阁刊《放翁全集》，非难得之书。惟所见每为后印本。余十年前曾得初印本《剑南诗稿》，并附《南唐书》、《斋居纪事》、《家世旧闻》等。但阙《渭南文集》及《老学庵笔记》。月前，于文汇书局睹《渭南文集》一部。亦为初印本，亟收之。然仍阙《老学庵笔记》。一书之全，其难如此，诚非以书为赏玩之资者所能理会也。放翁有心人也，生当南北宋之际，身经中原陆沈之痛，见朝廷上下，宴安嬉乐，若自甘于小朝廷之局面者，惄然忧伤，见之诗文。回天无力，呼吁谁闻。屈子孤吟，贾生痛哭，其心苦矣！临终时，犹有恢复之念，乃有“家祭无忘告乃翁”语，伤矣伤矣！其心何日忘中原也！岂知小朝廷饮鸩自娱，日陷日深，竟至复有“胡马渡江，翠华浮海”之变。放翁死不瞑目矣！余幼时即喜诵放翁诗，今置“全集”案头，几日日快读数十百首。每不觉悲从中来，泪涔涔下，渍透纸背。然念今时局面，决非昔比，则又自壮！

大明一统志

明李贤等辑 九十卷五十册 明万历年间万寿堂刊本

此书有明天顺及弘治二刊本，价奇昂。此为万历年间金陵坊贾所刻；其印时则已入清，故凡“大明”二字均挖改为“天下”二字，书名亦作《天下一统志》。故价甚廉。余得于朱瑞轩处。明代《一统志》修于天顺时，撰者为李贤诸人。乃直至万历年间尚未重修，仍沿用旧本，至可诧异。若《清一统志》则一修于乾隆，再修于嘉庆。于斯可见明廷官吏之不知留心时务与经世之术。地理之不知，方位之不明，风俗人情之不了解，何能谈“政治”之设施乎？

中晚唐十三家集

刘云份辑 十六卷八册 明末刊本 附《八刘诗集》八卷

刘云份初辑《八刘诗集》（刘叉、刘商、刘言史、刘得仁、刘驾、刘沧、刘兼、刘威），因得中晚唐人集不少，复辑十三家为一集（姚合、周贺、戎昱、唐球、沈亚之、储嗣宗、曹邺、姚鹄、邵谒、韩偓、林宽、孟贯、伍乔），盖有得即刊也。所据原本，均未甚佳。蒋孝于嘉靖中刊《中唐人诗》十二家，此无一家与之重复；《唐诗纪》仅刊“初”“盛”，未及“中”“晚”。云份此刊或意在补阙欤？

唐宫闺诗

刘云份辑 二卷二册 明末刊本

此书一题“唐人遗咏”《女才子诗》，余得于文汇。离余得《中晚唐十三家集》，不及一月也。刘云份序云：“近辑《中晚唐人诗》，遍阅诸集。念此帘幕中人，兰静蕙弱，何能搦数寸之管，与文章之士竞长斗工。彼其微

思别致，托物寄情，婉约可风，精神凝注，亦与白首沈吟者辉耀后世，可谓卓绝矣。忍视诸选家取此遗彼，令其珠明花艳，顾沦没于书虫竹蠹间乎？爰从讎定之次，广罗而全录之。取其品行端洁者列为上卷正集；若夫败度逾闲者列为下卷外集。”唐宫闺诗无单刊者，胡震亨《唐音统签·庚签》有宫闺诗九卷，然未刊。流传于世者亦仅薛涛、鱼玄机诗集耳。此书所辑虽遗漏尚多，然实为辑全唐女子诗之椎轮也。

谱双

明 未知撰人 不分卷一册 明正德刊 《欣赏编》本

沈氏萃芬阁书散出，某肆得《元十家集》、《升庵词品》及正德本《欣赏编》，求售于余，价甚廉。余嘱其留下。明日过之，已悉为他人所得。余尤喜《欣赏编》。为之懊丧不置。一月后，托中国书店于杭州某肆收得《谱双》一册，盖《欣赏编》中之零种也。具人物图，且有生动之趣者，《欣赏编》中亦仅有此种。得此，可不备全书矣。余于书，本不作收藏想，只视为取材之资而已。似此类书，本不必求全也。

欣赏修真

明 未知撰人 不分卷一册 明刊本

得《谱双》后，复得《欣赏修真》，同一版式，盖亦《欣赏编》中之一种。首有“长兴王氏诒庄楼藏”印。惟余见《欣赏编》总目，却无此种。盖在“续编”中也。惟“欣赏续编”为万历间茅一相集，而此书则似为正德刊本，不知何故。疑沈杰之《欣赏编》原有“续编”而今未见也。

精选点板
昆调十部集

乐府先春

陈继儒选 三卷一册 明万历徽郡谢少连校刊本

明刊散曲传世者甚罕，南曲选尤不易得。余十年前得天一阁旧藏《新编南九宫词》于乃乾许，曾诧为不世之遇。后又钞得吴瞿安先生藏本《南词韵选》，及《情籁》，北平图书馆藏本《三径闲题》，某氏藏本《词林白雪》。以重价购得《南北词广韵选》及《吴歛萃雅》、《彩笔情词》、《吴骚集》、《吴骚二集》、《吴骚合编》、《怡春锦》、《词林逸响》、《太霞新奏》、初印本《南北宫词纪》等书。（又于斐云处见《南音三籁》，惜未录副）战时，又于来青阁得《乐府名词》及残本《古今奏雅》。收藏此类书者，恐以余为最多。然《南九宫词》于翻印后即转让于北平图书馆，《南北词广韵选》、《乐府名词》及《古今奏雅》三书最近亦于录副后，归诸国家。《南词韵选》则于南下后遍觅未获，不知何时失去。存者仅寥寥数种。收书之兴，为之顿减。然顷于无意间乃复获得《乐府先春》一册，顿使黯然减色之“曲库”为之绚烂生光辉。余本有志于编刊明曲，获此，得助不少。初，余于课馀偶过中国书店，遇性尧，立谈甚久。夜色苍茫，灯火逐渐四现，正欲归去，抱经堂主人朱瑞祥忽携数册破书来，要郭石麒鉴阅。余久不与之交易，姑问有何好书。彼云：新从杭州收得此数种。略一翻阅，赫然有《乐府先春》在。首

附插图八幅，为黄应光所镌，图中人物，古朴类唐画。书分三卷，首卷有套数二十，上卷有套数六十五，下卷有套数五十七。题松江陈眉公选，其刊刻年代当与《吴骚集》约略同时（万历四十年左右）。余得之，不忍释手。询价，索金五十。立即收得，不复踌躇观望，盖一失之，即不可复得也。方斥售“曲库”中物大半，精本尽去，不意乃复得此，诚自喜！中有俞羨长、姜凤阿、郑翰卿、朱射皮、李复初等十馀家曲，皆他处所未见者。抱书而归，满腔喜悦，不复顾及餐时已过，饥肠碌碌矣。

汇 雅 前
集

明张萱编 二十卷 存一——二、五——七
十——十五，共六册 明万历三十四年刊本

此残本《汇雅前集》，余得于石麒麟。余所藏《北雅》，为张孟奇刻。初不知张孟奇为何人。今见此书，乃知孟奇即张萱。萱为回教徒，居南京，刻书甚多。所谓清真馆本《云笈七签》，即其所刻。此书萱自序，亦正署“题于金台之清真馆”。萱又著《疑耀》七卷，重编《文渊阁书目》为《内阁藏书目录》八卷。盖亦好事之徒。此书以《尔雅》为纲，而以《广雅》、《小尔雅》、《方言》、《释名》诸书，汇于《尔雅》之下。又以《埤雅》、《尔雅翼》汇为“后编”，今未见。萱自序谓：“余为《字觚》，计非十年不敢出以示人。然一出当令古今字书皆废。”而以此书先之，《字觚》未知曾成书否？而此书则实为“前无古人”之作也。

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图

宋王黼等撰 存第一、二及十五、十六卷二册
明嘉靖间蒋暘翻刻本

《宣和博古图》流行于世者为万历戊子泊如斋刊本。乾隆间黄晟得其版，合《考古图》及《古玉图》称三古图。余于劫中，得泊如斋初印本《博古图》于来青阁。寿祺云：苏店尚有明嘉靖间《博古图》残本。余促其邮来。不数日，书至。虽仅四卷，余亦收之。此书卷帙甚大。每半页八行，每行十七字。诸家书目间载此书，而每为残本，罕有全者。

（编者按：本篇初版作者以为所得为元刊本，据新序订正。）

分类 李太白诗
补注

杨齐贤集注 萧士贇补注 二十五卷六册
明万历间许自昌刊本

许自昌曾刊《太平广记》，不易得，又撰《水浒传》，演唱者至今不衰。余久欲得其所刊李杜集。虽不难得，却一时未遇。顷在上海书林朱瑞轩架上，见有李集，且价甚廉，乃收之。不知杜集何时可以收得。

古今
名公 百花鼓吹

《唐诗》五卷 《宋元明梅花鼓吹》二卷
《梅花百咏》八种 又《牡丹百咏》一卷 二册
明万历三十六年梁溪九松居士（王化醇）尊生斋刊本

抱经堂从杭州携来一批书，余得万历版《乐府先春》，为其中白眉。数日后，至中国书店，又在乱书堆中，获见《百花鼓吹》及清人某氏之《百花词话》，亦为抱经堂物，闻已售之北平文殿阁。余渴欲得《百花鼓吹》，即取归。明日再过之，则《百花词话》已为程守中先生所得。余方斥去万历杨氏原刊本之《唐诗艳逸品》，乃忽发兴欲得此书，思之，不禁自笑其多事。然《艳逸品》尚有朱墨刊本可得，《百花鼓吹》则绝罕见，且所附之宋元明《名家梅花鼓吹》二卷及《梅花百咏》等尤多不易得见之诗篇。《梅花百咏》传世者向仅中峰禅师及冯子振撰二种，《夷门广牍》中则仅有冯作及周履靖之和作。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有《梅花百咏》一卷，为元韦德珪撰。今此书于中峰、子振、德珪所作外，别有王达善、于谦、周正及无名氏几种，且附张豫源之《牡丹百咏》，故必欲得之。此类书虽无甚大意义，然亦元明文学资料之一种，不宜听其沦落也。

鸳鸯棒

明范文若撰 二卷二册 明崇祯刊本

荀鸭撰《博山堂三种曲》有原刊本，附《北曲谱》，二十年前，余曾见一全书于受古书店。后为涵芬楼所得。“一二八”之役，与楼同烬。每曲皆附图，作圆形，甚精致。劫中，先得《北曲谱》四册于来青阁，价甚昂。顷又得《鸳鸯棒》一种，末亦附《北曲谱》。惜图夺。余所藏《玉夏斋传奇十种》中有荀鸭二剧（《鸳鸯棒》与《花筵赚》），独阙《梦花酣》。荀鸭作传奇甚多；今所知者尚有《倩画姻》、《勘皮靴》、《金明池》、《花眉旦》、《雌雄旦》、《欢喜冤家》、《生死夫妻》等，皆稿本未刊，仅见数曲于《南词新谱》。（玉夏斋本《鸳鸯棒》，实即用博山堂旧版刷印者。）

筹海图编

明胡宗宪编辑 十三卷六册 明天启四年刊本

此书翻印本甚多，均不佳。此本为天启刊白皮纸本；于所见各印本中最为精良。惜嘉靖壬戌原刊本，不可得见，是一大憾事。《筹海图编》为防倭而作，于沿海形势，言之甚详。倭患经过，亦加详述。“经略”中，论水战船艇之构造与战术，最可注意。所附各图皆精。单桅与双桅船之桅上，均有“望斗”，为他书所未见。足与戚继光之《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同为明代倭患史中之要籍。余所得《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亦均为翻刻本，十数年来，访求原刊本，迄未曾收得。

说 郭

元陶宗仪纂 一百二十卷四十册 明末陶珽刊本

陶宗仪《说郛》体例仿宋曾慥《类苑》，而所收杂糅之至，然古佚书往往赖之而存，不能废也。原本久佚，仅散见明钞残本。近人张宗祥集诸明钞，重刊印行，原本面目，约略可睹。然张本之前，流行者惟陶珽一刻。今所见陶刻，多后印者，阙帙累累，几无一本相同。后人得其残版者，更欺诈百端，巧立名目，并《续说郛》残版，或称《五朝小说》，或称《唐宋丛书》，或称《续百川学海》，或称《广百川学海》，皆得酬其欺。其实仅加刻一二通序目耳。此本余得于中国书店，尚为中印较善之本。与《汇刻书目》所载目录细校一过，《汇刻》注“阙”者，此本大都有之：（一）《洛书甄耀度》（卷五）；（二）《山居新语》（卷五十）；（三）《朝会议记》（卷五十一）；（四）《南越志》（卷六十一）；（五）《乾道奏事录》（卷六十五）；（六）《东谷所见》（卷七十三）；（七）《髻鬟品》（卷七十七）。亦有《汇刻》不注“阙”而此本实阙者：《乘轺录》（卷六十五），《公私画史》（卷九十一），《禾谱》（卷一百五）及《齐谐记》（卷一百十五）四种。此本有而《汇刻》未列目者凡三十二种，足补诸丛书目之遗漏。书非目睹，或得善本，诚未易即据为“目”也。丛书目不难辑，难在不能多得异本相校耳。

续说郛

清陶珽纂 四十六卷二十四册 清顺治间刊本

珽既刊《说郛》，复纂明人说部五百二十余种以续之。但间亦阑入宋元人作。此本余与《说郛》同时得之，亦佳。《汇刻书目》注“阙”之《龙兴慈记》（卷五），《云南山川志》（卷二十五），《水品》（卷三十七），《拇阵谱》（卷三十九），《野菜笺》（卷四十），《虎苑》，袁弘道《促织志》（四十二），《广寒殿记》，《李公子传》，《仓庚传》（卷四十三），《莲台仙会品》，《后艳品》，《续艳品》（卷四十四），《杂纂三续》（卷四十五），此本均有之。但目录中注阙者仍有数种。不知初印本完全不阙之正续《说郛》各藏家有之否？

皇朝四明风雅

明戴鲸辑 四卷四册 明嘉靖三十五年刊本

《甬上耆旧诗》与《续耆旧诗》，选四明人作已大略无遗。此为戴鲸辑，入选者皆明人，故名《皇朝四明风雅》（序作《四明雅集》）。“四库”入存目，传本罕见。余得之平湖胡氏。近购得地方诗文集不少，而明本则不多，于《金华文征》外，仅有此书耳。

金华文征

明阮元声辑 二十卷八册 明崇祯间刊本

此书余得于富晋书社，刊印尚精。清人辑《金华文略》，多取材此书，而被削去之篇章不少。故此书仍不能废。元声别有《金华诗粹》一书，惜未

收得。顷北平来薰阁复于此间得正德本《金华文统》。迨余知而追询，则已载之北去矣。

鹤啸集

明朱盛 著 二卷二册 明崇祯十年刊本

今岁书市因平贾之麇集而顿呈活跃。各家皆出书目，杭州诸肆亦每寄临时目录来。但均无甚好书，盖好书不待目出皆已为平贾攫去。前在中国书店见杭州某肆目中有《鹤啸集》，名目较生僻，即托其代购。顷书来，为崇祯写刻本，甚精，首题楚鄂渚朱盛 著。明代楚地朱氏，多楚藩后，至二三人。盛 当亦为宗室。诗无惊人语，然稳妥。

海内奇观

明杨尔曾辑 十卷十册 明万历三十八年刊本

杨尔曾自号雉衡山人，所辑书不少，有《仙媛纪事》，《杨家府演义》及《韩湘子传》等，殆为杭地书肆主人，或代书肆辑书者之一人。此书余在北平曾见一部，未留下。近编“版画史”，思得一本，而上海各肆均无之。平贾王淳馥云：彼肆中有之。乃嘱其寄来。价不甚昂，遂收之。明人辑名山游记者有都玄敬（穆）、何振卿（钊）诸人，而其书皆不附图。名山记之有图，盖自尔曾此书始。图为钱塘陈一贯绘，新安汪忠信镌，甚精雅，惟尚微具粗犷气。崇祯间无名氏《天下名山胜概记》出，则其图渐趋细致纤弱矣。此书“说”皆出尔曾手笔，不类他书之专集昔人游记也。

金汤借箸十二筹

李盘撰 十二卷五册 明崇祯十二年刊本

此书有清代翻刻本，甚易得，然已削去违碍语。盖原本在禁书之列，久不得复睹矣。顷从叶铭三许得此书原本，甚为快意。李盘生当崇祯末年，乱兆方萌，此“十二筹”：“筹修备”，“筹训练”，“筹积贮”，“筹制器”，“筹清野”，“筹方略”，“筹申令”，“筹设防”，“筹拒御”，“筹厄险”，“筹水战”，“筹制胜”，虑深思周，固亦一有心人也。明代兵家言自戚继光《练兵实纪》、《纪效新书》后，作者至多，皆附图说，偏于实用。亦有辑古语故事者，若《百名将传》、《经世奇谋》等。但类多辗转抄袭。此书则合将略、故事及器用为一编，亦多蹈袭语。似为兵家实用之一手册。附图亦甚精雅。

百名家诗选

福清魏宪选 八十九卷存二十二册

（缺一——六） 枕江堂刊本

卷	一	魏裔介	卷	二	李 霁
卷	三	王崇简	卷	四	龚鼎孳
卷	五	梁清标	卷	六	王 熙（以上缺）
卷	七	钱谦益	卷	八	吴伟业

卷 九	曹 溶	卷 十	申涵光
卷 十一	曹申吉	卷 十二	佟凤彩
卷 十三	杨思圣	卷 十四	戴明说
卷 十五	沈 荃	卷 十六	陈廷敬
卷 十七	王士祜	卷 十八	王士祜
卷 十九	曹尔堪	卷 二十	施闰章
卷二十一	严 沆	卷二十二	宋 琬
卷二十三	张永祺	卷二十四	梁清宽
卷二十五	范承谟	卷二十六	魏裔鲁
卷二十七	孔胤樾	卷二十八	郜焕元
卷二十九	陈宝钥	卷三十	柯 夔
卷三十一	毛 逵	卷三十二	成 性
卷三十三	程可则	卷三十四	周令树
卷三十五	李衷灿	卷三十六	傅为霖
卷三十七	程 云	卷三十八	严曾榘
卷三十九	顾大申	卷 四十	陆求可
卷四十一	周体观	卷四十二	王曰高
卷四十三	范 周	卷四十四	王紫绶
卷四十五	遴窈奇	卷四十六	王追骐
卷四十七	李赞元	卷四十八	纪映锺
卷四十九	刘六德	卷 五十	黄骐若
卷五十一	宋 翔	卷五十二	孔兴钎
卷五十三	申涵盼	卷五十四	袁 佑
卷五十五	毛升芳	卷五十六	梅 清
卷五十七	计 东	卷五十八	赵 威
卷五十九	孟 瑶	卷 六十	程启朱
卷六十一	杨辉斗	卷六十二	成 光
卷六十三	黄 伸	卷六十四	黄 任
卷六十五	张祖咏	卷六十六	张鸿仪
卷六十七	张鸿佑	卷六十八	刘友光
卷六十九	戴其员	卷 七十	李念慈
卷七十一	陆 舆	卷七十二	沈道映
卷七十三	朱 骅	卷七十四	孙 郁
卷七十五	刘元徽	卷七十六	扬州彦
卷七十七	杨思本	卷七十八	刘维祜
卷七十九	王泽弘	卷 八十	丘象升
卷八十一	叶雷生	卷八十二	宗元鼎
卷八十三	毛师柱	卷八十四	黄之鼎
卷八十五	曹玉柯	卷八十六	吴学炯
卷八十七	释大依	卷八十八	释读彻
卷八十九	魏 宪		

右《百名家诗选》八十九卷，魏宪辑，盖续《石仓诗选》者。实只八十九家。每家有一小序，足资知人论世之助。“百”字系后来挖改，疑非原来书名。余先有魏氏《诗持》三集，复于传新书局徐绍樵许得此。价甚廉。故

虽阙前六卷，仍收之。绍樵云：有《石仓诗选》百二十馀册。余力促其出售。未商妥，而先获此。南洋中学有此书全帙，当借钞补足。宪自附其诗于后，不脱明人积习。所选未必皆可观。然其中诗集不传者居多。赖此，得窥豹一斑。

唐十二家诗集

不分卷十四册 明万历十二年杨一统刊本

一	王勃集	一册	二	杨炯集	一册
三	卢照邻集	一册	四	骆宾王集	一册
五	陈子昂集	合 一册	七	沈佺期集	一册
六	杜审言集				
八	宋之问集	一册	九	孟浩然集	一册
十	王维集	二册	十一	高适集	二册
十二	岑参集	二册			

右唐十二家诗集十四册，为南州杨一统（允大）刊本。明人编选唐诗者至多，自高棅《唐诗品汇》以下，至冯惟讷《唐诗纪》、张之象《唐诗类苑》、胡应麟《唐诗统笈》（仅见戊笈及癸笈二集）、曹学佺《唐诗选》，无虑数十百家，而合刻数家诗者却不多见。合刻初盛诗十二家者，有嘉靖壬子永嘉张逊业本，有晋安郑能本，余皆未见。此本题为“重刻”，却未说明系复刊何家者。三家所选十二家，名目皆相同。未知张郑二家孰为祖本。十月二十日，余终日清理书籍，欲脱离古书于虫鼠之厄，奔波于楼之上下，筋疲力尽，乃姑置之。乘车至中国书店，无一可资留恋之书。正欲废然而返，在堆满“廉价”书之桌上忽发见破书一堆，为书贾叶某之物，其中有旧钞本《天启宫词》及此书等。索价不昂，便收得之。自喜不虚此行也。时日色黯淡，西风凄厉，衣衫单薄，渐觉凉意侵人，然挟书臂下，意甚自得，同时获得者尚有程荣刊《嵇中散集》一册。孙仲逸序此书云：“于时作者众多，篇章繁赘。选醇摘粹，种种相望。苛严于历下，泛滥于新宁，使务精者致憾于多，博摭者遗恨于寡。均之二集，未为折衷。故总唐初四杰及陈沈王孟十二人为集。上尽正始之英，中罗开元之美，外联甫白之华，下杜中晚之渐。有唐之盛，班然备于斯集矣。”虽多溢美之词，然知择此十二家，尚有识力。暇当与他本校之，未始非重辑“全唐诗”之助也。每册均有“御赐天存阁”及“南海康有为更生珍藏”二印，盖自康氏散出也。同时散出者尚有刘侗《帝京景物略》等，悉为平贾所得。（北平图书馆亦藏有此书残本。）

嵇中散集

十卷一册 明万历年程荣刊本

程荣为刊《汉魏丛书》者。当时承七子之余风，士人竞以刊刻汉魏名著为事。《汉魏丛书》流传甚广，但荣此刻却不多见。不知尚刊有其他汉魏人集否？余颇思多搜罗明人单刊诸子与六朝人集。此愿不知何日可偿。盖限于力，未必能每见皆收也。此刻首有嘉靖乙酉黄省曾序，似重刻省曾本。但其中异处甚多。鲁迅云：“程荣刻十卷本，较多异文，所据似另一本。”（《鲁迅全集》第九册《嵇康集序》）鲁迅于此集用力至劬，其写定本已足为定本。然明刊旧本，仍可贵。

莆风清籁集

郑王臣辑 选六十卷十六册 清乾隆三十七年刊本

余不喜收故乡文献，以其过于偏狭，有“乡曲”之见也；尤恶稍稍得志，便事编刊乡里丛著。友人滕固，以介绍希腊、罗马及德国文化为职志，与余有同嗜。及其任职南京，久不相闻问。一旦相见，乃出所刊《宝山文献》诸集见贻。余颇怪其染时习之深。近从事“文学考”之纂辑，乃知地方诗文集之重要，复稍稍收之。然实浩如烟海，不能以一人之力一地之“资”搜罗其百一。聊备其所当备者耳。此《莆风清籁集》余偶得之于抱经堂架上，殊罕见，足资文学考之参订。固非以其乡邦文献而收之也。

第五才子书

金圣叹评点 七十五卷二十册

清雍正十二年句曲外史序刊本

此翻刻贯华堂本《第五才子》也，然罕见。首附人物图四十幅，笔致及赞语均臻上乘，颇疑即为翻刻老莲《水浒叶子》者。故余虽已收《圣叹外书》数种，却仍收之。某君曾语余：尝于日本京都某肆得贯华堂本《水浒》，首附老莲画人物像，当即此本。

余顷复收得原刻老莲《水浒叶子》一册，与此本图像对校，此本果即翻刻老莲所作者，不出余所料。原刻本所缺刘唐、秦明二像可以此本补之。惟此本将武松、戴宗二赞互易，大误。李逵亦易为手执二板斧，与原作异，原作神采奕奕，此本则形似耳。

石仓十二代诗选

明曹学佺编 存六百六十卷二百四十七册 明崇祯间刊本

《石仓十二代诗选》为明代诗选中最宏伟之著作，其明诗一部分尤其重要。《四库全书》所收，明诗仅至次集而止。谓三集以下均佚。《汇刻书目》载其全目，亦谓六集以下为钞本。实则石仓所刻明诗，不止六集。所谓礼亲王府藏本，于明诗六集外，别有明续集五十一卷，再续集三十四卷，《闺秀集》一卷，《南直集》三十五卷，《浙江集》五十卷，《福建集》九十六卷，《社集》二十八卷，《楚集》十九卷，《四川》、《江右》、《江西集》各五卷，《陕西集》三卷，《河南集》一卷。于六集中，又有：三续集十三卷，四续集九卷，续五集四卷，五续集六卷，六续集二卷，均刻本也。（《汇刻书目》作钞本，系据《啸亭杂录》，误。）群目为最足本。尝为陶兰泉所得。后兰泉所藏丛书悉售之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此书亦东去不返。（此本有礼王府藏印，必即为《汇刻书目》所云之本；惟《汇刻》所举，尚有七至十集，此本无。恐《汇刻》误记。以“九集”本即《社集》也。见后。）十五六年前，乃乾尝得残本百餘册，中有明诗七集及八集十数册，却又溢出礼亲王藏本之外。后乃乾所藏归于北平图书馆，其中七集及八集则归于南洋中学图书馆。余七年前，尝在北平邃雅斋见此书一部，亦有七集。渴欲得之，以索价奇昂而止。但终在他肆得次集五十餘册，载之南归。合肥李氏书散出，

中有明诗四集。余未及知，已为平贾所得。秋间，偶过传新书店，得清人词五十余种。徐绍樵云：有《石仓十二代诗选》一百余册，正在装订，其中明诗有八集九集。平贾欲得之，议价未妥。我闻之，心跃跃动。即嘱其为余留下。时未见书，亦未询价也。数日后，绍樵持魏宪《百名家诗选》来，余即购之。宪书盖续《石仓》者，不意竟先得之。叶铭三闻余购《石仓诗选》，亦至。云：彼亦有残本《石仓诗选》百余册。余促其携来。不数日，书至，凡一百十六册，反先于绍樵书归余。自古诗、唐宋元诗、明诗初、次、三、四、五集均有，而明诗奇零之极，三集仅有一册。然余竟以高价收之。绍樵书却久不送来。数次速之，一月后，书乃至。凡一百二十册，均为明诗，竟有八集三十余册，《社集》十五册，（以其中间标作九集，故绍樵目之为九集。）矜贵之至。八集数册及《社集》全部，其卷数均尚为墨钉，未刻。经数日之整理，剔除重复，凡得六百六十卷，二百四十七册。独七集竟无一册，续集则仅存第四十五卷一册；三集亦仅存一册（四卷）。其他各集，阙卷，阙页，比比皆是。然余已感满意。以斯类材料书固不能斤斤于完阙与否也。惟不知何日方得配齐全书耳。即借钞亦不易也。一书之难得如此！岂坐享其成者所能想象得之乎？八集中未刻卷数者凡三卷：（一）王留《匏叶诗》（附王醇）；（二）李生寅《高卧楼集》（附李德继、李德丰）；（三）文元发《兰雪斋集》。《社集》所收者凡二十九卷，均无卷数次第：（一）陈衍《玄冰集》，（二）张千垒《舒节编》，（三）陈正学《灌园集》，（四）陈伟《容阁集》，（五）郑邦泰《木笔堂集》，（六）林光宇《情痴集》，（七）徐燧《幔亭集》，（八）高景《木山斋集》，（九）崔世召《秋谷集》，（十）陈瞻《四照编》，（十一）林叔学《兼葭集》，（十二）张燮《藏真馆集》，（十三）黄天全《葆谷堂集》（附黄尚弘），（十四）吴潜《竹房稿》，（十五）颜容轩《鸣剑集》，（十六）倪范《古杏轩稿》，（十七）杨叶瑶《鸣秋集》，（十八）陈翼飞《紫芝集》，（十九）周婴《远游编》，（二十）林祖恕《山房集》，（二十一）游日益《辟支岩集》（附游及远），（二十二）李天植《冥六斋草》，（二十三）陈宏己《百尺楼集》，（二十四）陈鸿《秋室集》，（二十五）游士豪《集》，（二十六）游适游草，（二十七）李岳《湖草集》，（二十八）王宇《乌衣集》，（二十九）陈仲溱《响山集》。殆随得随刻，故不记卷数。以作者皆闽人，且皆学佺同社，故曰《社集》。不知较礼亲王藏本（仅二十八卷，此本多一卷）异同如何。明诗初集每卷皆附原集旧序或传，次集以下，则均无之。又一集之中，往往卷数多重复。为例甚不纯。当是未加整理之作，然明人诗赖此而活者多矣！自余购此书后，叶铭三知余亦收残书，复持某氏残书目二册来。中有天一阁旧藏本甚多。余得五六十种，亦意外之收获也！

陶诗析义

明黄文焕编 四卷一册 明刊本

六朝人诗，以《渊明集》刊本为最多。余既收《楚辞》不少，乃复动收陶集之兴。顷见正德刊何孟春注本十卷，为平贾所得，索价至二百金，为之愕然。力不能收，亦不欲收。但劫中所得陶诗，实多明刊本，而以黄文焕刊本为较罕见。文焕尝辑《诗经考》，余十年前收得一本。此书不屑屑于字解句注，惟释其大意而已。然多妄赞语，类大宗师之评点墨卷。盖犹是李贽、

叶昼、孙矿辈批评诸书之手法也。

碎金词谱

清谢元淮编 六册 又续谱四册 清道光间刊本

以工尺谱谱词者，此书当为第一本。余以其多窃取《南北九宫大成谱》，不甚注意，故虽屡见之，均不收。近来歌词之风渐盛，且有翻为西乐谱以便唱者。于是此书乃大行于世，颇不易得。此书有二刻，以写刻本为佳。余前在来青阁得写刻本“续谱”，顷复在中国书店得宋体字刻本正集。余集“词”甚多。此书自当在“词山”中占一席之地。惧其渐趋难得，故遂收之。非趋时尚也。

管子 二十四卷八册

韩子 二十卷八册

明万历十年赵用贤刊本

《管》、《韩》二子，明刊本不多，且均不佳。吴勉学刊《二十子》本，无注。惟赵用贤刊本独佳，均有注。（《管子》注，题唐房玄龄撰；《韩子》注，题李瓚撰。）足匹《世德堂六子》，为《管》、《韩》定本。大抵明人刊书，每多窜乱篇章，任意增删注语，甚乏忠于古本之精神。用贤所刊，则一以古本为主，谨慎严密，不师心自用。万历末有所谓“花斋管子”者，朱长春刊，即据用贤本，加以评释。《韩子》旧本，多所佚脱。用贤始据宋槧校补，力谋恢复原书面目，用力至劬。相传用贤刊书，均由子琦美助之。琦美即脉望馆主人，号清常道人，藏书甚富，钞校书亦不少，是明代一最谨慎小心之读书人。所刊书自是不苟。此二书余同时得于文汇。惜一为白绵纸本，一为竹纸本，未能匹俪。

萧尺木绘太平山水图画

清张万选编注 不分卷一册 清顺治间刊本

萧尺木《离骚图》，余藏有二本。惟《太平山水图画》则久访未得。十馀年前，曾于蟬隐庐案上见一本，正在装订。询其价，不过三十金。思得之，而肆中人云：已为日人某所购。留连数刻，不得不舍去。后见《支那古版画图录》，中收《太平山水图画》一幅，正是蟬隐庐售去之本，印本甚模糊，尚可相识。秋间，偶与石麒谈及此书，深憾未能获得。石麒云：张尧伦先生尝于劫中得一本，甚初印。我闻之，心跃跃动，力恳石麒向尧伦借阅，时余犹未识尧伦也。不数日，尧伦果慨然以此图相假。余感之甚！细阅一过，图凡四十三幅，无一幅不具深远之趣。或萧疏如云林，或谨严如小李将军，或繁花怒放，大道骋骑；或浪卷云舒，烟霭渺渺。或田园历历如毡纹，山峰耸叠似岛屿；或作危岩惊险之势；或写乡野恬静之态；大抵诸家山水画作风，无不毕于斯，可谓集大成之作已！不忍独秘，遂再度商之尧伦，付之印厂。后尧伦闻余收太平天国书数种，甚欲得之。余拟与此图相易。尧伦复慨然见允。于是此“版画”绝作，遂归于余。十载相思，得遂初愿，喜慰何已！所尧伦割爱相贻之情，亦“衷心藏之无日忘之”也！

付印后，某贾见告：某社曾翻印过一本。取得阅之，殊失原作精神，且原本亦非初印者。此本仍有重印之必要。几乎幅幅皆精，故不忍舍去一幅。竟全收于《版画史》之图录中。

礼记集说

元陈澹著 十卷八册

明万历间书林新贤堂张闽岳校梓本

此书得于来青阁。版式甚怪，每页上半均空白。寿祺云：此书无用，拟将上半页旧纸截下，作为补书之用。余亟救取之。首有“凡例”数则，述所据之“校讎经文”及所“援引书籍”，为通行本所未见。末页附一图，图绘数鲤向龙门跳跃状，殆坊费用以祝颂士子者。顷出此书示乃乾。乃乾云：上端空白，当是“高头讲章”，后人铲去不印入者。余本疑其为“高头讲章”本。果然余二人所见略同。

南柯梦

汤显祖撰 二卷二册 明万历间刊本

此《玉茗四梦》之一，于《还魂》外，此曲刊本独多。余有柳浪馆评本，有臧晋叔改本，顷复收得一万历间刊本，甚精。不知为何人所刊。然实刊于臧本及柳浪馆本之前。附图亦甚精美。数年前余在平曾获一本，甚初印，惟阙末数页，此本则首尾完全。杭州某肆于秋间出一书目，中有明刊《四声猿》及此书，价均廉。余托中国书店购之。但均已为他人所得。《四声猿》归朱瑞祥，复转售于来薰阁。此本则归富晋书社。余以十倍于原价之数，从富晋得之。嗜书之癖，弥增顽强，诚不易涂除也。

重刊河间长君校本琵琶记

元高明撰 二卷二册 明万历二十六年陈大来刊本

《琵琶记》明刊本最多，今所见者亦不下十数本，武进某氏影印之《琵琶记》，号为元刊本，与《荆钗》为双璧，均传奇最古刊本。原本曾藏士礼居，后归暖红室。今则在适园。然实亦嘉靖间刊本，非元本也。北平图书馆得尊生馆本，最精，余欣羨不已。然二十年来，余亦得精本不少。玩虎轩刊本，号为“元本《琵琶记》”，凌初成朱墨本亦自云据元本。别有容与堂刊李卓吾评本，金陵唐晟刊“出像标注”本，则通行本也。劫中，又得魏仲雪评本一种。然大略均不甚相歧。顷复于富晋书社收得陈大来重刊嘉靖戊午河间长君校元本，刊刻至精。唐晟本亦云出河间长君本，然夺去“凡例”“总评”及《音律指南》，河间长君序亦不署年日。此本独备。似龙胜尊生馆本。细校之，知玩虎轩本所云“元本”者，实亦据此本。而评语注释多攘窃之迹，而又妄事臆改，不若此本之忠实。此本为朱惠泉物，本欲求售于余，乃为富晋所夺。余必欲得之。乃以二倍之价，归于余。今所见诸明本《琵琶记》，于适园藏嘉靖本外，当以此为最精良矣。

皇清职贡图

董诰等编 九卷九册 清乾隆三十六年刊本

明人多绘苗裔图，施以彩色。清本苗图亦多。余以其皆为写本，不收。明刊《三才图会》，《精采天下便览博闻胜览考实全书》，及《石渠阁诸书法海》诸书中，皆有“九夷图”，而甚妄诞不经，甚至收及《山海经》中人物。《皇清职贡图》中所刊诸蕃夷，近自西南夷，远至西洋诸国人，则皆写实之作。原序云：“非我监臣所手量，我将帅所目击，我驿使所口陈者，不以登槩削焉。统计以部曲区名者凡三百数，以男女别幅者凡六百数”。此语诚可信。此六百幅图像，皆可作“信史”，确非妄为向壁想象者，不啻“册府传信之钜观”也。余在北平曾见一部，以价昂，未收。兹于富晋书社得之。绘图者为监生门庆安、徐溥、戴禹汲、孙大儒四人，刻工未署名。笔法软弱，虽细致而不奔放，盖“匠人”之作也。皇家刻本，大抵皆然。

尺牋新语二集

清徐士俊、汪淇同辑 二十四卷八册 清康熙六年刊本

余得《尺牋新语广集》于北平，甚有用。尝于来青阁架上见有《尺牋新语二集》，疑即一书，未加留意。后来青阁《临时书目》印出，载有此书，姑取来与《广集》一校。二书编制相类，取材却全歧。《尺牋新语》为徐士俊辑；《二钞》为士俊与汪淇同辑；《广集》则为淇独辑；俱收明清之际士大夫启札，多有关史实之文字。因复收得。周在浚等之赖古堂《尺牋新钞》三集，亦即其类。余尝得《新钞》二三集，未得初集；此书亦独阙《新语》（即初集）。想均不难配全。

澹生堂藏书训约

明祁承 著 不分卷一册 明万历四十四年刊本

《绍兴先正遗书》本《澹生堂书目》首附《藏书约》、《庚申整书小记》及《整书略例》；缪筱珊尝刊祁氏之《藏书约》及《藏书训》、《读书训》。此书则为万历原刊本，《读书训》、《约》及《整书小记》等均备于一编。诸藏书家皆未著录，诚秘笈也。首有郭子章、周汝登、沈 、李维楨、杨鹤、马之骏、钱允治诸人题序，亦他书所未见者。叶铭三携明刊残书百数十种来，余选购数十种，价甚昂。此书亦在其中，独不阙。余得之大喜。快读数过，若与故人对话，娓娓可听；语语皆从阅历中来，亲切之至。盖承 不仅富于藏书，亦善于择书、读书也。惟甘苦深知，乃不作一字虚语。余所见诸家书目序跋及读书题跋，惟此书及黄蕘圃诸跋最亲切动人，不作学究态，亦无商贾气。最富人性，最近人情，皆从至性中流露出来之至文也。缪刻多错字，《绍兴先正》本亦多所删削。稍暇，当以此本重印行世，以贻诸好书者。

读书志

明江阴周高起辑 不分卷二册
明万历四十八年周氏玉柱山房刊本

余今晨得明刊本《澹生堂藏书训约》一册，不禁大喜，快读数过，余味

若犹在舌端。此诚是真藏书人，真读书人之精神也！语语浅近，而无不入情入理。天阴欲雨，清晨皆消磨于斯。饭后微雨，地膏润若暮春时节。余欲访叶某，商购若干明人集残本，便冒雨至中国书店。心头犹带轻快之感。未遇叶而遇石麒。桌上堆满乱书，多为友人某君托售者。好书已去不少。余亦选购数种，皆诗人小传之属。此类材料，至有用。正选时，石麒打开一包云：“此为某先生所托售者”。内为《兰桂仙》及《读书志》二书。《兰桂仙》，余已有，遂置之。细阅《读书志》，正似将祁承《读书训》扩大数倍之物。不分卷，却分“好、蓄、护、专、癖、慧、适、友、助、激、观、遇、闰”十三部。周氏编纂此书时，与《读书训》刊刻时间相差不过五年，或是受祁氏影响而纂辑者。采摭颇富，而皆不注来历。仍不免明人纂书通病。但甚罕见；亦足为好书者案头常备之物。一日而连获此二书，颇自喜“书”运之佳也。

南华真经副墨

明陆西星述 八卷二十六册 明万历六年刊本

明人注诸子，好臆解，不如清儒之笃实。余方集周秦诸子，乃不能弃明人注不收。于罕见单行者，尤锐意购求，数年后或可略具规模。年来所获已十数种。今日过中国书店。郭石麒方自内地回。所得各书，已大半为平贾所得。案上尚馀数书，为彼辈所未见。余乃尽得之。中有《南华真经副墨》，刊本精至，书亦罕睹。通帙书法宗颜鲁公，庄重古雅，殊可爱。然其注则不佳。虽分八卷，而三十篇皆自为起讫。此种编法，亦是前无古人。

皇朝经世文钞

陆耀编 三十卷十六册 清同治八年金陵钱氏刊本

此书一名《切问斋文钞》；编于乾隆四十年，但原刊本未见。贺长龄之《经世文编》即续此而辑。余陆续收得贺氏、盛氏及光宣间刊印之若干“续编”“新编”等。独《文钞》未遑购入。沪战后一二月，旧书贾以篮筐挑书，沿街叫卖。有陈生者曾以此书及其他明版集子问余可购否。余未便夺之，但劝其留下此书。今乃无意于上海书林得之。价奇廉，仅国币二纸。此类书颇有实用，不当视如敝屣也。

请缨日记

清唐景崧撰 十二卷四册
清光绪十九年台湾布政使署刊本

余尝发一弘愿，欲收清季史料书。然实多至不可胜收，万非斗室所能容。乃先收其较罕见及记述较确实者。于中英、中法、中日及拳乱诸变，均有所得。顷于积学书社得唐景崧《请缨日记》，尤得意。景崧守台湾。中日战后，清廷割台于日。台人大忿，景崧被拥戴为“总统”。违命抗战。虽失败，其事则可泣可歌。此书为景崧身预中法之役，以日记体述其经过者。初刊于台湾布政使署。中有数页阙佚，以铅印者补入。当是携版归后重印于沪上者。

知本堂读杜

清汪灏辑 二十四卷八册 清康熙四十三年刊本

杜甫诗，注者极多，余不耐搜集，几于一种都无。近方收明刊本数种，（许自昌刻本，严羽评本等。）皆不惬意。此书以年统诗，颇与余意相合。灏自序云：“读杜必须编年。孟夫子知人论世遗训也。”又云：“合年谱于诗目中，庶读者了然，易于贯彻。”全集共收诗一千四百七首，而以附录殿之。其卷二十四：为“钱宗伯本附录”，凡《哭长孙侍御》以下四十八首；仇少宰本附录，“选存”《汉川王录事宅》等三首；更附“表赋”。清人注解书，皆慎重将事，不似明人之轻率。不宜以其“近”而弃之也。

陈章侯水浒叶子

陈洪绶绘 黄肇初刻 存三十八页

（缺二页）一册 清初翻刻本

余酷嗜老莲画。力不能得真迹，则思得其刊木之本，以其近真而不能作伪也。初获《九歌图》，墨色如漆，毛发可数，喜甚。持以较诸本，皆无出余右者。后获睹张深之本《西厢记》，首有老莲图，却不能收得，至今为憾。尝在北平肆文堂得李告辰本《西厢记》，亦有老莲绘图；其莺莺像尤佳，半弛其衣，态荡情醉，若出手迹，不类刷木。又友人周子竞先生藏有老莲绘《博古叶子》，余尝假以付故宫印刷所影印二百册。独老莲《水浒叶子》则屡求而未获一睹。诸家皆无之。某君曾收得《第五才子书》，云其人物图像为翻刻老莲本。然余亦未之见。读张宗子《水浒牌序》（《琅嬛文集》卷一），益深神往。私念不知何日得见此本。月前，于中国书店收得雍正刊《第五才子书》，首附人物图四十幅，疑即是翻老莲作，而未敢确信。昨夜，遇抱经堂朱瑞祥，谈及木刻书，彼云：所藏尚有数种罕见者。有《水浒叶子》，拟付石印，不出售。余喜甚，将信将疑。力促其携来一阅。今日果携来。刻者自署黄肇初，仍是清初的翻刻本。潘景郑先生所藏的那一部才是真正的原刻本。那个本子后来也归了我。曾仔细地对看了几遍，翻刻本虽有虎贲中郎之似，毕竟光彩大逊。

（编者按：本篇初版时作者以为所得为黄肇初原刻本，据新序订正。）

花草粹编

明陈耀文辑 十二卷附录一卷

存四、六、九至十二卷六册 明万历年间刊本

陈耀文尝著《正杨》，纠正升庵缪处不少，又著《天中记》，盖博雅之士也。《花草粹编》十二卷，又附录一卷，选辑唐宋人词；于清明人词选中，为甚谨严之著作。所谓“花草”者以“花”代《花间集》（唐五代词），“草”代《草堂诗余》（宋词）也。惟实非“花”“草”之合编，其所选尽多出二书外者。此书原刊本甚不易得，即清金氏活字本亦罕见。（国学图书馆有影印袖珍本，甚易得。）余尝在中国书店见残本二册为“四库底本”。馆员改易卷次，整齐词例之笔迹尚在。（《四库》析为二十二卷，不知何故。）以余未有“四库底本”一册，故收之，以备一格。叶铭三顷又携残本四册来，

亦收之。合之，仅得原书之半耳。

三经晋注

明卢复辑 十二册 明末刊本

所谓《三经晋注》者，盖合刻晋王弼注之《周易》、《道德经》及郭象注之《南华经》也。卢复《义例》云：“谈理莫若晋人。《老》、《易》之有弼，《庄》之有象，一曰理窟新义，一曰疏外别解。盖已为象弼之书，非复羲文，柱下，漆园之书也。”于《易》外，《老》、《庄》二书，均附李宏甫、袁中郎、刘孟会、杨用修、孙月峰之批评于眉端。此亦明人刻书之癖习。顷见来青阁书目有此书，以其不多见，且甚廉，遂收之。明刻诸子，以正德嘉靖间所刻者为最不苟。万历间赵用贤刊《管》、《韩》二子亦佳。启祯时所刻者则类多急于成书，未免草率将事。此书亦其一也。

古文品内外录

明陈继儒辑 《品内录》二十卷八册
《品外录》二十四卷十二册 明万历间刊本

《古文品外录》为万历间陈继儒选评，首有王衡、姚士粦二序及总校全书姓氏。所选皆为旨远情深之文，凡三百余篇。初无《品内录》之名也。二书版式亦绝不相类。《品内录》首有眉公序，所选自《考工记》以下至唐宋诸家文，二百余篇。每卷书名上所列陈眉公三字，似均系挖改补入。颇疑眉公序亦伪作，殆坊贾以《品外录》盛行，遂别选《品内录》以匹之。后更冒名以资号召。凡万历崇祯间诸坊本，号为眉公评选者，殆皆此类。余曾藏《品外录》一部，以此本璧合《品内》、《品外》二书，甚可怪，故复收之。

选编后记

郑尔康

今天——1995年12月19日，是您——我亲爱的父亲诞辰97周年。我在咱家的书斋——玄览堂里，写这篇短文，既是纪念您的诞辰，也是作为您的这一本书话的后记。以书来表达我对您的思念，应该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您说呢？

“玄览堂”这个亲切的名称，伴随了您大半生。数十年间，咱家从南方到北方，几经搬迁，您的书斋就一直用的是“玄览堂”的名号；现在，我的书房也依然叫“玄览堂”，因为这可以使我觉得您就在我身边，感受到您的温馨，鼓励我奋发向上。

不久前，北京出版社约我编一部您谈书的集子，我答应了，我想您一定会同意的吧？

“书”就是您，您就是“书”。这是我从记事的那天起对您的第一印象，我从小就是在您的“书城”中长大的。

由于您藏书丰富，人们便称您为“藏书家”，但是您却说：“我不是一个藏书家。我从来没有想到为藏书而藏书。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书，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头应用所需的。”

是啊，作为学者，书是您必不可少的。在浩瀚的书海中，您是一位游泳健将，遨游自如；您又是一块海绵，尽情地在知识的海洋中吸吮养份，然后消化成自身的巨大精神力量。于是，您的文思如泉，下笔万言。书斋里经常彻夜不熄的灯光和您熬红的双眼，我至今仍历历在目。于是，《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桂公塘》，等等，一部部传世佳作如江河之水，滔滔不绝地涌现在世人面前。

为了书，您自奉甚俭。作为一位名作家，您有相当丰厚的收入。但是，您的一生，又几曾穿过一件体面的衣服？又几曾为家里添置过一件考究的家具？直到晚年，您还睡在一张陈旧的木板床上。在许多老朋友家里都有了电视机的时候，您却不为所动，说是怕耽于看节目影响工作。您一生粗茶淡饭，每日只需一卷书、一杯醇酒足矣！您的稿酬哪儿去了？每当您手头有了钱，就必去“访书”，夕阳将下，微颺吹衣，您满载而归——拉回满满一车线装书……对此，母亲往往颇为不满，拉长了脸；而您，却孩子似地伸伸舌头一笑置之。晚餐后，您在书桌前坐下，拧开台灯，一手持酒杯，一手翻开久觅方得之书，如饥似渴地翻阅着，思索着，如同与好友久别重逢一般。您喜悦，您欢快，您陶醉，看到精彩之处，您便饮一大口酒，连连拍案叫绝！此时此刻，母亲总是在桌旁织着毛衣，脸上绽开了会心的微笑……此情此景，至今思之，宛然在目。啊，充满着温情，那令人心醉神怡的往事啊！

然而，谁又知道，书给您带来了欢乐，却也曾给您带来过多少辛酸痛楚啊！您曾亲眼目睹，您寄存在上海虹口开明书店里的一百多箱古今书刊，在“八·一三”的战火中全部化为了灰烬。当时，您站在远处，看见东边的天空，紫黑色的烟云突突上升，烧焦的纸页到处飘坠，然后像无数黑色的蝴蝶随风乱舞。您明白了，您二十来年的心血已付之一炬，您心里燃起了一团烈火……

还是在那黑暗的年代，您没有了收入，家境一度十分艰难。几年的时间，

为了一家数口的衣食，母亲几乎将家中所有能卖的——包括自己的嫁妆都变卖殆尽，有时还不得不向亲友借贷。卖书，渐渐地也变为了您的常事！把费尽心血买来的书又卖掉，无异于用刀在剜您的心。我永远不会忘记：每逢卖书的前夜，在小楼上昏暗的灯光下，您默默地打点着一捆捆第二天就要和您永别的书。您深情地望着，抚摸着这些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宝贝，似乎一下子老了十岁。这真是如同在和亲人诀别呀！事后很久，每当您谈起当时的情景，眼里还闪着激动的泪花。

“书”就是您的“命根子”，这是母亲常说的。可我却认为，您爱惜书，有时胜过了自己的生命。您大概不会忘的是，建国后的那一年，一位在香港的爱国人士，有一批古籍要捐献给国家，其中有不少珍贵的宋版书。当这批书运抵上海时，身为国家文物局长的您，亲自赶到上海码头验收。开箱时，许多专家学者都参加了，如逢盛典一般。当这批书要运往北京时，您坚持要亲自押运。可是这么多箱书，铁路只能货运，押运人不舒服不用说，而且很不安全；有人建议空运，您却涨红着脸大声嚷：“绝对不行！绝对不行！万一飞机出了事，这些书就全完了！”“书”，当时，您心里想的只有“书”的安全，却全然忘记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后来，是周恩来总理命令铁道部，把这批书作为“特件”，由您亲自押运到北京的。

您是一位赤诚的爱国者，因此您的买书和藏书又带有浓厚的爱国主义色彩。在漫长的“抗战八年”里，您没有和许多老友一起去“大后方”或是奔赴抗日疆场，而是留在了上海，以您独特的方式进行着战斗——为国家抢救了大量珍贵的文献古籍。胜利后，这就是您献给祖国和人民的“战利品”。用您的话来说，这就叫“书生报国”。

在您的这些赫赫“战功”中，最为辉煌的，最值得您骄傲的，大概就是那部《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了。为了寻觅这部书，您挨过了不知多少不眠之夜，您几下苏州、常熟等“藏书之乡”，您多方筹措书款。当您历遭磨难，几经周折，终于从一名书商手中，为国家夺回了这部比欧洲的莎士比亚还要早三百多年的伟大戏曲宝库时，归途中，您高坐“黄包车”上，像夺得了一座城池后凯旋的将军。到家后，您摸了又摸，翻了又翻，百感交集。您把全家人都召集来看这令西方人羡慕煞的“国之瑰宝”，像过一个盛大的节日。您的高声谈笑惊动了四邻，他们也都来看热闹。后来，您发现自己的大衣和帽子都不见了，竟不知是忘在了书商那里，还是丢在了车上，您呀！

您一生中，说得最多的是书，想得最多的是书，您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常和家人及朋友们说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我的这些书将来都是国家的。”这大概就是您“书生报国”的最后一个心愿吧？

“郑振铎——书”，“书——郑振铎”，人们只要一提起您，就马上会和书联系起来。您早已和“书”融为了一体，这就是您——郑振铎——西谛的特性。

一部有价值的书是永存的，因而您也是永存的——在人们的心灵世界里。

于京寓玄览堂

1995年12月19日

注：郑振铎牺牲后，家属遵其遗志，将近十万册藏书，全部捐献国家。现存北京图书馆。

